



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

于根元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于根元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1

(语言与传播丛书)

ISBN 7 - 5017 - 0963 - 7

I. 应... II. 于... III. 应用语言学—研究 IV. H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16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苏耀彬 电话 (传真): 010 - 6835 - 4197

个人主页: <http://fbshs.top263.net>

E - mail: cephs@economyph.com suyaobin@126.com

bianshensyb@yahoo.com.cn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白长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开 本: A5 印张: 9.75 字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17 - 0963 - 7/G · 16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53507 68308640 68359420 68309176

目 录

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

——代前言 于根元

1	学科的性质、范围和名称	(1)
2	学科建设的评价	(21)
3	学科建设的任务	(37)
4	交际理论	(68)
5	其他基本理论	(94)
6	语言全息发展论	(117)
7	关于“纯洁语言”	(130)
8	新词新语冲击波	(155)
9	网络语言冲击波	(192)
10	语言规范观	(207)

附录一 关于读书

附录二 参考文献

附录三 著述目录

后 记



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

——代前言

于根元

1992 年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开始建立，我国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就很活跃。我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些见解，也带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生，估计这些研究生里有的会有后劲。我自己来部分解读这个现象，也是讨论应用语言学的队伍建设。我自己作为研究者来研究这个现象，这个角度可能也有新意。所以，把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请来听一听。

一、我在创新和理论方面受到很多影响

我在上海人文初级中学念的初中。那是个不怎么样的初中，但是有不少好老师。我记得教我们历史的朱国璋老师，上课的时候常常引述《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学刊》上的见解。我们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老师很尊重我们，给我们说前沿的不同的学术见解。

高中更是这样了。我在上海五四中学念的高中。那是很有名的中学。我在 1958 届 6 班。班上的同学聪明极了，多才多艺。整个学校很活跃。电影《雾都孤儿》里的小女孩，是我们同学配音的。电影《街道足球队》，有我们的同学当演员。演相声，我们同学在市



里拿奖，在电台里演出。篮球，在市里警备队、交通大学都参加的比赛里得前几名。

老师也鼓励我们创新。我记忆深刻的有这样三件事。

一件是1955年，我刚上高一。语文老师刘田生准备讲《小二黑结婚》，要一个同学先创造性地讲一下课文。老师叫我讲。我离开课本，讲得很生动，同学听了前仰后合。结果，老师给了我90分。那时候我们像这样的考核几乎都是拿100分的。同学们对给90分很惊诧，我也惊诧。老师说“创造性不够”。老师给我们做了个简要的示范，课文时空大变位。我听了真是服了。后来，我总努力说得跟课本上的、老师说的不同，努力有创造性。

还有一件事是在高二的地理课上。蔡家龙老师要我回答问题。我又努力说得有创造性。老师先不给分，要同学们评论一下。同学们争论开了。结果，老师充分肯定了我的创造性，给了我高分。我努力创造了，老师看得出来，他们很高明，他们保护和鼓励我的创造。

第三件事是高三，还是高一的那位老师上语文课。我特别是语文学得好，老师提难答的题才叫我。老师叫我回答元杂剧产生的原因。我又创造性地回答了。老师说回答得很好，但是他又说高考的时候不要这样回答，高考不要标新立异。他又做了示范，第一什么第二什么，完全是八股调。后来我知道了，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你创新的，不是什么人都知道你是在创新的，不是什么时候什么人都保护和鼓励你创新的，碰到需要你创新的时候你创新，不要你创新的时候你也得会说八股。不过，我能不说八股的时候不说八股。我经常采用这样的方式：形式上像老一套，骨子里有许多创新。

我还参加上海青年宫举办的文学讲座。免费的，还发铅印讲稿。我听过许杰、顾仲彝、蒋孔阳、赵景琛一大批大作家、大文学理论家的讲座。

我的大学五年，基本上也是在思想活跃的氛围里度过的。



一进大学，就遇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不过情况还好，领导是做样子的，时间又短。歪打正着的是我们在学术上并不那么盲从，善于独立思考。

后来学术活动很多。老师的学术讨论会我们都可以参加。郭维森关于古典作品的作用是扩大还是缩小的文章，老师开学术会议争论，很激烈。系领导的学术思想很活跃，经常给我们谈很有创造性的见解。年轻老师跟我们座谈怎么学习。很有名的罗根泽教授跟我们谈怎样读书。

我们学生也有很多学术讨论活动。我参加讨论过白居易的闲适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等。

后来方光焘先生主持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那是我国语言学理论的一场大讨论，还请不同意见的高名凯来做报告，我们都是听了的。后来，方光焘先生还专门给我们开了一学期关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课。陈望道从北京回上海的途中来南京，做了几场报告，还跟南京的许多学者开过一次会，会上方光焘先生要求允许派外有派，我们都在场。

南京大学一毕业，我就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语言研究所，我的工作部门是学术研究部门，当然是很讲创造和理论的。文革当中，在干校的后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还细细读了不少马列的书。

二、我也参加了许多这方面的实践

大学里我也受了洪诚先生许多朴学的影响。洪诚先生也是思想很活跃的，但是朴学方面突出一些。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敦煌变文“是”字用法分析》（《中国语文》1965年第4期）是洪诚先生指导的。我写了许多札记，许惟贤先生辅导，洪诚先生指导。他们批改我的札记。我无数次到洪诚先生家里去接受指导。我在南京大学受到思想活跃、注重理论和朴学几个方面的熏陶。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风是很严谨的。我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工作了 21 年，受到很严格的训练。我在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等方面有过科学研究的实践，还在推广普通话等方面到第一线做过比较深入的调查。

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的训练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是敏感，有学术的新闻敏感性。《中国语文》处在语言学的前沿，编辑部的同仁谁发现了语言学术有价值的动向，经常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大家会及时讨论。

第二是知道取稿的标准不是自圆其说。研究当中有问题、有不妥，要实事求是地摆出来，不要回避，不要掩饰。取稿的标准也不是编者同意某种说法，也不是稿件里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重视的是有价值的新见。

第三是高效率。我们要组稿、审稿、加工、校对，工作很忙。校对就是三次，还要下厂核红一次。什么时候什么稿子送厂，什么时候什么稿子从厂里取回来，是有个严格的日程表的，绝对不允许耽误。我们还有许多别的工作。我们自己的科研，靠平时积累、思考，抓零星时间写。五一、国庆、过年，几天工夫就出来一个论文初稿了。没有人压我们，我们是很自觉地高效率。高效率成了习惯，就像许多农民不干活就难受。

第四是严谨和活泼的学风。学术空气很民主。学术空气就要民主，不民主就不是学术空气。说老一套就不是学术。我自己说新见，人家喜欢我说新见，我也喜欢人家说新见，新见当然就是不同于原来的见解。

语言所很重视培养年轻人。1964 年我从山东龙口北马北村劳动实习回京就当了一次值班编辑，苏培实帮我轮值。张朝炳比我大十几岁，手把手教我当编辑。文革以后，饶长溶也到了编辑部。在各种场合，我发言，他就对我会心地微笑，鼓励我。后来我自己发现我说的里面有很多是错的甚至是很幼稚的，饶长溶的学问那么大，



他当然知道，但是他鼓励我说自己的见解。后来我为主编辑《语言教学问题》（中国语文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为主编辑《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主编《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张朝炳很勤劳很谦虚地协助我，接受我的指挥。我也勇敢地指挥他们。我知道他们期望的就是我能指挥他们，他们鼓励我指挥他们。

杨耐思是研究中原音韵和八思巴字的大专家，他常常帮我改稿子。我常常到他家里去。哪里是他帮我改稿子啊，常常是我不同意这么改了，他要千方百计说服我，或者共同想一个好的说法来，或者是他同意了我的说法。

吕叔湘先生既是所长又是《中国语文》的主编。我很敬重他。有一段时间语言所在北京地质学院，我跟吕先生的家在永安里隔一条马路，编辑部有些事情让我找吕先生。但是我过年过节或者别的时候一般不去问候。吕先生对我的批评也很多，但是批评到位，我很服气。他在背后常常说我好话，说得也到位。我喜欢吕先生，他当面批评我，背后表扬我。我喜欢这样的人。后来我想：对于正直的人，你有什么必要去拍他马屁呢？对于不正直的人，你又何必去拍他马屁呢？主要的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语言所的许多学者对下很宽容。对权威敢提意见。有一次编辑部开会，张朝炳对吕先生提意见，跟吕先生你来我去争论起来。我好几次看到语言所的学者对权威提意见很激烈的。

我受了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我一方面很宽容，特别是对年轻朋友。《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说周瑜设计取荆州，以为诸葛亮中计，大笑曰：“原来今番也中了吾计！”（4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后来发现失计，第五十七回里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他没有找对原因。为什么老天爷生了周瑜就不能生诸葛亮呢？周瑜宽容些不行吗？我尊重年轻的朋友，不是一般的进化论，是我推崇鲜活，希望不要僵化，认为一个人不是一个方面好了各个方面



就都好，认为一个人不是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当了博导了就方方面面都是博导。还有就是选优，包括向年轻的朋友学习。我另外一方面是讨厌霸，特别讨厌欺负小字辈的霸。不过，这方面我也有了进步，不是一遇到我有不同意见的权威就提意见。有的权威或者够不上权威的不喜欢听不同意见，我就不提意见。本来嘛，人家不喜欢你提意见，你何必去提意见。

1984年10月，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建立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后来归国家语委，现在归教育部。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14年，我在新词新语、语言规划、社会用语规范、广告语言等方面都做过比较深入的调查。1994年到1996年担任《语言文字应用》主编，组织了关于语言观的大讨论。

1998年底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到现在也快7年了。我总想不丢掉原来国家队队员的水平。国家语委和有关方面的活动我参加得不少。有关的学术讨论会、规划会议、评估活动、课题，能参加的都参加。我离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时候跟国家语委的负责人说过：国家语委需要我做的事我会努力做。我兑现这个承诺。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这几年，便于我学术上滚雪球出成果和带了一些包括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生。

三、平民情结

这是解读我的一些理论认识和散文和生活态度的又一把重要的钥匙。

我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我1945年跟祖母、姐姐到苏北泰州乡下过了一年，还在那儿读了私塾。我和乡下的孩子在一起。我后来几次下乡。大学里几次去江宁县湖熟公社劳动。1963年10月到1964年9月在山东龙口北马公社北村一年。1965年10月到1966年6月在江西丰城先是石滩公社李家大队后来是桥东公社江下大队社教、劳动一年。特别是1963到1964年在龙口北马公社北村的一年。



我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不久，哲学社会科学部新来的大约八十个大学毕业生就到北马公社劳动实习一年。我们语言所同文学所是第一小队，哲学所、近代史所是第二小队，两个小队在北马镇。起初是劳动，后来分到各个大队帮助搞社教。再后来语言所的人回到北村大队劳动。我一直留在北村大队。这个大队有九个小队，一千多人。社教期间和后来，我主要做大队青年工作。前期我住在朱玉璋家，后来住在张茂田家了还是常常去朱玉璋家串门。我一直想着他们和那儿的朋友。我在一篇散文《尝鲜》里说：

我离开北村以后三十八年了一直没有回去过，可是心里一直惦记他们。我惦记那里河滩边的花生地，我惦记那里夜校的年轻人，我惦记那里冬天的吕剧演出。朱玉璋大我差不多十多岁，是我的大哥，大哥大嫂现在还健在吗？他们的孩子，我记得叫朱本玲、朱本英，还有小名叫秋忙的，你们都好吗？（《语言是大海》4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2005年4月15日我总算去了。朱玉璋早去世了，我看到了老嫂子，看到朱本英。他们也牵挂我。我们现在一直有联系。6月7日镇党委书记孙新河来了，他先去了我房东家，他捎来了我老嫂子的话，说是要我就把她当成我的老姐姐。

我生在上海，读大学在赫赫有名的南京大学，工作在北京，都在大城市。我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据说在古代相当于翰林院。我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两度当副所长，相当于副厅级，级别也不低了。但是，我的骨子里有平民情结、农民情结。我天生是个山野之人。

我总想，有一种平民原来是田舍郎，一朝登入天子堂，一有钱和权脸就阔。有的上层人有平民情结，英国王室不是有娶平民为妻的吗。

还有，似乎说中国平民敬畏大人物或者大一些的人物。这也不



一定。我这一次看我的房东，他们不因为说我是北京的专家就跟我生分。他们近来几次给我来电话，都直呼姓名。他们一直关心着我，想着帮助我。

我在北村一年，有个深切的体会：我们说人民、农民，不是抽象的，就是我的这些朋友。那时候我就下决心，我今后说话做事要很自然地想着让他们高兴。

我的理论认识里讨厌大欺小，讨厌霸道，讨厌贵族派头，讨厌瞧不起老百姓的语言，讨厌话语权在少数人手里，从这里可以得到解读。

我的散文里尊重小保姆，尊重售货员，喜欢牛郎织女、鱼姑娘、田螺姑娘，对不许牛郎织女长相守的王母娘娘不满，从这里可以得到解读。

我希望我的散文平民化和大气。我有平民、农民情结，我觉得踏实，所以才可能大气。

去北村那天上午，烟台师院的吕永进先陪我和妻子到张伟的万松浦书院。张伟到省里开会去了，张伟的秘书王东超接待我们。后来跟我通过不少信的张伟的好朋友王美盛也来了。王东超和王美盛问我为什么要去北村看看，我说了缘由。他们感叹地说这是我的财富。他们下午都陪我到了北村。一来他们在这一带熟悉，要为我找到房东出一臂之力。二来他们也希望看看这难得的场面。我理解他们说的财富，不是说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而是说我有这样的情结。这引起了一些缺乏这样情结的人的赞叹，引起了一批有这样情结的人的共鸣。

四、做了新词新语的整理和研究

这是我在理论方面有了比较多的认识的开始。研究新词新语，碰到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许多理论问题。

例如，说语言越稳定的越规范，新词新语是“风”“流星”



“昙花一现”。

例如，说汉语普通话里有了“出租汽车”，为什么要用“的士”。

例如，说：“一个新的语言现象，等它用的人多了，用的时间长了，我们来追认它是规范的，这就是规范工作。”说规范都是滞后的。

例如，说语言里不好的东西寿命短，会自然消亡，有价值的自然会长期留下来。

我们发现，这些说法的理论，差不多都跟索绪尔、斯大林的某些语言学理论有关。我们不得不审视索绪尔、斯大林某些有关的语言学理论。我们提出或者发展了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理论、交际值理论、新颖度理论、预测观、规范就是服务、积极规范。

新词新语是新东西，研究新东西就会碰到许多新问题。这几年新词新语的讨论是很多语言问题讨论的汇集，新词新语的讨论成了语言观更新的排头兵，我们有幸研究了这个问题。

五、读了《宇宙全息统一论》

我1994年细细读了王存臻、严春友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这本书。

这实在是一本好书。我读了之后知道，原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尤其是哲学家，从老子到恩格斯、列宁，对事物、信息的潜和显都有极大的兴趣，都有许多论述。我从中得到启发，在王希杰的基础上主要加上色彩，提出语言始终处在潜和显的过程之中。我们不同意语言产生和消亡的说法，提出或者发展了语言喷泉说、语言是个开放的梯形结构说、主体客体语言说。

在这前后我还提出或者发展了语言巨系统和惯性说，语言创新能力说，占位挤位说。我还认为理论是一种修养，不重视理论实际上也是不重视实践，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是我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标志。



六、逐渐走向前台

我在《中国语文》主要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组稿审稿改稿，还把自己的一些好的料子贴进去。此外还起草简报、报告。常常为别人或者为集体整理、起草稿子。这是很好的锻炼。在座的刘艳春在这方面也受到了锻炼。我在为她的《语言交际》（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一书写的前言《语言交际的书品》里说：

2003年春天，原来我参加撰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里的语法部分要修订，主要是比原来扩充十几倍。那时候我的视力很不好，我要刘艳春起草初稿。她根据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提供的许多实际语料以及别的材料，起草了七万字的稿子。有一次，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邀请有关的人讨论这部分稿子，我提出希望让刘艳春参加，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的领导非常欢迎她参加。刘艳春参加了这样高层的工作，也参加了这样高层的讨论。她的有效的研究工作，使她获得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现在大家看到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商务印书馆，2003）里的语法部分，是刘艳春起草的。

陈章太和我总主编了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我主编的其中第一本《应用语言学概论》就要付印了，马上要起草一个这一套书的总序。同样是2003年春天，我的视力很不好。陈章太提议我们再叫上周洪波周末到北京广播学院我的办公室里好好议一议，但是要有个人记录和起草。刘艳春做了记录和起草的工作。她又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刘艳春很快就写好了初稿，后来主要是陈章太修改，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总序。《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3期上刊登的时候，陈章太问我要不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刘艳春起草



的，我说不用了，刘艳春不在乎这个。后来陈章太拿到稿费还是我们两个加上刘艳春三个人平分了。（4页）

我希望我的年轻的朋友在这些方面多得到锻炼。

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4年，我起初当了6年所长助理，后来两度当副所长，做了一些学术管理的工作。1994到1996这三年很重要。这三年我担任《语言文字应用》主编，工作的学术性更强了，读书和研究的时间也比较多，这期间完成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一书，书海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是我走向前台的开始。

七、组织“语言哲学对话”

这是我走向前台的时候摸索共同学习和研究的路子。

1996年10月17日，我们开始了语言哲学对话。到1997年10月，第一轮告一段落。参加对话的大概有一百多人，说了话的并且发言进入书稿的有60人。成果是语文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的《语言哲学对话》。集中的成果是58个重要的见解，其中我参与提出来的有下面29个：

（一）语言最基本的，一是交际属性，二是社会的属性，三是兼有物质与精神的属性。特别是这第三点，更是语言的特点。这三个属性是相互关联的，这决定了语言的第二个层次的属性及其相互关联性。

（二）语言的基本部分也就是相对稳定的部分比较能产；而最能反映语言特点的，比较起来，还是语言里经常变化的部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相对稳定的部分的内部活动还更活跃一些，所以比较能产。

（三）语言的运动是开放的。从纵的方面说，语言是历时的产物，运动才能形成历时。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语言是一个纵横交错、相邻部



分叉动态叠加的系统。

（四）语言是个开放的梯形结构。下面同一些动物语言交叉。人还要同比人低得多的机器说话。上面同人的更高的表现手段交叉。体态语并不都是低层次的，它是跨许多层次的，有的在很高的层次。

（五）人是能影响语言的，不过，人要承担影响的后果。使语言更加健康、丰富、优美、文明了，人们要承担后果，使语言变得粗俗了，人们也要承担后果，而且群体很长时间承担后果。事先有一定的主动权、选择权，但是后果来了，阻挡不住，后果的影响也就是一种惯性。人们对待语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也很公平。种和收也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不想要豆子而要瓜，那么把豆子收了种瓜。

（六）研究语言的人文性，更要善于设想、联想。更要用开放型、发射型的思维。更要历史的、立体的观察和思考，更要跨学科，更要重视语言里的差异和重视差异的规律。研究语言的人需要聪明。

（七）人共振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使用语言，语言是含有意义的情况复杂的振动的巨系统。

（八）人选择有意义的声、光作为语言来交际，也是在交际的过程中来选择的。

（九）我们的语言观，最基本的是交际观。在交际这个语言的基本属性面前，任何语言学理论，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语言学家，顺者昌，逆者衰，概莫能外。

（十）意思不明的不是静态，而是非交际态、无效交际态或者交际的不完全态。

（十一）我们现在学校的语言教学，往往是模拟交际。我们学习语言，要学习交际里的活的语言，要尽量放在交际里学，学了要交际。交际要有一定的量，少了不行。长期进行不怎么准确的交际



学习也不行。一开始的模拟交际，如果还比较对头，到内化了，它可能是个基础；如果不怎么对头，到内化了，它可能是个妨碍。

（十二）吸取，都是本身的需要。能够吸取，一定有本身的土壤。吸取，一定跟吸取来的不完全一样。这本身或多或少就有创新。吸取得不够好，也有本身的土壤，有自身的原因。

（十三）语文工作一般情况下小步微调，条件成熟了也要不失时机地步子大一些。

（十四）语言的静态研究是初步的而不是基本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动态研究是语言研究的主导方面。

（十五）语言不存在事先就放在那里的静态的仓库。

（十六）中介语还是套在母语、目的语两个圆圈外边的圆圈，三个圆圈一起运动。

（十七）规律、办法，自己不会说话。由语言学者中比较先进一些的去认识、反映、感知、领悟，去显示。或者说是规律、办法一而再地找语言学者中比较先进的去显示。人是个显示器。发展我国语言学的办法和根据，是客观的规律、办法同站在语言学术前沿的语言学者相互能动的结合。

（十八）语言从人与人的对话发展到人与机器的对话，形式上似乎变了。但是，机器语言充其量是对人的语言的模仿，毕竟是派生物，何况现在的机器语言离真正的仿生目标还差得远呢。从根本上说，人机对话不过是人与人对话的延伸，语言的本质并没有变。

（十九）语言现象是千变万化的，但是变化是有规律的。条件变化，现象变化；条件有定，现象有定。我们有时候把比较少见的现象认为是异常、超常、不平常、非通常，往往是从量上面来考虑的，这个量又是我们很有局限性地观察到的。其实，不管量多量少，条件与现象的关系是一定的，这就是规律。一定的条件出现一定的现象，并不异常、超常。

（二十）从历史的角度看，或者从根本上说，语言工作的进进



退退是个规律。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螺旋式的，语言工作也不例外。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文字的本质和规律，因势利导地做好工作。

（二十一）这次新词语研究对语言观的更新具有冲击力。一是这次新词语的涌现是同改革开放一起来的，是同人们思想方法的更新一起来的，新词语是人们思想活跃的创造，是某些新理论的实践。二是新词语是语言里活跃的部分，是我们以前注意不够的部分，现在注意整理、研究新词语，发现原来的许多理论不能涵盖它。新词语是古已有之的新领域。

（二十二）文学作品语言是表示情绪的语言。人的表述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侧重逻辑、理智，对人们的影响容易立竿见影。另外一个侧重心智、情绪，影响是潜移默化，影响是情绪的碰撞。这是指整体的气氛，效果是一团情绪，不很计较一个一个具体的表述，不过当然是用许多具体的表述形成的。

（二十三）文学作品语言是整个语言里高层次的，特别是大型话剧、长篇小说，几乎包容了各种语体的语言。文学作品语言在整个语言里是带头的。文学作品语言是整个语言潜能的充分的释放。

（二十四）语言既有限制，又传意传情。传意传情要抵得上限制，否则就划不来，就不用或者少用。我们一面减少限制一面增加传意传情。有人说文学作品是带着镣铐跳舞。这比较多地说了限制一面。有限制，可是大概并不很痛苦。因为语言有层次。对低层次来说，限制并不很多。对高层次来说，限制多一些，但是，到了这样的层级，对低层次的限制到这里也淡化了，这里更显出语言是象征性的符号系统，并不斤斤计较形式逻辑等。表达心灵、心智、情绪，要用相应层级的语言。此外，共振的对方，层级要相当。

（二十五）不要把混沌性跟精确性对立起来。有的貌似精确，实质上不是精确。混沌是实质上更精确，不是乱七八糟。

（二十六）作家的语言示范和表率作用，表现在既规范又丰富



和发展语言两个方面。（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说法还是把规范跟丰富发展分开了，是不对的。关于这一点，我后来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为庆祝建所二十周年编的《语言文字应用论文集Ⅱ》的我的《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里改为：“一切语言示范者要在语言规范尤其是语言创新方面起到表率作用。”（143页，语文出版社，2004））

（二十七）我们要注意时空观。一个成品出来，是在不断改变时空的。我们常常说的“改”，是在另外一个时空里进行的，是在另外一个时空的认识下进行的。虽然在原来的稿子上改了几个字，科学的认识应该认为是另外一个东西，是另行铸造。学习别的，吸取别的，是创造性的仿制。稿子是能够在体外见得到的，所以我们会误以为文章在出来以后可以而且需要大动筋骨或者修饰。文章的形成，不是机械的卸拆装。不管怎么改，都是重新创造。同样，甲写的文章，乙进行了“修改”，文章出来了，实际上是两个人的创造。自己的文章，自己改好了，是自己“创造+再创造”的结果。

（二十八）多样化，一方面相对于简单化、贫乏、一体化。指的是丰富，品种丰富，情况丰富。另一方面相对于杂乱、不规范。多样化，是在规范层次比较高的基础上形成的。多样化，选择的余地大，便于表达多种多样的内容、情感、色彩。交际是双方的事，对方需要丰富，能理解丰富，这一方才好使用和发展他丰富的语言。而且有主体化，才谈得上多样化。

多样化的总的标志，是语言生活呈现出立体、多层次，多种多样，进一步满足多样化交际的需要，并且使用者总体认可这个趋势，推动这个趋势。多样化、丰富，是语言和语言生活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体化实际上是对语言生活的认识简单化、纯粹化，有时导致我们语言工作的粗糙化、粗暴化。主张多样化并不主张语言生活的随意性。这便是提倡多样化的同时还要提倡主体化。



(二十九) 语言生活是分层次的，语言是分层次的，一体化不符合语言生活的本来面目。主体化有助于多样化。多样化为主体化提供丰富的营养，有助于主体化。主体化是多样化的主导方面，不是多样化的对立方面。主体化在多样化里属于上位层次，其余处于隶属地位，在下位层次。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采用了对话这种比较好的方式。一些人心平气和地用对话的形式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是个好办法。说繁荣学术是百家争鸣，可是争鸣还是要争。其实还可以平等地对话，也无所谓争，是一起探讨。或许这样更好。我们进行“语言哲学对话”还想探讨和发展这种繁荣学术的方法。

第二轮是1999年12月13日开始的，到2002年1月10日结束，历时两年多一些。六次是在锦州师院语言应用研究所举行的，在座的刘艳春和尚春光参加了。三次是北京广播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参加的讨论，在座的赵俐参加了。一次是两校有关硕士生分头参加的关于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讨论，在座的刘艳春和尚春光参加了。还有是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长达近两年的讨论。

前两次主要是理论建设。

2002年3月16日~6月，我们进行了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这以后的重点放在队伍建设。我们应用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建设，一个是队伍建设。因为语言是个巨系统，引导它的发展，不能立竿见影，不能急于求成，要适度超前。我们过去对这一点认识不够，常常把语文工作混同于政治运动。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特别不能立竿见影，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建设不够。不重视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我们的应用语言学不能有比较大的发展。我们认识了这一点，前两轮语言哲学对话在理论建设方面起了一些作用，在队伍建设方面也起了一些作用。第三轮起重在



队伍建设。在座的很多人参加了。我们是个自学小组，我们希望通过讨论，培养我们自己这些人有一些特点。

例如，一是注意哲学层面，尤其是比较了解东方的哲学。有个大语言观。

二是联系实际，在语言实际的探讨方面比较深入。

三是有比较好的学风、文风、文笔。我们都是学院派的，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经院学派的。但是我们决不贵族化。我们来自平民，我们现在和将来还是平民。

四是我们还要多一些想象和假设。我们需要把自己培养成学者 + 哲人 + 诗人 + 商人这样的人。还要多一些浪漫的情调。

五是我们会有一定的共同点，但是大家都很有个性。有个性和团结是能结合的，关键是大家有包容心。我们一起探讨，就是来取长补短的。人才都是辈出的，辈出都是一起取长补短的。换句话说，我们一起探讨，就是要科学地进行队伍群体的建设。

队伍建设方面，这以后的讨论还有一个大的变化，是由在座的赵俐主持。

2002 年 10 月 15 日 ~ 2003 年 4 月 15 日进行了第四论语言哲学对话。

理论或者哲学层面的较大规模的讨论不是经常可以进行的。进行几轮“语言哲学对话”那是在世纪之交。时空点很重要。

八、方法上的特点

一是高效率。在《中国语文》的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

二是喜欢鲜活。我喜欢这样的哲学观，喜欢融于自然。我认识的很多语言学的道理是从自然、社会、生活的道理里受到启发的。所以我经常打比方。打比方是说明我的认识是从哪儿来的，也是想让别人也从那个源头得到启发。不是说比方就是论据了，打完比方就完了。我还是要从语言本身来说明的。我喜欢语言表达也鲜活。



关于语言表达的认识和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语言观。

三是滚雪球。这要有个随时调整的内核，要有个吸取营养的机制。这里要有比较好的角度和头绪。我们碰到的材料越来越多，要梳理和思考的内容和问题也越来越多。要逐步调整好角度，理出个头绪。角度是立足点，就是自己的今天的高度，应该是时代的高度，而且会影响今后。绝不是一般的评述，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各赏五十大洋，不是动辄就归纳个几多几少。头绪是认识到本质以及不同情况的不同体现。角度和头绪是有关系的。角度和头绪又是代表了水平的，这个水平又是逐步在对事实和理论的研究中提高的。所以，要在也只有在滚雪球的过程中滚好雪球。

我很重视写札记。随时整理和调整材料和认识，这就是发展。话说得重一点，我觉得不写札记学术研究不会有前途。前途就是发展。不滚雪球怎么发展？怎么体现语言全息发展论？

高效率方法的方法是滚雪球，滚雪球方法的重要方法是写札记。

九、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不老搞或者只搞语言学术沙龙，不老搞或者只搞“语言哲学对话”。内容要鲜活，样式也要鲜活。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专题研究。有几个成果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这篇论文比我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有这样一些进步。

一是含有交际理论，并且提出交际理论是纲。

二是粗略地说了几个下位理论的关系。

三是基本理论跟方法、方法论粗略地挂上钩。

四谈到不同意什么。

第二个是帮助赵俐完成专著《语言宣言——我们关于语言的认



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这本专著是四轮“语言哲学对话”的精选、重组和发展。我们到一定的时候整理和小结我们的认识。赵俐的这本专著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同时还注意点的突破。赵俐的这本专著也体现了这一点,这本专著在“语言创新和语言创新能力”方面有许多新的思路和实验,而且提出和阐述了发展“语言全息发展论”的思想。

第三个是《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长江学术》2004年,总第6期)。论文提出语言内核和外层的运动是双向的。还提出“解放思想,解放语言”。这是我2003年11月16日给武汉大学文学院部分老师和研究生做讲座的稿子。联系到我参加2002年10月25日~28日武汉大学等在武汉举行的“言语与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提要《关于“言语”和“言语学”提法的几点疑问》,大概可以看出《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的部分用意:

1. 提法的讨论有没有必要继续。20世纪60年代有过一次大讨论。主要在南京大学。发表阵地主要在《中国语文》,不久《中国语文》停止讨论,此后一直没有继续讨论。那时候我在南京大学。不久我到了《中国语文》。吴为章的《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里也介绍和分析了不同意见。

2. 关于“言语”的提法涵义也不同。关于“言语”20世纪60年代也有争论。方光焘和高名凯不同。因此引起关于“语言”的提法涵义也不同。有的认为是抽象,有的认为是静态的系统。

3. 现有的提法里都有些不严密的地方。例如为什么大量使用的是“言语”,几乎不用的是“语言”?动态的抽象之后为什么是静态的?个人用的怎么区分是非社会的,既然是非社会的,为什么等用得多了可以进入语言?现有的提法带来的问题是成了“追认观”“静态观”“历时共时严格限制”“全民语言及其变体”“语言有一个静态的仓库”的部分理论根据。有的“言语”的提法可能成了个“筐”。



4. 关于“语言”“言语”区分的估价。“语言”“言语”的区分既然是划时代的功绩，那么过去不分以及后来不分一定要犯错误。据我所知，丁声树、吕叔湘、朱德熙不分，我们可以找一找他们哪些地方因为不分导致了错误。

5. “言语”说有多少实际意义。“语言”的提法是有不同涵义的，提出“言语”是否解决了问题。发展语言运用学说、语言应用学说、语用学以及有关的学说，用了“言语学”利弊如何。

6. 我们认为“交际之外无语言”。我们提出“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我们主张“交际是语言的本质”“唤醒的是语言交际”“动态观”“前瞻跟踪观”“纵横交错的研究”“语言研究以人为本”。我们为包括“本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学理论”的“语言学”的发展而努力。

第四个是《语言是个开放的梯形结构》（《汉学报》2005 第2期）。主要是分析了语言能够显现的内部条件，认为语言的再潜是相对的，认为要重视拟声词，还认为语言交融能力是重要的能力。

第五个是《关于“语言全息发展论”》（《语言文字应用》2005 年第3期即将发表）进一步列出“语言全息发展论”的部分提纲，主要认为需要避免可能成为机械全息论，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是我们经常说“一粒沙子看世界”。我们总不能都去研究“沙子学”吧。一通百通和百通一通应该是分层次而且结合的。我们往往是对沙子之外显示的道理懂了许多之后才进一步懂得“一粒沙子看世界”的道理的。

二是人认识全息也有不同。我们说的语言的潜，实际上还有认识不到的含义。外星球之外还有外星球，那是存在的，我们没有看到而已。语言的许多规律，包括不是新的语言现象显示的规律，我们是逐渐认识到的。有的人认识到了，还常常有人长时期地反对某些正确的认识。有对有错，有前有后，有大量中介物，犬牙交错，相互转化，这本来就是全息发展论的基本内容。看事物的性质不能



只看“有”或“无”，尤其是中介物里充满了类型和程度的不同。

三是有人在找普适性语法，在找全人类的语言能力的最大公约数。现在个体或者部分所显现的全息，不是早先显示的全息。人比较充分地显示了生物的全息，但是现代人和原始人所显示的不同。今天的儿童跟原始人的儿童所显示的不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代一代人充而用之的积淀。从今天的儿童的语言发展来找人类起初的语言是很难的，因为这种积淀是动态的重叠的。说很难，不是不能找，但是不要要求太纯。

四是既然世界是全息的，这个道理就会反映在各个方面，谁都会认识到一些，谁都会说出一些。谁又不会认识得很清楚，谁都会有一些矛盾的认识和说法。但是有个大的倾向的不同。不要把一种大的倾向说成是另外一种大的倾向，也不要以为某某语言学家说过几句有全息论思想的话他就是全面的全息论者了。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分析。

五是我们研究语言全息，不只是把宇宙全息论运用到语言学里来。不是掌握了一些全息论，就是语言学家。语言学还得搞语言。哲学家谈语言有时候谈不好，语言学家谈哲学，可能对哲学有贡献。例如说语言里名词出现在前而动词出现在后，还由此说明语言结构对应这现实世界，这就有些问题。现实世界动不动？现实世界有没有“关系”？可能早先名词动词是混在一起的。我们是用今天的词类划分来说古代名词出现比动词早了。今天的很小的孩子说“奶”，大人会理解小孩说的是“要喝奶”，大概不会误解为这个小孩在显示他知道这个东西叫做“奶”。再说，体态语也很重要，它是跟语言一起用的，体态语分什么词类？其中什么词类比什么词类出现得早？

六是个体认识的情况很不同。有的人认识得快，有的人认识某一部分快。有的人一个阶段认识快另外一个阶段认识慢。有时候有的人认识的先后跟我们一般认为的序很不同。全息发展论也要关注



这一些。全息发展论不能大而化之，要关注部分、个体、个性。语言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比较活跃的外层以及中介物构成，活跃的、新起的部分显示全息比较充分。整个语言进一步显示全息往往从活跃的、新起的部分开始。近些年新词新语带来了我们语言观的更新，网络语言带来的冲击波至今还相当强劲。整个语言进一步显示全息，都从个人、一些人开始，所以要特别保护和鼓励个人、一些人的语言创新。

七是语言的问题也有全息性。我们讨论某个比较大的前沿的问题，总要碰到许多别的问题。有的问题解决了，也解决了许多别的问题。有的问题，需要别的问题的解决来帮助。学问也有全息性，高层次显示全息程度比较高。我们调整自己，跟高层次的共振，那是做学问的捷径。当然，事先要有一定的基础。

八是进一步显示全息都有条件，而且有或大或小的惯性，我们可以根据条件和惯性预测事物包括语言会如何进一步显示什么信息。

我们下一步还要从这个理论进一步认识很多方面。关于跟动态理论、层次理论、中介理论、潜显理论尤其是跟潜显理论的关系，比较好说。跟人文性理论的关系要进一步探讨。跟交际理论的关系，那是说交际是自我和相互的唤醒或催眠，是一种彼此的充而用之，是彼此的吸取能量。

我在《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一书里说过“语言交际是为了相互理解、推动认识、寻找认识的新的生长点，即兴口语表达也是如此，不是为交际而交际。要注意合作。所以要很好地听话。”（1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还有，信息的进一步显现本身就是一种发展，人进一步认识信息本身也是一种发展。全息里还有分工不同，不能因为分工不同而认为不是全息。语言学起初属于哲学，后来还属于文史，也说明学科的全息。学科的独立也说明分工不同。全息是既有联系又有类



前言

型、层次、程度的不同。需要注意大量的中介物，中介物里显现全息的类型最丰富复杂，其中也有联系和类型、层次、程度的不同，假设的两头显示的信息倒比较单纯。

发展这个理论，还要不限于这些。例如张炜的小说《满地落叶》（《山东文学》1988年第10期）里“我”跟果园的女教师肖潇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怎样判断一个人的修养：

她接上说：“一个人的修养怎样去判断？当然有很多的标准了，可是……”她停下来看看我，“可是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被人们忽略了。”

我问：“什么标准？”

“说不清楚。我只知道，一个人无论怎样高深，如果他（她）不愿亲近大自然，大自然也唤不起他的柔情，那么就不能算有很好的修养。”

我同意她的说法，进而补充说：“这对于一个人是太重要了。有人读了很多书，可仅仅把书做为生活的工具，也无助于修养。如果读懂了多少书还不能算作修养的最重要的标准，那就只能把它与大自然联系起来去考察了。”

（9页）

要学会同天地谈心。要学会领悟大自然里显示的语言和语言学的规律。我们要会生活，会理解、欣赏大自然。有兴趣，有智慧，有大自然的胸怀。

下一步计划2006年出版《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



1

学科的性质、范围和名称

○我们研究应用语言学，一开头就面临着这么一个学科的定位和定义的大问题。或许，这个问题不深究，也不怎么影响我们研究应用语言学。或许，在一定的层次里，就这么说吧；到另外一个高得多的层次里，用另外一套说法。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有时候看两套或者几套说法，不要都并列地看，它们可能是不同层次的。

○不要把应用语言学看成实用语言学。不要把应用语言学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一、开头的话

关于“博士”这个词的来历，有好多种说法。我比较喜欢说它是从“把式”来的，“车把式、茶博士、酒博士”，把式就是博士，博士就是把式。博士是老百姓里有一定特长的人。

博士本来是平民化的。可是有一个时期似乎形式上贵族化了，一想到博士，人们就会联想到洋博士、太阳镜、司的克、白手套，跟那时候的平民格格不入了。我认为博士应该还是平民，是从平民



里来的，永远植根于平民之中。博士是平民里的精英，平民里的精英不是脱离平民，只有深深植根于平民之中才能成为平民里优秀的一员。

我主张作坊里也能出精品。这是锻炼队伍。后来条件好了，这种精神和起点比较高的认识不要放弃。特别是一个人做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又是还没有成绩和显示能力的时候，不能要什么条件而且也没有什么条件，又要创业了。在作坊里干活，不见得认识就一定土就一定低，认识的层次可以很高。需要的时候，正规军也能打游击，而且打得好。打阵地战不能小看打游击战，阵地战也不是队伍整齐地敲锣打鼓列队走向敌人。

崔永元《不过如此》里说：“那么，平民的特征是什么？我觉得是善良、真诚、与人沟通、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都是平民最本质的特色，而不是穿打补丁的衣服就是平民。”（311页，华艺出版社，2001）我赞同崔永元的看法。平民最本质的特色是厚道，不霸道。

叶圣陶说学语文是为了不用学，教语文是为了不用教，当然主要指的是学校里的学和教。我们在座的学了19年了，有的年头更多，为什么还来学，来学什么，怎样学。

学位是需要拿的，还要学真本事。学什么？博士当然要博，既要博，还要深。还要有一招。学了之后不用在学校里跟老师学了，会自己学了，是要会用好自动升级的程序。电脑是仿人脑的，电脑升级很快，从286、386到了奔腾3了，还有更高级的。这是好事，可是我们一般人的电脑老跟着更新负担不起。我们人脑里天生是有个自动升级的程序的，我们在学校里学，最主要的是要学会用好这个自动升级的程序。学这个，比学得博、深要重要得多。我们说要有一招，主要说的是要有这一招。

我们现在博士后面还有“研究生”三个字。这个研究生，是要成为探索型或者加上工程型的研究人才，甚至成为领导型、骨干型



的研究人才。

我们应用语言学的特点是应用和交叉，我们应用语言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应用和交叉。我们要有本体研究的功力，在知识结构方面，语言学科的几个主要方面，理论、写、说，应用，要几项全能。还要高效率。我们经常要调查研究，要会田野作业。要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有科学工作者的品格和事业家的眼光。不保守，不迎合。学术跟权术不能掺乎。要有骨气和策略。还要有时空观念，会审时度势。

领导型的研究人才要自己真正承担课题，是高层次学术群体的核心，要团结人和关心人的各方面。领导学术的主要方式是以学术引导学术。还要既把握学术的方向和动向又会微观操作具体进行，不是大而化之。骨干型研究人才是次高级人才，是开拓型和工程型之间的，能领会开拓型研究人才的研究意图，把这些研究意图创造性地细化、系统化，变得好操作。

博士生不是比本科生、硕士生越学越难，应该是越学越容易。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了，有了一定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了，应该是越学越容易。如果不是这样，就有些不正常了。

也有越学越难的，也有不少人没有学好，反而滑坡。不是有“傻”博士之说吗，越念越傻。有个念硕士的跟我说，她很苦恼，她发现她们那儿不少博士研究生好像挺傻的，她怕也越念越傻。念书的确是有越念越聪明和越念越傻两种可能。这位硕士生后来也念博士了，并不傻。

要做到不傻，无非是按照规律来学。书如果本来写得不太活，我们念得又不太活，死读书，死读书，必死无疑！读活书，活读书，怎么会死呢？怎么会傻呐？

我们的学习，主要用熏陶的方法。我不怎么赞成用循序渐进的办法。那个序是谁定的？前人的学问，好几千年了，我们十几年里怎么循序渐进地学？例如用电脑，如果我们不是研究电脑演变史



的，何必一定要从 286、386 用起。有人说走还走不好不能跑。怎么叫走好了？跑的人都走好了？小孩是先会跑的还是会先会走的？应该说走和跑都是分层次的。还有，谁把第一册全学会了才学第二册的？第一册学到一定程度了，就可以学第二册，学了第二册回过头来会对第一册有进一步的领会。有的地方放在一年级上的课，换一个地方可能放在二年级三年级上。

我们博士生上课，学最前沿的，最新鲜的。问题有全息性，知识有全息性。前沿的、新鲜的反映全息比较充分。后生长的，反映全息比较充分。今天的社会比以前的社会反映社会发展的全息比较充分。新词新语和新的语言现象反映词语和语言的全息比较充分。学术的新成果在学术的前沿，迫切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现实的和理论的重大问题在学术的前沿，学术的重要的新的生长点在学术的前沿。我们这样按规律学习，要傻也傻不了啊。当然要有一定的基础。要了解一般情况。要适当补课。

用熏陶的办法更要有悟性。我们现在始终是小班学习了，不是搞工业流程了，特别讲究因材施教了，教一个是一个了，这样的教学接近艺术了，特别要有悟性。

我们说要学前沿的、新鲜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不喜欢老一套。崔永元《不过如此》里还说：“我说，你喜欢过期变质的礼物吗？”（同上 237 页）我们不是提倡语言也要新鲜吗？大家讨厌套话，讨厌口头禅，因为它不新鲜，没有营养，可能有害。我们也讨厌不新鲜、没有营养、可能有害的所谓学问。

跟这个有关的还有一个唤醒理论。有一个“白板说”，说是人生下来大脑里原来是一片空白，学了一句话大脑里才有了一句话。乔姆斯基提出语法装置说，根据之一是儿童语言，儿童学说话并不是一句一句学的，他学了一句话经过天生具有的语法装置会出现很多句话。乔姆斯基认为人天生就有语言方面的创造性。我们更同意语言与生俱来的说法。许国璋说《马氏文通》里已经吸取了这个



说法。

语言如果是与生俱来的，人后天是唤醒语言。唤醒要找高明的人，要找在这些方面已经醒了的人，找善于唤醒别人的人。“语言唤醒说”是尊重人，把主动权交给自己。人们讨厌老一套，那也是觉得没有受到尊重。所以人们追求进步，呼唤引导，呼唤唤醒，这也是人的天性。人们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能得到满足，会非常不满，犹如对大学生上课还老说中学里的内容。

熏陶，唤醒，要自愿。要自学为主，自己研究为主。我们是考进来的，是自己要求唤醒的，来学习不是做红萝卜，不是做香蕉人，不是镀金。不是光会一些名词术语，不是徒有其名。适当的包装是为了跟内容相配，也是方便和美感。学习是为了觉悟，为了自在，不是更麻烦，不能学了以后去吓唬人。

要相互熏陶和唤醒，所以要相互讨论。做学问就是碰撞，互相找新的生长点，互相选优，共同提高。

熏陶，不能立竿见影、急于求成，要看后效应，要接受社会历史的检验。研究就是探索。对探索的鉴别本身也在探索。不探索是最大的失败。不发展是最大的不规范。要保护探索。我们要重在探索而不要太在意眼前别人对你探索的成绩的评价。

有的博士生考上之后似乎有些滑坡。考的时候，面试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考生风度翩翩，英气勃发，古今中外问题对答如流，很有锐气。录取之后，似乎不如原来来了。原因可能很多。我觉得，博士生谦虚是需要的，但是要善于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学术上有些见解错了也没有关系。学习也要有勇气，要对前人敬而不畏。使你畏的一些书不看也罢。对相应程度的人谈的学问，是使人们觉悟的，是使人们感到亲近的，是使人们觉得也可以努力做到的，是鼓励人们给人们勇气的。如果是吓唬人的，肯定不是真正的学问，这是检验学问的一个标志。我们一定不要被假的或者掺假的学问吓倒。我们以后也一定不要去吓唬别人。



还有，一定不要浮躁。浮躁是想种豆得瓜，种豆是得不到瓜的，管分配成果的人也一定不能给种豆的人得瓜，也不能给种瓜的人得豆。我们说成果的分量，是指学术功力加必要的劳动时间。除了有分量，还要巧，要机智，要高效率。我们要会几件事一起做，要适当忙一些。要会安排时间，手勤一些，多思考，会利用零星时间，利用各种时间，有时候要倚马可待，有的时候要拼一下。

特别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搞科学研究，创造、发展，比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说要有语感和论感两头并且相互促进，指的就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神。特别要做大量的调查工作，要做第一手的调查。理论要力求解决问题。我们在理论上有一些建树，首先考虑的是解决现实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我要建立什么理论了。理论不要玄虚，不要花哨，不要吓唬来吓唬去。如果我们理论建设不够，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够。

进一步解放思想，才可能进一步解放语言；进一步解放语言，也是进一步解放人自身。

二、学科的性质

应用语言学学科的性质，也就是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定义。我们在我主编的《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里提出了“简单地说”“进一步说”和“打个比方说”：

简单地说，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有关方面发生关系的学科。

进一步说，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应用各部分结合部、接触面，包括结合、接触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的学科。

打个比方说，好像一个轴承，一面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一面是发生关系的各个方面，两者之间的一个个



1 学科的性质、范围和名称

滚珠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个分支学科，他们相互接触、推动，它们还嵌在一里一外的槽里，都跟槽相互接触、推动。应用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所有的滚珠以及跟槽的接触部的动态的规律，包括共性和个性。举例的时候，可能举这个或者那个滚珠以及跟槽的结合部的情况。（23 页）

这个比方，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的开头说过。（9 页）

这里要说明几点：

（一）我们可以对上面的定义画图来说明。例如一个圈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外面有很多圈跟它交叉，发生关系。例如有一个圈是“教学”，交叉的部分是“语言教学”，属于应用语言学。这个“语言教学”不等同于“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也不等同于“教学”，也不是两者的相加。如果说是化学，我们研究的是两者的化合。如果说是物理学，我们研究的是两者接触时候的热反应或者电火花。但是“语言教学”跟“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和“教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语言教学”，要对“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和“教学”相当了解，尤其要有很好的“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方面的功底。交叉学科绝不能是“四不靠学科”。交叉学科的好处就是可以从有关方面吸取营养，也容易对有关方面作出贡献。我们在“语言教学”研究方面有了成绩，必然会对“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和“教学”也作出贡献，只不过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加自觉。

（二）“应用语言学”不是应用语言学几个分支学科的拼合，不是分支学科一加分支学科二加分支学科三。“应用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所有的滚珠以及跟槽的接触部的动态的规律，包括共性和个性。”

所以，研究应用语言学的人从事的项目就是五项全能或者十项全能。你要在五项全能或者十项全能里成绩靠前，总得有一两项成



绩真正是拔尖的，而其他几项也不错。不过，大凡在几项全能里一两项成绩真正拔尖的，其他主要的几项也不会太差。

（三）我们取的应用语言学的定义是广义的。陈章太和我的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里说：“应用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分广义、狭义两种。狭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中国一般取广义的，也有取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概论》3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里还说过：

还有，外国起初是狭义应用语言学还是广义应用语言学，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使外国起初是狭义的，也不是说我们中国也要搞狭义的。主要看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当然不能老是改，但是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障碍。教育部没有规定只能搞狭义的，那么，我看愿意搞狭义的就搞狭义的，不要批评别人搞广义的。

（四）应用语言学里包括语言应用。所以我们的定义里有“语言本体”几个字。我在1987年10月24日下午在“广州工作会议”上解释说：

有人提出我们讨论的“应用语言学”是“应用 | 语言学”呢还是“应用语言 | 学”，我认为包括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应用语言学学”，后面两个“学”重合起来了。（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20页，书海出版社，1966）

（五）关于定义的提法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在我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里说：“是研究语言和语言学同应用各部分接合部、接触面包括结合、接触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普遍性、特殊性的学科。”（7页，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1999年10月18日我在“第四次应用语言学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研究应用语言学方法



论的几个问题》里对上面的定义做了自我批评和调整：“例如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定义，说是语言和语言学同什么什么怎么样的学科，就有待于调整，因为应用语言学本身属于语言学。或许可以这样说：应用语言学是语言本体研究同语言学之外有关方面发生关系以及应用语言学再应用的学科。”（于根元主编《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31~3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仲哲明还说过一个定义：“我国学者提出，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学科’，……”（仲哲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上）——汉语文教学及语言规划、术语学、语言的社会应用》，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219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三、提出应用语言学理论的依据和意义

讨论应用语言学学科的性质，首先碰到的是应用语言学到底有没有理论。

过去，不少人说应用语言学本身是没有理论的，它只是理论语言学的运用。一个来源是外国，例如英国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不知道是这本书本身不太好读呢还是译文不太好读，但是关于这一点，译文倒是说得很清楚的：

把语言学知识运用于某一对象，或者说，应用语言学（其名称的含义就是如此）是一种活动，不是理论研究，而是把理论研究的成果付诸运用。应用语言学家是理论的运用者，而不是理论的创造者。如果我们按照“理论”一词在科学中的用法来使用它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语言教学理论”、“言语障碍病治疗理论”或“文学评论理论”。（2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有人说皮特·科德的说法在国外只是一种说法。这是可能的。



但是这种说法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外国是一家之言，介绍到中国之后，许多中国人以为这是外国唯一的或者是权威的或者就等于非常正确的说法。不过，皮特·科德的这个说法在外国大概是很流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副主席德国的居尔晚1990年4月1日~15日来我国访问，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做了四场学术报告，谈的都是应用语言学的前沿问题，介绍了国际尤其是欧洲尤其是德国应用语言学的情况，我是都听了的。我又几次读了打印的他的“应用语言学演讲录”中译本。这些都没有消除我上面的感觉。

中国的说法如刘涌泉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关于应用语言学同语言理论的关系就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理论要以应用（实践）为基础，应用又以理论为指导。可以说，语言理论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武器，而应用语言学则是鉴定各种理论的实验场。”（460~4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1987年10月23日~24日编写“应用语言学导论”的广州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有理论。我们在访问中也有学者说：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它本身是没有理论的。我们1987年，一路征求同行的意见，一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不同意这个意见。在广州会议上我们初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吴启主发言说：“语文政策要科学化、理论化。例如现代汉字问题就研究得很不够。我们省的自学大纲，我就把汉字部分去掉了，等待研究。语言应用本身有理论问题。怎么没有理论呢？例如翻译，翻译也是创造，也有自己的方法理论，我们写《应用语言学导论》的过程中就有理论充实语言学。”（《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15页）我说：“以理论、原则、方法为纲来串这本书，举例不受块块的限制。”（同上21页）龚千炎说：“我们澄清了一个认识，就是语言理论的运用、语言运用本身还不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里的一个分支，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应用语言学最大的特点是应用，但不是一般意义



1 学科的性质、范围和名称

的应用，它本身有自己的理论、原则、方法，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们主观想象的。”（同上 24 页）

1986 年 9 月 1 日～9 月 5 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筹办的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头一天的开幕式上我说了《致年轻的同行们》。1991 年 5 月 3 日～6 日，湖北省语言学会语言应用研究中心和湖北襄阳师范专科学校联合主办的中青年应用语言学术讨论会在襄阳师专举行。主要议题是：汉语及汉字的教学研究、语言学及其子系统的应用研究、语言学及其他学科交叉应用研究、广义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其他问题。我提交了《关于语言应用研究——再致年轻的同行们》。基本内容写进了 1993 年《语言文字应用》第 2 期《领先科学——语言学的本质》。文章说：

应用不等于简单的把现成的理论拿来用用。大理论就那么一些，为什么用起来就大不一样了？这当然有个对理论的掌握、理解问题。另一方面，应用对理论有验证、调整、补充的作用。有时候是很大的调整。所以不能小看应用研究。拿语言学来说，有一种说法，好像应用语言学是理论语言学的应用，本身并没有理论。其实，就拿理论应用来说，语言学的许多学科有谁准备好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好让我们来用呢？我们一面解决实际问题，一面还要注意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来完善或者建立某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本身还有理论和方法，近来不是提出了个“应用理论”吗？

我觉得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都有个层次问题，例如概括了第一层次应用的基本规律的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而掌握了第一层次基础理论的第二层次的应用则比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高，当然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



萧国政《世纪之交的语言文字应用之走势——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座谈会纪要》（《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4期）说：“李宇明说，过去似乎有一种观念，认为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没有理论价值，也不需要什么理论，只要把基础研究的成果拿来应用就行了。而事实上，语言文字应用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研究领域。首先，语言文字应用是多学科共同参与、直接关系到上亿人的语言生活的重大社会工程，没有理论的指导，语言文字应用就必然是一种低水平的，甚至会出现诸多失误。例如，我国的语言规范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停留在‘匡谬正误’的水平上。”纪要接着说：“第二，多数基础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进入到语言文字应用领域，而是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应用性改造。比如，要把现代汉语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去，就需要在语言学习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应用性改造。我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在一个时期内‘推而不广’，至今还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与缺乏语言学习理论的指导不无关系。第三，语言文字应用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而且可以对已有的语言理论进行验证和修正，通过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语言理论。例如，近几十年来从儿童语言习得、失语症、语言规划、语言运用等一些语言文字应用领域，就总结出了许多新的语言理论。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新的语言理论中，有一大部分是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还有一件事，1995年12月25日～28日，由国家语委主办、语用所承办的首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举行。在一次分组会上，一位很有名也很有成就的外语应用语言学家说了“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这样的意思。我没有直接提出不同意，而是说皮特·科德说应用语言学是怎样的学科，我不同意，我认为应用语言学是什么样的学科。王希杰说了赞同我意见的话，那位外语应用语言学家同王希杰有几次交锋。那位外语应用语



言学家是我和王希杰的好朋友，我们才在会上讨论。不过，那次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这个消息传到了各个组。

后来我们归纳了应用语言学有理论的几个主要依据：

（一）没有人事先准备了完善的语言学理论以供应用。应用语言学常常要一边解决实际问题一边建立和完善应用语言学理论。这个认识受了毛泽东的启发。毛泽东说：“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比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需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791 页，人民出版社，1991）

（二）任何层次的应用都包含了下位层次的理论。这是吸取了毛泽东关于“实践—理论—实践”的思想。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96～297 页，人民出版社，1991）

（三）语言学之外也有理论。本体语言学可以从语言学之外吸取理论，例如据说语法关于动词的价就跟化学元素原子的价很有关系。应用语言学也同样可以从语言学之外吸取理论。戴昭铭从法学的无罪推定吸取关于语言规范的理论讨论“涉及到、见诸于”（《叠架形式和语言规范》，《语言文字应用》1996 年第 2 期）。关于“无罪推定”，《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4 年第 1 期老地的《花心不是



我的错》有个解释：“1997 年修改后的《刑法》有一条原则叫做无罪推定，说白了就是我掌握了你有罪的证据才能认定你有罪，而不是先假定你有罪再逼你交出有罪的证据，后者是有罪推定，新《刑法》摒弃了这一点。”（199 页）我们说“规范就是服务”（参见季恒铨《读 1991 汉语新词语》，《语言文字应用》1993 年第 1 期），是从管理学吸取理论。（参见《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271~273 页）

应用语言学理论最根本的最终来源是语言生活实践。这方面的成果最多。例如我在《语文建设》1996 年第 3 期上的《说“友”》阐述“占位、挤位”的认识。1961 年 10 月，陈望道在好几个地方作学术演讲，有一个演讲录叫《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收在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陈望道语文论集》里。那个演讲里多次说到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研究语文，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616 页）其实，最根本的来源就在我们的屁股坐的地方：中国的今天。

美国詹姆斯·莱德菲尔德的《塞莱斯廷预言》是 1995 年、1996 年在欧美极为畅销的书，张健民、唐建清的译本昆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书里分析亲近的人为什么会发生权力争夺。书里说：“你知道，我们看上去像字母 C，我们很容易滑向异性，另一个半圆圈来到我们身旁，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就成了整圆——她们给我们惊喜，给了我们能量，这种感觉好比完全与宇宙发生联系时产生的圆满感。事实上，我们只是与另外一个人发生了关系。而他（她）也正在外面寻找另外一半。”（217 页）书里把圆满的比作字母 O。（同页）我受了启发，在我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里说：“最根本的是紧密结合我们自己的地域上联系世界的、学科上联系各学科的、时间上动态发展的语言生活，成为 O 字母。这是能量最大最根本的来源。别人家能量交流、循环的 O 字母也是这样形成的。这样，我们才能为世界、为别的学科、为今后作出贡献。这



1 学科的性质、范围和名称

样，学习外国、学习古代，处理同理论、事实、政治、经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可能正常交流，不会受干扰，不会被侵吞。”（267～268页）1997年1月10日我们以“怎样发展我国的语言学”为题的“语言哲学对话”里萧国政引用《塞莱斯廷预言》说了同样的意思（《语言哲学对话》157～158页，语文出版社，1999）

经常性的是综合的来源。例如综合儿童语言发展史来研究语言发展史。（参见《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275～277页）

（四）上面几个依据主要还是思辨性的。最根本的依据是下面的实绩。

我们梳理了一些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1999年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做了一些应用语言学理论的梳理工作。其中有动态理论、层次理论、中介理论、潜显理论、人文性理论。原先的提纲（见《语言哲学对话》369～373页，语文出版社，1999）第十点是谈交际理论的：“跟提出规范度、交际度有关的是提出了交际值，也叫语值。首先是看到了交际值是衡量语言规范度的标准。其次看到交际值是有大小的而且是可以衡量的，提出了考察的态度和方法。还分析了语言里不都是上乘物的原因。关于语值的分析，还是举例性的。”（同上372～373页）1998年秋天我给北京市部分中学语文老师研究班初中班以及高中班讲课，讲稿整理成《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教学》，刊《汉语学报》2000年第1期，成了交际理论的基本内容。后来我在《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发表了《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把交际理论作为总纲。这篇论文还说：

确定了应用语言学具有理论，带来了语言学的一种新分类。原先的一种分类是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认为前者有理论和谈理论，后者没有理论只是前者理论的应用。这种分类里没有本体语言学。新的分类是一、本体语言学。二、应用语言学。两者都有理论，原有的普通语言



学常常指本体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三、语言学理论，也有人称为语言哲学，是本体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融合和提升。确定了应用语言学具有理论，还带来了某些分支学科归属的进一步调整。例如，不少人也把社会语言学归到应用语言学。

四、学科的范围

范围就是研究的对象。

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学科方面，也就是学科门类方面，一般分成四大块。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说：

我们取广义的，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范围是开放的，具体包括四大部分：一是语言教学，主要研究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二是语言规划，主要研究语言地位问题和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三是广义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同社会的关系和语言的社会应用；四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现代科技的关系，例如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概论》3页）

第二个方面是学科建设方面，我们曾经叫“队伍建设等”。包括研究机构的建设、刊物等的阵地建设、活动的开展、学风和文风的建设、课题和课程设置、成果推广等。其中队伍建设很重要。我在《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1期有一篇《语言应用研究的队伍建设》，是此前给上海师大中文系文科基地师生的讲座稿。我们提出第二个方面，受了德国应用语言学家居尔晚的启发。他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讲学，私下里谈到应用语言学也要研究怎么安排课题以及课题成果怎么使用。

这里要说明两点。

第一，不要把应用语言学看成实用语言学。我们现在有的现代汉语课的效果不很好，寄希望于应用语言学，似乎应用语言学成了



实用大现代汉语。这个希望会落空。有的老师把应用语言学教成实用的语言技能课，这是语言技能课用了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应用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理论性强，有的谈语言技能的部分多一些。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应用语言学概论》有导论的作用，涉及的面宽，恐怕理论性比较强。

第二，不要把应用语言学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在应用语言学的学术讨论会上，常常有人提交的是本体语言学的论文。有人给《语言文字应用》投语法方面的稿件，理由是涉及到教学。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说：“应用语言学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相关学科发生关系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它和本体语言学具有交融性。如，语法学谈语法结构属于本体研究，而谈语法运用就跨界了，谈语法规则基本上属于应用语言学了。”（《应用语言学概论》3页）我1994年～1996年担任过《语言文字应用》的主编，我们就是这样处理稿件的。还有关于方言的，属于本体语言学，比较多地涉及推广普通话的，属于应用语言学。修辞里关于语言风格和作家作品语言的，大体上属于应用语言学。关于语音和汉字的稿件，也应该有本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区分。把不是应用语言学范围的往应用语言学里装，是对应用语言学的误解，对发展应用语言学没有什么好处。

五、学科的名称

有人总望文生义地说：“应用语言学嘛就是重在应用的。”名实不很相符的情况是很多的。但是，“名”实在影响“实”了，可能不得不改名。上面第9页仲哲明的一段话后面接着说：“它的任务是研究探索语言应用的一般原则、方法和规律，建立并完善学科的理论体系，用于指导语言应用的实践，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跟前面的话一起，实际上认为应用语言学有理论，而且提出了“领域”的思想。许嘉璐早的时候也提出领域语言。袁贵仁2001年5月



30 日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十五”科研规划论证会上的讲话《以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开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新局面》，谈到第 7 点成绩的时候说：“领域语言研究、专名术语研究相继展开，发表、出版了一批研究论著”（《语言文字应用》2001 年第 3 期）。李宇明在 2001 年 10 月 26 日～29 日厦门大学主办的第三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研讨会的头一天大会上又提出“领域语言”。这是很有意义的。“领域语言学”可以说是“应用语言学”改名的一个候补的名称，它也是跟语言本体研究对应的。

后来，李宇明又同周建民进一步阐述了“领域语言”：

真实的语言存在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之中。语言研究有两种路向：一是弃析语境而使语言“纯化”，研究语言的超语境属性。语言本体研究即是这种研究路向。二是在一定的语境中研究语言，或者研究一定语境中的语言。不同的语境实际代表着不同的交际领域或社会领域，因此这第二种研究路向。可以称为“领域语言研究”。（李宇明、周建民《“领域语言研究”开栏引言》，《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

“语言本体研究即是这种研究路向”里的“即”改为“较多”为妥。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认为：“真实的语言存在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之中。”“不同的语境实际代表着不同的交际领域或社会领域”。就是认为：真实的语言存在于一定的交际领域或者社会领域，社会领域也是交际领域。吕叔湘先生 1980 年 10 月 22 日下午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学术报告《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里说：“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中国语言学会编《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12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可见得，我们说：“语言存在于交际之中，交际之外无语言。”（《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 年第 1 期）也没有什么特别。



1 学科的性质、范围和名称

还有，我跟李宇明 2004 年 1 月 8 日讨论到这个开栏引言说：计算语言学也可以看成领域语言的一个分支。那么，语言本体在哪儿？实际上也在各个交际领域里。因此，我们说的应用语言学的定义也值得考虑，哪儿先有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之后又跟别的发生关系的呢？李宇明说很多学科的定位和定义都值得考虑。

我们研究应用语言学，一开头就面临着这么一个学科的定位和定义的大问题。或许，这个问题不深究，也不怎么影响我们研究应用语言学。或许，在一定的层次里，就这么说吧；到另外一个高得多的层次里，用另外一套说法。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有时候看两套或者几套说法，不要都并列地看，它们可能是不同层次的。

2004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18 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个“领域语言”讨论小组，不过事实上成了“其他”小组。

我们再联系下面一段话来看看：

在中国，要使语言学走在其他相关学科的前头，就要大力倡导语言（还有文字）的应用研究。当然，只抓应用的研究是不行的，那将使语言学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也要加强基础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常常是互相促进的，应用科学也常常能给纯粹科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园地。”（吕叔湘等）同时，随着语言学与社会生活的贴近，语言学的价值为社会所认识，语言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会得到加强。（《编者的话》，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1 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为什么不提只抓基础理论研究或者不抓应用研究就会“使语言学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呢？语言学的源和本在哪儿？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举还有没有调整好的痕迹。出在 1996 年是奇怪的。但是跟同一本书后面我们上面引的仲哲明的话不太一



致。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11~12页多处提到：“语言应用、语言本体、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是调整中的混乱。

一个学科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关键要看它对本学科本质问题认识的程度，即研究的对象、内容、范围以及构建其理论框架的方法论等问题的研究进展。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有许多问题要进一步解决。



2

学科建设的评价

○需要探讨的是学理到底是什么？“某些现象”“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是含有学理？

○我们的学术发展特别要发扬学术民主，我们学科建设的评价机制要充分体现这一点。

一、评价的标准

应用语言学学科搞得好不好，大的评价标准跟我们语言文字工作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就是中央确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1986年1月6日～13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的文件刊登在《语文建设》1986年第1、2期合刊上，还出了个会议文件汇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语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我们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时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会上学习了中央确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1997年的第二次会议还是提这个方针。方针是这么说的：



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最后一句话“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很重要，这是我们语言文字工作、研究、教学的出发点、目的和目标，是检验我们语言文字工作、研究、教学的标尺。这里也体现了我们的语言观，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者服务，重在建设。

进一步讨论关于应用语言学学科的评价标准，还要看看一般学科的评价标准。我用禹永平（《语言文字应用》评论员）为名在《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的开头发表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广阔天地》，后来作为附录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里。文章说：

一个学科、一个方面的研究的发展，需要具备两个相互推动的基本条件：一个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外部条件；一个是及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内部条件。（《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379页）

作为很多事情的评价标准，后面一句话我后来逐步发展为：

及时地高层次的满足和引导现在和未来多方面的需要。

进一步落实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同时进一步讨论“社会需要”的主要方面，上面这篇文章还说：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要顾两头。一头是解决语言文字应用中的实际问题，一头是发展学术。解决实际问题基本的，是出发点，也是归宿。……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注意了普遍性、规律性、特殊性，加以理论、方法、原则上的概括和提炼，这就是学问。如果解决的是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比前人解决得好得多，那么解决的理论、



方法、原则，一般来说也超过前人，这就发展了学术。

（同上 382~383 页）

上面说的解决实际问题和发展学术里，包含了语言政策的内容。

二、基本评价

根据上面的评价标准，应该认为我国的语言应用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应用语言学学科 1992 年建立以来，是很有成绩的。

我们同意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 2001 年 5 月 30 日在无锡召开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十五”科研规划论证会上的讲话《以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开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新局面》（《语言文字应用》2001 年第 3 期）里的评价：

关注语言文字生活，注意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优秀传统。进入新时期以后，这一优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九五”期间，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取得多方面的进展，这表现在：（1）语言文字法制建设研究和立法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制和基础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强，取得了新的成果；（3）推广普通话，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理论、政策研究逐步深入；（4）中小学语文教学、双语教学、扫盲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5）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对外汉语教学”逐步发展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初步建立了被定为国家级标准化考试的“汉语水平考试”（HSK）；（6）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由于计算机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已基本解决了“字处理”（汉字的计算机输入和显示等）的问题，“词处理”（中文自动分词、词性标注等）研究也获得了重大进展，在语音识别和



语音合成方面成绩喜人；（7）领域语言研究、专名术语研究相继展开，发表、出版了一批研究论著；（8）语言习得研究、语言认知研究和病理语言研究等也开始起步；（9）在辞书编纂方面，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辞书，对提高全民族语言文字生活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10）语言文字国情调查广泛开展，即将完成。

需要补充的是，这个时期还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建设大丰收的时期。

袁贵仁代表国家语委对这个时期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的高度评价是符合事实的。1986年到1997年语言观调整，许多见解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如果说国家语委工作有成绩，语文工作有成绩，而应用语言学研究没有成绩，这怎么可能呢？难道那些语言文字工作的成绩是没有应用语言学研究支撑的吗？

陈章太和我在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里也对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作了比较高的评价：

我国应用语言学自建立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研究机构，创办了语言应用、语言教学和语言信息处理等专业刊物，筹备成立学术团体，建立了一批硕士点和博士点，并逐步建立了学科基地，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专业队伍，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应用语言学概论》2页）

基本评价应该还包括不足方面。袁贵仁上面的讲话里列举了五点：

（1）专业人才短缺，经费投入不足；（2）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3）采用人工、传统的研究手段多，借助现代化手段少；（4）面向人的研究多，面向计算机和网络的研究少；（5）语言规划研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等，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陈章太和我在上面的“总序”里是这样提的：

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在理论建设、方法研究、队伍建设及学科的整体规划方面，还存在不足，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理论建设的不足，跟我们的语言应用研究工作急于求成，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很大关系。语言应用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启动起来需要一定时间，而要停下来，由于惯性作用也需要时间，所以语言工作有时要适度超前，做好促进工作。对队伍建设的重视不够，也跟过去对语言应用的认识不足有关。在方法、方法论建设方面，现在做得不够好，研究不够深入，计量、实验等方法用得较少，还有为方法而方法的情况，采用的方法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对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不够完整、不够清晰、不够具体，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应用语言学概论》6页）

三、几个关系

（一）标准、规范和研究

袁贵仁在这篇讲话里说：“语言文字工作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为保证所制定规范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必须围绕规范标准制定工作开展立项研究。面对社会语言生活日趋活跃和复杂的新情况，加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化管理，尤其是对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意见是很对的。要注意的是学术研究需要适度超前。学术研究里相互牵涉的方面很多，有些牵涉方面研究不够你这方面就研究不好，而牵涉方面可能是个很基础的方面，研究需要费时费力，我们需要进行长期的有步骤的研究。



（二）规范和活力

袁贵仁在这篇讲话里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国际国内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语言生活空前活跃。语言文字作为人们交际的基本工具，社会对其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也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语言文字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对此要有充分认识，对新的语言现象要进行跟踪记录和研究，并及时加以引导，使语言生活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

我们规范是要让语言有活力的，否则就不是规范。但是“有序”和“充满活力”都是规范的内容，“有序”也还要作些分析。关于有关的提法我也有过混乱。例如说：“作家的语言示范和表率作用，表现在既规范又丰富和发展语言两个方面。”（《多维的语言：文学作品语言》，《语言哲学对话》256页，语文出版社，1999）“一切语言示范者要在语言规范和语言创新两个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后面一篇论文收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Ⅱ》（语文出版社，2004）的时候，我改成了：“一切语言示范者要在语言规范尤其是语言创新方面起到表率作用。”（143页）

（三）刚和柔

袁贵仁在这篇讲话里说：“语言文字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到了各个应用领域，就更为复杂。因此，制定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出发，有的可以刚硬一点，有的则需要柔软一点。比如，研究基础较好的有把握的规范和标准可以刚一点，研究基础不太好的规范和标准则应当柔一些。”

我们认为语言外部活跃，稳定的是基本内核，还有中介物，总起来是动态的。外层、内层、中介物加在一起叫语言。这些都是为交际服务的。内层部分好做标准，外部的不好定标准。水平高的人



群多用到外层。我们提出刚柔相济，外部柔一点，内部刚一点；提出该柔则柔，该刚则刚，要区别对待。我们的语文工作要注意两个方面。中介部分更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施春宏在《语言在交际中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里进一步说：

弹性原则是从规范化方式来认识的，包括刚性和柔性两方面。弹性不只是柔性，更不只是刚性，而是刚柔相济。规范化是对语言现象的含有规范指向的操作，必然存在度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分析，比较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规则本位和语用本位时指出，以规则为本位的规范化容易导致对刚性原则的迷恋，而多少没有考虑到规范化工作要刚柔相济，该刚则刚，该柔则柔，该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就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157 页）

（四）人际和人机

上面袁贵仁的讲话说：“面向人的研究多，面向计算机和网络的研究少”。

面向机器的研究需要增强，要统筹考虑人力等配置。总的来说，面向人的研究比面向机器的研究总是会多。还有，机器跟人是什么关系，不少基本上面向人的研究跟面向机器的研究是有关系的。

（五）定量和定性

上面袁贵仁的讲话说：“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这是一种现象。量化的目的是定性。现在的问题是定量不准确的问题。一个是量不够，一个是量不准。定量要定好，要看有没有反映实质部分，关键在这儿。认识事物的性质不仅仅靠定量，在共同的数量面前高层次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关于语言现象的定量情况很复杂。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里说：“语言要素量的测定是为了对语言结构得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是语言本



身在交际过程中常常是模糊的。准确性和模糊性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补充。”（77 页）“定量和定性不是一组对立物，两个事物不在一个层面上。”（82 页）关于模糊，他说他在《社会语言学》里举过一个例子：“比方我们常讲的‘老中青三结合’。什么叫老，什么叫中，什么叫青，就很难画出一个科学的界线来（在行政上人为地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同样是‘老’，年龄跨度大得很，你说模糊不模糊。”（同上 77~78 页）

定性和定量，两者都需要，量定的目的是定性。一个关于导弹部队的电视剧，军事演习中数据都来了，指挥官不是也有很不同的意见吗？将来的战争不会有了数据就够的。思维可以用语言和非语言来表达，还可以用数来表达，但是语言不完全等于数，不少事情不完全等于数。还有，我们使用语料的类型和数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要加上人工干预。人工干预既然是经常的，那么就需要研究人工干预的原因、人工干预的种种情况、人工干预的程度和类型、人工干预的作用和效果，总之要从中探索一些规律，也有助于我们对语言现象定量分析的地位的认识。

我们还要考虑统计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下面这段话值得我们思考：

经济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即使是最真实最可靠的数据，也受制于统计者对统计方法的设置，受制于主观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从而是有选择的数据，并不是事实真相的全部。（韩少功《货殖两题》，《当代》2003 年第 1 期 167 页）

（六）学理和俗实

袁贵仁在这篇讲话里说：“进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制定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都必须遵从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有学理上的根据。但是有些现象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也会出现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可能形成大众化的世俗现实。从理论上说，应当根据学理来



制定规范和标准，但是，一旦某些现象有悖原有学理，但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应当考虑‘从众从俗’。也就是说，尊重学理而不能完全拘泥于学理。”

需要探讨的是学理到底是什么？“某些现象”“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是含有学理？

现在讨论得多的是三个例子。一个是“叶公好龙”的“叶”不读“舍”而读“叶子”的“叶”了。读叶有什么不好呢？很多人读“叶”恐怕不一定是“习非”，而是考虑到语言更大系统的一种语言调节，我们只是认可了、支持了这种调节。此外，以前我们说语言里每个部分的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缺乏分析。我在《制订语言计划的若干原则》（《澳门语言论集》，澳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收入我的《语言应用论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里说：“语言是个系统，哪怕细微的调整，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语言应用论集》128页）这是不对的。我这里要做检讨。语言里面某一部分的变化不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动全身，有的动半身，有的只动一发。姓“单”的没有改成了读“单独”的“单”，因为这个改动不止动一发，还涉及“掸掸蝉蝉啁啁阐”和“单于”里的“单”。

一个是“身份证”里的“份”。这个变化虽然不止是动一发，但是动得也不很大。要改成“分”，经济损失太大。两相比较，取“份”比较划得来。

一个是不叫“邮码”而“邮编”。两个都可以叫，逐渐趋于用哪一个，恐怕要考虑从更大的系统里找原因。“清华大学”取“清华”，可能那个时候是跟“燕京大学”取“燕京”类推。“北京大学”取“北大”可能一来避免北京有了好些大学或者将会有好多大学或者北京有很多大部门名称都冠有“北京”都取“北京”不好区别，二来可能是那个时候跟“南京大学”取“南大”等互相仿照。现在汉语新的名称简缩有取单位数的一种趋向。纵横交错地梳理汉



语简称的情况，一定会比以前的梳理和研究有比较大的进展。

还有“占位”等都是学理。

我们现在把“精采”改成了“精彩”，实际上也有不妥。“精采”跟“无精打采”有关，跟“精”有关，跟“风采”“神采”属于一类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但是给人的感觉“精采”又跟五彩缤纷有关，跟颜色有关，那改就改吧。再说“叶公好龙”的“叶(sè)”念成了叶子的叶，为什么没有念成还有“张、王、李、赵”呢？大学者的意见没有推行开，一些层次不很高的话很快在一些群众中流行开了，有的学者也大为疑惑。其实，某些话一个时期用的人多，跟这些话一个时期同影响比较大的群体共振有关系，这些话占了位之后更好一些的近义的话就比较难在一些说开的人里再占位。这也是学理。

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学理，老百姓里用开了就有一定的道理。应用语言学学者不要用“约定俗成、习非成是、习惯使然、不合逻辑和语法”来打发人，要在语言学方面说出道道。也不是为不对的东西作注解、找歪理。有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动半身的，要谨慎，或者不要动，有不少看样子要改定了的不是不久统统改回来吗？或者动的意义大，要好好动，语言的发展甚至是格式的创新、文体的大改变历史上是不少见的，大的改变如五四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这种大动的阻力都比较大。

跟这有关的是关于语言规范化的“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的讨论。施春宏在《语言在交际中规范》里专门有一节讨论“关于语言规范化的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有很多重要的论述：

关于何为理性原则何为习性原则，邹韶华先生针对“贵宾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个句子合格性问题的讨论，概括出大致上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逻辑事理为主，我们称之为理性原则；第二种意见以流行程度为主，我们称之为习性原则。”（邹韶华《试论语法



规范的依据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4期）一般正是这样认识的。邹先生认为：“衡量一种用法，一个句式是否符合语法规则，就要看它们是否为多数人所接受。一言以蔽之，习性原则是语法规则的依据。”此文虽针对“语法规则的依据问题”进行探讨，一般人在其他方面大体也是这样认识的。邹先生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语言规范化原则的文章都主张习性原则是规范的依据的看法，如《现代汉语语法规则问题》（吕叔湘等著、马庆株主编《语法研究入门》294～300页，商务印书馆，1999），《语法问题的规范化对策》（吕冀平主编《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389～39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论语言规范的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2期）。（163页）

我们认为，语言规范化中的“理性”不能只是局限于逻辑事理，语言逻辑、艺术逻辑、认知逻辑、心理逻辑、辩证逻辑也不能等同于形式逻辑。而且，有时约定俗成、群众习用、广为流传的东西，并非不合乎理性，而是我们的认识不全面，没深入，未到位，我们的语言观念规范观念太落后，对语言本质把握得不准确，对语言现象观察得不仔细，对语言结构分析得不缜密，对语言功能探讨得不到位，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太弱，规范操作方式不恰当。另外，所谓的与习性、群众习惯相违背的“理”也许本来就不对头，没有考虑到那些归结为“习性”的现象里蕴涵了新的理论，甚至是高层次的“理”。而这些都容易在语言规范化中将理性推到不利的位置上。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理性的作用不能及时发挥出来，这就是语言中蕴涵的理性其显示不是一次性的，而人的认识能力又有局限。理



性的意义并不是能解释现实中所有的现象，能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而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探索原因，设计方案，调整策略，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对自然之势的分析是理性的根本。（163～164 页）

我们是这样理解理性的：理性是从现实同一性的角度观察语言事实，在语言现象的时空分布中分析其价值，从中找出可靠的根据，并由这些根据进行合乎逻辑的判断、推理，确立语言规范化具体的原则、标准、方式，从而对规范化对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评价、预测。理性是以交际价值或者说语用价值的大小作为判定规范程度的标准的。而习性是从流程度量的角度来观察语言事实，分析语言现象的使用频率，并以此为根据确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也就是说，习性是以语言现象使用人数的多少、使用时间的长短来作为判断规范程度的依据的。我们认为理性原则是规范化的基本原则，它可以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对待所有语言现象。习性原则不能作为语言规范化的基本原则。从我们处理那些合乎“习性”的语言现象来看，事实上不是在使用习性原则，而是试图从习性的途径考虑、认识其中蕴涵的理性的原则。所以，根本而言，习性原则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原则，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作为参考而已，它是对理性的认识不确定时的一种做法，若作原则使用，也只是一种权宜性的，处理不好容易导致机械的阶段论。此外，无所谓的时候，没有什么道理的时候，大众使用本身就是个“理”，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受众的接受层次、语言现象的占位与制约等大原因方面进一步探讨。理性不是要求处处作出决定，对还不能作出决定、根据还不充分、认识水平还没有达到的情况，就不要匆忙下结论，更不要下否定性的结论。”（164～165 页）



理性的对立面应该是非理性，而不是习性，而非理性的语言规范化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理性地研究非理性。（165 页）

即便从习性原则本身来看，它在具体操作上也有不可逾越的困难。邹韶华（《试论语法规范的依据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6 年第 4 期）指出了问题所在：“（1）何时使用习性原则？”“一个新出现的语言现象，经过多长时间的考察期才可以进行流传程度的计量分析？根据口头流传还是书面流传？如何找出第一次使用的时间？”“（2）如何得出使用频率？”“什么人的使用频率？”“什么书面材料的使用频率？”“如何确定不同语体的使用频率？”“如何确定语言内部情况各别的使用频率？”邹韶华《论语言规范的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语言文字应用》2004 年第 2 期）也指出：“要贯彻习性原则，就必须有一个度即数的观念，多少人（包括什么样的人）认可的东西才能视为规范？赵元任先生提出，‘拿现在知识阶级读书人的口吻里头所有的作为标准’，至于多少人，赵先生的意见是‘一半儿一半儿的时候么，还可以挽狂澜于未倒’，要是成了压倒的多数就必须承认了。”而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基本解决，习性原则的可操作性就要大打折扣。在这种前提下，如果说“不管具体问题如何进行具体分析，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都得依照习性原则，都得达到一定的语用频率，达不到一定的语用频率是不合格的”，恐怕难以服人。而要将这些问题解释清楚（有的恐怕无法弄清），靠习性本身是不行的。将习性原则适用的范围、条件、场合、主体、对象确定清楚，实际是从理性出发并据此作出理性的判断。（165～166 页）

我们认为，不要将形成了理论的就当成理性的，对与



此理论相背离而又被社会接受了，就认为是习性决定了理性；不要认为专家认可的规范如果没有流行开，就是理性错了；也不要因为合乎理性的高层次的东西没有流行开来就怀疑理性的价值，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更不要将那些还没有形成为人认识、理解、接受的理论的东西都归入习性之中。理性不等于已有的理论。而且，理性未必都能形式化，或者更稳妥地说，在现在都未必能形式化，但大多是应该能描述的，进行概念的描述和关系的描述。我们确实有将习性当成筐，把凡是一时认识不清解决不了的东西都往里装的倾向。习性自有其特定的价值，但不能置于理性之上，更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其实，只有那些合乎语言生活实际、能经受语言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真正理性的东西。一个显在的问题是，“习性”如不研究，可能成了不可知，我们的研究和工作的就容易跟着现象转。（172页）

坚持以理性原则为主，除调整语言观和规范观外，需要做的工作有：细致的语言调查和观察，充分的描写和解释；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研究；关注批而不倒的“倔强的语言事实”；加强对所谓的“习非成是”现象的研究；加强语言现象的交叉段、延伸段的研究；进行预测机制研究和对预测结果的跟踪监测等。在理性还没有到位或难以到位，理性认识不一致时，我们要尊重习性的价值。（172页）

四、评价机制

这几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在评价机制方面提供了许多原则和方法。2005年6月15日～20日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五届电视舞蹈大赛和21日的颁奖晚会又提供了更多的原则和方



法。归纳起来主要有这几点：

（一）权威。评委是这个地区这个时候这个领域里好找的很懂行的人。权威是分类的，例如国标舞的评委跟当代舞的评委是分开的。可见得找这些评委的人也很懂行。业内的人本来就知道这些评委是很懂行的。21日颁奖晚会上，请了几位评委即兴表演，水平的确很高，大家看到这些评委之所以评得好，还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一手，当场就可以示范。不至于有些评审活动的有些评委对这个领域确实比较生疏，要么连连说他是来学习的，要么评审不当。

（二）公开。评委公开打分。这跟匿名评审和盲审不同。评委特别注意评审的道德、标准和结果。有的评审说他们评审的时候比选手更紧张，原因是他们感到责任重大，他们爱惜人才。有的评委还当众检讨和纠正他们的评审不妥。

（三）监审。观众可以询问评审的标准，可以对某些评审的结果提出质疑，可以对某个评委的评分似乎偏高偏低提出质疑，有关评委需要回答。监审还监审大赛的其他许多方面，例如选手的资格等，计分是否正确等。

（四）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权威评审也会有不同意见，这样做既让权威根据自己的看法评审，又考虑到评审的公正。

（五）公证。第五届电视舞蹈大赛的一次比赛中，有一个选手进行综合测试的时候有人提示，公证员及时指出，得分被取消。

（六）追踪检查评审结果。有时候有前几届的获奖者来表演。21日的颁奖晚会上，前几届电视舞蹈大赛的几位获奖者来表演，有的成绩更好了。

总之是公开、公平、公正。

很多学术等评价机制里都有许多成功的方面。例如有权威的仲裁机构，让得到不够公平待遇的人有地方说话。这叫依法管理。

我们应用语言学及有关的学术评价机制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检查我们不妥的地方，根据自身的特点建立比较好的评价机制。总



之，避免弊端，有利于应用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人才和良好学风的培养。我们的学术发展特别要发扬学术民主，我们学科建设的评价机制要充分体现这一点。



3

学科建设的任务

○要探讨的是这些语言观滑坡的原因。有关的是也要探讨理论的作用为什么难以发挥，为什么一遇到新的语言现象和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总有一批人包括一些学者有抵触情绪，用一些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话来反对。

○我们常常对前人的成果了解不够。我们常常找某个方面的专著或者专题论文，而忽略了散见的认识。其实，前沿的认识起初是散见的，露出了一些，后来才逐渐专门论述的。

一、理论建设

（一）基本认识

袁贵仁 2001 年 5 月 30 日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十五”科研规划论证会上的讲话《以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开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新局面》里说：适应国家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十五”期间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要力争在五个方面有较大推进，其中第三个方面是“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建立”。这个



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的。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建立”。

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主要在于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陈章太和我的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关于理论建设说：“从总体上看，国外应用语言学发展很快，但在理论上还比较薄弱，这有多方面原因：一个是学科形成到现在的时间还不太长，学科基础不够深厚，理论研究自然比较薄弱；另一个是应用语言学涵盖的内容繁多，不容易进行总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加强应用语言学各分支学科方法论的综合梳理与总结，加强应用语言学基本理论研究，将是应用语言学今后在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应用语言学概论》2页）“跟国外相比较，我们的应用语言学比较注意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实际问题和总规律，而且认为应用语言学不只是理论的应用，本身也有理论。在理论方面，有从国外借鉴而有所发展的，有主要是我国提出的。”（同上5页）“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在理论建设、方法研究、队伍建设及学科的整体规划方面，还存在不足，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理论建设的不足，跟我们的语言应用研究工作急于求成，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很大关系。语言应用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启动起来需要一定时间，而要停下来，由于惯性作用也需要时间，所以语言工作有时要适度超前，做好促进工作。”（6页）“历史上，我国的语言学理论建设有较大局限，科学方法没能很好发展起来。现实中，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比较薄弱。今后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加倍努力。”（同上）

（二）发挥应用语言学理论的作用

近些年来，我们不少人在语言观方面滑坡，出现了不少“车轱辘论”，来回讨论、经常反复又没有多少进展。空谈，说过头话，不解决实际问题。一个时候调子很厉害，人家最多不吭声，过些时候人家吭声了，又来压一下。因此，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建设里还需要研究怎样发挥应用语言学理论的作用，也就是研究制约和促使发挥作用的现象和条件。



我在《应用语言学科的几个前沿问题》（《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里说：

近二十年来，我们的语言观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某些方面似乎滑坡。文革结束不久，语言研究所的领导要我同几个人谈谈，开出一个当时语言研究禁区的单子，目的是要打破这些禁区。我找几个人谈了，记得开出了十几条。打破一些禁区的提法不久就在一些讲话里体现出来了。1980年10月21日~27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王力的《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批判为大洋古，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语文》杂志。于是，我们洋的东西不敢研究了，古的东西不敢研究了。我们不知道，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范围是很宽广的。研究洋的东西、古的东西，有的成果在短时期内很难适应实践的需要，但是，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发展有用的，就不能说是脱离实际的。”（中国语言学会编《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外国语言学有的，我们不一定都得有，更不必都得超过他们。但是，在各国都应有的，都需要的方面，我们不应该落后。落后了就是我们的短处，就要在这些方面赶上去。”（同上3页）可是今天有的据说是专家的公开列出一些禁区。要探讨的是这些滑坡的原因。有关的是也要探讨理论的作用为什么难以发挥，为什么一遇到新的语言现象和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总有一批人包括一些学者有抵触情绪，用一些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话来反对。《语文建设》2000年第10期的卷首刊登了王均的《网络时代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学》，认为：“在国际联网时代，包括外语借词缩略语在内的新词语的猛增，是语言与社会共变的必然趋势，语法的精密化也肯定是一种进



步。汉语书面语中‘他、她、它’‘那、哪’的区别和文本的横排以及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曾经有人强烈反对，他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讽刺挖苦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但到现在，也只有接受。语文保守主义和语言‘净化主义’是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它必然要碰壁。”我相信这些主义“必然要碰壁”，但是需要深入地多方面地研究它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威甚至长时期地占上风。有关的是我们说语言文字工作会进进退退，需要进一步研究主要的条件和因素有哪些。

周洪波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003年版《新华新词语词典》收录了“包二奶”，释义是：“在外包养情妇。”举例是：“来自沿海开发地区的调查表明，重婚纳妾、姘居、‘包二奶’、婚外性关系及同居现象比较普遍，危害了婚姻稳定。（《中国改革报》1998年7月30日）现在社会上出现的重婚、纳妾、‘包二奶’和姘居等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2000年10月28日）”（9~10页）媒体报道许多人对该词典收录“包二奶”进行了指责。我们2003年3月1日举行了一次关于“汉语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进一步面向世界”的语言哲学对话，收录在赵俐主编的《语言的轮休和充电——第四轮语言哲学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里。讨论涉及到上面的问题。其中刘艳春说：

陈原先生在1978年《中国语文》第1期发表的《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一文中就曾指出：“词典是一种出版物，一切出版物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这是出版物的普遍性，即共性。词典当然有这个共性，但是词典是通过它自己的特殊性，即个性，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词典是工具书，不是报刊，不是广播，不是政论。……词典是一种工具，是给人们翻检查阅他们所要知道的某一特定问题（有关这个特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观点)的工具;……从总的方面说,词典不能丝毫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词典决不是马列主义基础教科书,而且决不能代替马列主义基础教科书。……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词典的特殊性,即个性,常常被忘记了,或者甚至被否定了;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吧词典等同政论,……”(42页)

词语随着社会的产生、发展、变化而产生、发展、变化,新语词的出现客观地记录、反映了它产生的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变化。有些人认为词典中收录一些负面词汇会误导社会风气。因此作为权威部门的词典不该收录这些词,那么,这里又涉及到了一个词典“收词”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在“文革”时期,“四人帮”一伙人就曾提出词典中不应该收入所谓的“生活词”“消极词”“反动词”和“黄色词”等等口号。就这一问题,陈原先生曾给以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同上49页)

陈先生说,在这些主张下,编英汉词典对“超短裙”这个词很费踌躇:“收吧,说它是资产阶级生活,甚至是黄色下流的东西;不收吧,人家碰见这个词,也不懂它是好吃的呢还是好用的呢。其实‘超短裙’是外国一定时期流行的一种女服,是一种时装,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穿的,同‘喇叭裤’一样,劳动人民也穿。我们不提倡‘超短裙’,这不错;但这种裙子是存在的,它反映了外国的生活现实。作为英汉词典,不收它,就是形而上学。”

谈到所谓“黄色词”,陈先生说:“前几年说的黄色词一般还不是指那些下流的东西,而是指一些生理器官及生理、生殖方面的名词、动词。词典唯恐碰到它们,而它们却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合理的存在。因为人体没有了它



们，就变成残缺不全。比方‘子宫’，照那个时期形而上学的观念，是属于‘黄色词’无疑了。但是1976年4月3日几万罗马妇女反对梵蒂冈禁止堕胎法令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尖锐的政治性口号‘子宫是我的，我自己安排！’这个‘子宫’没有一点黄色味道（它本来就没有），而且有点‘红色’倾向了。如果‘娼妓’‘卖淫’‘强奸’‘通奸’，照此谬论通通属于‘黄色词’，一律请它们靠边站的话，那么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根本就不能读了，还编什么词典呢！’

生活词不能收，消极词不能收，反动词不能收，黄色词不能收，陈先生认为：“这样一来，词典还能收什么词呢？都是红色的，革命的，美丽的，积极的，无产阶级的，健康的，正面的，等等词汇，那么‘资产阶级’一词首先就不能收。然而，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如果按‘四人帮’形而上学那一套来编词典，从理论上说是荒唐的，从政治上说是反动的，从实际上说是行不通的，对读者来说是完全没有一点用处的。”（同上49～50页）以上，我感觉，陈先生对“收词”问题谈得已经很清楚了，我想，他的灼见对于我们今天探讨词典的“收词”问题仍然是具有重大指导和借鉴意义的。

.....

有时，经过一段时期我们的认识反倒会滑坡，有时，我们的认识又和真正把认识落实到工作之间还存在相当距离。《新华新词语词典》能够使正确的认识和工作真正达成统一，能够勇敢的收入一些鲜活的和负面的词语，全面、客观的记录当代社会新用语，还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以本真面目，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词典编纂在



认识和实践上走出以往误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179
~181 页)

我在讨论里也说：

词典恐怕都要承担一定的道德评价的，《新华新词语词典》事实上是承担了道德评价的。要研究的是：什么叫道德评价，怎样承担。例如不收“包二奶”的词典在道德评价方面是不是就进步一些，这样一来，编这一类词典的人会不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学生词典要不要收“黑客”，还有用什么方式评价的问题。

词典，不是说收的每一个词本身在词汇系统里都是经典的，而是在一定的时空里收这样的词是应该的，有关的说明是典范的。收这样的词，体现了一种语言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中国语文》1978 年复刊后的第 1 期刊登了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的《批判“四人帮”扼杀〈现代汉语词典〉的罪行》和陈原的《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编辑部为此发表了编者按。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有新的认识，但是我们也有许多原则性的认识有了滑坡，这倒是需要很好注意和研究的。(182 页)

应用语言学理论发挥作用的进进退退是我们语言工作进进退退的一个原因，我们这里是在探讨原因的原因。

我们 1997 年 3 月 11 日“语言哲学对话”讨论了“语言工作的进进退退”，我在讨论到原因的时候说：

语言工作等的进进退退，从退的方面来说，比较具体的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主要是外部方面原因的，一个是大气候。语言工作等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围，大气候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出了比较大的偏差，或者是左的干扰，或者是右的干扰，都造成语言工作等的某种程度的



倒退。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大气候的干扰、破坏的典型。此外，关于语言美活动，80年代初，是很有成绩的。后来五讲四美活动一度比较讲形式，有不少过头的东西，要批这批那，整个活动有些倒退。语言美方面，前不久有些地方搞的几十条服务忌语，还有一些学生宣誓保证不说脏话等，认识和做法上，都是80年代初的倒退。有时候经济建设上碰到很大的问题，例如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有许多人为的因素，这些人为的因素也反映到了语言工作方面。那时候的语言工作就有一个倒退。经济困难本身，也造成语言工作条件方面的困难。二是一些外行的干扰。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还有这个问题。这些人的主观的原因有好几种，总的是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过于相信行政的力量或者他个人的力量。有的本来是外行，但是尊重内行，自己也努力学习，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有的不能说不是学者，如果不注意调查研究，不注意进一步学习，而且语言学的某些方面不见得精通，也可能干扰了工作。（《语言哲学对话》225~226页，语文出版社，1999）

大体上属于内部原因的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认识上和做法上把语言工作程度不同地等同于政治工作。五四时期，我们的几次语言工作都是搞运动。解放后不久，也有这个味道，甚至说推广普通话或者别的就是政治任务。语言工作不是单打一的，是同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在一个大的运动中，语言工作还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做好语言工作，也才能对大的运动有贡献。这方面的工作做扎实了，有时候大气候不好，而语言工作还有一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某些时候，在一些语言工作者还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例如推广



普通话工作还是有发展的。搭车、借势的认识都是有欠缺的。（同上 226 页）

跟这有关的是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单打一，不大会跟有关的方面结合起来，不大会用迂回的方法，甚至不把这些看做是语言工作。二是，缺少辩证法，冒进，说过头话，做过头事，纠正的时候又矫枉过正，容易造成多次摇摆。三是有的当事人一定的时候再次提出不怎么对的做法。这跟一定的气候等外部条件有关。四是历史太长，学习历史又不够，或者是忘掉历史的教训，把历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甚至比历史上的讨论水平还要低许多。五是社会需要我们步子大一些的时候，因为事先缺乏准备，没有满足社会的急需，引起社会的不满。我们这里有两个认识问题。一个是不很认识到语言工作等跟语言生活等的变化是有时间差的，语言工作等要适度超前。一个是缺乏时空意识，渐变的认识基本上成了唯一的认识。有时候机遇来了是需要我们步子大一些的。机遇的光顾，时间是很短的，往往是错过这个村就再没有店。我们错过机遇的情况也不少，眼睁睁看着机遇过去。这方面的原因也很多。例如，80 年代中期办《中国语言文字报》，办了也就办了。1985 年没有让办《语言文字应用》杂志，1990 年办起来就非常困难。如果前一两年把《语言文字应用》停办了，以后基本上也办不起来了。不能抓住机遇的一个大的原因，是队伍建设不够好，任务拿不下来。我们老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队伍建设重要，可是事实上还是把队伍建设当作软任务，没有火烧眉毛、心急如焚，将来还会出问题。语言工作者自己也有责任，不能等着别人来建设，要自我建设。许多体育运动队大换血的时候成绩都要降下来。此外，“人际失和”也是对语言工作等有很大破



坏力的，所以语言工作者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很重要的。还有，许多工作要配套，例如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如果出台，有关的标准和研究要提前完成，不然又要失去机遇。（同上 226～227 页）

情况是复杂的，多种原因往往交错在一起。（同上 228 页）

周洪波发言专门讨论了语言观方面的原因：

语言工作的进进退退，还跟语言工作者的语言观是否正确密切联系着的。社会生活活跃，语言文字应用更加活跃，如果语言工作者的语言观跟不上，就有可能对一些语言现象感到疑惑，甚至横加干涉，这样也会导致语言工作的退。比如外来语言成分的引进问题，有人看到传媒上不断地使用“克力架、可口可乐、卡拉 OK”等外来词语，就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崇洋思潮，是外来文化的入侵，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不良的影响。实际上，从语言本身来看，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多层次多等级的大系统，它具有调节外来语言成分的能力，使语言更加丰富发达。从历史情况来看，我国汉代开始外来词就已经引进汉语里了，如“琵琶”来自匈奴，“琉璃”来自西域，“佛”原为梵语，是从佛教吸收来的。后来从欧美和日本吸收的外来词就更多了。这些外来词在汉语里扎了根，成了汉语的一部分，并没有对汉语的健康有任何损害。联想起 40 年代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对外来词的吸收要持积极的态度，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摇摆。（同上 229 页）

关于原因，我在《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 年第 1 期）补充说：



我们还要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如何发挥作用的有关问题。例如限制应用语言学基本理论发挥作用或者限制语言观调整的因素，可能有：一、人云亦云。二、接受旧的教育。三、对语言本质认识的片面。四、因为调整的困难就维持旧的说法。五、脱离语言实际，认识滑坡。

在《应用语言学科的几个前沿问题》里我又基本上从正面提出解决的办法说：

大的方面，在研究和工作方面要进一步实事求是。一个意思是我们学说的最主要的来源是我们的实践。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我们曾经有人提出过：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个手向外国要东西，一个手向古代要东西。这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提法。可是，最值得要和最必须的东西正好在我们自己的屁股底下，我们忽略了。第二个意思是多做实在的事情和多说实在的话。许多工作是要长期做的，难度很大，不做又不行，那就从基本的做起，一步一步做。需要做十年就做十年，需要做五十年就做五十年。切忌还没有怎么做就认为或者说十年、五十年的事完成许多了。

大的方面，既要进一步面向世界又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包括古代的实践和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不少语言学家提出我们应该为世界提供一些学说、理论。其实，拿向外国学习来说，我们的情况不同，向外国学习得好的话，一定是跟我们的实际情况结合的，一结合就应该有跟外国不同的学说、理论。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学说、理论，可以说，学习外国也没有真正学好。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比古代进一步的学说、理论，学习古代也没有真正学好。我们常常对自己古代的遗产还重视不够了解不够，学习也就不够。在不少领域里，我们对我国古代的实践和



理论还很模糊。我们学习古代，还要学习古代是怎样向外国学习的。（《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136～137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不过，语言工作、语言观的进进退退总还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文学方面。韩少功在韩少功、王尧《文学：文体开放的远望与近视》（《当代》2004年第2期）里说：

我有时候想起古人的一些说法。为什么某种对文艺的怀疑浪潮似乎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墨子就不喜欢文艺，说“凡善不美”，认为善与美总是对立的。柏拉图也认为文艺与哲学永远是对头，被钱钟书先生译成“旧仇宿怨”。这样一些“卑艺文”的观念，后来在历史上多次再现，比如在宋明理学那里还达到新的高峰，连大诗人陆游都不好意思写诗了，一写诗便有点犯罪感，觉得自己不务正业。我们可能不宜简单地以为，那只是几个呆老头子的刻板和迂腐。（197页）

对于人的精神来说，思想与感觉是两条腿，有时候左腿走在前面，有时候右腿走在前面。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社会想象成一个人，恐怕也是这样。思想僵化的时候，需要用感觉来激活。感觉毒化的时候，需要思想来疗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个时代都有文艺，但并不是每个时代的文艺都是人类精神的增长点。我猜想古人们有时候会碰上一个文艺繁华但又平庸的时代，一个文艺活跃但又堕落的时代，才有了上述一些怀疑。“卑艺文”之所以成为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原因很可能是文艺本身在周期性地患病。正如思想理论也会周期性地患病。（同上）



（三）中国应用语言学理论发展的走向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理论主要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实际问题，从中寻求一般规律。这是中国应用语言学理论发展最主要的走向。理论的检验看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语言生活是否丰富多彩，理论是否有发展。

这里需要注意几点。

1. 理论还是一种修养。不是口头禅，不是口号。更不能在某些理论里的片言只语来做不干活的盾牌或者打语录仗。

2. 我们有时候还局限于认为需要甚至标榜运用某个理论来解决某个问题。甚至要求运用的理论要纯，只限于一家。甚至比赛我运用的理论如何纯。忽略了从实际中验证、补充、修正、提炼理论。语言运动的关系和秩序就是规律，说明这些规律就是理论。

3. 有时候我们标榜我们的学科是应用性很强的。其实作为一个学科来说，理论性如果不强，它的应用性的层次也不会很高。

4. 还要避免把不是理论的说成理论。

（四）关于“学术民主”

陈章太和我在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里说：

我们还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空气，要提倡学术民主，在这方面我们和国外差距较大。（《应用语言学概论》6页）话不多，但是分量很重。

我们在上面关于语言观的滑坡里讨论到了这个问题。

这里谈几个认识问题。

（一）关于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各赏五十大洋

语言交际到位，一定准确，准确就是跟别的联系与区别清楚，当然就鲜明。准确一定有针对性。折中不等于辩证法。如果现实里有两种不良倾向，在现实的时空点上这两种倾向的作用几乎不可能正好对等，所以我们的针对性和态度也不应该对等。动辄以公正自居，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不公正，是拉偏手，袒护了该



多打的，委屈了该少打的，这样的裁判也该打。何况现实里往往不是只有两种意见，也不是几种意见都是错的，更不能拿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各赏五十大洋来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低效比较”，或者是我们过于迷信“旁观者清”了。更何况我们还应该重在建设，拿出我们建设性的新见来。

（二）关于宽容

有学问有本事就有见识，往往要坚持自己某个方面已经清楚而别人还不理解的认识，或者说有刺。有刺的人跟有刺的人怎么相处、共事、合作呢？一种办法是你的刺必须砍掉，你必须效忠于我。这太霸道。人家不干。或许有人会同意效忠，那一定没有多大本事的人。或许有人一时韬晦，有朝一日就翻脸不认人。霸道的也没有多大本事，有本事的霸道。一种办法是把刺都砍掉，大家都光滑，大家都一样，或者说大家都平庸，或者说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老天所以让生出各不相同的人出来，就是各有用处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有不同用处的，我们非要一样，岂不是逆天之行要遭天谴？还有一种办法是各人的刺还留着，免得砍掉了刺可能把本事也砍掉了，但是，彼此都宽容。后一种办法来得好。

为人既要方正又要圆通。内方外圆。内不方正者没有主见，也谈不上讲策略，最多是随波逐流，最多是滑头。不圆通者不知道因时因地制宜，很难维持方正，那是僵硬和教条。

（三）关于大一统

学术上的事，一定要讲民主和平等，不要以势压人，不要搞大一统。我们弱小的时候一般会提出“不要定于一”，这往往是一种保护自己学术见解的策略。其实，到自己比较强大的时候，更要提出“不定于一”，这才是学术品格和胸怀。学术上为什么要定于一呢？学术上怎么定于一呢？定于一有什么好处呢？学术上嚷嚷定于一的或许是怕动摇他的学术上带来的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



我们弱小的时候要向别人学习，学习了才能强大。但是，那样的学习可能是低层次的、被动的。到了我们比较强大的时候还努力向别人学习，那一般是高层次的、主动的。继续学习，才可能更强大。比较强大了，不再学习了，那就是霸。还不怎么强大，以为自己强大了，也不再学习了，那也是霸。霸必衰。一个人特别不能大欺小。一个人要在学术上起一些引导作用，只能以你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成果来引导。

（四）学术问题要由社会历史来检验

2001年6月24日，我在《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举行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上介绍《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建和有关认识说到这样的意思：我们编者不能凭自己的看法断定稿件学术上的对与错。如果没有政治性、常识性的问题，稿件有新见，就可以考虑发。我们特别要判断的是不是学术上有新见。我们个人关于学术上对或者错的判断不是取不取稿件的标准。从我的经验来看，学术性的论著，没有全对的也没有全错的。现在如此，以后也如此。好的稿件往往是站在很前沿的，有不少部分也不成熟。站在前沿的往往不很成熟。有的说法一时认为很对的或者很错的，过了一段时间重新审视有了另外一种认识，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学术上一定要有良好的讨论的气氛。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轻松的时候容易出新见。如果气氛紧张，边上老有人打棍子、找茬，谁能轻松，谁能思想活跃，谁能出新见。

二、队伍建设

陈章太和我在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里说：“我国的语言应用研究还跟本体语言研究密切结合。一个时期我国的本体语言学很受重视，现在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学者有一批是从本体语言研究中来的，他们兼做本体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这对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十分有利。有比较好的本体语言研究做基础，这是我国自古以来



就有的好传统，也是我国语言应用研究的一个特点和长处。”（《应用语言学概论》5页）“从内部条件看，重视、关心、参加语言应用研究，是我国自古以来语言研究的传统。同时，我们还有了一支良好的研究队伍。”（同上5~6页）“应用语言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因此队伍建设要重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加强两栖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作为现代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应该懂语言学又懂现代科技及其他相关学科。学科建设，还要有学科带头人、学术领袖和高层次的学术群体。纵观我国学科发展情况，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领袖起了很大作用。学术群体不一定是地域性的，可以跨地域跨学科，既有共同点，又有个性，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合作的、交融的。”（6页）

这里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讨论几个问题。

（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人才的情况和人才发展的趋势很重要。我在《制订语言计划的若干原则》（《澳门语言论集》，澳门社会学学会出版，1992。后来收入《在语言学的道路上——于根元自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里说：

语言计划不能孤立地实施，要同人才素质的培养结合起来。首先要建立发展一支素质高的语文工作者队伍：有学问，有活动能力，视野开阔，又脚踏实地。建立发展这样一支队伍，有时候比出学术成果更重要，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语言计划要考虑到有后劲，太顾眼前，急急忙忙出轰动效应、新闻效应，如同毁坏资源。人才效益如同生态效益，注重人才效益，才能持续发展。（《在语言学的道路上——于根元自选集》120~121页）

语言学应该是领先科学，如果不领先了就不正常。不领先，往往是队伍建设出了问题。卫志强的《当代跨学科语言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里多次涉及这个问题。例如：“我国的侦查



语言学队伍还不大，还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89页）“儿童语言发展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实验科学，它需要相关学科专家的紧密合作，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126页）“有志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者必须同时掌握语言学和神经心理学两方面的知识及在这些领域中取得的最新成就，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有比较中肯的分析和令人鼓舞的创见。”（143页）“生物语言学跟多门学科相交，因此，要求生物语言学工作者具有相关学科的广泛、扎实的基本知识，才能对人类自然语言的本质及其跟动物‘语言’的区别进行科学的对比分析。”（175页）

（二）基本要素是大聪明

2005年4月18日晚，我以“大聪明——语言学者的基本素质”为题给烟台师院文学院的部分师生做了一场讲座，比较集中地谈了这个意思：

1. 语言学很像哲学，跟许多学科发生联系。语言学期长期在哲学里出不来，有它的道理。大哲学家没有不谈语言学的，大语言学家也没有不谈哲学的。语言学跟宇宙科学、生命科学的关系也很密切。语言学跟文学的关系也很密切，说文学是人学，其实语言学也是人学。

或者说，语言学是智慧学，需要有智慧的人来学习，学习了更有智慧。语言本来就是使人脱离动物而更有智慧的，而且使人区别于原始人而更有智慧的。

2. 语言学跟许多学科发生关系，容易吸取许多学科的营养。语言学者有条件也应该谦虚好学而且学得好一些。

3. 语言学跟许多学科发生关系，容易影响许多别的学科。这种影响往往也很像哲学。语言学要成为领先学科，首先要向有关学科学习。善于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4. 语言是个运动的巨系统，它运动的秩序很像宇宙运动的秩序。语言不是所谓精密的符号系统。它的运动是有序里有无序、无



序里又有序，它运动的秩序是混沌的序。

5. 语言是人。“得心应手”，是说人的心里要拿什么，心不能拿，手来拿、手是应心而动的。同样的意思，“得心应口”，是说言为心声，这里说的心是指真我的系统。人不仅仅是肉体。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来了，那个人没有碰到你，你会高兴或者不高兴，因为那个人有个场，场也是物质的。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人的名字也会有那种感觉。

还有，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通过人、语言可以认识地、天、道、自然。这些都有全息性。

所以语言研究要融于生活、融于社会、融于自然，以人为本。

语言生活和社会生活同自然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是自然的一部分。学问还是感觉到和认识到自然。张炜的小说《满地落叶》（《山东文学》1988年第10期）里“我”跟果园的女教师肖潇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怎样判断一个人的修养。

很多关于语言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理论。语言交际理论，说的是人使用语言的交际。交际值是人交际到位的程度。语言规范工作，实际上不是使语言规范，而是使使用语言的人使用语言规范。语境讨论的是人的关系。同样一个意思跟不同的人说，往往色彩不同，主要原因是人的色彩不同。说话要有一定的新颖度或者叫陌生化，那是人的交际需要稳定的一面和新颖的一面。还有一些语言现象长期不用，用起来又新鲜了，我们说是轮休或者充电，实际上是人的遗忘造成距离美。语言不能纯，主要原因是人不能纯，包括人认识语言、掌握语言、使用语言不能纯。语言的层次，是人分层次。还有语言的交流，例如外来词，是人的交流。语言的弱势和优势，跟民族、国家的弱势、优势有关。语言的个性，语言的风格，都是人的个性、风格在语言方面的体现。人机对话的本质是人人对话，或者说是人跟仿人对话。

语言学是从哲学、史学、文学里独立出来的。不独立，不好，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跟那些学科割裂，不好，失去了联系。我们既要讲区别，又要讲联系。我们近来注意语言学向哲学的回归了，语言学跟哲学、史学、文学既结合而不混合，既独立又不割裂。我们说的语言学者要跨学科，首先跨哲学、史学和文学。

还有，语言是聪明学，要聪明人来研究。

以前比较强调勤奋、刻苦。一个外国名人说是百分之多少的勤奋加百分之多少的天分等于成功，它是特别看重勤奋的。我以前也这么看。大概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改变了这个看法，受了美国黎天睦的影响，也是事实改变了我的看法。那前后，我们很多语言学者都认识到了大聪明的重要性，邢福义叫“悟性”。

大聪明就是快速到位。

(1) 准确到位，讲究分寸，体现了文章的机智，当然还有论题的切入点。我们要介入，要身历其境，要做当事人。什么“几多几少”，罗列几种意见，那是低效比较。不要迷信“旁观者清”，不要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各赏五十大洋。我们要介入当前语言热点问题大讨论。例如网络语言、字母词、外文使用的讨论。学术是这样发展的，队伍是这样锻炼的。我们不是说要深入生活吗？不是说只有深入生活才能高于生活？旁观者算是深入生活吗？

(2) 高效率。体现了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高效率才可能在合作中有信誉度。否则没有资格搞语言学。真理不会托付给吊儿郎当的人。一个人高效率，活一辈子等于活几辈子了，二三十岁有六七十岁的智慧了，五六十岁有百把岁的智慧了。高效率还是取得智慧的方法。爱因斯坦相对论说的是外部运动，我们还要注意我们内部思维的敏捷。

读书要快而到位。一个人念书十几年，大学阶段最轻松了，大部头的文学名著应该在大学或者大学之前读得差不多了。读书还不是最主要的。也不见得腹有诗书颜自华，也不见得开卷都有益。古人还说“人生糊涂识字始”。不是还有叫“书呆子”的吗？那是读



书读傻了的。我们要按规律办事。不要被吓唬和吓唬人。古人说“入木三分”，我们读书也要逐渐“入木三分”读出三个层次。一是字面意思。二是针对性。三是大的意图。我们写书也要逐渐做到“入木三分”。不要强调必须众里寻他千百度，不要都形式逻辑一二三四画重点，要有灵感思维、发散性思维。

(3) 不要用小聪明抵制大聪明。研究人文性，不要局限于研究称谓。还有，说成语谐音改字、网络语言破坏古代文化，我们要问：古代文化的精华是什么？是神农尝百草，不是搞两个凡是、三个凡是。

(4) 要注意新的好的语言现象。那还是一种审美观。

(5) 不要搞大一统。事物是对立统一的，这是宇宙的大法则。许多事物亦此亦彼。火和水也相容，不是说“取坎补离”吗？

(6) 不要一开始研究就要有保险，很看重人家会怎么说。只要我们自己是经过思考的认真做的，别人说好说不好是次要的。因为别人没有像我们这样经过思考，也没有做过，不能要求别人有中肯的意见，别人肯提意见供我们参考就不错了。我们也不要依据供参考的评价高兴或者不高兴甚至决定我们做或者不做。

还有，有批评甚至嘲笑，那不是坏事。那是说明你可能在进入一个很高的层次。老子《道德经》里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末尾一句很重要：“不笑，不足以为道。”这是一个检验标准，如果没有人嘲笑，说明你离认识规律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动不动就说要争取成功，就祝人家成功，2002年说得特别多的是“马到成功”。可是，要知道，大成功是要有人嘲笑。

张炜《能不忆蜀葵》里有这样一段：

然而在淳于眼中，桢明越来越像一个艺术宠儿，一个成功者。对此他欲辩无语。深夜，只有寂无人声的深夜，源于心底的那个声音才告诉他：成功？不，事实上不是，



完全不是。真正的成功不是因为尾随潮流博来的喝彩，不是因为来自百发百中的底层经验——随机与投机、回避，等等这一切所赢得的世俗物益；真正的成功仅仅是因为独立和坚持，因为追求和辨别，对真实的不断强调而伤害的人群——他们发出的阵阵嘘声！真正的成功将收获更多的痛苦，还有被世俗的无名杀手紧紧追赶的恐惧……这才是成功。（《当代》2001年第6期101页）

伴随大成功的会是这些东西。我希望追求大成功的朋友们要有足够的迎接这些伴随物的准备。

当然，我们不要故意树敌。故意树的敌不是大成功的伴随物。我们要靠智慧，尽量多团结人，尽量改善工作环境。要考虑到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经过我们的研究和说明，经过人家的思考，很多人会逐渐接近比较正确的认识的。关键看我们的认识是不是逐渐比较正确。

这里说个故事。2002年6月22日，我作为嘉宾到中央电视台第十二演播室谈网络语言问题，去接受争论。我知道时空点对我的谈话不利，我想我就主要面对镜头外的广大观众，面对将来。我的态度是从容的微笑。在这之前，我们看世界杯足球赛，看到法国队的一个队员一个机会很好的球踢偏了一点点，他没有呼天哭地，镜头里一个大特写：他在很甜很甜地微笑。我们都被他这个特别美的微笑感动了。在第十二演播室做节目，我自始至终从容地微笑。我的很多朋友和学生看了电视以后对我的表现满意。这一次实践很重要，我后来比较习惯了在我是少数的情况下阐说意见和团结人。

说大成功一定伴随着什么什么，听了不要紧张。我们也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面开拓者还是很多的，来者也不少，有时候还有追风。庄子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理解这句话也要有智慧，不要老显示自己木秀于林。人家说你“中上”，那其实是上上吉的评语。有的人还好，但是吹嘘；有的不很好，吹嘘自己天下第一，



霸，不学别人，自己不发展，也不许别人在这方面有发展。那是因为既有利益。霸必衰。

我喜欢鲜活。我出了一本自选集，封底要写几句，我写了：“我总不大喜欢成熟、游刃有余、炉火纯青之类。我喜欢鲜活：总有不足，总在进步，总在探索。真实的世界是鲜活的，探索鲜活，是探索真实的世界。”

（三）超一流的学者

吴为章、田小琳的《汉语句群》，商务印书馆 2001 年出版。我在《汉语句群研究的精品——读吴为章、田小琳的〈汉语句群〉》（收入我的论文集《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里说：

1998 年 11 月我调到了北京广播学院，跟吴为章不在一个系，但是吴为章在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担任课，我从许多方面对吴为章更了解了。这两三年我接连读了吴为章的三本新著，想得很多。2000 年 2 月 15 日晚，我看电视现场直播第 45 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讲解员说王楠、陈静是超一流的运动员，超一流的运动员的条件，一是全面，二是有特点，三是心理素质好。我联想到吴为章，吴为章是超一流的。论全面，经名师指点，语法修辞逻辑，广播电视语言，理论，外语，都很强。论有特点，语法这个本体研究的重要核心，是她的强项。论心理素质，锲而不舍，谦虚好学，热情欢迎新的学术思想。我担任了两年多的大学教学任务，有了更深的体会，我还想，吴为章凭现在的学问，深度、广度各去一半，留下较浅较窄的那四分之一，担任大学教学任务足能胜任愉快，她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深入拓宽地探讨？驱动力是什么？尤其是三十多年了，在时空不是都有利于、鼓励她做学问的情况下。这个心理素质就不是一般的心理素质了。她的目标和责



任，不是目前一般教学的需要，而是未来事业发展的需要，是语言学发展的需要。她有无形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无需驱动。她在领先、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会勇往直前。我想到这儿，不由得对我的师姐肃然起敬。（88页）

吴为章、田小琳要写这本书，是90年代中期确定的，“此后，无论公务、家务如何繁忙，我们都尽力在做这份属于我们俩的‘私活’。”（245页）很多情况下，这样的“私活”比某种认可的范围的研究有高得多的价值。因为超一流的学者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往往超出在这个领域非超一流学者认可的范围。我们的研究体制恐怕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不久，不少方面还有不少计划经济的认识 and 做法，科研方面大概也不会例外。（89页）

（四）先进的几个标志

一个学科，一个学术群体，一个学者，我们认为他比较先进，一般总有几个标志。一是总有一些比较好的成绩，而且取得这些成绩是自觉的，不只是别人分析出来的。二是对自身的进步的历程是清楚的。三是对自身取得这些成绩的来源是清楚的。受到什么师承，受到什么影响，借鉴了什么，很清楚。这也说明他会有后劲。四是对自身的缺点、不足和问题很清楚，尤其是对自身做过哪些检讨很清楚，不认为自身一贯正确。我们进行调查的时候有这样的体会：往往是先进的常常说自身的不足、困难和问题，说得很深刻很到位，因为想着发展。往往是不很先进的，一说到自身的不足和困难就不痛不痒。五是知道自身今后怎么做而且在做。

（五）关于大的课题负责人

我们年轻的学者不能只是会完成某个课题，还要会系统地领导较大的课题，还要在大的建设方面做主持的工作。主持一个比较大的和时间比较长的课题，一是要宏观把握这个课题的价值和我们做



这个课题的优势；二是要有一支比较好的队伍和比较好的分工；三是要出优秀的成果和出优秀的人才相结合；四是出集体成果和个人的成果相结合；五是能持续发展；六是自己带头做课题；七是要能根据情况随时应变；八是要有经济头脑；还要经得住社会上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六）重视创新

科学研究就是要创新。新是逼近规律，逼近真理，逼近“是”。“是”只能在“实事”中“求”，只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务实。别人务实，向“是”靠拢了一步，我们更加务实，才能更加靠拢“是”。我们比别人更加靠拢“是”的那一点点，我们叫“新”。更加务实才能创新。实事求是，要实践，要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那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我们去解决，原有的认识或者方法没有解决好，我们进一步解决就不会用原来的一套，在认识上或者在方法上或者同时在两个方面都比原来的要进了一步，这进了一步的地方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理论就是这么来的。不要以为理论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不要到没有理论没有学问的地方去找理论找学问。也不要被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吓倒。创新是我们“实事求是”比别人好一些因此逼近了“是”的部分，实事求是就是深入实践、更加务实。

（七）人才辈出

李準说：

我相信“朋友就是财富”这句话。中国历史上的“桐城派”和“扬州画派”都是群星璀璨，历数代不衰，就是互相影响而来，所以艺术家、思想家总是“鱼群式”地产生的。（《李準自述（之六）》，《十月》1998年第6期133页）

以后，我总结出来，一个地方出文人、学者、艺术家，一般都不是一两个，一出来就是一批，是“鱼群”式



的，因为他们互相影响。（《李準自述（之三）》，同上第3期50页）

人才总是辈出的。因为整体的条件好，而且人才彼此影响。

（八）关于复合型人才

周洪波在《广播电视语言：语言应用研究的新天地——读牛印文等〈广播电视语言应用〉》（《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1期）里说：“搞广播电视语言研究需要高素质高层次的合作”。这也是我那个时候的认识。后来我的认识有了改变，我主张由兼通的人才来合作。如果彼此对对方的领域不怎么懂，的确很难合作。高层次的合作，不仅是彼此的水平在本领域里是高层次的，还包括合作的高层次。我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广阔天地》（《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里说：“我们当然可以跟别的学科的人合作，但是我们对那个学科还是要懂得比较多。”

（九）干实事者挂实名

现在申请比较大的课题，进行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结项和成果推向社会，如果有名人挂名比较好办。这也是一种名人效应，也很可以理解。但是，不实干的名人挂一些虚名如何，例如顾问？负责人、组长、主编还是署实干的人的名好。

（十）关于学派

学派，一是学，某个方面总要达到世界水平。二是派，就是群体。总起来说是高层次的学术群体。这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要成为派，一般来说不会是一个，总得有两三个四五个。高层次的学术群体也是辈出的。真正要形成学派的，反倒是要为也有条件成为学派的别的群体的发展考虑和出力的。

（十一）注意几点

1. 我们常常对前人的成果了解不够。我们常常找某个方面的专著或者专题论文，而忽略了散见的认识。其实，前沿的认识起初是散见的，露出了一些，后来才逐渐专门论述的。



2. 我们有时候还是跟许多非前沿的认识相比，说当前的研究如何如何不足。跟非前沿的相比，你比他强了又怎么样呢？要跟前沿的比。即使讨论问题，也不要罗列很低层次的，要举高层次的很有影响的。

3. 跟上面有关的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容易出新见。有时候人为地贬低前人。如果认为前人似乎很傻，我们不是成了傻子的后代了吗？其实，前人并不都傻，许多前人是很有聪明的，很多话前人说过了，许多话说得比我们好。

4. 要七分学问三分关系。当今，一点不搞关系也难，有的功夫的确是在学问外的。能不能还是以学问为主？

5. 还是在做学问上多花些时间。有的博士生做学问之外的事太多，是大忙人。我听一位有很多行政工作的博导说，他的博士生比他还忙。我听有的博士生说，他们成了驻京办事处，给外地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办好多事。这些博士生的外地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能不能给这些博士生适当减负，尤其是他们从开题到答辩的一年里。

（十二）进一步探讨研究队伍建设的途径

徐红燕主编的《语言学家的故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代前言《探求语言学队伍建设的途径》说：“我们策划编写《语言学家的故事》一书，想将当代语言学家的风范尽可能多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现语言学队伍的面貌，来探讨语言学队伍建设的某些途径。”（5页）“队伍建设首先包括老中青语言学梯队的搭建，包括领导层的建设、导师层的建设和研究生的建设。领导层要起统领作用。领导人才要能纵览全局，在历时共时交叉的背景下对我国的语言学提出深刻的中肯的适度超前的意见。领导人才也需要主持并且实际参加课题研究，而且做得更好一些，从中进一步取得领导经验。”（5页）“导师层的建设是中流砥柱。出成果出人才，主要是这个环节。要以研究带工作，要解决实际问题，



又要发展学术。”（6页）“研究生的队伍建设包括选优和培优两部分。首先是选优，要选择视野开阔又脚踏实地的年轻人，有独立完成任务能力却又能团结作战的人。发展这样的一支队伍，有时候比出学术成果更重要，这是很多无私的老师们的心得。”（6页）“队伍建设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文风和学风建设问题。一个好的队伍，学风和文风一定要好。”（7页）“一般而言，好的学风必须以好的文风作为它的表现形式。树立好的文风，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哗众取宠、弄虚作假之心。现在急功近利的情况比较严重，要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急于求成，要耐得住寂寞。”（7页）“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进行语言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研究出的规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能够对实际生活和社会进步有帮助。既然是对社会有帮助，就应该是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言之有物就必须善于观察和勤于思考。不观察、不思考就会人云亦云，没有真知灼见；不观察、不思考，就会老生常谈，提不出新思路、新见解。真正新鲜生动、富于创造性的见解，是与深入的思考、对实际生活的独到体验和认识分不开的。良好的学术风气是鼓励创新的。”（7~8页）“队伍建设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独立与团结相结合，就是说既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又具有团队合作精神。”（9页）“有些工作是团队合作完成的，个人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要听从安排和指挥，时间意识要强，不能影响后面的人的工作，我们要讲究信誉。”（10页）“队伍建设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有科学工作者的品格和事业家的眼光。科学工作者的品格就是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语言学是科学，语言学者是科学工作者。作为科学工作者，要熟悉和尊重反映本质的事实，尊重不同意见，尊重和自己原有意见不尽相同的事实。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闭门造车，不要自圆其说，不要一成不变，而要与时俱进，随时超越自己，迎接不断发展的现实。近百年来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语言观接受实践的检验作出补



充和修正是很自然的事情。补充和修正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探索。科学的语言观是建设语言学这一大厦的总体设计思想。语言学者应该随时调整自己的语言观，根据实际情况检验自己的语言观，多向生活学习，向大自然学习。”（11 页）“事业家的眼光就是要不保守，敢创新，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为顺应社会发展，满足和引导社会需求开展研究工作，把我们的语言学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12 页）

三、教材建设

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说：

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材建设。在 1998 年第二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上，许嘉璐先生对应用语言学学科今后的发展谈了三点意见：一是要加强理论建设，二是要使应用语言学进入大学课堂，三是研究人员要实行知识更新。会后，我们讨论了应用语言学进入大学课堂问题，想组织人员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不久，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和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共同策划此事。1999 年 10 月，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应用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应用语言学教材建设。陈章太在会上作了“关于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陈章太说：“应用语言学在国际、国内建立以后，其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主要方法，以及新的研究成果，应当编入有关的教材当中；而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用语言学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对它提出的问题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也要通过教材把它总结、肯定下来，以便传授给众多的专业受业者，并促进本学科不断发展。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成体系的应用语言学教材，更谈不上教材的



多样与选择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小的损失和遗憾！摆在我们应用语言学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有利的条件，尽快编写、出版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有较高水平的应用语言学教材。”（《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1期）这次研讨会之前，已经策划快一年了。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在商务印书馆召开了总主编、分册主编、策划人员等参加的工作会议。陈章太就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的缘起、特色、编写人员、具体要求和第一批书目等问题做了具体说明。计划第一批编写10本，都叫概论。总主编是我们两人。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俞士汶主编《计算语言学概论》，庄文中主编《中小学语文教学概论》，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陈章太主编《语言规划概论》，戴庆厦主编《社会语言学概论》，张颂主编《传播语言概论》，李如龙主编《文化语言学概论》，曹先擢主编《中国辞书学概论》，袁晖主编《汉语语体概论》。会议决定成立这套教材编委会，由总主编、分主编和有关人员组成。各分册编者请有实力的本学科学术带头人担任，组织编写人员时应注意老中青结合、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结合。每一分册的编写组拟出大纲，其框架和内容经过编委会详细讨论，最后由总主编和分主编审订。会议商定2002年陆续完成初稿，由分主编统稿，总主编审稿，最后由分主编定稿，2003年分期出版。其间又召开了几次编委会，主要讨论全书的内容、写法、体例，及有关的编务，交流各书大纲和编写过程中的问题。编写、出版工作大体按计划进行。这套教材的体例总的来说是统一的，第一章是“绪论”，最后一章是“回顾与展望”。一般每节后面有思考和练习题，章后附有参考文献，书末附有名词术语表。各书有自己的内容，但有的内容是



共有的，共有的内容在观点和写法上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可说是大同小异吧，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可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这套教材的编写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两年后，我们将根据读者意见和学科发展及教学实际的需要，再进行认真的修订。（《应用语言学概论》7~8页）

2003年8月起，《应用语言学概论》《计算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社会语言学概论》相继出版。

我不是个编教材的料子。我教“应用语言学概论”十多遍了，还是编不好这个教材。《应用语言学概论》多亏了郭熙。我适合写专著，适合写专著性的教材。

《应用语言学概论》很多人在用，其实教法很可以变通。我们计划办些班，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些教材的意图，我们是怎么教的，这些教材有哪些不足。例如《应用语言学概论》各章不够匀称，有的章节内容比较陈旧，我们教的时候内容上有了很大调整。

要注意这本教材里编者没有“理论语言学、言语、变体、产生和消亡、静态”的提法。后记里说：“内容可以调整、补充。章节也可以调整，例如把几个基本理论放在‘中国的应用语言学’后面梳理。在‘语言交际’等章里可以多安排一些练习、讨论和实践。作业可以做一两个方面的调查报告。”做了作业之后我有详细的讲评，还请几位同学介绍他们的作业。有的作业建议他们修改后发表。课堂练习里有语言和思维联想的练习、语言延伸段和交叉段问题的分析、语言表述综合情况自我测试等。还有语言中介现象、语言能力分化的讨论。

我又给硕士研究生开了几次“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课，这个课还给外校的博士生开过一次。这是补课和提高性的，我用自己的讲义，同学还用《应用语言学概论》做参考教材。我正在编一本基本上适合给硕士研究生上课用的《应用语言学高级教程》。给博士生



3 学科建设的任务

开的“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课跟那两门课很不同。不过，博士生这门课调整的认识和一些内容会逐渐下放到那两门课里，博士生这门课陆续换上新的内容。



4

交际理论

○认知、思维甚至独白、自言自语跟一般的语言交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交际值的衡量，五四白话文的构建，当代汉语的形式标志等许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其实，我们都是有了一些语言实践了，从语言实践里概括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逐渐形成了一些结论。然后用这个结论进一步审视语言实践，包括新的语言实践，补充、完善或者修正、调整原有的一些结论。这里也用了演绎法。

一、提出和发展

（一）提出

关于语言是交际工具的基本思想至少在 18 世纪中期就提出来了。我们 1996 年 11 月 5 日的一次语言哲学对话讨论“语言是什么样的工具”（见《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施春宏提到：“早在 18 世纪中期，语言的工具性就提出来了。狄德罗在《科学、艺术和手工艺百科全书》（1751）一书中说语言是：‘借助词、



手势和表情，并适应社会的习俗和交际行为所处的环境，使人们得以交流思想的工具。’（见卫志强《当代跨学科语言学》209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我听于全有说，他找到更早一些的说法。列宁1914年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里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的这句话，长期以来成了我们常用的语言的定义。这不是唯一的定义，不过，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很有影响的定义。

（二）认识的几个阶段

庄文中在《语言哲学对话》里说，“五四”以来，我国学者关于语言/语文是工具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个别学者顺便提出“语言是工具”，没有进行论证。20世纪20年代，我国现代第一代语言学家黎锦熙侧重从文字角度考察，联系语言，说：“夫文字，工具也，利器也”（1924）。“要使文字和语言一致。文字以语言为背景，才是真正确切的符号，才能作普通实用的工具。”（《新著国语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4）叶圣陶则从口头语和书面语角度考察，认为语文“在生活上必要工具中的一种”（1942），语言“是表达内容的唯一工具”（1948，见《叶圣陶语文教育文集》）。第二阶段，五六十年代。学习苏联，学习斯大林的语言观，确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学界作了大量论述。由于“语文”的复杂性，中小学语文教学界稍晚一些才认识到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是语言教学，语文也是工具。叶圣陶1955年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人民教育》1955年8月号）里说得很明确：“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语言的学说，语言是‘交际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直到60年代初，经过语文教学实践的检验，中小学语文教学界才确认了“语文是工具”，并且写进了1963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纷纷撰文阐述语言/语文是工具的观点，推动了语文教学。第三阶段，80年代前期。拨乱反正，进一



步确定语言/语文是工具的观点，并且进一步阐述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吕叔湘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科知识也少不了它。”（《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叶圣陶说：“语文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交际的必不可缺的工具。”（1980，《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座谈会上讲话记录》）第四阶段，80年代后期至今。由阐述语言/语文是人类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进而阐述语言/语文的文化内涵。1996年，经国家教委审定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确认：“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语言哲学对话》20～21页）

很多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语言不是一般的工具，具有人文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学者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跟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有关。还跟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有关。社会语言学重视社会因素，重视群体的特性。要注意的是：第一，我们说的人文性，不包括属于上层建筑的有阶级性的部分。第二，语言的人文性不仅仅表现在是文化的载体，还表现在运送——传播方面。

工具性和人文性不应该是二元论，但是具体认识和处理并非一定不是二元论的，把人文性分离出来而且凌驾于工具性之上的情况并不罕见。人是具有文化的，人的交际是包含文化的交际。我们往往简略地还是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能因为没有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就一定片面，而是要看所说的交际里面是不是包含了文化。其实，说是文化的载体也不全。我们有时候更全面地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思维、交际的工具。也可以认为认知、思维是交际的一种方式，而只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有人认为交际就是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当面或者近距离说话，不能概括别的语言活动，别的语言活动不是语言交际。这涉及到字眼的问题了。交际这个词是从外国语里借来的，人家外国语里的那个词还有交流、交换、沟通的意思，我们借了交际这个词，实际上含



有交流、交换、沟通的意思，业内的人士是应该知道的。有的人碰到这种情况就用外国语词或者注上外国语词，看来汉字里夹用外文是不能一概取消的。当然我们需要研究认知、思维甚至独白、自言自语跟一般的语言交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是很有价值的。还有，吴启主认为语言的交际功能源于语言的思维功能，很值得探讨：

关于语言本体是什么的问题，在我国流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交际工具说，把语言定义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这是从社会学的视点来回答的。二是思维工具说，把语言定义为“人类思维的重要工具”，这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回答的。三是符号说，把语言定义为“一种重要的信息符号系统”，这是从信息论和符号学的观点来回答的。我认为，最能从本质上揭示语言本体特征的是思维工具说。语言之所以能成为交际的工具和信息符号，就是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我国古人说：“言为心声。”他们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语言哲学对话》266～267页，语文出版社，1999）

还有学者说语言除了有交际作用还有标记作用，一个人用一种说法来作为他的标记。那么，标记是从哪儿来的呢？标记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人与人本来是不同的，所以人说话不同。不是因为说话不同所以人才不同。有时候人的内心我们不容易看出来，要借助这个人的说话来看出这个人的内心。借助一个人的说话来看出这个人的内心也不容易，有时候听了许多话还琢磨不明白这个人的内心，因为一个人的内心是体现在他许许多多变化的有时候似乎是矛盾的话里的。一个人的内心也是复杂的变化的。人分类，而且跟社会等有关，所以分社会语言学等。因为从说话了解人不容易，因此有语言学，有很多语言学的分支。不从说话了解人，又很难同这个人、这一类人说话。要同这个人、这类人把话说好，就是语言交际



好。语言交际好的目的和原则是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不能合作、不想合作就连话也不说了，说话，就是还有合作和寻求进一步合作的可能。语言是人为了合作而出现、为了合作得好而发展的。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很多。

其实万事万物都在交际。万事万物都在跟别的交际之中出现、发展、变化。人是万事万物不停交际的产物。人继承和发展这一点，在跟各种人、跟自然的交际中从原始人成为现代人和进一步发展。万事万物跟别的事物交际的程度、类型、方式、趋向是这个事物的特性，也就是这个事物本身。从一个角度说，交际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交际以及对交际的认识也来自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钱学森在《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上发表的《美学、社会主义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里说：

人类从蒙昧时代慢慢进入野蛮时代并向文明时代过渡，一个里程碑是一万年以前所谓新石器时代。这时开始有了农业、畜牧业。我称之为第一次产业革命。因为这时人类谋生方式起了大的变化，从打猎、收集树上地上能吃的东西，变为自己来种地、养牲口，自己控制生活的来源，开始了能控制自己命运的历程。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历史从原始公社进入到奴隶社会。大约在三四千年以前，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称之为第二次产业革命。这时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又一次发生质的变化。有了商品交换，生产者就不光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了。到了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就有了更大的发展。

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封建时期延续非常长。最近有的历史学家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时期——唐朝以前和唐朝以后。唐朝以后我们



的封建制度进入到租佃制的时期。这一发展，就使中国的封建制度非常稳固，中央集权有了更牢固的基础。这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国家不同，它们多是分散的小王国。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非常强大、非常牢固，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很难萌生。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就发展起来了，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工业革命。我把它叫做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个时候，中国正是明朝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这个萌芽在明末就被压下去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没有成长起来。”（钱学森《科学与艺术》143～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人类经过漫长的历程才有了商品交换的。有了这一点可不得了。人们一方面认识了自己的个性，要发挥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发挥和发展自己的所长。人都是有个性，有所长的，需要发挥、发展才能认识它的性质和价值。人充分认识和发挥、发展了个性和所长，社会就能极大地发展。而这个个性和所长是在同别的人的比较中来区别的，这个比较又是一种实际的合作和吸取。从一个角度说，一个人的所长或优于别人，是某一方面特别会向别人学习，特别会吸取别人的优点。所以，人们在合作中才能发现、发挥、发展个性和所长。

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在是英明。这个决定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处于初级阶段，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既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革除不完善带来的弊病，还要防止种种“左”派幼稚病，还要注意不要用计划经济的老一套来所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现在关于语言规范的许多认识和做法，也会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弊病、种种幼稚病、计划经济老一套的影响。一定要发



展，解决问题是为了发展，用发展来进一步解决问题。语言是用来交际的，是用来合作的，是用来发展社会的，语言在人们交际、人们合作、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和发展。语言只能在人们语言的交际、人们使用语言进一步合作中、人们使用语言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中来规范。语言规范的目的只能是有助于人们的语言交际、有助于人们使用语言进行合作、有助于人们使用语言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

（三）关于语言交际的有些经典理论还需要讨论

中国的语言理论主要受到索绪尔和斯大林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索绪尔提出语言是静态的平面的共时的系统，为语言而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认为历时的研究都是要素的研究，纵横交错的研究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背景是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缺陷的矫枉过正。斯大林提出语言的本质特点是基本词汇和语法。因为基本词汇稳定，语法更稳定。总之是稳定。说语法是组词造句的法则，含有语言有静态的仓库和语法单纯研究结构的思想。最近胡裕树先生在范晓主编的《汉语的句子类型》的“序”里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法学可以说是一门研究句子构造规律和运用规律的科学。”（书海出版社，1998）认为语法是句子结构和使用的规律。

（四）我们接受正确的语言交际经典理论方面也有欠缺

我们常常把“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口号。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陈原〈语言与生活〉读后》（《读书》1980年第4期）说：“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指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这以前的“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即使是对工具的认识，我们也是不够的，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是动态的新陈代谢的巨系统。



“工具”是手段，问题不是出在认为语言是“工具”上，而是忘了使用这个工具的“人”和这个工具的“交际”的性质。否定语言的“工具”性，问题可能更严重。

（五）提出交际度或者交际值

关于交际理论，有些学者比较关心的是我们提出了“交际度”。

《学语文》1994年第5期开始连载我们关于现代汉语规范研究的系列文章，头一篇是《现代汉语规范回顾》，署名是“现代汉语规范研究小组，施春宏执笔”。有一个题注说：“1994年初到秋天，于根元为研究生施春宏、庄莹开设‘现代汉语规范研究’课，共同回顾解放以来现代汉语规范的情况，讨论‘规范的涵义和原则’‘规范的范围’‘规范的层次性’‘不规范的原因和规范的途径’‘规范就是服务’‘规范失误例析’‘规范的困难’‘提高规范的质量’等问题，魏丹、彭睿、郭龙生等也一起参加。每次讨论之后，由一人整理成文，暂且用现在这样的署名，现在连载的是于根元删改过后的内容纲要。”庄莹执笔的之二《规范的涵义和原则》（《学语文》1994年第6期）里说：“交际即使比较规范了，还有个规范度。”在庄莹执笔的之五《不规范的原因和规范的途径》（《学语文》1995年第4期）里说：“我们认为规范要放到人们活的交际活动里去看。因为规范就是为人们交际得好服务的。我们提出规范度这个概念，交际效果好的就是交际度高，规范度当然高。”还说到“交际到位”：“还有一种似乎很维护语言规范，实际上认为语言使用就那些材料、条条，不大赞成也不怎么了解语言里出现的新的东西和灵活的用法。他们的语言不新鲜，交际也不怎么到位。”

1998年秋天我分别给北京市部分初中、高中语文教师研讨班讲《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教学》，后来发表在《汉语学报》2000年第1期上，里面说：“交际到位的程度——交际值或者交际度是衡量规范的唯一标准。”（见《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11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二、基本内容

在《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教学》里，主要讨论了七个问题：（一）为语言交际而研究语言。（二）交际能力是最基本的语言能力。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的目的和检验标准也是看交际能力。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的目的是进一步知其然，而不是跟知其然无关甚至妨碍知其然。现在语言学家语言表达好的不很多。语言学的学术会议上车轱辘话、口头禅并不罕见。自己不生动活泼，还常常反对生动活泼，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不规范，以深奥为能事，也是一种语言观，是跟交际观不同的语言观。这可能跟以前主要受了语言知识能力的教育而没有受到应有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教育有关。（三）语言交际是多层次交叉的。（四）在多样、鲜活的语言交际中实践语言交际能力。（五）语言交际单位是语言的主要单位。（六）交际值是衡量语言规范的唯一标准。（七）语言交际能力的实践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同上 116~120 页）

我在《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 年第 1 期）里进一步归纳了语言交际理论的地位、根据和基本内容：

交际理论是应用语言学基本理论里居于总纲地位的理论。它也是本体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我们的本体语言学在交际方面进一步考察研究，本身会有很大发展，也会进一步发展、丰富交际理论。交际理论，是本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高层次结合的纽带，是本体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相互促进的纽带。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是从语言的本质的功能方面给语言下的定义。这种交际包括思维和认知，这种交际是含有文化的交际。

世界万物要交换能量而存在、变化、发展。宇宙万物在相互吸引、排斥、中和中动态平衡。人要在社会中协



调。语言因为人们的交际而出现而存在而发展。语言存在于交际之中，交际之外无语言。交际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力和目的。语言生活的健康、丰富、活泼是语言工作、语言研究、语言教学的目的和检验的标准。在交际面前，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语言学家，顺者昌逆者衰，概莫能外。我们为语言交际而研究语言。语言现象多种多样，我们要研究的是现象跟条件的关系，现象一定条件一定。抽象不能涵盖我们所有的研究。交际是决定语言现象的根本的条件。

语言交际能力是最基本的语言能力。语言交际能力是不同情况下跟不同人现实的既趋同又趋新把握好度的不断磨合的能力。语言交际能力的测试应该逐渐在一定的现实的交际的情况下进行。语言交际是多层次交叉的，所以要在多样、鲜活的语言交际中实践语言交际能力。鲜活还有时代性。语言学习还要有一定的量和质。一定的量，可以内化，可以生巧。一定的质，可以提高层次。

交际到位的程度——交际值或者交际度是衡量规范的唯一标准。交际值里含有文和质两个部分，我们的交际应该文质彬彬。美，包含在交际值里。没有游离于交际之外的语言的美。超规范、反规范、突破规范的说法可能是把规范同规则或者某些本本上的规定混淆起来了。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交际，绝没有妨碍交际的所谓规范。同样，认识跟语言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要素也是为了更好地交际，绝不能妨碍交际，也绝没有妨碍现时交际的现时的所谓的跟语言交际密切相关的积极的文化。规范同稳定没有必定的关系。规范或者不规范也不看过去有或者没有这种说法，而是外部看现在是否需要这样说和内部看汉语的大系统里是否允许这样的说法出现。



语言素质也是有层次的。一个人的语言素质结构还可能滑坡。语言交际能力的实践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语言知识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语言研究能力之外，还有一个更要的更高层次的语言能力——发挥语言能力的的能力，或者说语言创新能力。语言能力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和提高，现有的语言交际实际上都是打了折扣的不怎么到位的交际，而且是很难发展的交际。一个人语言表现出来的灵气，主要在他语言创新方面。

还有，说话并不是要求都是大白话。交际当中除了意思到了之外还要求有适当的色彩、情调等。我国在语言学方面有一个新颖色彩理论，外国有别的叫法。意思是说，老是说老一套话，好懂是好懂了，可是人家还是不喜欢，而且更不好记。人家喜欢适当来点新鲜的。要有不同的色彩，是人的天性，所以世界才五彩纷呈。你适当来点新鲜的，人家稍微一动脑筋，明白了，比听老一套记得牢。过于深奥了，人家动了脑筋还是不明白，就不想动脑筋了，于是乎不明白，交际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这个新颖要适度。这个适度的度是不怎么好掌握的，是要在实践中逐渐调整的。我们希望的是逐渐适度，而不是不要新颖。

实际上，乔姆斯基的语法装置说，就认为人天生具有语言创造能力。不过，他的语法装置说，没有明确说语言的词汇等方面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更赞同《马氏文通》的提法。许国璋在《中国语文》1991 第 3 期上的文章《〈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说《马氏文通》后序首段：世界上一切人种，不论肤色，天皆赋于心之能意，意之能达之理。这一点“叫人想到今人所说语言是‘生来俱有’的学说”。这些论说，“今天的学者耳熟能详。然则马氏在一百年前得现代语言理论风气之先，是中国语言学的骄



傲。”劳动创造语言说，是指人类初期。我们说的是现代人。我们后天的一个任务是唤醒。唤醒，主动权在睡着的人的手里。唤醒者不能己之昏昏，要高层次，要有耐心，有技巧。唤醒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唤醒之后还会睡着。人基本上具有他以前的全息，唤醒得不得法，会唤醒低层次的信息，而阻碍他高层次信息的被唤醒。

创新部分是稳定部分的唯一来源。我们特别要鼓励创新。我们的教材要帮助学生创新。我们当教师的要在创新方面进行身教。一切语言示范者要在语言规范尤其是语言创新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也要注意语言创新方面的测试。学生的学习是为了社会的发展。继承也还是为了发展。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发展，特别是大学生。法乎其上也还是模仿，还要脱颖而出。创新不等于降低层次，不等于奇谈怪论，不等于一般形式上的变化。我们的学生头脑里要有自动升级的程序。其实，自动升级的能力是人本来就有的。语文教学就是唤醒学生这种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并且帮助它发展。帮助它发展，我们教师要留心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我们教师要提高创造语言的能力，我们教师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语言观。我们经常说：“当教师的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缸水。”其实，一杯一杯给下去会有给空的时候，即使不给空，那水也不新鲜了。我们教师应该时刻生活在活水面，成为活水的一部分，并且努力让水增加活力。这样，我们的学生就不仅仅是得到知识和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而是能自己找到知识宝库并且锻造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能吸取、提炼前人的宝藏而且为世界增添宝藏。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学生从我们这儿只是学到了一些守株待兔用的知识，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有动态变化的天罗



地网，头脑里有自动升级的程序。我想，这个程序应该也是与生俱来的，问题是我们要用好它。帮助学生用好它，关键也在于我们教师自己先用好它。

近些年讨论语言能力分化的时候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位是中国农村的老太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中国话说得好；一位是外国的语言学教授，说中国话说不好；会研究中国话。谁的语言能力强？这样就把语言能力分化为交际能力、知识—研究能力。换个说法，前者有语感，后者有论感。我们语文教师的语感和论感都要强。有一定的语感又有一定的论感，发现不同于原来理论的语言现象，及时调整我们的语言观，再用新的语言观观察语言现象，又会有新的认识，语感和论感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这就用好了自动升级的程序。教师自己用好并且帮助学生用好自动升级的程序，恐怕是我们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

重视创新是我们对待语言的基本态度和语言研究方法、方法论的重要基础。例如，我们要重视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我们重视匡谬正俗的消极规范，但是我们认为及时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的积极规范更重要。追认不是规范的辅助方法，它只是有时候不得已的补救方法。语言规范的阶段观也不要常常成为我们在语言规范认识上跟不上趟的托词。还要及时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学思想。又如，我们认为语言如果不能发展那是最大的不规范。还如，既然语言是发展变化的，那语言就是开放的，我们认识和解释语言就不要自圆其说。语言不整齐的地方，往往是语言通往上层次或者下层次的通道，往往是语言发展的重要部位。我们的研究方法要立足于引导语言丰富、发展。要注意实践中的新问题，要重视第一手材



料，要重视调查中的个案，要重视调查中的不同意见。我们在语言学术上要尊重不同意见。要重视研究方法的创造性。

迄今为止，我们语言方面的教材、著作、文件、规定，在鼓励和帮助人们发挥语言创新能力方面是很不够的。与此有关的是我们的语言学在很多方面落后于有关的兄弟学科，我们关于语言的不少认识落后于关于社会生活的认识。

（这是做了一些改动收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为庆祝建所二十周年编的《语言文字应用论文集Ⅱ》里的，143页，语文出版社，2004）

三、几个问题

（一）关于语言的美渗透在语言的交际之中

我曾经说过：“规范还是基本的要求，比规范层次更高的是优美。规范还只是语言使用的不高不低的一个层次的要求。”（《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218页，书海出版社，1996）这个说法是不对的。1999年8月15日访陈醇的时候开始改变，在一系列文章中说语言的美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语言美渗透在不同层次的语言交际里面。例如：“交际值里含有文和质两个部分，我们的交际应该文质彬彬。美，包含在交际值里。没有游离于交际之外的语言的美。”（《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

又如：我们常常说某某人会说话，某某人口才好，某某人文笔好，于是也常常想办法练说话，练口才，练文笔。办法五花八门，似乎有些效果，也似乎没有多大效果，理论上更是缺少根据。

我几乎天天晚上入睡以前都听广播。有一个节目是一男一女说新闻，也算是谈话类节目吧，我比较喜欢听，觉得这两个人口才不



错，似乎什么话题都可以谈，还谈得比较深刻。有一天这两个人谈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这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我一听，他们外行话太多，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头，不觉得他们会说话了。或许以前他们谈别的话题，对那些话题很专业的人听了也不觉得他们会说话，或许觉得他们会说话的是对话题不怎么了解的人，或许他们两个几乎天天在临时准备之后说一些他们并不很了解的话题。于是，我进一步觉得要会说话，就要对说的内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不存在脱离了对内容了解的会说话、语言美。

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说到我们有见解的内容了，说话顺畅了，听的人甚至我们自己也觉得用语很美。我们一般不说我们不了解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好。

所以，教人家不管什么话题、不管对那些话题了解不了解、不管自己要说的话想好了一些没有，张口就来，而且滔滔不绝，而且还有声有色，而且还美，恐怕是难为了这些老师和学生。

语言交际到位就美。这个到位包括了文和质。不够美，说明语言交际还不够到位。到位，一定准确，准确就是跟别的联系与区别清楚，当然就鲜明。

认识深刻，语言才容易生动。人民大众的语言生动，因为他们对他们的那部分生活的认识很深刻。认识深刻了，语言表达才能浅出。

不是说认识深刻了语言表达一定就好，语言还是要下苦功夫学的。但是，认识不深刻，语言表达一定不会好。这些认识也属于语言学。说这些话也是有针对性的，几次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评委都一再批评说，不少歌手只是在唱音符，不能打动评委的心。到了决赛了，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说明实际上对什么是美的认识的糊涂不能不说是相当严重的。

吕叔湘没有说语言美是语言的最高境界，他说的是语言“得体”。



美不能脱离时空，得体就是美。美在交际中，渗透在交际的不同层次之中。没有交际就没有美。

“翻译的标准很多，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提出‘信、达、雅’三项标准。‘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就是忠实于读者，‘雅’就是忠实于文学语言。”（蔡富有、郭龙生主编《语言文字常用辞典》71页“翻译”条，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我们有时候把“信达雅”作为语言表达的三个层次了，跟严复的原意不同。

还有，现在一般人饭菜有得吃了，要吃好了，忘掉困难时期了，忘掉吃饭的目的了。我们总不能吃饭损害了生命和健康吧，吃好的要好在有利于生存和健康吧。不存在游离于、脱离、损害生命或健康的吃好和美食。农家粗茶淡饭也包含美，可能是很高层次的美。不同层次的美渗透在不同层次的有利于生命和健康的吃食里面。有一个小品，叫《红高粱模特队》，其中赵本山说劳动最美，这令人深思。

有一个电视节目介绍花的颜色，花不是平白无故地显示它的颜色美，它是吸引有关的昆虫等来帮它传播花粉。

（二）关于交际值的衡量

进一步探讨怎么去操作去衡量，这是认识了交际值的重要性之后下位层次的事。不能因为不好操作就认为它不对。追认难道就好操作？有时候好操作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关于交际值的操作涉及到衡量语言规范的问题。王希杰把句子分为语音句、语义句、语法句和语用句，举例从不同角度以及综合角度分析了句子的规范情况。（见《重新认识语言，推动语文规范化——第4次语法学修辞学学术研讨会择要》，《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储泽祥在《汉语规范化中的观察、研究和语值探求——单音形容词的AABB差义叠结现象》（《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1期）也作了有关的分析。我在《文学作品中的新词语》（《修辞学习》1994年第5期）一



文里试着分析了“灰颓、渴盼、泼脱、抒泄”这几个词。我觉得两个双音节形容词或者动词常常能合成一个双音节词。有一种情况是并列的两者有“而”或者“又”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比较牵强，就比较难合成，如“泼辣”和“洒脱”，而且“泼脱”的构音也有些不妥，像拟声词。即使有不少“而”或者“又”的关系也不一定好合成，否则“而”和“又”一类在短语里不是只起过渡和松开的作用了吗？像“灰颓”里的“灰心”和“颓丧”，后者还包含了前者并且程度又甚于前者。“渴盼”里的“渴望”和“企盼”，前者也包含了后者又甚于后者。“抒泄”里的“抒发”和“发泄”缺少“而”或者“又”的关系，如果从“又”的关系方面来看，色彩一褒一贬也合不好。

这些还都是举例性的，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三）关于唤醒语言

语言是与生俱来的，人生下来之后不是习得语言，而是唤醒语言。大概有这样几个根据：一、宇宙是全息的，人类具有宇宙发展链人类之前的基本信息。现代人类也具有这之前已经出现了几百万年的人类的基本信息。东方哲学里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和人之前的基本信息，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本自俱足的。二、人的工具都是人原有的能力的外化，语言是工具，也是人原有能力的外化。三、人生下来之后语言能力有的差异很大，有的是天才，要用他们原有的语言休眠的程度来解释。《马氏文通》“后序”说：“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里的《〈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1996年11月27日开展的语言哲学对话，讨论“语言的人文性”，曹志耘说：“语言，也可以说是人的一部分。”1998年8月27日《文汇报》刊登了记者吴娟优秀的长篇专访《面对新词语的丰富世界》，报社某同志在“背景提示”里写道：“语言



和我们与生俱来”。这些认识不同于人脑里语言先天白板说，也不同于乔姆斯基的人的语法装置的天赋说。这里还要说明一点，人脑子里不是白板，但人脑子里的语言也不是满满的或者说事先全部定下来了，它有发展的空间。这就涉及到学习和发展的问題。

怎样很好地唤醒和发展，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关于学习和发展

1999 年秋天，我辅导当时我教“应用语言学”和“现代汉语应用与实践”课的高职班一年级的王心琳写了一篇《学习与发展》（《播音主持艺术 2》，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文章批评了“守株待兔”式的学习，提出：“学习和发展相辅相成。我们在学习阶段就应着眼于未来，不局限于现阶段的学习和短期的发展，要在头脑里装下自动升级程序，以变应变，以变引导变。”（355 页）

（五）关于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

2000 年 11 月，我给当时锦州师院中文系的师生做了个讲座，谈到“用好自动升级程序”的办法是“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语文教学通讯》2001 年第 5 期的卷首上刊登了我的《用好自动升级的程序》，其中说：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学生从我们这儿只是学到了一些守株待兔用的知识，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有动态变化的天罗地网，头脑里有自动升级的程序。我想，这个程序应该也是与生俱来的，问题是我们要用好它。帮助学生用好它，关键也在于我们教师自己先用好它。

近些年讨论语言能力分化的时候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位是中国农村的老太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中国话说得好；一位是外国的语言学教授，说中国话说不好；会研究中国话。谁的语言能力强？这样就把语言能力分化为交际能力、知识—研究能力。换个说法，前者是语感，后者有论感。我们语文教师的语感和论感都要强。有



一定的语感又有一定的论感，发现不同于原来理论的语言现象，及时调整我们的语言观，再用新的语言观观察语言现象，又会有新的认识，语感和论感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这就用好了自动升级的程序。教师自己用好并且帮助学生用好自动升级的程序，恐怕是我们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

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是根据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也体现了发展的认识。

我在《语言传意和传意者》（程祥徽主编《语言与传意》，香港海峰出版社，1996。又收入《在语言学的道路上——于根元自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里先说了三件事，基本上都是语感，也谈了一些论感：

第一件是，1991年我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新词新语新用法”课题组的同人编新词新语新用法的词典。大家从报刊和书上勾乙，有时候读了许多也勾不出什么来，有时候一篇文章里可以勾好多好多。我们决定做一段时间的统计，找一点规律。目的是把主要力量用来发掘富矿，提高勾乙的效率。我们发现，找新词语，外事版、理论版，很少。农村题材、军事题材、古代题材的小说和平实的散文里，也少。报告文学、杂文、新闻报道、座谈会发言里比较多，口语化的语言和现代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品里比较多。那几年，《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里相当多。大概有这样一个规律，思想活跃、语言活跃、形式活泼、贴近生活的文章里新词语比较多。新词语在开放的、思想活跃的、贴近生活的领域里容易显现和传播。社会历次大变革，尤其是引起思想文化领域变革的时候，都引起词语比较大的变化，而且往往引起关于这个现象的讨论和争论。



第二件是，1995年我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广告语言研究”课题组的同人研究广告语。我们常常听到广告界的人说，我们许多语言研究同他们的实际脱节。为了探个究竟，也为了结合实际，这一年3月到5月，我们到中国邮政广告公司去实习了三个月。我们也参加了两个产品广告语的设计。总监对我们说，语言的功力是重要的，但是光靠这个不行，还要靠思维活跃和别的。思维要很活跃，活跃到不发神经就行。思维活跃不是拍拍脑袋乱想，也是有规律的。

第三件是，1995年我撰写《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这本书。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后来的大众语运动，要唤起民众，要作家用民众能懂的话来写，但是没有明确提出要向民众学习语言，而且认为民众的表达法“简单”，作家不能仅此而已。延安整风明确提出了向民众学习语言，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自选集》132~133页）

接下来说了思考，涉及论感了，大体用的是归纳法：

似乎有两个理论与此不相一致。一个是实际上是常常冒出来的“语言学习是一次性”的理论。我们许多人口头上说语言是相对稳定而时刻变化的，但是对变化多少有一种排斥的情绪，说什么越稳定的越规范。至今还有学者说这个不规范，那个不能说。原因呢？汉语里原先没有。还有一个是语言的创造是在语言功力非常非常强之后的事。当然是语言大师的专利，民众怎么能创造语言来让语言功力比他们强的人来学呢？可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少有一定语言功力的人语言表达干巴巴。而有的作家本来语言表达不错，进修了语言之后，似乎有些退步，这是另一方面的现实。他的语言功力是强了些，可是丢掉了一些并非



与此一定水火不相容的思维活跃——我们常常称为灵气的东西。

因此，考察一个语言传意者的语言传意，在有点静态的语言功力之外，至少还要看他的思维是不是活跃。表现在语言上，看他是不是善于学习新的东西，是不是善于变通，是不是注意用得活。（同上 133 页）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语言功力和思维结合的种种情况。然后联系到“情趣”，有归纳法，但是有演绎法。有很多语言事实我是此前就接触了的，这个时候对这些语言事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语言功力、思维情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情趣。（同上 135 页）

接下来讨论了三者结合的种种情况。

下面我们还会讨论到起初认识到“语言不规范现象也会新生的”的个别例子，然后认识到几种今后还会出现的几种类型，然后初步有了上面的结论，然后加深了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的认识，然后进一步认识各种语言现象。

还如，我在我主编的《网络语言概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前言”里从事实归纳出一个认识：“近一年来的网络语言冲击波的发展，总的看来，跟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大众语运动的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含有共同的规律。”（8 页）后来我在《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里说：“2002 年 8 月 27 日，国家语委语用司召开了关于社会语言热点问题座谈会，会上就有不同意见。肖复兴、敬一丹和我的发言意见比较相近，新浪网和北京电视台对我们的发言比较感兴趣，2002 年 8 月 31 日请我们三个做客新浪网，跟网友主要讨论网络语言问题。那个活动是北京电视台一起办的，电视上也会播出。据说一家广播电视的报纸在头版上报道了我们在新浪网的谈话。这次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20 世纪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



运动，从文学界开始，然后才是语言学家唱主角。这几年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也是如此。我觉得其中有规律，就是文学界敏感，语言问题的深入解决靠语言学家出面。这次活动却是语言学家、媒体重要人物和文学家的联手，这是社会的发展，也是媒体和文学界对语言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平。”（168页）调整了原有的认识。

还有，我在《留心各种语言现象》（《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又收入我的《语言应用论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说研究者语言事实的研究和语言理论研究不妨螺旋般前进，也有这样的认识：“具体到一个人，不妨某个阶段多考察钱，然后花一段时间多考察一下相关的绳子，然后再用进一步的网络意识来侧重考察钱，螺旋般前进。”“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敏感应该是对有关语言学理论知之甚多者的本领，而不是相反。”（《语言应用论集》389页）

我们都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只不过我们当时可能没有很自觉地认识到这是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而已。其实，我们都是有了一些语言实践了，从语言实践里概括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逐渐形成了一些结论。然后用这个结论进一步审视语言实践，包括新的语言实践，补充、完善或者修正、调整原有的一些结论。这里也用了演绎法。我们硕士、博士论文的开题的时候，总是有了一些认识和设想了，这些认识和设想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事实和进一步的认识，才能写出论文。一般人写论文也是这样。这是实践论的过程。不要把确定论题和方案都看成是脱离实践的“大胆假设”，不要把进一步调查事实和深化认识写出论文都看成“小心求证”。你不这么做试试。后面的论文也处于中介状态，学术的理论都处于中介状态，比较流行的理论都经过开始提出和不太流行的阶段，流行不等于正确，开始提出和不太流行不等于不正确。所谓正确也不是绝对的。“假设”在科学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设。有的假设是还没有证实



的事实、预见和规律。人的语言交际本身离不开假设。我们跟对方谈话，都是对对方有许多假设的，例如假设对方听得明白，如果对方不够明白了，我们再调整我们表述的深浅等，所以说语言交际能力还是实际交际中不断磨合的能力。近代，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小心假设，大胆求证”之说。W. I. B. 贝弗里奇著、陈捷译《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81）的第四章就是“假说”，分“实例”“假说在语言中的运用”“运用假说须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讨论“合理假设，合理求证”，在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方面应该有一篇专论假设的论文。

“神农尝百草”，这个“尝”就含有假设，同时，又是实践。

邢福义在《语言学科发展三互补》（《汉语学报》2005年第3期）里说：“研究问题，不管范围大小，只要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便可以认为是一家之言。小到一篇文章，提出与别人有所不同的说法，富于新意，可算一家之言；大到总揽一个学科，另辟蹊径，提出足以影响整体发展的关键性主张和理论，更为一家之言。从前者到后者，往往是量之积累引发质之变化的过程。学科的发展，特别需要后者。这样的‘一家之言’，是学术发展的前导，是促成学科昌盛的基石。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往往是粗糙的，很不成熟的，但是，无论如何，都应采取由衷欢迎的态度。”（2页）“学术领域，没有‘武林至尊’；‘一家之言’，不应‘唯我独尊’。任何一个学科领域，没有‘一家之言’固然表明其处于低谷状态，如果仅有一种居于垄断地位的‘一家之言’，也表明其远离成熟。”（2页）“当然，所谓‘理论创新’，更准确地说，应该添加中心语‘思考’，说成‘理论创新的思考’。因为，就事实而论，我们基本上只是停留在‘思考’的阶段。正因如此，学者间相互尊重，不同学术群体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十分重要。”（3页）

对语感和论感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论证，论证的核心是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的条件和途径。好的语感如何形成，好的语感如何



促进形成好的论感，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好的语言使用家不一定是好的语言理论家，好的语言理论家也不一定是好的语言使用家。

（六）关于趋新和趋同

语言交际能力是不同情况下跟不同人现实的既趋同又趋新把握好度的不断磨合的能力。语言交际能力有求稳和求新两个方面，语言交际能力包含趋同和趋新，两者本身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只趋同或者只趋新，也不是先趋同再趋新。语文基础包括这两个方面，共同的目的是交际到位。我们的教学也要认识到这一点。只顾稳和只顾新都有片面性。知其二不知其一，不好；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让学生知其一又知其二呢？关键还是要尽量进行实际交际的教学，模拟的交际教学要尽量结合实际交际的教学，不能让学生误以为某些模拟交际是实际交际而丰富复杂的实际交际却不是交际。语文世界是个实际的丰富复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交际的求稳和求新本来就是结合的，如何结合得好，也要在实际交际里磨合。

语言的训练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以思维为中心，一个是以语言为中心（语智说）。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交流要与万人谈，崔永元在《实话实说的实话》（时间、乔艳琳主编，崔永元、关秀玲、赵一工策划，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里说：

后来不久，就见到著名作家麦天枢，我向他叙述自己的苦恼，说自己过去有个很好的习惯，看看书、读读报，现在时间越来越少，尤其是静下来读书的时间。麦天枢说：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愣了，我觉得这句话没必要解释。麦天枢说：十个人有十个解释得不对。这两句话是并列的，就是说，一个人读一万卷书和行一万里路，收获是一样



的。不是说先得读一万卷书，再行一万里路，那任何人都达不到这个境界了。他说我再给你加上一条：和一万个人说话。你现在就靠第三条，这和读万卷书的效果是一样的。这让我豁然开朗，我觉得现在我一直在充电，而且不比谁充得少。（109～110 页）

所以，充电的最好方法不是或不只是读书，关键还要与别人谈话。现在的谈话节目，关键就是许多人要求有话语权，而且需要互动；思想碰撞可以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出现。

交流中最主要的是即兴口语表达，谈判、辩论、提问等都是即兴口语。现有的训练方法，关键是要讨论一些认识问题。沟通，首先要对别人的语言理解，第二是表述。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的连贯性不一样，但并非不连贯，否则，人该怎样思维呢？形成语结、伸展语结的方法，关键就是要在交际中进行训练和拓展。比如，可以把现场即兴表达录制下来，过后进行分析。此外，也包括分析、联想等方法的运用；写作关的通过，也是在初稿完成后，进行集体评判。运用这些方法，关键还是生成问题，要写好短篇幅的语结，然后才有可能拓展成长的篇幅。陈晓宁已经有专著《论整体设计语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於春在 2006 年 1 月有讨论语结的专著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听话的能力和理解为中纠偏的能力。

现在还有“八股”的回潮，总的特点是不新鲜、套话，套话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套话”并不全是老套套，它也在发展，它也有新套套。贾磊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若干新套话调查分析》讨论这个问题。

（七）关于白话文和当代汉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五四白话文在很多方面是重建，怎样重建的，都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古代双音节的词不太多，为什么四音节的成语相当多？



相关的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问题。书面语并不是完全都从口语中发展来的，他们是不同的语体，有的语言只是出现在书面语中。五四运动以白话文为一个基点，不过口语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后来，陈建民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现在还有不少基本的问题要调查研究。

近些年，不少学者又在讨论和关心“当代汉语”的提法。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汉语跟1919年到1978年这个历史时期的相比在许多方面尤其是词汇方面有了比较大的不同，我们不少语言学者认为我们汉语从1978年以来进入了当代汉语时代。例如，语法方面，有些格式使用有明显的扩大化的倾向，动宾加宾、副加名、谓词带宾语、谓词和一些名词加“着”有的加了之后还带宾语、重叠四字格的多样。语义对句法的推动也比较明显。词汇方面，出现的新词语以经济方面为主而且多方面，口语里单音节词增加，后缀和准后缀增加，语文性词语的范围扩大。语音方面也有一些倾向。文学作品语言使用可以归纳出几点：一、叙述者跳出来说话。二、快节奏。三、意识流。四、多种样式手法的交融。还有一些副词的单用。我们的语言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对语言对汉语的认识有了发展，我们认为当代汉语里使用的不同时空来源的部分都属于当代大汉语的大系统。我们对语言规范的认识有了发展，认为及时发现和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比匡谬正俗更重要。我们在语言观方面有了许多发展，跟认识语言的范围和特点以及促进语言发展和今后进一步显示它的特点有关，它本身也是进入当代汉语的形式标志。上面还是很粗梳的认识，关于当代汉语的主要标志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这里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1978年起我国进入了当代汉语时期，那么我国的现代汉语阶段为什么相当短？



5

其他基本理论

○我们还有很多语言资源没有开发。一种语言现象不是可以无穷类推的，但是我们现在资源浪费是很大的。我们对语言创新鼓励不够，在语言创新方面尝试和研究不够。

○纵横交错，突破历时共时严格限制，还突破空间严格限制。

○语法格式使用的重要的扩大化也带来争议也就是带来新颖、活跃。谓词带“着”、形容词带宾、动宾带宾、副加名、名加“着”，近些年来这些使用的重要的扩大化很值得关注。这些格式起初也是新格式。把主要语法格式出现和重要发展的历程梳理一下找出一些规律，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基本内容

陈章太和我的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对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作了评介：

事实上应用语言学有自己的理论，如交际理论、动态理论、中介理论和人文性理论，尽管这些理论还不够成



熟，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交际理论是居总纲位置的理论，是本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结合的纽带。交际是一种活动，语言存在于交际活动之中。因此，语言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性是语言的本质。其实人们早就看到了语言的动态性，问题是如何看待语言的动态和静态的关系及地位。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静态看作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认为动态是对静态使用的表现。语言的动态理论则认为，物体运动速度不同，速度相对比较慢的叫稳态，速度相对比较快的叫动态，动态是语言的主导方面。而所谓的静态只是为了研究、说明、解释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状态。中介理论一开始是从语言教学中来的，现在不仅语言教学讲中介，社会语言学也重视中介。还有人文性理论。这三者都是语言交际理论下位层次的理论，此外还有层次理论、潜显理论等。（《应用语言学概论》3~4页）

我在《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里介绍交际理论之外的基本理论说：

关于层次理论。

人分层次，决定了交际分层次，决定了语言分层次。语言的层次同交际的层次、人的层次紧密相连。

语言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比较活跃的外层以及中介物构成，共同为交际服务。比较活跃的外层如新词新语、广告语言等，比较稳定的内核如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基本语法等。比较活跃的外层是比较稳定的内核的唯一来源。现在比较稳定的部分当初都是活跃过的。语言的发展变化首先表现在比较活跃的外层。语言比较活跃的外层转化到比较稳定的内核，并不完全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比较活跃的外层和比较稳定的内核，总的说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



是对立的关系。某些词语用的时间长短，一般说跟它指的概念等存在的时间长短有关。某些词语一个时期用的人多，跟这些词语一个时期同影响比较大的群体共振有关系，这些词语占了位之后更好一些的近义词语就比较难再占位。

语言的内核部分，往往是语言水平低一些的人要尽快掌握的。语言的外层部分，语言水平比较高的人常常使用。语言的内核部分比较好做标准，语言的外层部分的使用常常用指导性的方法。我们的语言工作、语言教学、语言研究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任务来确定重心，但是都要认识到语言的整体和各部分的关系。

还可以说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比较靠下的比较稳定，比较能产。比较靠上的比较活跃，比较充分地显示了语言的全息。比较靠下跟比较靠上之间的律动可以说是喷泉现象。

古人概括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基本精神，如《周易正义》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卷一）语言是由比较活跃的外层和比较稳定的内核以及中介物构成的，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一点，正是从一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正义》还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卷四）“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卷五）

语言也是如此。

我们语言学的不够活跃，可能跟我们长期以来比较忽视语言比较活跃的外层和靠上的部分因此也比较忽视语言的运动有关。

语言的层次理论，也是我们关于语言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层次认识的基础。语言研究方法具有层次性。语言研



究的基本的方法是比较方法。其他的方法都是由比较方法衍生出来的。语言研究的方法还具有灵活性、多样性。语言研究要纵横交错，突破历时和共时的严格限制。

关于动态理论。

运动是绝对的。运动速度相对比较慢的叫稳态，运动速度相对比较快的叫动态。或者说稳态是动态里的一种状态。实际上的物种分成非生物和生物。其实很多非生物的运动速度也很快。生物里分成动物和非动物，动物当然是可以自己运动的。人是最高级的动物。语言是最高级的动物人用的。交际是一种活动，语言是在活动的。语言又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动态是语言的本质。语言局部的发展变化会引起语言内部有关部分的发展变化，使得有关部分协调，这就是语言的自我调节。语言运动的方式是脉动。语言的运动有急流和缓流。语文工作还有进进退退。认识这些规律，有助于能动地促进语文工作。

语言的运动是一种新陈代谢。语言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运动是律动。语言的运动也可以归结为语言的潜和显。语言的时空分布既反映了语言的层次，也反映了语言的运动。

语言是个巨系统，惯性很大。语言工作要适度超前，不要追求立竿见影，要重视后效应。

语言发展的外部动力是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语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对一个较长阶段语言生活情况的总的估价是跟对一个较长阶段社会的发展以及语言工作、语言教学、语言研究的总的估价密切联系的。我们认为当前语言生活情况总是好的，所以我们赞成语言工作重在建设。

关于中介理论。



运动的连续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具有周边事物和前后事物的一些属性。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不都是“非此即彼”。往往是“亦此亦彼”。对立通过中介转化。语言跟其他现象一样，存在着中介状态。语言的中介状态，典型的就地方普通话。对说地方普通话的人，一是要鼓励，二是对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有比较高的要求。后来，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中介语常常是人们学习语言的正常过程，人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必然有许多不到位也就是不规范也就是不纯洁的语言现象的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里就要交际。我们要把这种过渡状态跟语病区分开来。由此，不少学者对纯洁语言的口号进行了反省。20世纪90年代，不少学者讨论语言观的时候，讨论了这个问题。1997年12月23日许嘉璐代表国家语委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作的主题报告里明确提出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近几年来我们对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语言是为所有的人服务的，人是分层次的，而且是不纯的，人不纯谈什么语言纯。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了，人又要学习，这个学习又要有一个过程。还有，由谁来纯洁语言呢。不规范的语言现象也是不断新生的。不纯洁是语言正常运动的正常表现。语言是大海。我们是在不纯的情况下搞规范。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交际，不是妨碍交际，不是为了纯洁语言。语言规范实际上不是规范语言本身，是规范人的语言使用。

我们不赞成当今社会里有谁谁的语言“一字不易”的说法。

运动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一切都处在中介状态，所有的语言都是中介语。语言研究的就是语言运动中的个性和共性。



当前，不少学者进行语言现象延伸段和交叉段的研究，是很有眼光的。比较，主要是认识一事物同他事物运动中的联系和区别。

关于人文性理论。

这里说的人文或者有时候说的文化，主要指的是习俗。我们不要忽略语言的人文性，也不要跟语言的阶级性的说法沾边，还不能把语言的人文性理论凌驾于交际理论之上。

关于潜显理论。

运动和时空是连续的，事物不是同时空同样显现的，显和不显又是有条件的。语言也是如此。加上色彩的潜显，可以说语言始终处在潜和显的过程中，语言研究的就是语言的潜和显及其相关条件。语言不是同时空同样显现，也是为了交际。

语言的潜显理论是对待语言规范的“前瞻跟踪观”的基础。

下面几节是对上述认识的一些补充，也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二、关于“内核外层互补说”

我在《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长江学术》第6辑，2004年）和《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里又提出了一些认识。

（一）“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这个认识首先是从新词新语的整理和研究的实践里来的。我们1986年开始整理和研究新词新语，当时碰到一个“追认观”，说是：“一个新的语言现象出来以后。用的人多了，用的时间长了，我们来追认它，这就是我们的规范工作。”既然是这样，我们辛辛苦苦来做新词新语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干什么？语言里除了比较稳定的部分，还有比较活跃的部分，比较活跃的部分也是人们要用的部分，比较活跃的部分是比较稳定的部分的唯一来源。这是事实根据。

“追认观”也是有根据的。我们找到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里类似的说法：“这个形式一再重复，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但不是任何的语言创新都能同样成功，只要他们还是个人的，我们就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语言。只有等到它们为集体所接受，才进入了我们观察的范围。在一个演化事实之前，总是在言语的范围内先有一个毋宁说许多个类似的事实。这丝毫无损于上面确立的区别，甚至反而证实这种区别。因为在任何创新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时期：（1）出现于个人的时期；（2）外表虽然相同，但已为集体所采纳，变成了语言事实的时期。”（141～142 页）

我们还有一个事实根据是语言交际能力。我们认为说话不能都是老一套，求稳和求新是语言既能用来交际又交际得好的要求，语言交际能力是跟不同的人实际交际既求稳又求新或者说既趋同又趋新把握好度的不断磨合的能力。交际理论、层次理论、中介理论、动态理论、潜显理论、人文性理论，都可以作为支撑这个认识的部分理论。

（二）语言活跃的外层，用多了，新颖色彩逐渐潜藏，稳定色彩逐渐显现。有的语言不怎么用了，潜藏了，后来又用，又新颖了，不怎么用的某些情况我们叫轮休、充电。轮休、充电后的某些语言现象，连编词典的行家都不很知道是轮休、充电过的。现有的新词新语词典，很多都收了这样的旧词语的。内核到外层的原因之一是内核的这一部分处于潜的状态，潜得比较久，许多人遗忘了，又有了距离美，觉得新颖了。就像有的过去的衣服样式又时兴了，就像吃鱼肉吃多了想喝粥了。除了距离美，还有口味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原有的重新做了认识，还有怀念过去，还有需要多样化。有的



语言不容易充电，意义和色彩可能贬义很强。

（三）我们需要探讨新的语言现象出现的内外部原因。拿汉语来说，语素也是变化的，有的双音节的一个音节的意义虚化了，语素也变化了。语素和语素的结合的可能性是很多的。这是语言的资源，也是表达可以新颖的一个根据。

（四）我们还有很多语言资源没有开发。一种语言现象不是可以无穷类推的，但是我们现在资源浪费是很大的。我们对语言创新鼓励不够，在语言创新方面尝试和研究不够。理论方面有阻碍，人的思想也有一些定势。还有一些人滥用，也给创新带来一些麻烦。已有的显语言现象也为新的资源的开发既起促进作用又起制约作用。

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进一步解放语言。进一步解放语言，也是进一步解放人自身。

（五）“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说梯形结构的下线是开放的，主要是指这里有人的语言跟动物语言的交叉。我们人的语言里来自自然界和动物语言的成分也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要重视拟声词和感叹词。拟声词拟的往往是动物和自然界的聲音。有的拟人的声音，但是从拟声来说跟拟动物和自然界的聲音没有什么不同。感叹词在语言的上线，“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人还要同人设计的目前比人低得多的机器说话。

梯形结构的上线也是开放的，那是人的语言同人的更高的表现手段的交叉。人使用语言和体态语往往也是交融的。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都离不开体态语，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有表情。地球之外很可能有更高级的人，那些人也有语言，也可能跟地球人彼此交际。

人类之后还会有更高级的生命体，那样的生命体的语言高于现在人类的语言，但也还是人类语言的延伸和发展。

（六）语言的潜和显也有程度不同，显了之后不会全潜，但是会相对地潜。



(七) 语法格式使用的重要的扩大化也带来争议也就是带来新颖、活跃。谓词带“着”、形容词带宾、动宾带宾、副加名、名加“着”，近些年来这些使用的重要的扩大化很值得关注。这些格式起初也是新格式。把主要语法格式出现和重要发展的历程梳理一下找出一些规律，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八) 梯形结构开放的两边，可以看做跟语言内部运动互动的社会等外部运动。社会的变动和其他事物的脉动影响语言，语言本身也有脉动，这就构成了复杂的运动，或者这就是语言运动交响曲。我们研究语言，有一项任务，就是研究这些运动和运动间的关系！

(九) 语言开放的梯形结构里靠上跟靠下之间是大量的中介现象。有的语言现象品位高、耐磨，比较长时期既新颖又稳定。这里还需要保护，不滥用。20 世纪 80 年代好不容易用上“小姐”了，因为滥用，现在很多地方称呼年轻的女子不知道叫什么好。“绿色”也是很好的说法，可是不少公害严重的东西也叫绿色产品，使“绿色”贬值。“我爱你”一说似乎没有怎么滥用，还有神圣的色彩。语言的保护要社会来做。

三、关于“惯性原则”

很多人都关注语言的惯性。

陈章太和我的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说：“语言应用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启动起来需要一定时间，而要停下来，由于惯性作用也需要时间，所以语言工作有时要适度超前，做好促进工作。”（《应用语言学概论》6 页）

我在 1992 年 3 月 29 日～31 日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主办的“澳门过渡期语言发展路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提出社会、人对语言的影响到语言发生变化往往有个时间差，所以我们有的工作要适度超前。后来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



出版社, 1996) 里说到: “语言的变化有个惯性, 对语言发展的推动或者破坏, 立竿见影的情况并不多。”(139 页) “因为语言文字工作有惯性, 也就是后效应, 负效应在面上一时还看不出来, 但是后来慢慢表现出来了。”(同上 179 页)

我们 1996 年 11 月 5 日以《语言是什么样的工具》为题的“语言哲学对话”里讨论了语言的惯性。我说: “社会变化有惯性。人的思维也有习惯, 我们有时候叫做‘思维定势’。变有惯性, 不怎么变, 也有惯性, 怎么变也有惯性。语言是历史形成的, 语言还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又是个巨系统, 改变它有个过程, 立竿见影恐怕是做不到的。有的在语言里已经内化了, 改变起来也比较难。我们认识语言的惯性, 可以利用这个惯性。例如, 我们可以使‘动态变化’成为人们对语言的基本认识, 使人们对语言观的经常调整成为一种惯性。人是能影响语言的, 不过, 人要承担影响的后果。使语言更加健康、丰富、优美、文明了, 人们要承担后果, 使语言变得粗俗了, 人们也要承担后果, 而且群体很长时间承担后果。事先有一定的主动权、选择权, 但是后果来了, 阻挡不住, 后果的影响也就是一种惯性。”(《语言哲学对话》35 页) 施春宏在讨论中就提出: “预测也根据语言场的惯性。根据语言变动的惯性去预测, 光有语言学知识是不够的, 一次性短平快获得的语言学知识更不够用, 还需要提高思维活跃的程度, 培养语言生活的情趣, 以及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和思想。”(同上) 施春宏后来在《语言在交际中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里又说: “因为语言变化有个惯性原则, 由规范工作到语言受到影响到语言规范有了一些效果有个时间差, 有后效应, 所以要有预见性, 有超前意识。”(12 页)

下面再做些补充或说明:

(一) 涉及到系统的语言成分惯性大。要动它, 要谨慎, 动它的意义也大, 往往引起激烈的斗争。例如五四白话文运动。现在的网络语言、新词新语、外来词尤其是字母词, 都引起斗争。



(二) 书面语的格式惯性大。受书面语格式影响的口头表达惯性也大。

(三) 语言里稳定的部分惯性大。

(四) 惯性大，根本原因是使用者这方面的惯性大。一个是使用者多，一个是使用者比较习惯了，一动起来涉及使用者的语言习惯，惯性者，使用者的习惯性。

(五) 惯性大，指不容易起动，一旦动起来也不容易停，越是大的东西越是如此，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都是如此。正确的、合乎语言的大系统的，比较容易贯彻。不正确的、不怎么合乎语言的大系统的，不容易贯彻，但是会一定程度地造成混乱，纠正起来也麻烦。

(六) 动包括进步和退潮。不正确的一些庞然大物，一旦开始退潮，不是自愿地留下空白，而是被新的建设所取代，所以要重在建设。实际上是语言使用者经过比较选择了更好地为他们服务的方面，所以要尊重使用者，要服务，要以自己的使用来示范。要耐心，这一定要有个过程，因为一些人使用原来的一套有了习惯。

(七) 较量的时候不要说过头。说过头就不符合大系统，也不是重在建设，会引起使用者选择时候的反感，而且也不符合辩证法。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对立面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营养，也一定含有合理的因素，不然不会取代过去而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说过头话，会抹杀了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不符合事实，也失去了我们的一部分营养。有朝一日对立面里正确的一部分得到重新认识的时候又可能说过头，全盘连带错的部分又肯定下来，造成了车轱辘论题。这样无谓的翻过来覆过去论争，过去和现在都很多。这也是造成进退退的一个原因。

要耐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到了显的苗头，别人没有看到，有个水平问题，也有个显得不够的问题。到显得充分了，一般人都会看到。



要耐心，还有一个原因，语言交际有趋同和趋异两个方面，人希望稳定同时也希望变化，变化也是人的天性。问题是我们自己是否经常前进，否则有朝一日成为绊脚石。

（八）我们比较认识了惯性，语言工作还是有进进退退。大宇宙的运动是脉动。我们的认识和工作有时候要清理一下，这是一种调节。还有，就是往往好话说过头，好事做过头，引起对过去部分合理成分的重新认识同时带来过去不合理部分的反弹和回潮。还有，可能是我们提出的认识半生不熟，人家接受也夹生，这里有认识的夹生，还常常受到某种压力不得已跟着说。

（九）语言现象的运动并不是等速的，造成了语言现象的不整齐，研究语言需要考虑历时。考虑历时里的一个因素，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语言里惯性不同。

（十）语言的惯性跟人的惯性有关，要看看人的惯性的大小。语言内部是个巨系统，但是各个系统运动的情况不同，惯性大小不同。语言内部和外部各为惯性大小不同的动态平衡物。内外又互动。还有，老大难的问题都是惯性大的。

四、关于“前瞻跟踪观”

我们原先叫“预测观”。2001年10月26日～29日厦门大学主办的“第三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研讨会”举行。29日上午第一场跟第二场之间，九点五十分，韩敬体建议跟我达成一个共识：规范观叫前瞻性的跟踪观，不叫预测观，也不同意追认观，追认观不干活。我同意了。我说可以有这样三个说法：“前瞻性的跟踪式地进行规范、前瞻的跟踪的规范观、前瞻跟踪观”。《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预定发表我的《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里面有“预测观”的提法，我在校样里改成了“前瞻跟踪观”，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现这个提法。

我的“大事记”记着这样一件事：



1992年9月21日,《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两刊编辑部召开北京地区青年语言工作者座谈会。与会者认为,青年语言工作者应该积极关注和介入社会语言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实际,注意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增强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有利于使更多的人和部门从语言研究中获益,有利于使语言研究的价值进一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与会者对推广普通话工作和语言规范化工作发表了意见,特别是对词语的规范问题,很多人发表了新的看法,周洪波明确批评了语言规范方面认为“一个新的语言现象,出现的时间长了,用的人多了,我们来追认它是规范的,这就是规范工作”的“追认观”。

1995年12月25日~28日,国家语委主办、语用所承办的首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举行。近200位学者参加。陈建民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会前,陈建民出了个大会报告的题目《新词语的预测》,说让周洪波准备并发言,他说这个题目有冲击力,还说让我协助周洪波准备。周洪波本来脱稿说话的本事就很大,在我的房间里又预讲了好几次。头一天上午大会第一场,有一位专家重申了追认观,没有什么反响。上午大会第二场,周洪波发言,推出了一批预测可能出现的新词语,并且提出了预测的策略。他发言口齿清晰,条理清楚,内容集中,很有说服力,时间掌握得很好,全场反应强烈。我担任这一场的讲评,因为我跟周洪波以及这一篇发言的关系,对他发言的讲评没有采取高调。但是,这一场大会一结束,很多学者向他祝贺,有的一定要他继续研究,有的说我们要反思以前的规范观。这是预测观跟追认观的较量,也反映了这么多高层学者的态度,这是与会者心知肚明的。可是,第二天的一次会上,邹韶华的发言还把这第一场中的追认观和第二场周洪波的发言的针锋相对点明了。周洪波的《新词语的预测》,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我认为这标志着规范观从追



认识开始进入预测观时期。

吴为章在《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研究的方法：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一节里有关的评述如：“经常的做法是从已经显现出来或收集到的现存用例中进行分析、归纳，并据以构建理论体系；是一种认定式或规范式的整理工作。”（232页）“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新词新语新用法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却有较大的突破。”（同上。注说：“参看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第三编第八章《新词新语新用法》，书海出版社，1996年。”）“‘空语类’理论的引进：绘画、书法中的留白，音乐、朗读中的停顿，语言结构中的‘空语类’，都可以留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使人们不仅看到现存的‘显’现象，还可以猜想、预测可能出现的‘隐’（或‘潜’）现象。90年代以来，语言学家们开始把这一理论引进新词语的研究，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一研究的指导意义。这可以说是新词语研究的理论突破。有关情况参看周洪波《从隐性到显性——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和《新词语的预测》。”（233页。注说头一篇文章见《辞书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范围由‘显’到‘隐’的扩大，则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的有机结合。”（234页）

前十年，我们在语言预测的策略方面已经尝试了六个途径：

（一）周洪波的《新词语的预测》里说的类推仿造。

（二）我在《说“友”》（《语文建设》1996年第3期）里提出的占位等途径。

（三）刘一玲在《语言哲学对话》里提出的对外来词语的改造。（44～45页，语文出版社，1999）后来周洪波和我扩大了范围，例如韩语借了汉语的“玲珑”又有发展，可以说“玲珑的声音、玲珑的月色”，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借回来。

（四）我在《活大该》（《语文月刊》1990年第3期）里尝试的类似元素周期表的途径。



(五) 我在《语言哲学对话》里提出的合乎条件的成批类推的途径,例如“现代化、专业化、革命化、规范化、标准化”都可以拿掉“化”前面加“很”。(27页)我的2000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黄晓蕾的毕业论文就是《“很”和“化”》。

(六) 我们编网络语言词典的时候起初有这样一条:“戒网:脱离对网络过度的迷恋、依赖;不再上网。仿‘戒酒、戒烟’。如:‘我戒了38次网,失败了38次。’有谐趣意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戒网’这个词,但是根据上面的例子可以估计可以有这个词。”这是从离合词的离推断它的合。

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些途径。我们在编写《语言预测词典》(郭丽君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的时候尝试了以下的途径:

(七) 古代有统言、析言之说。我们可以从总说预测分说,或者相反。例如:我们给手机短信息送的饺子命名为“短信息饺子”的分说,预测会有“短信息礼品”的总说,又预测会有“短信息粽子”的分说:

短信息礼品 duǎn xìn xī lǐ pǐn 手机短信息赠送的虚拟礼品的总称。例如:“年三十的时候,朋友给我发来了很多短信息礼品,有一个短信息饺子是这样写的:‘今天是年三十儿,送你一个饺子,平安皮儿包着如意馅,用真情煮熟,吃一口快乐,两口幸福,三口顺利,然后喝全家健康汤,回味是温馨,余香是祝福。’”“在物质已经比较富裕而更加重视人情的今天,短信息礼品往往比实物礼品更感动人。”“短信息饺子、短信息手套、短信息月饼、短信息玫瑰、短信息外衣、短信息粽子”等是“短信息礼品”的分称。参见[短信息粽子]。(49页)

短信息粽子 duǎn xìn xī zòng zi 手机短信息赠送的虚拟的粽子。例如:“‘送你一个粽子。青青的叶子是长久的祝福,红白的馅儿是无尽的关怀,下锅后是浪漫,咬开



后是温馨，吃起来是甜蜜。祝你开心平安每一天！粽子节快乐！‘粽子节到了，送你一个粽子。含量成分：100%的纯关心。配方：甜蜜+快乐+开心+宽容+忠诚=幸福。保质期：一辈子。保存方法：珍惜。’这是学生‘送’给我的两个短信息粽子。”仿“短信息月饼”。是“短信息礼品”的分称。参见 [短信息礼品]。（49~50 页）

（八）社区词语进入普通话。例如：

豆腐渣话 dòu fǔ zhā huà 如同豆腐渣食之无味而又稀松的话，喻指被人说过多遍，没有多少价值的话。例如：“听这个老师的课真费劲，他尽说豆腐渣话，没意思。”“他的豆腐渣话让人听怕了，好多人溜号了，他还在兴致勃勃地说。”含贬义。参见 [豆腐渣论题、豆腐渣身体]。原来是湖南一带流行的社区词。（48 页）

（九）联想。多个互仿的词语形成联想串。例如下面“伴喊、领喊、跟喊”成一组联想串，“领哭、领展、领喊”又成一组联想串：

伴喊 bān hǎn 在一旁呼喊，以配合别人的呼喊，或指这样的人。例如：“你声音大一些喊，我们一起伴喊，为你助威。”“女声一唱到‘万岁毛主席’，我们男声就伴喊‘万岁毛主席’。”“餐厅里顿时有节奏地喊着：‘师—生—同唱！师—生—同唱！’但是不见有人来请我上台。他们也是为喊而喊，或许是有了七八分醉意，伴喊也是造造气氛，也是集体参与表演。于是我也随着大家的节拍热烈地大声喊着：‘师—生—同唱！’”仿“伴唱”等。又与“跟喊、领喊”互仿并相应。参见 [跟喊、领喊]。类似“跟喊”，但处于辅助地位。（8 页）

跟喊 gēn hǎn 跟着喊，或指这样的人。例如：“我们的跟喊比他们多多了。”“体育比赛的时候，观众中有领



喊，也有跟喊。做领喊不容易，嗓门要大，要有气势，普通话还要标准。据说，著名球星孙雯有一次因为拿不准‘祖’是平舌音还是翘舌音而拱手把领喊让给了别人，自己做了跟喊。”与“伴喊、领喊”互仿并相应。参见 [伴喊、领喊]。(67 页)

领喊 lǐng hǎn 领着喊，或指这样的人。例如：“他嗓门大，音色好，共鸣控制也好，每次都被大家选为领喊。”“今天李明给大家当领喊。”与“伴喊、跟喊”互仿并相应。又与“领哭、领展”成联想串。参见 [伴喊、跟喊、领哭、领展]。(108 页)

领哭 lǐng kū 领着哭，或指这样的人。例如：“随着‘哭丧’成为行业，领哭和随哭也必然产生。一人引领，其他人跟随，前者是领哭，后者是随哭，角色不同，报酬也会有差异。”“电视剧《马大帅》里，马大帅为了赚钱，临时做了领哭，一群孩子成了他的随哭。”“领哭的差事不好做，尽管做为职业可以不必要掺入更多的感情，但哭多了毕竟也是十分伤害身体的。”与“领喊、领展”。成联想串。参见 [领喊、领展]。(108~109 页)

领展 lǐng zhǎn 引领别人参观展览。例如：“有多家公司参加了这次规模巨大的车展。为了方便参观，主办单位安排了专人领展，参观者可以在专人的引领下有目的、有计划地参观。”“展览馆的每个楼层都设有用来领展的标志牌，标志牌上清楚地标明了各个展区的位置以及各展区的展品。”又指引领别人参观的人。例如：“参观展览的人数远远超出了预想，十几位领展忙得团团乱转，仍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与“领喊、领哭”成联想串。参见 [领喊、领哭]。(109 页)

还应该有好多的途径。还要把多个途径理出个层次来。



五、关于“人文性理论”

下面还是一个大的思路。

（一）基于三个相结合的认识

1. 天行健和地势坤。

2. 顺乎自然。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上篇第二十五章）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语文工作必须遵循语言文字的演变规律，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做促进工作。”（《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29页，语文出版社，1987）这是那时候国家语委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多次提出来的思想。我们语言文字工作历史的主要教训是忽视了语言文字本身的规律，陈章太的这个提法是有历史意义的。

语言文字工作必须遵循语言文字本身的规律，所以要学习和研究它的规律。“自然、势”就是它的规律。只有认识了、合乎了规律，才可能做促进工作，促进工作主要是引导。这个规律，包括了人民大众的理解、支持和参加。人民大众、第一线的干部还不理解的事，不能急于做，不能跟人民大众、第一线的干部顶牛。语言文字工作不是几个人做得了的，要人民大众、第一线的干部一起来做。人民大众、第一线的干部理解、支持和参加了，才可能做好。我们做了引导工作，如果人民大众、第一线的干部还不理解、支持和参加，那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或者做错了，就要改进。不要认为人是无能为力的，促进工作做和不做是不一样的。也不要过高估计人的作用，语言本身有强大的调节功能，这是由它的交际功能决定的，也因为人们头脑里有比乔姆斯基说的语法装置大的装置。

古人说的“不隔—隔—不隔”，不是从自然到不自然再到自然，而是从低层次的自然到高层次的自然。我们学习一种新的更好的方



法，例如跳高从跨越式到滚式到背越式，起初会不熟练，成绩会下降，这不是不自然，而是不熟练，不要把不熟练一概当做不自然。也不要把熟练一概当做自然。

3. 天人合一。

所以要“以人为本”。

（二）体现在语言观方面

因此，我们赞成语言的交际、动态、层次、中介、潜显等理论，赞成“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赞成“语言全息发展论”。我们赞成吴启主说的：“我们应从‘整体、动态、平衡’这一组辩证观念出发去认识汉语的特点。”（《语言哲学对话》267页，语文出版社，1999）赞成曹志耘说的：“语言，也可以说是人的一部分。”（同上41页）我们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是大语言。语言是开放的，语言是大海，语言的序是浑沌的序，语言不搞纯而又纯，语言研究不搞自圆其说。语言研究者需要大聪明，要善于领会自然，需要自然，注意新的好的语言现象，要重视实践和理论，重视创造，重视中介。语言研究者或者学术见解之间不能“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

（三）体现在语言研究方法方面

纵横交错，突破历时共时严格限制，还突破空间严格限制。注重研究语言运动的现象和条件的关系及秩序。

语言现象不能无穷尽类推，语言运动也无所谓习性。研究需要宏观和微观结合，动态和稳态结合。调查不搞竭泽而渔，注意增加代表性而减少局限性。研究者需要提高本人语言使用和认识语言的层次，才能跟所研究的问题共振。语言表达要好。不搞形式主义的美，注重形式和内容的结合。还要注重语言的色彩。还要重视个案，个性是运动的层次。语言规律的初显都体现在个别的语言现象里。特别要注重向群众学习语言，注重语言研究的服务观。



（四）体现在语言方面

体现在语言的很多方面。就说成语方面，卢卓群主编《学生常用成语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就有这些例子：

哀莫大于心死 安之若素 昂首望天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拔苗助长 白驹过隙 白云苍狗 百川归海
百花齐放 百花争艳 百家争鸣 百年树人 悲天悯人
变幻无穷 标新立异 别出心裁 别具匠心 别具一格
别开生面 别树一帜 别有天地 冰清玉洁 屏气凝神
博采众长 不二法门 不拘一格 不落俗套 不同凡响
不一而足 藏龙卧虎 层出不穷 超然物外 陈陈相因
称王称霸 成事在人 成竹在胸 出神入化 除旧布新
触类旁通 川流不息 春华秋实 从善如流 大彻大悟
大气磅礴 大巧若拙 大智若愚 得天独厚 得心应手
得意忘形 地杰人灵 顶天立地 独辟蹊径 妒贤嫉能
多行不义必自毙 高山流水 海阔天空 海水不可斗量
和风细雨 恒河沙数 后来居上 还珠买椟 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 兼容并蓄 见贤思齐 将心比心 教一识百
教学相长 聚精会神 举一反三 宽宏大量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平心静气 平易近人 恰如其分 千红万紫
千姿百态 谦受益，满招损 群龙无首 人才辈出 日新月异
三人行，必有我师 水到渠成 顺其自然 天高地厚
天经地义 天理人情 天理昭昭 天时地利人和
心驰神往 心花怒放 心旷神怡 心领神会 心平气和
虚怀若谷 言为心声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朝气蓬勃
正气凛然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助人为乐 纵横交错

还有格言。梁衡说散文美的三个层次，一是描写的美，二是意境的美，三是哲理的美：“作者在对客观事物作了描写，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并感染了读者后，又进一步升华到一种哲理思想上，



并理出一种新理念，创造出一些警句哲言，将其‘定格’下来。”（《散文美的三个层次》，《只求新去处》281页，作家出版社，1994）“所以这一层次的美又返归到客观的美，不过更高一层。”（同上）梁衡关于美的层次和关联的思想很有价值。

散文的新格言如：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睬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余秋雨《苏东坡突围》，《山居笔记》124～125页，文汇出版社，2001）

现在我知道成熟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就是有勇气正视生存现实沉默的冷漠，就是有力量拒绝真诚的善意的温柔的自我欺骗。（阎真《曾在天涯》，《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3期49页）

成功与代价同行，非凡的成功需要付出非凡的代价，这是永恒的真理。（邓贤《流浪金三角》，《当代》2000年第3期127页）

洒脱，是对“穷”的一种超越。别老想着别人有你没有的，其实你也有许多别人没有的。（张曼菱《穷上大学》，《当代》1999年第6期160页）

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严歌苓《人寰》，《小说界》1998年第1期26～27页）

广告用语里也有许多类格言。

前些年一度出现了广告语言的文学化倾向，有褒有贬，影响不很大。当前广告语的哲理化是个重要的倾向。广告语言的哲理化，指广告语言含有哲理化的用语，给人以哲理方面的启示、联想、思考以至震动。例如：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澳柯玛空调）

这里有个世界观。一切都在过程中。学习才能好，好了更需要学习。好了不怎么学习了，就要滑坡。古人说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今天说霸必衰。

生活就是优先选择的过程。（和路雪梦露）

人生就是要不断地进步，每个进步，都是要比较，就是认识事物的联系和区别，做出行动。有的选择是生死抉择。有的一步错就会很多步错。《淮南子·说林训》说一个叫杨朱的见逵路而哭之，逵路是可以通向很多方向的路口，叫杨朱哭歧。《太平御览》也说杨朱见歧路而哭之。《吕氏春秋》说墨子见歧路而哭之。他不知道怎么选择，茫然，很痛苦。下棋是选择，是动态地权衡之后的选择。购物也是选择。有的人挑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买。人才要选择，不是有那么多多的考试吗。择业也是选择。择偶，更是要慎而又慎。说话也是选择，问句实际上都是选择问或选择问的衍化。答句是根据问句来的。

结束就是开始——北京晚报。

这里体现了一种重要的世界观。任何事情都在过程里，没有开始和结束。开始和结束只是一种说法。前一个的结束又是后一个的开始。晚和迟是两个含义，晚饭不是迟饭。下午的报纸也可以是很及时的新闻。凤凰卫视咨询台说：“一天的终结就是另一天的开始，地球没有停止的一刻。”异曲同工。

我运动，我存在——李宁体育用品。

运动就是生命。运动不是一般的动，是进步，是发展，是学习，是吸取，是创造。是各方面的，不完全是生理的。不进步，不发展，不学习，不吸取，不创造，或者这些方面少了，存在的价值失去了或者少了。这是规律。进步了，不怎么说，也进一步有了存在的价值；否则，大喊大叫，也无济于事。

回望：是为未来更好的展望（上汽集团奇瑞汽车）



配图是汽车司机前面的很大的前望窗的上面一个很小的回望镜。说出了回望和展望的正确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我们说要继承和发展。回望是为了展望，展望需要回望。回望绝对不能妨碍展望，妨碍展望的绝对不是正确的回望。展望好了才是回望好了，否则是抱残守缺。主要是展望。

我们还要探讨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了广告语的哲理化倾向。这是人们认识的提高和深刻。人们对理论的重视。我们说广告人应该是商人+诗人+哲人，三者是结合的，但也是有层次的。还有，哲理化倾向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文学方面，小说方面，宁肯的网络小说《蒙面之城》，讨论的是哲理的命题，有很多哲理。

哲理不能是说教、玄虚、假深沉、迂腐、酸溜溜，是讨论，是平等，是谦虚，是觉悟。而且要有很好的语言来表达。有一个饮料广告说：“生活就是舞台，随时随地亮出你的吸引力”，就不够深刻，生活的道路是坎坷的，要有纵有收。

广告语的哲理化倾向，还要注意：广告语不是哲学书。

那么多广告，有的不能用哲理化的语言，有的很难用。大概观念性的、企业形象诉求方面的才好用一些。

2003年3月25日我们以“关于广告用语的哲理化倾向”为题，进行了语言哲学对话（见赵俐等《语言的轮休和充电——第四轮语言哲学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刘艳春进一步撰写成论文《广告语言的哲理化倾向》，发表在《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上。



语言全息发展论

○处在 3 的事物是继承 2 事物而发展的，而 2 事物能从 1 事物发展到 2，2 是继承了 1 事物的，不发展也是没有很好继承，在不同的时空点上继承得好，一定不同于原来，一定有所发展，那么 3 事物继承的 2 的属性里就有发展 1 的属性，3 事物继承 2 事物还继承了 2 事物里含有的发展的属性。

○我们比较的时候常常关注“有”或“无”，对“有”里面的程度不够关心。现在有个说法叫：“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无我有”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要特别关注的是“人有我特”。同样是有，情况不同，其中包含了程度，有时候程度形成了类型。

一、基本理论的关系

几个基本理论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只不过是看问题和叙说的侧重不同而已。一般来说，同一层次的特点不超过三个，如果超过三个了，或者是说的人连特点也没有搞清楚。或者是背后一定有东西，背后有一个统筹的东西。还有，我们提这个理论那个理论，有



一个针对性的问题。例如，有人认为静态是语言的本质或者是基础，我们就要说说语言的动态理论。今天一个针对性，明天一个针对性，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就多了。其实，动态也不见得是语言的特点。人们对应用语言学的动态理论的认识大体上不成问题了，或许我们也就不怎么谈这个基本理论了。

还有，几个基本理论，或许只是从不同方面认识语言而已。例如说语言的交际造成了语言的运动，层次是说语言运动的一种方式 and 结果，中介是说语言运动和层次造成的某种关系，潜显是阐述语言的运动同运动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人文性是联系社会历史来说语言的运动。

要说支撑这些基本理论的理论，就是“语言全息发展论”。关于发展——充而用之，来自孟子的启发。《孟子·公孙丑上》接着人皆有善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十三经注疏》下册2691页，中华书局，1980）“语言全息发展论”，主要受了王存臻、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的影响，还受了钱冠连《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2002）的影响。钱冠连的《语言全息论》是一本好书，很值得读。全书共十章：宇宙、人体、语言三者契合，语言全息论总体构想，语言内全息状态，语言与认知的全息关系，语言各种性质向外找根据，某些语言理论向外找根据，语言对宇宙全息律的印证，语言与文化的全息关系，两个语言猜想，从科学走向语言哲学。很全面。作者说：“语言全息论（the theory of language holography）是以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律、与系统论来解释语言内全息状态、与语言外全息状态的语言理论。”（20页）说明了语言全息论的几个来源，我们由此还对有关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作者很简单，他对语言创新、语言潜显认识的水平都很高了。

关于语言全息发展的认识，我们除了有关理论的借鉴之外，还



有事实的根据和别的来源。东方哲学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二、基本内容

赵俐的《语言宣言——我们关于语言的认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介绍了“语言全息发展论”的基本内容：

全息思想是东方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一，也是我们的哲学思想，同时还是方法论和具体方法。全息是指任何个体的局部单位，都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宇宙间的一切系统、一切事物、一切层次都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相互感应，处于动态的全息联系之中。（参看王存臻、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5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全息性是指系统总体与局部间结构、功能的相似性，时空演化规律的统一性。现实中存在着诸多的全息现象，现代克隆技术就是全息观的典型印证。“一粒砂子看世界”是一个极致化的例子。而“蝴蝶效应”则是一个例证。中医的观察诊断有全息观的根据。我们由宇宙全息观受到的启示是：全息反映观、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蕴含着东方哲学思想的精髓。

我们认为，跟生命有关的成分如果还是有机物，就不会是单一性的。语言是全息的。语言的问题也有全息性。我们讨论某个比较大的前沿的问题，总要碰到许多别的问题。有的问题解决了，也解决了许多别的问题。有的问题，需要别的问题的解决来帮助。所谓一通百通和百通一通，其实是通的层次不同。同样是全息，显现的程度不同。高层次的，运动快的，显现全息的程度要高。学问也有全息性。于根元老师不大赞成循序渐近的说法，也是基



于此。序是谁定的，就一定是该循的那个序？要去跟高层次的泡，去受熏陶。因为高层次，显现全息程度比较高。我们调整自己，跟高层次的共振了，那是做学问的捷径。当然，事先要有一定的基础。一粒砂子看世界，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别的更高层次的事物和角度看世界。

语言跟天地人全息，研究语言就要融于生活、融于自然、以人为本。天地人是运动的，语言是运动的，所以要注意天地人和语言运动的时空，注意人跟天地、语言的交接或者共振。语言的序不是从无序到有序，有时是从有序到无序，有时无序中又有序。语言的运动是脉动，它的序是混沌的序，所以研究语言要纵横交错，要跨学科，要用混沌学的方法。

全息的当然不光是语言，还有其他。我们跟语言全息的认知相结合的，还有一个“充而用之”。这一方面是人的能动，比一般的后天激活或者唤醒还积极一些。加上事物不完全是预先规定好的，是留了改变、发展的余地的，所以要充而用之。在总的全息里，个体或者部分显现全息是不同的，从个体或者部分来说，要充分显现全息，也要充而用之。还有，个体或者部分都不是自足的，需要跟有关方面交换能量，要充而用之。（206～207 页）

这里补充两点认识：

（一）我们先看看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的《简明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的“人”字条：

rén① [名]（口，个，帮，伙）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高等动物，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从事劳动，能用语言进行思维：～为万物之灵。② [名] 成年人：长大成～。③ [名] 从事某种职业或做某种事情的人：军～ | 主～。④ [名] 别人：～云亦云 | 和气待～。⑤ [名] 人的品质、



性格：为～公正 | 他～很好。⑥ [名] 人的身体和精神：抬到医院，～已经昏迷过去了。⑦ [名] 每人，泛指一般人：～所共知 | ～手一册。⑧ [名] 人手；人才：这里不缺～ | 培养～。⑨ [名] 具有一定属性的人：自然～ | 法～。⑩ (Rén) [名] 姓。

★本人别人常人超人仇人蠢人敌人动人恩人法人犯人夫人工人客人狂人老人猎人名人男人旁人情人穷人商人伟人文人友人罪人辩护人代理人悲天悯人咄咄逼人后发制人旁若无人盛气凌人治病救人 (674~675 页。上面数码字原文是阴文)

上面字形、注音、词性、释义、量词搭配举例、用例、构词举例都是这个词反映的信息，也是许多词语能反映的信息类。这本词典列词目的跟“人”构成的词语有“人才、人次、人道、人丁、人浮于事、人格、人工、人海、人寰、人际、人家、人间、人口、人类、人力、人伦、人马、人们、人民、人民币、人命、人品、人情、人情世故、人权、人身、人参、人生、人士、人世、人事、人手、人梯、人体、人头、人微言轻、人为、人物、人心、人性、人选、人烟、人员、人缘儿、人云亦云、人造、人造卫星、人证、人质、人种” (675~677 页)。这本词典介绍说“人家”既指别人，又可以指自己，这里反映的信息就比较复杂了。我们想到的词语还有“人流、人气、人望、人居、人均、人字形、人字呢、人群、人妖、人弹、人贩子、人中、人寿、人言可畏、人模狗样、人五人六”。其中“人流、人居、人均、人弹”是简称；“人弹”可能是新词；“人望”是书面语；“人言可畏”是成语；“人模狗样、人五人六”是口语还有贬义色彩，修辞色彩很强。“人”不打头的词语，还有“头人、中人、上人、下人、仆人、保人、广告人、电视人、同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其中“广告人、电视人”可能是新词语；“同人”还可以写成“同仁”，涉及到“仁”和“人”的关系，



古代的“仁政”意思就是“把人当人”。如果涉及到字形，“仙、佛、休、俩、仨、僮、侗、傣”等都密切有关，其中“俩、仨”用于口语，“僮、侗、傣”还有“伢”等涉及兄弟民族名用字。还有，其中“俩、仨”等属于一个系统，“僮、侗、傣”等属于一个系统。这本词典有的地方还有辨析，也是说的跟别的词语的关系。还有，这些词语是历时的产物，还有变化的先后和原因。还有，这些词语是不同语体不同人用的，涉及语境和用的人。注音用的是汉语拼音，是拉丁字母，又涉及跟西文的关系。根据“人”构成词语的原则和“人”构成词语的潜在能力以及人们交际的需要还可以预测含“人”的新词语。一个词“人”，反映了多少信息？语言的每个成分都不同层次地反映了语言的全息。

（二）充而用之，或者是包含全息的发展论，一是因为事物都处在中介阶段，不发展就是没有继承。例如处在3的事物是继承2事物而发展的，而2事物能从1事物发展到2，2是继承了1事物的，不发展也是没有很好继承，在不同的时空点上继承得好，一定不同于原来，一定有所发展，那么3事物继承的2的属性里就有发展1的属性，3事物继承2事物还继承了2事物里含有的发展的属性。二是因为全息不全，体现全息还有层次不同，最充分体现全息的全息也不全，要逐步体现，体现的过程还是脉动，是进进退退的，不是时间上后来的都比前面的好，“持续发展”也只是一个比较大的阶段的大概的说法。退还有主动的自觉的退和被动的勉强的退。事物在进一步体现全息的过程中有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是营养和社会需要的程度等，内部因素是该事物可以体现全息的程度和交融能力。三是人认识全息分层次，最前沿的人认识全息也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充而用之的过程。

三、下位原则

现在大体上可以提出“类型、程度、分工”三个下位原则。



（一）类 型

这是个大层次。同一个类型里反映的全息更相似。语言交际的不同类型对交际有不同要求，不要混为一谈，也不要割裂。不要用应用文语体来要求文艺语体、网络语体，不要用法律语体来要求文艺语体。但是不同类型里也有联系，法律语体里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跟文艺语体有交叉。网络词语里的“青蛙、恐龙”起初也不是网络词语。网络词语里的“菜鸟”跟北方话的“菜”有关，“菜鸟”很可能用到别的领域里谑指“水平低的新手”。网络词语里的“大虾”跟“大侠”有关，“大虾”很可能用到别的领域谑指“水平高的老手”。因为所有的用语都有一个大的背后的来源或共同需要：实际的语言交际。既有同的，又有不同的，不同也是为了交际的不同类型的需要。“清一色、翻番”来自打麻将用语，打麻将说这些话也是借自别的领域也说不定。还如：

我现在琢磨啊，别赶明儿的饭局里，藏着什么炸弹，把咱一家三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定点清除了。

明显处在下风头的曾华，给小兰的这句“定点清除”逗乐了，于是紧着往脸上找娱乐无极限的感觉……（于卓《挑染》，《当代》2004年《中篇小说原创专号》161页）

而这年头露脸的事，未必都是阳光工程吧？我的意思就是见不得人，听明白了吧？（同上 166 页）

在街上立个亭子，就等于在这个城市立了个据点，摆了个饭碗，打开了一个窗口，以此为依托，不仅可以经营小商品，瞅准了大买卖，照样可以大干一场。（史生荣《日子如波》，同上 175 页）

这两年娟子一直都在做股票，钱没见她赚多少，也许还赔了，却学会了一肚子的股市俗语，平时说话时不时就来一句，有的还用得非常精彩。比如她说结婚是“满仓”，离异就是“空仓”。她还进一步阐述说：现在的股市，满



仓就意味着套牢，然而人在股市，空仓只是手段，满仓才是正经。找一只业绩优良且具成长性的好股拥入怀中然后放心持有，毕竟是股市中大多数人的真心所求。只是这样的好股票寥若星辰，还常常真伪莫辨，于是空仓者就不免要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买进怕套牢，不买又怕踏空。举棋彷徨之间，就把大好的机会给错过了。（秦轮《给钥匙系上红流苏》，《当代》2003年第1期173页）

这里“定点清除、娱乐无极限、阳光工程、据点、满仓、空仓、套牢”，都是跨领域或者说是跨领域使用的词语，这里还把“阳光工程”的意思做了改造。这样跨领域或者说是跨领域使用的词语很多，好好探讨一下，找出一些规律，是很有意思的。可以连带探讨一下，哪一类词语是不怎么可以跨领域或者说是跨领域使用的，这也很有意思。

（二）程 度

不同类型反映全息类型不同，有的类型交叉但程度不同，同一类型里也有程度不同。有的类型和程度都不同。有的程度不同也就体现了类型不同。我在《播音主持语言研究六题》（《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里说到：“关于主持、主持人有无艺术，这里涉及中介理论，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269页）“个性有类型不同，程度不同。”（273页）“2001年3月8日中央电视台的晚会，是谈话类节目，张越是主持人之一。其中有一个内容，问男人女人有什么不同，可能是有人说女人温柔，男人刚强之类。张越问男人有没有温柔的，下面答有，又问女人有没有刚强的，下面答有。这么一来，似乎男人女人只有性别的不同了。节目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是思想方法是有缺陷的。男人女人同样温柔或者刚强，人群的量 and 个体的程度是有差异的，而且类型也是有差异的。我们关于主持人更加有个性的说法，不是不对，而是要进一步讨论播音员同主持人的个性的表现的程度和类型的不同。”（274



页)

我们比较的时候常常关注“有”或“无”，对“有”里面的程度不够关心。现在有个说法叫：“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无我有”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要特别关注的是“人有我特”。同样是有，情况不同，其中包含了程度，有时候程度形成了类型。事物的延伸段性质不都是一样的。拿百分制来说，65分跟66分没有很大不同，60分跟59分就太不同了。拿高考、中考等来说，有时候那一分例如85分跟86分也很关键。度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适度。

“人有我特”，往往从一个大类里又形成了一类。很多学科都是如此。要不然只看“有”，那么只有一个学科：哲学。关于“当代汉语”的某些形式标志的探讨，就不要避免探讨某些用法扩大化的倾向。

W. I. B. 贝弗里奇著、陈捷译《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81）说：“据说，一项对知识的创造性贡献，其接收过程可分为三步：在第一阶段，人们嘲笑它是假的，不可能的，或没有用的；到第二阶段，人们说其中可能有些道理，但永远派不上什么实际的用场；到第三步也是最后的阶段，新发现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这时，许多人说这个发现并不新鲜，早就有人想到了。”（117～118页）这里有个思想方法问题，我们要重视前人所说，但是也要重视新说的程度和时空的针对性。

（三）分 工

既合作又分工。分工不等于别的不会或者不管。右利手的人右手吃饭，他右手出了问题了，左手也可以吃饭。某地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吉东右耳受伤了，他用左手拿手机左耳听，虽然有时候不习惯：“要不说呢，这冷不丁地改变习惯，还真是别扭得不行，稍不留心，就想换手拿手机，刚才给家里打电话，就换了一次，碰得耳朵这个疼呀。”（于卓《挑染》，《当代·中篇小说原创专号》2004年增刊170页）我们打篮球的还要练左右手都会上篮。这也是全息唤



醒吧。人左脑的左半球管语言，左半球出了问题了，右半球也可以管语言。与此有关的是语言里的交叉或者连及，既“弄巧”又不“成拙”，即批评他“成拙”，又鼓励他想“弄巧”。例如时空的说法可以相通。例如：

一抬头，只见隔壁墙头上露出颗女人脑袋，那是韦百顺的女人翠萍，他忙问道：“翠萍，我家的人到哪儿去了？”

“挖银子去了！掏金子去了！”她一脸凶相，气狠狠地说了这两句话。（马烽《彭成贵老汉》，《小说月报》1984年第2期46页）

问“到哪儿去了”，可以回答“干什么去了”。例如问某某“在哪儿”，可以回答“出差了”，说明某某不在这儿以及原因。有时候“干什么”有一定的处所，回答“在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要干什么”，也说明了“在哪儿”“去哪儿”以及原因，如“在领工资”“探亲去了”“要去寄信”等。

还如连带：

他把话停了下来，用目光搜寻着坐在屋角上的那些超支户，向他们打量了一会，见他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闷声大发财。（曹玉琳《苏醒的原野》，《1981年中篇小说2》3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闷声大发财”，吴方言。原来的重点大概在“大发财”，是一种不叫不嚷地发了财。后来也可以把重点放在“闷声”，意谓：不吭声者正酝酿着发财也。上面一例说的都是“超支户”，无“发财”可言，纯粹指“闷声”，“大发财”是跟在“闷声”后面连着带出来的。又如：

不过，要让男子平心而论，他们两口子在匈牙利拥有的这片天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妻子一个人拳打脚踢打出来的，他韩钧并没有帮上多少手。（余泽民《匈牙利舞



曲》，《当代》2005年第1期5页）

“拳打脚踢打出来的”，可见得“脚踢”是连带出来的。后面韩钧“没有帮上多少手”，更说明这一点。

四、关于联想

联系是世界的运动，是世界动态的结构，联想是人的认知同世界联系的结合。或者说，人的联想也反映了世界的运动和动态的结构，或者说联系和联想是世界和人发展的一种方式。联系和联想是吸取和给予，是交际、交流、交换、沟通。联想和联想串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全息发展论，或者说也论证了语言全息发展论。

联想，有的呈波浪形层递式地想出去，越想越远。例如西北某县魏家桥大队支书魏天贵从“黄河——摇篮”想到“婴儿”，又想到“母亲”，又想到“襁褓”，继续想开去：

他听出来了，原来是“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摇篮”这个词他也懂。这使他一霎时想到婴儿，联想到母亲，联想到温暖的襁褓，联想到家庭，联想到传宗接代，联想到繁衍和生长……原来，中华民族就在黄河这个摇篮里长大的！真有意思！于是，这句唱词刹那间使他像受到电击一样，全身麻木而又颤抖起来。（张贤亮《河的子子孙》，《1983年中篇小说选》第1辑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有的呈放射形的想开去。例如下面的“刨花儿、月牙儿、鱼钩儿”同“眉毛上的头发”发生联系：

（小菊头）眉毛上的头发呢，弯呀弯的，叫人想起刨花儿，想起月牙儿，想起鱼钩儿，想起瀑布儿，想起流水儿，想起金风拂起的稻浪，想起婉转动人的歌声，想起曲线美，鸟儿飞翔，鱼儿嬉戏。（刘兴元《丫头》，《小说界》1985年第1期48页）



下一例涉及影响联想物的因素：

看日出还得根据你当时的心绪——要是你当时又饿又渴，你会觉得太阳像个大烧饼或是大橘子；要是你又冷又冻，你会觉得太阳像个大火球或大暖炉。总之，你老是想着自己的需要。只有吃饱喝足，才能浪漫得起来。把日出想象得美好无比。（邓刚《白海参》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这一节上面的引例和分析见我的《留心各种语言现象》，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联想还是一些文艺作品的线索链。陆文夫的《毕业了》（《陆文夫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里有一段写李曼丽通宵缝裙子好让女儿天亮了过六一儿童节穿。“李曼丽开始缝裙子了，那时候又没有缝纫机，全靠一针一线，针针线线又牵动着思恋和记忆。前几年的儿童节多欢乐啊，那时孩子们的节日，也是大人們的节日。”接着写他们以前怎样过六一的。“可这世界说变就变……真的变了，窗外有了风声，乌云遮盖星斗。”接着写李曼丽希望下雨好让在农场的丈夫喘口气，又怕下雨，下雨了女儿六一不能去游行了。（179页）我的散文《陶然亭公园的孔雀园》（《语言是大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说：“我来游孔雀园，总会想到我在干校的饲养场。特别是这一次在孔雀园里看到了久违了的荷兰猪之后。”（109页）“我怀念我们的猪们、羊们。我怀念我那一段在猪场的生活。我还由此常常想起我1992年8月在俄罗斯的半个月。”（116页）“想起我们的猪场，想起在俄罗斯的日子，我还总会想起我们汉语里的‘有容乃大’这四个字。想起‘有容乃大’就会想起‘无容乃小’，想起‘无容乃小’就会想起北京野生动物园。”（118页）

第五讲里我们还说过，联想还是新词语预测的重要途径。这里再举郭丽君主编《语言预测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里的一例：从“裸捐”到“半捐、身后捐”。

半捐 bān juān 捐出一半。例如：“模特小姐回答



说，如果她这次得了大奖，一半给父母，一半捐给社会福利事业，相对牛群的裸捐，这是半捐。”仿“裸捐”。参见[身后捐]。2002年底到2003年初，关于牛群捐出所有积蓄出现了“裸捐”一说。“裸捐”不是直接说出“全捐”，而是说捐得自己光了。（7~8页）

身后捐 shēn hòu juān 承诺去世后捐献，捐献品多为生前还不能捐献的藏书、房屋、身体和身体器官等。例如：“有不少人作了去世之后遗体或者身体器官捐献给医院等有关部门的身后捐。”仿“裸捐”。参见[半捐]。（151页）

这些，包括上面第二节里举的“人”的各个义项的关系，我们似乎都可以从“语言全息发展论”的角度来认识。这里只是说了一个思路。广义的联想，内容要丰富得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多得多。



7

关于“纯洁语言”

○对“纯洁语言”口号的反思，不只是对“纯洁”这个名词用法的反思。涉及到关于语言的本质的若干方面或者其中某些方面的思考。

○汉语是不是天生保守，他的保守是怎么造成的，它有没有开放过，它的交融能力能不能发展，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这涉及到汉语怎样更好地走向世界的问题。

一、提出和反思

（一）1951 年提出

195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说：“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



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的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结论是：“我们应该坚决地学好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里的“纯洁语言”，是指不要出现不规范的语言现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迫切需要在世界上树立自尊自重的形象。同时党和政府迫切需要宣传群众，迫切需要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和文化水平，人民群众也迫切需要学习文化，领会党和政府的各项指示的精神，发展经济，做好各项工作。很多人从语文水平很低要很快过渡到做报告、写文件，甚至于搞创作，语言使用混乱的情况就很突出。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同时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这样，现代汉语规范化作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开展起来，形成了自觉学习和大力提倡紧密结合的局面，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这篇著名社论的发表和20多万字的《讲话》能在当时只有对开四版的《人民日报》的宝贵版面上连载，在汉语规范化的历史上，甚至世界的语言规范化历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带有政府行为性质的卓有成效的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动员，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表明党和政府对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高度重视，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普及语言知识、重视语言应用、强化语言规范的热潮。

社论潜伏的几个问题，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是说毛泽东和鲁迅“他们所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这个结论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二是形成了现代汉语规范化主要是“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的缺点”的“匡谬正俗”的片面化的倾向。三是对许多语言现象判断过早过严，有不少判断失误。四是不确切地提出了“纯洁语言”的口号。这四个问题都是关联的，尤其是第一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或者说毛泽东和鲁迅“他们所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也是社论提出需要和可以纯洁语言的一个事实根据。



关于第一个问题，后果之一是 1978 年初，据说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在一个很有影响的班上做报告说：毛主席，我们现在中国人民的语言，主要是毛主席的语言，我们日常谈的，讨论问题，思考问题，我们用的是毛主席的语言……《鲁迅全集》可以去翻一翻呐，那语言真是丰富，但是鲁迅在接受外来语言的时候，搞了 500 万字的翻译，他翻译的东西有 10 本。他把外来语言变成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但他没有完成，是主席完成的。看一看鲁迅的语言，那是很了不得的，找不到一点毛病，精密到了极点。……我们现在的文字、写的东西，有个来源，我来看去看，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写中国文字的时候，是从毛主席那儿来的。……毛主席的语言好极了，我们现在语言都是从他那儿来的。

我们认为这个提法第一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很重视修改文章。我们认为第二不符合事实。《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说明说：

这次修订，对有些文章误署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对正文中的某些史实以及少量错字、漏字等作了校正。对某些用字，包括少数生僻难认的地名用字，根据文字规范化的要求，作了更改。……对正文所作的校订，分别列表附在各卷书末。（《〈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说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这一版对 20 世纪 50 年代初和 60 年代初先后出版的第一版作了校订。第一卷校订 36 处，第二卷 21 处，第三卷 14 处，第四卷 7 处。共 78 处。例如第一卷第一版 165 页倒 1 行至 166 页 1 行：“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第二版 181 页倒 1 行至 182 页 1 行：“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

还有一个例子：

……阮籍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



成名！”

他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了世间。也许那天出行因路途遥远他破例带了个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处记录了这个感叹？反正这个叹成了今后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共同心声。直到二十世纪，寂寞的鲁迅还引用过，毛泽东读鲁迅书时发现了，也写进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鲁迅凭记忆引用，记错了两个字，毛泽东也跟着错。（余秋雨《遥远的绝响》，《山居笔记》278页，文汇出版社，2001）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纯洁语言，后来很多人长期跟着说，原因很多。主要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提的，人们不敢提出反思。主要原因是人们没有往反思的方面去想。较长时期的社会思潮是那样的，人要自觉地纯，要甩掉“同路人”。1958年的时候认为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了，提出“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有的地方吃饭不要钱了，也要不发工资了，大家过集体生活了，农村取消自留地不许个人养鸡养鸭叫“割资本主义尾巴”。1958年8月17日～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还提倡实行供给制、工资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会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459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文化大革命是破四旧，“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思

这时候很多语言学者和语言文字工作的负责人都在反思。1994年元旦还是春节的一次国家语委全体会上，国家语委常务副主任仲哲明讲话，一大段是不同意“纯洁语言”这个口号的。不久，有一次王希杰来北京说起不同意这个口号，仲哲明也在边上，我对王希



杰说仲哲明也不同意这个口号，仲哲明肯定了。

夏中华在《所谓“纯洁语言”》的语言哲学对话中说了他认为的主要背景：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百业待兴，语言学界也从十年的沉寂中逐渐活跃起来，语言规范问题重新纳入人们研究的范围之内。但这时的研究，是在对以往工作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结合语言实际的反思，人们开始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汉语规范问题，提出了有悖于“纯洁语言”的观点，例如语言规范柔性原则、语体规范标准、语言的潜和显、语言规范中介物等理论的提出，都反映出人们对“纯洁语言”的异议。这期间，发表了很多探讨汉语规范问题的文章，仅《语文建设》在1986年至1994年间就组织了三次大讨论。在这些文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上王希杰的文章《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文章在阐释对语言本质特点再认识的过程中，提出了语言的缺漏性和不自足性，强调了语言本身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功能，进而全面否定了“纯洁语言”的观点。此后，王希杰在《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和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和于根元在《语言哲学对话》和《夏中华〈语言与语言应用问题研究〉序》中更是直言语言不是纯洁的，也不应该纯洁的观点。（于根元、夏中华、赵俐《语言能力及其分化——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10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我在同一次对话中谈了主要背景：

对“纯洁语言”这个口号反思，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认识到语言里有大量中介状态开始的。语言是要学习的，人学习语言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有一个过程。地方普通话是典型的过渡语或者中介语。拿地方普通话来



说，它已经不是方言了，但还不是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对说地方普通话的人的态度，一是鼓励，二是要求其中一些人进一步提高。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对类似的情况都持这样的态度。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语言使用不到位，也就是不规范，也就是不纯，这是必然的。而且不是学到了家了才去交际，而是边学边交际，边交际边学习。所以实际的语言交际中有许多中介现象。如果不允许或者一味贬低这样的现象，等于不许或者不鼓励人学习语言，等于认为语言学习一定要一步到位。进一步说，语言是一种运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是连续的，运动中的每一个点都处在中介状态。学到家的“家”也是中介状态。（同上 102~103 页）

以前，有关的讲话和文件上照例都会有这个口号，可是 1995 年 12 月 25 日“纪念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4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的重要讲话《在纪念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没有出现这个口号。事后我问起草组的季恒铨，他说起草组不同意这个口号，所以没有写上这个口号，李岚清也就没有讲这个口号。

1997 年 12 月 23 日许嘉璐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开拓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服务》（《语文建设》1998 年第 2 期），又一次批评了《人民日报》社论的这个口号。报告指出：12 年来，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在工作实践中也取得了许多新鲜经验，这对未来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其中第四点认为：“要尊重语言文字自身发展规律，因势利导，积极作促进工作。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和相对稳定是其内在特征，开展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既不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也不能简单化，‘一刀切’，搞纯而又纯。”



同 1951 年《人民日报》社论及后来国家有关语言文字文件中的表述相比，这种变化，表明国家在汉语规范化工作提法上的改变。如果再联系改革开放以来语言学界的一些文章，更证明从上到下，人们对“纯洁语言”的观点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

1999 年 12 月 17 日，《文汇报》刊登了《语言应当如何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12 月 29 日，《文汇报》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许嘉璐写了书面发言，《文汇报》在 30 日刊登了，标题是《容纳 分析 引导 规范》。发言再次不同意“纯而又纯”：“规范并不能阻止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语言现象，当然也就不能保证出现的新词新语新说法人人都懂得。不进行规范当然不行，过分强调规范，希望纯而又纯也不行。要言之，我们是在不规范的情况下搞规范，语言又在规范中发展。当然，符合规范的发展才是健康的。规范是为了发展，为了语言的健康发展。”

（三）《人民日报》第二次提出“纯洁语言”

200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50 年前的今天，本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半个世纪过去了，重温这篇曾经推动了语言文字规范化历程的社论，仍觉耳目一新，它的基本精神，对新时期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获取信息手段的多样化，一些领域又出现许多新问题。比如一些企业在营销活动中乱造音译词，影视作品中滥用土语、外来语，有的广告乱改成语，有的流行歌曲词不达意，网络上有些语言毫无语法可言，等等。这些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规范 and 加强管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新闻工作者承担着特殊的使命，我们愿和全国人民一道，为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继续奋斗。”

二、反思的基本理由

（一）斯大林说：“语言，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



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8页，人民出版社，1971）语言为人的服务是一视同仁的。有的人语言比较规范，语言为他服务，让他说得比较规范。有的人语言不够规范，语言为他服务，让他说得不够规范。语言之所以有的比较规范有的不够规范，关键在于使用的人不一样。我们要语言纯洁，就要使人纯洁。如果人不纯，就谈不上语言的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什么时候使人纯呢？

（二）人生下来，语言是要学习的，学习有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学到了位了才跟人交际，没有学到了位就要跟人交际，实际语言生活里大量的的是没有学到了位的语言的交际。学习的过程是个不到位的不规范的也是不纯洁的过程。如果要纯洁语言，势必会要么要求学习语言一次到位要么就要人家不要学习语言。学习语言有个过程，把这个过程的中介物跟语病区分开，对这个学习过程采取科学的辩证的态度，是对“纯洁语言”反思的主要原因。

（三）语言又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了，人们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如果认识到要适应某些发展变化，那么又要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又是个不到位的不规范的也是不纯洁的过程。如果要纯洁语言，势必会要求语言不要发展变化或者要求人们不要适应语言的任何发展变化。

（四）不规范和规范度低的语言现象也会新生的。犹如人体会不断有新的病。现在的癌症、艾滋病能治了之后也会有新的病出来。犹如电脑会不断有新的病毒。这就是辩证法，这是规律。2003年6月8日《文汇报》奇云的《如果没有病毒》认为：“如果没有病毒，生物不会如此进化”“如果没有病毒，花儿不会如此绚丽”“如果没有病毒，害虫不会如此惊恐”“如果没有病毒，生态不会如此平衡”。文章说：“如果没有病毒，……当然，这只是假设，其实不可能。”“遗憾的是，人类对病毒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认识不



足，长期以来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认定一种生物是‘害’是‘益’。在医学领域，这种‘以人中心’的观点更是根深蒂固。例如，当人们认为天花病毒有害时，就千方百计地要把它彻底消灭。至于天花病毒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它与其他生物物种的特殊制约关系，很少加以考虑。有研究者认为，艾滋病病毒的肆虐，与人类消灭天花病毒有关。事实上，从人类首次发现艾滋病症状算起，再加上病毒感染潜伏期，天花病毒的消灭与艾滋病的出现就无明显的时间间隔。也许，今天我们刚消灭了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病毒，明天又会出现另一种更可怕的新病毒。”

1. 原来就有“如意”，指符合心意，动宾结构。中间不出现的是“人”，因为不言而喻说的是“如人意”。旧时大官臂弯里抱的有点弯的东西也叫如意。还有豆芽菜形状像如意，又叫如意菜。后来的表达要更加有分寸，出现了“尽如人意”和“不尽如人意”。“不尽如人意”五个字，说起来不方便，要去掉一个字，比较好的是去掉“如意”里不出现的“人”，说成“不尽如意”。可是有的人去掉的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如”，说成了“不尽人意”，例如：“这几个学生的情况都不尽人意，也不是在当时约定好范围之内录取的。”（木白《“高招”日记》，《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6期29页）“不尽人意”当然比“不尽如意”的规范度低得多。江蓝生在国家广电部门的一个会上谈过这个问题。这是新出现的情况。

2. 二与两。有一个时期，汉字数字尽量写成阿拉伯字，有人把“两”也写成了“2”。例如《北京晚报》2005年7月31日16版上就有“我要2个任期清理布什残局”。“两”写成了“2”，这个时候的“2”还应该读“两”。可是这样的阿拉伯字“2”再折合成汉字数字的时候，有人折合成了“二”，出现了“二个”。“中国人民邮政汇款通知”里“收款人取款注意事项”的第一项写道：“凭本通知在二个月（自本通知投递之日起算）内到指定的局、所取款，逾期不领，汇款退回收汇局，本通知作废。”《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



第2期有一篇论文的大标题就叫“标点符号规范的二个原则性问题”，论文的“摘要”里也说“二个原则性问题”。或许这里出现“二个”有别的原因。与此有关的是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当着嘉宾的面一会儿称嘉宾“二位”，一会儿称“两位”。

3. 像和象。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10月10日《简化字总表》重新公布。国家语委《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说：

原《简化字总表》中的个别字，作了调整。“叠”、“覆”、“像”、“囉”不再作“迭”、“复”、“象”、“罗”的繁体字处理。因此，在第一表中删去了“迭〔叠〕”、“象〔像〕”，“复”字字头下删去繁体字〔覆〕。在第二表“罗”字字头下删去繁体字〔囉〕，“囉”依简化偏旁“罗”类推简化为“啰”。“瞭”字读“liǎo”（了解）时，仍简作“了”，读“liào”（瞭望）时作“瞭”，不再作“了”。此外，对第一表“余〔餘〕”的脚注内容作了补充，第三表“讠”下偏旁类推字“讎”字加了脚注。（语文出版社编《语言文字规范手册》（1997年重排本）2页，语文出版社，1997）

国家语委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说明了恢复的必要。其实恢复这几个字带来了麻烦，例如恢复一部分“象”为“像”。陈章太在《胡乔木同志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特殊贡献——怀念乔木同志》（《语文建设》1997年第7期）一文里巧妙地说了事情的原委：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为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纠正社会用字混乱，国家语委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写了请示报告。为妥善处理这件事，乔木同志多次同国家语委领导成员谈话。有两次还是在病房里谈的，使我们很受感动。他认为《简化字总表》总体上是好的，它的发表有其



历史背景和当前的社会条件，实用效果也是好的。但总表中有少数字简得不大好，应当趁重新发表的机会加以改正，并提出拟改字的具体方案。国家语委党组和主任会议对此多次进行认真研究，认为乔木同志的意见很重要。但考虑到语言文字使用的社会性和约定性，《简化字总表》已推行 20 多年，人们已经使用习惯了，为保持汉字的相对稳定，《总表》中的字暂时不宜改动，但需认真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对过去简化的汉字进行一次总的修订；改正《总表》不大好的字，吸收“二简”中合理的字，再少量吸收社会上广泛使用、科学合理的简体字，并调整过去发表的几个字表中有矛盾的字。当时的设想是在适当的时候研制并公布一份现代汉字规范字表，稳定使用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多次向乔木同志报告上述意见，甚至同他进行争论，有时争论还比较激烈。乔木同志没有利用他的职权来压制我们，而是以一种灵活、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同我们的争论。他给我写信说：“关于重新发表‘总表’时改字的问题，已经讨论多次了，我不能说服你们，你们也不能说服我，那么我们就各自向中央书记处申诉吧。”于是我们又向中央报告我们的意见，乔木同志也给书记处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的主张。最后他又给我们写信，说他理解我们的想法和意见，可以不改动那么多字，但有 7 个字必须改（就是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里作了调整的“叠、覆、像、啰”和“瞭、餘、雛”7 个字），并具体说明改这些字的理由。我们勉强接受乔木同志的意见《总表》重新发表后，群众对改动的字有意见，尤其是“像”“象”分开不易掌握，应用效果不好。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乔木同志对待工作是极其认真的，对同志是宽容的，作风是民主的，但有时也有失误。（32 页）



胡乔木在那个时候多次的谈话以及给有关同志的报告里都很坚决地谈了这个问题。1986年9月15日《致温家宝、胡启立、邓力群并中央书记处》里说：

为了使新的《简化字总表》及其说明得以做到充分准确严谨，考虑到中央和国务院现在不可能有人逐字推敲，而国家语委又倾向于得过且过，我自愿以对党、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担任审校的重任，借以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将功补过，并且努力做到遇事查考，遇事协商，遇事请示。如蒙同意，我不能以一个语委委员的身份来进行工作，请求中央和国务院授权。（《胡乔木谈语言文字》358页，人民出版社，1999）

信里面“将功补过”一说，令人深思。

这几个字的改动，尤其是‘像’‘象’分开，实际上有“长官意志”的成分。现在又能改回来吗？《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关于“想像”条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已确定‘想象’为推荐词形。”（1424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的第5版1489页上说“想象”也作想像；“想像”同“想象”，也以“想象”为主条。在上面两本词典出版中间的《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3期不少地方用了副条或者不推荐的用法，如：

这件事对思文的打击，比我想像的要沉重的多。（阎真《曾在天涯》，94页）

还有一处索性把“像、象”两个都写上了：

第一天就觉得想像象中的浪漫一点也没有应验……

（同上11页）

其实，恢复了“啰”也带来许多麻烦，有的电脑字库里没有这个字，所以很容易还用“罗”。下面就是两例：“你罗嗦个啥嘛？”（黎民泰《妖绿》，《当代》2003年第3期156页）“听他这么说，方



正则没跟老桂再罗嗦……”（亚子《报社》，《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6期214页）

4. 呆。现在应该读 dāi，但是还有不少人读 ái。因为过去曾经定为 ái。现在有的词典还要为这个音做提示。例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呆”字头就提示说：“统读 dāi，不读 ái。”（254页，2004年版）有人有意见说：“一会儿读 ái，一会儿又读 dāi。”这说明了确定标准的摇摆不定。

上面四种情况是四种类型，而且很难保证今后不会再出现这四种情况。

（五）谁来纯洁语言？这是具体的做法，也是一种反思的策略。有人主张要纯洁语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操作。张三可能是很主张纯洁语言的，那么请张三来纯洁语言吧。这时候张三很可能推辞了，说自己的语言也不纯洁，他不能来做纯洁大家语言的工作。也可能李四自告奋勇说他能来纯洁大家的语言。这时候很可能有人出来反对说李四自己的语言不纯洁，他不能担当此任。很可能这么一来没有人来担当此任。

《人民日报》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的朋友蔡维藩多年致力于语言规范。他新近出了本37万字的《鸡蛋里面挑骨头——给三大报寻个错》（大连出版社，2005），458篇文章点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近两年来的编校差错，一类是内容的问题，一类是语言文字不规范。蔡维藩在《前言》里说：“报纸上编校差错不断，一面消一面长，禁而不止死而又生不厌其烦，似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现象令人深思，很值得研究。”（2页）

（六）谁的母语或者外语说到家了？张锲2002年10月16日为我散文集《语言是大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写了序《在语言的大海遨游》。序写好了，张锲打电话来说想加上一段，我说好。他加的一段是这样的：

季羨林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告诫自己，也告诫我们大



家：“对于语言，包括外国语言和自己的母语在内，学习任务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的。”他还说：“现代当代的著名文人，又有哪一个写的文章能经得起语法词汇方面过细的推敲呢？因此，谁要是自吹自擂，说语言文字的掌握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个人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骗子。”季羨林先生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前些日子首都的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刚刚在北京大学为他祝过寿。他是一位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的语言学家和散文家，七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东西方语言文字的研究，对汉语、英语、德语、俄语、印度吐火罗语等多种语言文字，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仍然在散文园地里辛勤笔耕，时有佳作问世。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东方鸿儒，在语言的大海面前，尚且如此谦逊，更何况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语言是大海》7～8页）

近来，目的语学习里经常说起一种“僵化理论”，意思是说学习一种目的语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难学上去了。学到“炉火纯青”，吹嘘而已。

上面这一节也是前面说过的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的一个实例。

对“纯洁语言”口号的反思，不只是对“纯洁”这个名词用法的反思。涉及到关于语言的本质的若干方面或者其中某些方面的思考。

三、另外一个“纯洁语言”的提出和反思以及有关的意见

还有一种“纯洁语言”，是不许在本民族的官方语言里用外来词。据说法语里很早就有这个要求和做法，我们有一些人要求仿照这样的要求和做法。近一些年来，我们的一些媒体比较集中报道了外国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外国的媒体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报道。然后是我国有人要求拿出管理的办法、要求立法或者制造舆论，同时也



引起了对这样的“纯洁语言”的比较集中的反思。

看看报道的时间表以及报道的内容。

2001年5月5日《光明日报》《法国捍卫法语纯洁性》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面前，法国人为了捍卫自己语言的纯洁，为了保障法语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前途，正在顽强地努力着。”

2002年6月28日央视新闻《俄罗斯将立法保护本国语言》说：“……最近俄罗斯政府就准备通过立法来净化本国的语言。”“为了净化俄语，俄罗斯国家杜马现在正拟订有关法律条文；这些法律主要规定，官方用语中不许带有外来词……”“还有一些语言学家表示，外来词的侵入不见得就会削弱本国语言文字的影响力，因为本国语言文字里的精髓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一些该淘汰的东西就应该让它自然淘汰。”

2002年8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国际新闻《外来语不断“偷天换日”，日本展开日语“保卫战”》说：“政府正计划召集20名学者、编辑、翻译家组成日语专门小组，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为公众不熟悉的英语外来语确定相应的日语词汇。但分析家说，由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政府这一企图看来注定难以成功。”

2002年10月24日《世界新闻报》杨洁的《罗马尼亚封杀外来语》一文的刊头语说：“随着全球化日益加速，文化的交融也日益明显。近年来外语词汇大量出现在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之中。而罗马尼亚有关方面出于保护本民族语言的考虑，于日前出台一项新法律：公共场合禁用外语，违者将课以重罚。于是，该国街头开始出现诸如‘产自德国汉堡的夹肉面包’这种不伦不类的罗马尼亚语广告，让人哭笑不得。”

2003年8月15日《作家文摘》转载了原载7月24日《上海译报》的《法国禁用“E-MAIL”这个词》说：“法国文化部近日下令，禁止一切政府部门、文件、出版物或网站使用‘E-mail’一词，并将其改成法语合成词“Courriel”（电子邮件）。据说，这是法政府



阻止英语词汇侵蚀法语的最新举措：‘Courriel’ 发音具有鲜明的法语特点，因此比 ‘E-mail’ 这个外来语更有 ‘亲和力’。部分商家表示政府此举很 ‘可笑’，他们认为这一决定不能反映现实。法国互联网俱乐部总裁表示，‘E-mail’ 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没人将其当作是 ‘美国人专用语’。法国人喜欢在讲话和工作文件中夹杂大量来自英语的 ‘洋话’。法政府曾经在 1994 年下令，把那些在广告中使用 ‘英法混合语’ 的人送进监狱，但其实无力控制上述语言泛滥。”

《人民日报》2004 年 6 月 14 日报道《外来词使用当规范》一文，评介了外国的有关情况，而且明确跟 “纯洁祖国语言” 联系了起来：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6000 种语言，但每年有 25 种语言消失。有人估计，到本世纪末 90% 的语言可能会灭绝，世界的部分文化、历史就会随之消亡。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提出警惕 “语言入侵”、“文化入侵” 的问题，有识之士对民族语言的 “异化” 和 “污染” 忧心忡忡。许多国家在维护民族语言方面，态度非常鲜明，立场非常坚定。

1992 年，法国国会郑重地把 “法语是法国的官方语言” 这句话加入到法国宪法中。1994 年法国又出台了新的法律，规定公共场所的所有标语、公告牌必须用法语书写，原文是其他语种的也要翻译成法语，而且法语字母不能小于原文。违反上述规定的个人和企业将视情节轻重处以 1000~5000 欧元的罚款。2000 年，波兰制订了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公司的推销广告和产品说明书必须用波兰语。几年前，德语研究所曾致函德国电信公司，抗议该公司滥用英语词汇。一气之下，德语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还创建了 “保护德语学会”。2001 年普京总统就签署了一项要求维护俄语 “纯洁性” 的命令，禁止在俄语中滥用英语单



词。一位语言学家甚至呼吁：要保护世界的“语言生态”平衡。

.....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这个曾经产生过唐诗、宋词、元曲的国度里,人们发出了“维护祖国语言健康发展”的呼喊。

有关的还有几次会议。

2002年8月27日国家语委语用司召开的社会语言热点问题座谈会,《文汇报》28日报道《新词语混乱不堪还是生动活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认为,现在中国文字的混乱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大量不规范的外来语、英语缩写的直接使用、像‘菜鸟’、‘大虾’一类网络语言、像‘绝代佳人’之类的新人类自己创造的词语,已经使不少文章出现了令人读不懂的情况,有的更会引出歧义,影响我们的理解。对于现在的混乱局面必须采取立法、行政、引导等各种手段予以纠正。而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节目主持人、播音指导敬一丹和《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肖复兴等为代表的专家却大声为这些新名词叫好。”注意其中刘吉提出了:“必须采取立法、行政、引导等各种手段予以纠正。”

2003年10月14日教育部召开“外来语规范问题研讨会”,通知说:“大量的英语缩写词以及中英文拼接而成的语词在大众传媒中频繁出现,一些完全可以用汉字表意的内容采用英文缩写词,一些并非必要的场合也使用英文缩写词,而且不加必要的注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汉语言文字的严整与和谐。这种现象引起了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4年5月25日中宣部新闻局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在京联合召开“规范外文使用,维护祖国语言健康发展”宣传座谈



会。《中国教育报》26日报道标题是《规范外文使用宣传座谈会在京举行 用科学态度维护祖国语言健康发展》。最后一段说：

与会专家在座谈会上达成以下几点共识：要从继承中华文明的高度，来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要从维护中华文化主权的高度，建立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意识，自觉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要自觉抵制霸权和优势语言的侵犯；要用科学的态度，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新闻出版单位要带头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要自觉维护祖国母语的尊严。

《人民日报》2004年6月14日的报道上面已经说到过，其中还有一段：

对此，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李行健指出，吸收字母词或外来词要坚持引导使用规范的、大多数人懂得的意译词，已有可用的意译词时，一定要使用意译词，如“世贸组织（WTO）”、“首席执行官（CEO）”等。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译名，不妨用音译的形式，非用字母词不可时也应遵循有关规定，在字母词后面括注释义。至于 HSK（汉语水平考试）、GB（国标）一类仿照外文字母词用汉语拼音字母造词就实无必要。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15日跟这个会议有关的报道，标题为《用科学态度维护祖国语言文字主权》，标题上面有这样的话：

一个国家的法定语言或官方语言就像这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一样，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也是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

因此，要从维护中华文化主权的高度，建立祖国语言文字的意识，自觉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自觉抵制霸权和优势语言的侵犯，新闻出版单位更要带头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要自觉维护祖国母语的尊严。



这里恐怕需要分清“祖国语言、法定语言、官方语言、母语”“霸权语言、优势语言”“侵犯、交融”这些概念。同一天的这份报纸的报头下有英文 CHINA EDUCATION DAILY，还有网址 <http://www.jyb.com.cn>。头版右上角“郑州十一中（原郑州三高）50 周年校庆公告”，也有英文网址。头版《学英语报》广告也有英文网址。第 6 版介绍“方正集团”里有不少英文。同版《2004 年高考语文虚词解析》引了选择题选择项就用了“A. B. C. D.”。这一期中缝有文字的里面还有不少英文。

四、反思的基本理由以及有关的问题

（一）不许在我们的的官方语言里用外来词。有没有可能和必要。我们的官方语言里不许说“社会、政治、经济、权益、干部”，有这个可能吗？有这个必要吗？

（二）拿我们的汉语来说，它先天是不是纯洁的？我请教过研究中国民族语言的有关专家，他认为汉族原来是羌族的一部分，汉语里就有许多羌语的成分。我们的汉语起初是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语言里的，汉语这个名称也是后起的。他说我们汉语北边是阿尔泰语系，南边是南亚语系，很难不受两个语系的影响。

（三）这样的“语言纯洁”对我们语言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史有为在他的《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序里说：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语言必然是没有竞争力的语言，必然导致使用社群的狭窄甚至萎缩；而另一方面，评价语言则又要根据能否完善地表达当前事物与概念，以及满足当前交际和科学的需要，此即所谓实践检验也。我们在语言接触和融合的问题上当然要有民族的意识，但更要有世界的意识，在二者之中保持一定的张力。任何只考虑或倒向一端的想法和做法可能都是无益的，也会被现实所拒绝。



与此有关的是何星亮《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光明日报》2002年12月24日）说：“从广义的文化概念来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以分为两部分：民族性文化和世界性文化，或者说，民族性较强的文化或世界性较强的文化。”“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文化或制度文化，以及表现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精神文化是民族性较强的文化。”它具有“保守性”，如语言文字。还有“排他性”，“渐变性”。“世界性文化与民族性文化不同，它具有流动性、全球性和速变性等特征，它是可比较的，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因此，对世界性较强的先进文化，应大量引进。一个民族是否善于引进、采借世界性的先进文化，决定着该民族和文化发展的速度。在当代世界，只有大量引进世界性的先进文化，并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之与本民族的固有文化融合为一体，才有可能复兴自己的文化。”文章有很多新见，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是语言文字的民族性强到什么程度，还要多进行事实的分析。

还有，《语文建设》2000年第10期的卷首刊登了王均的《网络时代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学》，认为：“在国际联网时代，包括外语借词缩略语在内的新词语的猛增，是语言与社会共变的必然趋势，语法的精密化也肯定是一种进步。汉语书面语中‘他、她、它’‘那、哪’的区别和文本的横排以及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曾经有人强烈反对，他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讽刺挖苦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但到现在，也只有接受。语文保守主义和语言‘净化主义’是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它必然要碰壁。”

有关的还有汉语里大量阿拉伯数字的使用。《现代汉语词典》里收录了“〇”，释为“数的空位（同‘零’）”（2002年增补本802页）。《现代汉语词典》里还收入日本汉字“辻”，说：“日本汉字，十字路口。多用于日本姓名。”（同上1141页）

（四）语言交融能力是重要的能力。我在《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里说到：“邢福义在1997年1



月9日的语言哲学对话《动态：语言的本质》里说：‘从非人动物到人，是渐变的。最原始的人和最高级的非人动物，二者之间没有鸿沟。正因如此，最原始的人所用的传递信息的符号和最高级的非人动物所用的传递信息的符号，都是语言，二者之间也没有鸿沟。通过传递信息的符号，人和人可以沟通，人和动物也可以沟通。’（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140页，语文出版社，1999）我很同意这个意见。”“不能仅仅重视这些人和那些人语言交际的差异，忽视这些人和那些人的语言交融，自设语言隔离墙，或者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泛化，似乎认为只要是民族的就必然、自然和已经、仍然是世界的，限制了自身的自由和发展。”“人使用语言和体态语往往也是交融的。”“语言要从社会交际、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吸取生活资料。语言更从别的语言系统中吸取生活资料。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汉语方言里吸取生活资料，而且从兄弟民族的语言和外语里吸取生活资料。北京好几千条胡同的‘胡同’来自满语，来自日语的‘干部’成了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来自俄语的‘布拉吉’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了。来自英语从粤方言进口的‘的士’，变幻出了‘打的、面的、人力的、的来的去’等。这都说明我们的汉语生机勃勃。语言交融能力或者说吸取能力是重要的能力。语言交融本来也是具有潜在的可能性的，现实的交融，是由语言内部和外部条件形成的显化。交融的语言的各个部分，都属于这个语言的大系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某种菜肴离开原地做法和味道不正宗了，不纯了。其实，这种适应更多人口味需要的吸取了别的一些做法和口味的变化了的的做法和口味也是一种品种，或许还是比较有前途的变化。语言交融的原因是人的交融和社会需要人交融，社会开放和人们交往以及思想活跃促使了语言运动的活跃。”我还认为当代汉语里有的，就是我们系统之内的，过去古汉语没有标点，现在也进入我们的系统了，成了我们的系统。汉语中很多元素来源不同，但只要对我们的系统有利，就是我们系统的。韩国人



这方面比较普及的语言观值得我们借鉴。韩国很多民众使用大量汉语借词，他们说：原来是你们汉语的，现在是我们韩语的。使用的不同来源的成分不宜都说成是不同系统的，这不同来源在当代汉语里是可能成为共同的系统的。外语词在汉语里的显，或者说是空间的突破，我们的语言研究既要突破严格的共时与历时的严格限制，还要突破空间的严格限制。

有关的还有戴庆厦主编的《社会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4）谈到“语言影响”的时候说：

从吸收能力上分，可分为开放型和保守型两类。开放型是指语言结构系统容易吸收外来成分来丰富自己，如英语、日语吸收外来词语的能力很强，大多数使用音译手段。保守型是指语言结构系统对外来成分有一定的排斥力，吸收借词乐于使用意译而不用音译，汉语属于这一类型。（89 页）

汉语是不是天生保守，它的保守是怎么造成的，它有没有开放过，它的交融能力能不能发展，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这涉及到汉语怎样更好地走向世界的问题。

（五）出现了跟俄罗斯纯洁语言不同的实例：

虽然莫斯科在申请主办 2012 年奥运会的竞争中首轮即遭淘汰，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申奥录像中的讲话还是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联社说，这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第一次用英语在如此正式场合发表长篇大论。（《新闻晨报》2005 年 7 月 7 日）

（六）《光明日报》2001 年 6 月 14 日报道《汉语应与时俱进》里说：“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刘涌泉说，目前，像 VCD、WTO、IP 电话等外来语”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这些写法简捷通用，如果一定要写成中文反而复杂了，一般人看不懂。像 DNA，写成中文是一段很繁复的专业术语，不仅人们不好理解，在电子计算机上



处理起来也要困难得多。他说，规范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把发展中的东西规范下来，就有利于现代化，而反对发展，就不利于现代化的进程。”报道还说到“汉语拼音不可淡化”。

下面两个材料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有关的问题。

一个是 2005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的一部分：

（七）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应成为相互充实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基础。当今世界的主流要求不是搞“文明冲突”，而是必须开展全球合作。应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应在相互尊重和包容中开展文明对话与经验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求共同进步。应加强人文交流以建立国家间友好信任的关系。（新华网同日）

还有一个是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 2005 年 2 月 25 日在 2005 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语言文字工作简报》第 6 期（总第 146 期），2005 年 4 月 6 日）里的有关部分：

语言文字工作要统筹、协调好各种关系，促进和谐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民族、全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保证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应当正确分析这项工作所涉及的范畴和关系，清楚认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和使命，抓住主要矛盾，兼顾其他方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语言文字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克服交际障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和传播先进文化提供平台，为人民群众的学习、生活和发展提供便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奠定基础。为此，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深对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同时，也要对与此相关、相对应的范畴和方面有清醒、清楚的认识，以保证工作在符合语言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轨道上顺利推进和发展。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行者，我们应该认识到，语言文字本身是复杂多样的，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正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是多元的，社会语文生活表现得愈益纷繁复杂。我们应理解社会对语言生活多样化的需求，妥善处理好语言文字主体化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注意维护语言文字和谐发展的环境，依法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以及与外国语言文字的关系等等。

还有一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交往的增多，特别是受经济全球化浪潮和通信、交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外国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在我国逐渐增多，并呈上升趋势。英语学习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全社会学习英语的热潮也经久不衰。对此，存在不同看法，应该进行严肃、负责的讨论。应该认识到，语言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加强外语学习、提高外语应用水平，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与世界联系和交往的需要，也是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需要，应该鼓励和支持。但要注意到，语言文字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



素质，为适应未来教育文化发展和人才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发展，应进一步加强祖国语言文字教育，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重视外语学习和使用而忽略或削弱本国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现象，要进行纠正，要宣传引导，督促有关方面重视并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应用；同时应对合理吸收使用外国语言文字制定相关标准，并依法对外国语言文字在公共交际场合的不适当使用进行适度干预和积极引导，以创造规范、健康的语言文字环境。



新词新语冲击波

○1978 年以来，我们的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可以说我们的汉语新陈代谢进入了当代汉语时代。我们生活在当代汉语里。一批同人觉得需要编一部帮助人们了解当代汉语词汇的词典。我们设想，当代汉语词汇里包含几个主要部分，这几个主要部分都需要和可以分编出字典、词典，在分编的基础上再编出中型的当代汉语词典。这一系列字典、词典构成当代汉语系列辞书。

○我们现在编撰的许多语文性的新词语词典收录的词语还是经过比较严格筛选的，可能收录了不到十分之一，不很容易反映我们新词语的面貌，这还跟词典市场的需求有关，多少跟需求者以及编撰者互相影响的语言观有关。我们一时难以编撰出版收录面宽得多的词典，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少发性词语”的整理和研究。

一、第一轮语言哲学对话的有关见解

1997 年 3 月 25 日，我们以“新词新语的冲击波”为题进行了



语言哲学对话，收录在《语言哲学对话》（见 234~247 页，语文出版社，1999）。参加的有我、王铁琨、李建国、蔡富有、施春宏。其中主要见解如下：

（一）语用所整理、研究新词新语新用法，是 1986 年初开始的，主要成果是发表在《语文建设》1986 年第 4 期~1989 年第 5 期“新词新语新用法”专栏里的札记。工作注意了应用和预测，在大的理论上，这是两个敏感点。那时候许多学者还不太注意这个工作和这两点，主要意见无非觉得这项工作没有多少用，他们大概过于考虑实用了，尤其对“商标西瓜”这一条意见比较大。其实研究者还考虑到社会语言学的价值和语法格式的新颖。有些学者长期以来对新出现的语言现象不重视，对理论不重视。

（二）语用所“新词新语新用法”编写组成立，立即着手搜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新词新语语料，希望能在整理研究过程中找出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规律。每天从报刊上抄录资料做卡片，卡片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再写成千把字左右的研究文章，通常是以一个或一组新词语为主，旁及其他；不只进行词源、语义上的分析，而且注重新用法实例的搜罗，并且以有出处的书证支持语义上的分析，同时在词汇、语法的结合上对新词新语新用法的变化进行超前的科学预测。这样立体化的研究显示了一定的研究深度和理论价值。当时的这些尝试，实际上是在为后来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趟路子、打基础。

（三）语用所是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的，当然要注意应用。收词怎么收，碰到有关规范的一系列问题。注意了预测，虽然预测观是几年之后提出来的，1995 年年底占了主导地位，但是跟追认观的面对面的交锋是 1992 年的事，都是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引起的。

（四）1991 年初语用所一级课题“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正式上马的时候，语用所不仅有了几年扎实研究新词新语的实践基础，而且初步形成了一支有一定研究实力的队伍。正是靠了这支队伍，



课题组成立后很快就出了系列成果。课题组成员还分别发表了有分量的专题论文。课题组带出的一批年轻人正在不断成长、成熟，语用所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也在扩大，逐步发展成为汉语新词语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五）我国历史上对新词新语的研究是极不重视的。周秦之世虽有使者采集民俗、民谣的风气，但收集到的民间词语仅供天子观政，然后就藏进官府完事。西汉末年扬雄著《方言》，可以算作活语言研究的开山之作。可惜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高度集中的政治与极端分散的经济，使农业文明步履维艰地缓慢发展着；加上东汉以降言文分离，文言文一统天下，雅文化排斥俗文化，重文字轻语言，活语言的研究不登大雅之堂，所以历代的新词新语虽说也不断地浸染着雅文化，但其被吸纳的数量极其有限。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废弃文言文，使言文重归于一，白话文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从此，活语言的研究才在语言研究的领域里据有了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以《现代汉语词典》为标志，对现代汉语的词汇研究做了阶段性总结，并对语言规范化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和别的方面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说，多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对新词新语的总体倾向是不屑一顾，更遑论其研究了。在计划经济的年月里，也有新词新语产生和使用，通常是由政治运动起杠杆作用的。政治运动一来，自上而下地依靠单一的媒介途径传播着政治色彩浓重的新词新语。由于种种原因，语言学者习惯于关起门来对书面语言做纯语言的研讨，而这种研究又多亦步亦趋地在印欧语言学理论里兜圈子，听任汉语中鲜活的新词新语自生自灭。应该承认，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六）新中国成立不久，也是我国新词语大量涌现的阶段，可是当时整理和研究都不够。可能是那时候总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改



错字、病句还忙不过来呐。那时候的语言观也比较旧，规范的主要工作是匡谬正俗。此外，那时候新词语大都是政治方面的，样式也少，其他方面的质量不太高，也是个原因。

（七）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战略国策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商业大潮汹涌澎湃，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外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行业文化等，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相互交融，彼此渗透，互补而又互动。这样一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最为灵敏迅捷的新词新语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是，社会已由相对封闭走向开放，经济、文化也由一元变为多元，特别是高新科技的飞跃发展，使新词新语几乎每日每时都在产生并迅速传播开来。原先以政治为动因、自上而下的词语传播途径已被以经济、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为动因、由下促上的传播途径所取代，单一的传播媒介由多种传播途径所取代。这样，新词新语就如冲击波般地迫使人们不能不关注它、研究它，并更新着人们的语言观和规范观。试看十多年来几十本新词新语词典的出版，就足以说明它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八）打个比方说，新词新语就如同新生婴儿，只要他出生并报上户口了，就得承认他的合法性。至于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难免有病或意外夭折，但在正常情况下，多数是可以生存发展的，不过生命有长短罢了。新词新语的发展，正像人生青少年时期一样，是最富生机、最为鲜活、最多变化的。其中进入基本词汇的，就可以“为人父母”“生儿育女”了。

（九）新词语成了基本词语，新鲜的色彩潜藏了，稳定的色彩显现了。一部分基本词语比较能产，就是说组合成新的词语的机动性比较大。

（十）在社会经济急剧变革的时期，例如当前我国以改革开放为特色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新词新语像潮水般涌现。这无疑给语言生活和语言研究带来巨大的冲击。可喜的是，近些年在我国兴起



并日趋成熟的应用语言学，对新词新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极大的热情，并视之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领域。一批从事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新词新语研究方面用力较勤较深，成就显著，推出一批颇有创获的有关新词新语的理论著述和辞书。这既是我国应用语言学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新时期语言学发展的一大特色。

（十一）近些年的新词语研究，有多方面的收获，但是最大的收获，还是语言研究者语言观和规范观的调整。比如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的音译外来词如何处理的问题，原来汉语里有“出租车、公共汽车、饼干”等，又起用从色彩到风格都很“新潮”的音译外来词“的士、巴士、曲奇、克力架”等，一开始起码在相当一部分人心中是无法接受的，曾有不少文章对此类现象提出过批评。然而，这类音译外来词似乎顽强得很，它们先是在粤方言区流行，而后向其他地区渗透；先是在年轻人圈子里站稳了脚跟，接着又在更大范围内逐渐用开了。口语和书面语中现在还有“大巴、中巴、小巴、面的、打的、奶油曲奇、蔬菜克里架”等说法。“打的”比“搭乘出租车”来得简洁明快，而且带有点洋味儿，目前国内许多城市都能听到这种说法。开始的时候有人看不惯，说是现成的“出租车”不用，干吗要说“的士”。后来伴同旅游文化的发展，“面的”“马的”“驴的”“打的”之类仿制的新词使用开后，连原先反对的人也满口“的（di）”来“的（di）”去了。有的先生曾说我们对待新词新语“不要为天下先”，有的部门曾发文禁止出租车上的招牌使用“的士”字样，现在看来没有禁止住。我们恐怕不能说当时禁止是对的，是形势需要，现在听其使用是因为“的士”已经取得了语言的价值了。

（十二）其实，不只音译外来词，其他来源产生的新词语在初显时由于用的人少，时间短，常常让人感到眼生，不习惯，但是它们并不等于不规范。词语的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只不过我们



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还不那么深透罢了。新词语初显时只要不是明显不妥，出现之后用上几十年的，我们欢迎，能用上几年，这几年没有它不方便的，我们也欢迎；眼看着快要隐退而有价值的，我们同样欢迎。这种比较宽容的态度是明智的。现在一些“新词词典”在收录这类词语的同时，加以适度的评判和预测，更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纂者观念上的更新。而观念的更新又是基于对语言本质的再思考、再认识。

（十三）语言是一个不对称的、多层次的、动态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大系统。语言规范应该放在这个大系统中去考虑，不应该是僵化不变的模式，而应该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性的。以往一些学者从纯洁祖国的语言出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某些尚未得到普及和取得所谓合法地位的词语归为“生造”和“滥用”，究其根源，恐怕也在于语言观和规范观没有跟上趟儿。其实，用动态的语言规范观去考察词语的变异现象，许多困惑我们多年的词汇问题可能就会找到答案。

（十四）对待新词新语应该宽容一些，不要总拿计划经济时期的静态的一元化的语言规范观苛求它们。新词新语是处在使用状态的活语言，语言系统自身的调整和社会对它们的评判、抉择都有一个过程。过程是动态的，一刀切的办法行不通。比如现在商店的命名，有“××商城”“××中心”“××广场”，有人指责这些名称不合规范，无非是它们与习惯中的“城”“中心”“广场”词意不合。其实，“商城”也好，“中心”也好，“广场”也好，不过就是指一种综合的多功能的集商业文化之大成的现代化大型商场，广大群众认可，照旧使用。颇为滑稽的是，北京有名的隆福商场，落成时叫“隆福广场”，因为牌匾名称要求规范，结果改成“隆福广场商场”，不伦不类，使人哭笑不得。

（十五）新词新语的规范化是一个复杂的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以往的许多研究尽管也谈到规范化并非限制词汇的发展，但在具体



实践上却往往墨守固有的形式作为规范的标准，缺少必要的弹性。这样，有时候就难免与语言运用和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形发生抵触。鉴于此，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谈规范，而是力求搜集更多的语料，试图从宏观上对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他们除了从词汇的内部去探寻新词语规范化的规律外，更致力于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有机结合，着力从社会发展、民族心理以及传统文化史等角度去寻找某些依据，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地进行研究。这一类型的研究，以新词语规范问题为突破口，对汉语词汇规范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应用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对国家新时期的语文规划和汉语规范问题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六）信息化时代对语言的规范化程度要求高，但规范应该有层次性和调适性。有些规范要求是自觉的、硬性的，如国际标准术语、自然科学译名、专业用语以及国家颁布的法定标准等，这是必须遵循的，否则会妨碍信息的时效和社会的交际。而大量的社会生活用语，是处于使用状态的自发规范的活语言，不妨采用柔性的灵活的对策，在分析、评判、抉择的基础上，带有导向性地推荐给社会，供人们使用。

（十七）新词新语给人的冲击最主要的还是对语言是什么样的东西的认识，怎样看待语言的演变，怎样看待语言的交际作用，怎样看待语言的调节功能，怎样看待语言为所有人服务的问题，总之，就是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的语言观、规范观的问题，这就是根本性的冲击了。语言观、规范观不同，感受到的冲击力就有所不同。在语言生活比较活跃的时期，任何关心不关心语言生活的人都会感受到新词新语的巨大冲击。一个比较开明的、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动态的、乐于向前看的人感受到的正面冲击就大，一个较为保守的、过于注重语言的既成形式的人感受到的负面冲击就大。只不过带有保守倾向的人也许最容易感受到这种冲击。没见过、不了解、



未理解、不熟悉、太新奇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他们的指责。因此，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一个时期，对新词新语的批评越多，语言生活就越活跃，新词新语的冲击力就越大。我们应该注意和尊敬这种批评。

（十八）只要社会交往、交流比较深入，都能明显地感受到新词新语的冲击。30年代，有人曾写信给鲁迅批评那些“误用的”“时髦字眼”，主张“与其食古不化，何如禁用在先”，这些词是：“共鸣、对象、气压、温度、彻底、趋势、理智、下意识、相对性、纵剖面、横剖面、死亡率……”（鲁迅《花边文学·奇怪（二）》，《鲁迅全集》第五集5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实，这些词，除了个别之外不久都已成为常见词了。也不光中国才有这种现象。1894年，保尔·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罗大冈译，商务印书馆，1964）一书中详细罗列了大量的某些权威否定过的、被法兰西学院编的《学士院词典》排斥过的、却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的新词。一百年了，情况又有多大改变呢？如果抱着纯洁语言的认识，恐怕对这种冲击也感受很深。再加上有时这种语言纯洁感附着了语言的民族情感在里面，便容易对外来成分形成一种潜在的排斥心理。滥用外来语是任何主张语言规范的人都会反对的。可是使用外来语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何为滥用，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被判为滥用，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历史上，汉语曾经经历过开放地吸收佛教词语的漫长过程。有人研究后认为，汉语对佛教词语的吸收创造“带来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它树立了吸收外来词的样板，扩充了汉语词汇的宝库，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词方式，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过程，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参见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汉语对佛教语言的开放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试想，如果没有佛教词语的“加盟”，佛教词语不积极地在汉语中“抢滩”“登陆”，汉语不主动地对佛教词语“整容”“演



绎”，现在的汉语词汇恐怕就不是这种样子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时候人们也会明确地感受到新词新语的冲击的。

（十九）有人对来自社会基层的新词语不大容易接受。我们反对滥用方言土语，反对滥用俚语俗话，然而我们同时又应该不断地从“下层”人使用的语言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这是不矛盾的。语言创作不只是大作家、大学问家的事情，而是所有的语言使用者共同创造了语言，共同推动了语言的发展。否则，“高级人物说的话往往被看成是高级的语言”（鲍林杰《语言研究方法的演变》，赵世开译，《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2期）。其实每个使用语言的人都有权利，而且实际都在为语言的交际作用提出自己的意见。创造、引进、使用一个新词新语，也就是对语言或显或隐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二十）新词语研究对语言观的更新具有冲击力，一是这次新词语的涌现是同改革开放一起来的，是同人们思想方法的更新一起来的，新词语是人们思想活跃的创造，是某些新理论的实践。二是新词语是语言里活跃的部分，是我们以前注意不够的部分，现在注意整理、研究新词语，发现原来的许多理论不能涵盖它。新词语是古已有之的新领域。

（二十一）现在我们不是常说输血、充电吗，看来我们的语言要不断地输血，在新词新语的冲击下，我们也要不断地充电。

（二十二）我国学者研究新词语，特别注重国外某些先进理论、方法的引进和吸收。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新词语，视野更加开阔，研究的思路越拓越宽，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陈原发表在《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上的《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一文，可以看作是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新词语的较早的论文。陈原认为：“社会语言学家对新语条的出现应当给予极大的关心。即使出现了将来肯定被淘汰的新语条，社会语言学家们仍然要付出足够的力量去搜集、比较和



分析，并评定它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80年代中期，语言学界曾对1987年前后社会上频繁使用的“反思”和“推出”两个新词（新义）是否属于“滥用”展开过讨论。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不是很多，但它引起了人们对新词使用过程中的这类现象的注意和思考。这场讨论的效果是积极的，讨论的实质，涉及语言的规范和词语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讨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取得了共识，即：新词语新用法的不断出现，是语言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评判某个新词语的优与劣，滥与不滥，应持发展变化的观点，特别应该注意联系具体的语境，考虑到不同的文体、对象、目的、风格、修辞等诸多因素，不能简单化、“一刀切”。事实上，主观武断地用硬性规定的办法进行词汇规范，也是行不通的。进入90年代以后，新词语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引进有了新进展，一些学者借鉴了语言的“空符号”理论，从“潜”和“显”的角度来探讨新词语，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参见周洪波《从隐性到显性——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载《辞书研究》1994年第4期）

（二十三）进入90年代之后，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1~1993，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之后。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和旧的规范观讨论。那时候主要的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出现时间的长短和使用者的多少。一些学者提出了初显词语这个概念。初显词语不等于基本词语，也不等于不规范词语。从新词语和基本词的关系提出语言是由比较稳定和比较活跃两部分组成的亚稳体。还有一个是说一个事物、一个意思有一个词就够了。一些学者提出寻求新的风格、寻求新的色彩是出现新词语的重要途径，后来进一步提出色彩是语言的动态的系统。1993年之后，着重于理论的建设。一些学者提出了交际值是衡量语言规范的标准，而且试着做了一些交际值的分析。提出语言是个运动的过程，不再提“产生”和“消亡”。在提出预测观的同时就探讨了预测的途径，例如类推、占位。与此有关的提出了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语言内部新陈代谢的喷



泉理论。对“全民语言”的说法进一步提出质疑。关于辞书的类型，提出了有规范型和描写型结合的类型。

（二十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词新语的大量出现，而且对使之产生或者说为之催生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是宣传鼓吹的作用。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新词新语的产生、形成、流行，对当今人们的观念变革、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娱乐方式、休闲方式等，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变作用。因此，研究新词新语不仅仅具有语言学的意义，具有语言本身就承载的人文精神的意义，而且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具有新时代精神的意义。从语言哲学的高视点来看，研究新词新语既具有语言工具价值的意义，也具有语言人文价值的意义；既具有语言工具理性的意义，又具有语言价值理性的意义，还具有语言审美理性的意义。

二、《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的有关见解

2000年3月22日，教育部部级科研项目《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由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审批立项。该项目的组织工作由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负责，研究工作由《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承担。课题组成员为：于根元、金惠淑、刘一玲、孙曼均、孙述学、王铁琨、袁晖、周洪波。6月8日召开了专家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部分学者座谈“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问题。与会专家为：晁继周、陈章太、符淮青、胡中文、李行健、谭景春、徐枢。《文汇报》驻京记者站记者吴娟、国家语委报刊社杜永道、《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叶青也应邀出席了会议。课题组成员全部到会。课题组2000年3月22日~2002年1月10日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我整理了课题组的讨论，也以“新词新语冲击波”为题收入《语言能力及其分化——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见243~28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我还把专家讨论的意见和这一



次对话执笔写成《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同王铁琨、孙述学一起署名刊于《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1期。《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里的有关见解跟上面的连着排序如下：

（二十五）规范的意义。

1. 语言文字的规范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

2. 新词新语规范是现代汉语规范的重要部分。

3. 新词新语规范有助于基本词语的整理和规范。

4. 为普通话水平测试里新词新语的确定提供一部分根据。

5. 有助于国际接轨。外国不少国家如法国、俄国、日本等重视新词新语的整理，而且重视了解中国的新词新语。

6. 学术意义。新词新语的整理和研究包括规范研究实际上是近些年来我国语言观更新的排头兵。

（二十六）新词新语的涵义。

1. 主要是时间划界的问题。一般以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为界。

2. 主要标准看新颖度。有的词语不到10年新颖色彩基本潜藏而以稳定色彩为主了，可以认为是基本词语。有的词语超过10年，人们已经很熟悉了，稳定色彩很浓厚，但是新颖色彩仍然也很浓厚，可以认为是基本词语，也可以同时认为是新词新语。严格地说，新颖度以词语取舍者取舍的时点来判断。大的多年本的词典收集新词新语以1978年以来的为宜。

3. 有的词语潜藏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休养生息和不少人已经陌生了又恢复了一定的新颖色彩，这样的既有浓厚的新颖色彩又不是新出现的词语，如果不收，不利于交际，学术和理论上也说不过去，收了，很多人说过去什么什么时候有过，甚至古代有过，有的收的人或许是不知过去有过。收，以利交际，但是说明情况，以示区别和严谨。

4. 以进入普通话语言生活为准。原来方言、专业术语里有的，



这个时候进入了普通话语言生活，收，说明情况。

5.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新词新语加引号的，说明还是临时用法，把加引号称为戴帽子。实际使用中加不加引号的随意性比较大，有人不加引号表示自信，标点符号使用中也主张能不用的就不用。所以，加不加引号只是取舍的参考。

6. 关于新词新语，只是一个通常的叫法。还有新义、新用法，也包括在内。关于新词和新语本来界限就不好定，放在一起说是一个稳妥的说法，也考虑到一些新语的整理和研究的意义，一般不会把很长的好几层结构的新语放进去。

（二十七）规范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

1. 规范的目的是有利于交际。

2. 规范的对象是可能给交际带来某些情况或者问题的语言现象，而且是规范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语言现象。还是郭沫若 1955 年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的开幕词里说的：“……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不是所有的语言现象都要去规范一下，要管应该和能够管的，不要管不要和不能管的。主要是面向社会的有较大影响的用语，如报刊用语，广播电视用语。

3. 规范的标准是看交际值即交际到位的程度，这是同语言的功能相一致的。交际值里包括感情、色彩等。如“手机”是口语词，是俗称，“移动电话”是学名，两个词都说。总的是文和质结合。大的规范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交际的原则。经常是多种综合的规范的下位的基本原则有：

（1）必要的原则。即使用有必要性。看新词新语是否必然，有无必要，是否填补了汉语词汇的空白，普通话中是否没有这些词语。如“团伙”，与“集团”不同，色彩也不同。

（2）丰富的原则。即丰富了汉语。表现在两个方面：新词语反



映了新的观点、新的事物；新词语提供了有用的同义近义形式。

(3) 经济明白的原则。经济，如“扫黄、共识”等双音节化的简称。明白，即表义清楚，让人理解。如表示设备等的“硬件”和表示管理等的“软件”。表示人才的“活件”就比较牵强。

(4) 符合结构规律的原则。即符合汉语允许的大的结构规律。如“泼辣”和“洒脱”合成的“泼脱”，就比较牵强。

(5) 重视国际通用的原则。有些东西汉语中没有译词，不用字母词就难以交流，有些字母词又回避不了，如“CT”“B超”。

(6) 大汉语观。要考虑到汉语使用广大地区和汉语使用不同语体的情况。重视汉语使用广大地区的情况。如“E-mail”，台湾用“电子邮件”。大陆规定术语时应考虑到世界华人区，沟通一下好。

(7) 品位的原则。品位主要指思想性，列在大规范观里。一是过于粗俗的从严，如“搓蜜”。但反映社会消极面的需要存在，如“包养、三陪”。二是注意适当的避讳。三是要有动态的观点。

(8) 使用和动态的原则。不存在抽象的不分使用情况的规范。有时候不是词语本身的问题，使用也很重要。还有“BP机”到“呼机”，“大哥大”到“手机”都有个变化的过程。

(9) 引导的原则。我们常常说鼓励创造，常常说规范有利于创造，但是我们很多关于规范的意见和规定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点。我们要在规范的原则里列上这一条。

4. 词语的规范有一定的特点。新词新语的规范更有一定的特点。不能拿别的词语规范的特点来要求新词新语。

(1) 新词新语的特点就是新。一是用的时间短用的人少，就不能拿用的时间长和用的人多来要求。二是新颖，就不能拿稳定来要求。三是人们还不怎么熟悉，一方面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让人好懂，另外一个方面不能拿一些人不懂来指责它。四是其中包含着许多创造，而我们可能不容易判断，所以要特别宽容。不同形式往往是色彩不同，不要輕易地只要一个。真正是完全同义而一时难以取舍的



可以先都留着。

(2) 还有田小琳提出和做了初步研究的社区词，指形式上是普通话词而在某个社区流通。这个语言现象和新的观点，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并且尽量在我们的研究中体现。

(3) 规范的策略和途径也有些不同。词语的规范同文字、语音的规范不同。文字、语音的规范可以由管理机关、职能部门经过调查研究，确定标准来推行。即使这样，人们平常口说读音的差异、手写文字形体的差异，即使不规范的读音和文字形式也仍然存在。因此文字、语音的严格规范也只能在一定范围中实现。词语规范的实现是另一种情况。人们接受某些词语，有多种因素起作用：一是简易经济的因素，如“扫黄、共识”；二是求新求异的因素，如“氛围（气氛）、大腕/大款（富豪、阔老、）”；三是丰富语言的元素，如“生猛、靓丽”。四是名人、权威机关的引导，如“出台、举措”；五是传媒的推广。此外，词语本身的因素也起作用：一是双音化的因素；二是语言发展中类推的作用。这些因素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为语词的来源：有音译、意译、方言、港台、名人等。二为语词本身的条件：有双音、新异、经济、理据等。这些因素互相作用，此消彼长，形成一种合力。传媒、管理部门的倡导起很大作用，但语词本身的条件也很重要。如五六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劳改、人流”都不算规范的语词，现在都承认了。这并不是某些语言学者不懂规范，或是存在某种神秘的社会力量。社会接受这些词语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语言学家提出的意见仅仅是一个因素。现在又有学者认为“打的”可接受，“面的”难以接受。如果没有更好的新形式代替，它也要存在下去。“手机”有可能成为规范形式，但“大哥大”以其独特的形式、色彩和理据，作为同义形式，恐怕也可以存在下去。因此，在词语的规范方面，语言学家的作用是提出有根据的意见，但仍要借助管理机关的倡导以及传媒的推广才能起作用，单一因素不行。要正确估计语言工作者的作用。



语言工作者只能因势利导，要看准“势”。这是在操作时首先要考虑的。以为定出标准就是万能的，一呼百应，这不可能。词语规范比语音、语法难。难在词汇的数量大、变化快、标准不明，每个词语的性质不同，是有个性的存在单位，用衡量这个词语的标准去衡量那个词语可能就不行。词汇系统是开放性的，自由度比语音、语法大得多，词语的变化也太快。除了明显不规范的词语可以马上决定，大部分词语的判定不能操之过急。

（二十八）关于“生造”。

1. 几十年来对生造词的定义、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没有大的进展。1982年以后，生造词的研究有所深入，但还局限于产生的原因、辨识的方法等具体方面。虽然也提出了判定标准，但实际并不明确，仍然划界不清，难以操作。因此也就很难避免出现今天说是生造词明天又不得不承认是规范词的尴尬。问题出在“生造词”的提法恐怕有问题。生造词实际也是新词，它与新词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正由于此，生造词与新词才难以科学严格地界定。只不过许多文章所列举的生造词大多出现于文学作品，频率低，范围窄，因而人们感到陌生，自然就看着不顺眼、听着不顺耳、不能望文知义了。自1955年以来，防止生造词和不断消灭生造词一直是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生造词的说法在20世纪50年代也许有它存在的可能和必要。但在今天，社会和语言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语言规范观也发生了转变，生造词的说法就显得含混模糊，不够科学了。如果仍围绕着生造词做文章，恐怕很难有所突破。“品位”和“规范度”的说法比较有意义。新词语确有规范与否、规范的好与不好之分，对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分析评判，如表义、构词、语音、频率、范围等，进而认定它是可以被接受的还是需要淘汰的。似乎没有必要非定位在“生造”上不可。

2. 以前说“生造词”或“新造词”，都是指以前没有的、新的形式。只是一般认为，新造词必须要符合现代汉语构词规律，否则



就是生造的，不规范的，没有生命力的。另外，新造词必须适应语言表达实际需要，词汇中已经适应这种需要的词语，就不能再造了，否则也是生造。这种说法是比较笼统的。有的我们都认为是生造词，可以说是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此外，认为词汇中“已经有现成的某个词，不必另造某一个新的词”这种要求也显得有点简单化。实际表达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多方面的，有时候就是为了和已有的不一样，为了新奇。

3. 新造词语当中确有一些生硬拼凑、难以为人们接受的词语，都是规范度或者品位度不高的问题。

4. 两个双音节形容词或者动词常常能合成一个双音节词。有一种情况是并列的两者之间有“而”或者“又”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比较牵强，也比较难合成。合成一个词，还合得好，要有达意、逻辑、读音、色彩等好些方面的考虑。

（二十九）关于简称的地位和趋势。一是使用范围十分广，使用频率相当高，生成能力特别强。缩略语的健康创造和正确运用，不仅能够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宝库，而且可以大大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大大提高语言的交际功能。二是重要的趋势。一些境外、国外的中文报纸的简称用得比我们的多得多。人家报纸上新闻短，标题字号大，标题字少，标题里的简称很多，还为了吸引人，也有随意的色彩。估计那里的读者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现在用的许多简称，人家早就用了。我们的简称也有发展。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简称“哈夏”，就有艺术色彩。三是新词新语出现的重要途径。简缩是新词新语出现的重要途径。估计这样的情况不止百分之十。汉语词汇双音节化，一是单音节扩展，还有就是多音节简缩。现在很多双音节词很容易恢复多音节，尤其是四音节。不少词典的双音节词的释义用的方法就是恢复到四音节。简缩是任何语言都有的现象。汉语的简缩也是由来已久。四是简缩手法的运用是基于语言使用的需要和语言自身的特点，表达简省的需要，适应汉语词的双音节化的趋



势。很多简缩形式是双音节的，有词化的可能性，适应更多的新组合的需要。简缩后的形式比原来的形式运用更灵便，组合能力更强。汉语同语素（或叫同字）词语丰富，为大量数字式简缩形式提供了可能。简缩形式面目新，给不同的表达风格提供选择，是词语发展的重要反映。五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重要反映。缩略语的增多，是新时代各民族语言的普遍现象。这取决于现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飞速发展，也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发展变化。现代社会生活以及现代思维方式要求并促使语言尽可能地追求省时省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原则，同时还要更加丰富多彩地表现客观事物和人们的认识。在许多国家，语言中的缩略语是很多的，汉语中的缩略语也会越来越多，这是当今新词语大潮所伴随的必然趋势之一，这个趋势是国际性的。

（三十）简称跟原词。缩略语是原词语缩略而成的，它必然是后生的。即原形出现在前，缩略产生于后。一些汉语缩略语词典把“朝鲜、俄罗斯、印度”说成是缩略语，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词在汉语中早就出现了，不能都看成是某个国家全名的缩略语。缩略语出现后，一般说来是与原词语共存的。缩略语与原词语不是一个取而代之、新陈代谢的关系，而是互有特点、互相依存的关系。当然这里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有差别。缩略语的使用范围要广得多，使用频率要高得多，原词语反而变得很冷僻，很少有人使用，但绝大多数没有潜藏。如“冠心病、高考”，这些缩略语可以说已经词化了。有些缩略语能量很大，超过了原词语，如“东单、东四、西单、西四”，其原形现在几乎无人知道。大多数缩略语与原词语是要长期共存的，对于缩略语和原词语来说，共存是一般的、基本的，取代是个别的、偶然的。缩略语与原词语在表达意义上是一致的、等义的，但是它们在风格上、情味上却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说来，原词语比较庄重和细致，缩略语则比较简洁和明快。因此缩略语在语言修辞上也有一定的作用。缩略语的创新，多数具有类推



性，即创造了一个缩略语后，可以类推出一群成族的缩略语。缩略语的能产性是很强的，不仅表现在它自身的成族创造，而且还表现为成为构成新词的一部分，有了构造新词的能力。有学者曾经提出全称和简称并存的时候说明简称还是不稳定的，是临时用法。实际上，简称除了经济之外，有比较随意等新颖色彩。嫌繁嫌正式的时候想到用简称，可是用简称肯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而且随意，有人是不喜欢随意的，有时候有几种简称，有的又简得不够好。人接受简称本来要有个过程，加上有的简得不够好，人就更有意见。例如数词式的，的确有的是套套，往往是出自擅长搞套套的人之口。缩略词的现象比缩略语多，缩略词不一定有原形，数量很大，构词方式也不是原来的五六种方式能解决的，如“的哥、的姐”等。

（三十一）简缩手法和简缩词语。一是脱离具体语境（狭义语境、广义语境），所指代意义独立稳定的，就能固定而使用开来。否则，对具体语境依赖性较大的，就固定不下来，用不开来。如：仅仅用于标题的“寄小、经谈”；仅仅用于某些场合的“热巧、女配”。数字式简缩尤其依赖语境，很难独立稳定下来。二是具有一定能产性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较稳定的简缩词语。否则，较长时间仍是孤例的，特别是带有修辞色彩的一些简缩形式，多为临时用法，不能定型为简缩词。数字式简缩在简缩中数量很大，涉及政治、措施、任务等，在报告、总结类文体中使用尤其多。数字式简缩除应适应上述两条原则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意义方面：一是代表性。提取字要能足够代表被简词语意义。如“三好、三废、三通”。但“三开、三信、三青、二水”就差一些。纯数字式的如“五四三”更是谈不上代表意义，可以说是意义非常不明确的暗号。二、有理性。若干同字词语首先在逻辑意义上有并列的道理，不是硬凑的、一味形式化的。如‘三外、三名’都是凑成的。形式方面：三是一致性。提取的字词性要一致。如“三头干部（赤脚光头、手拿锄头、生产带头）”，完全是凑在一



起的。关于简缩手法和简缩词的区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数字式一类的，许多人意见大，我们也没有都收录，但是在某些场合某些时段有交际价值，不能认为是不规范的。我们现在认为是规范的，但是没有词汇化。解决了一个难题，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简称手法还有《红》《要略》《讲话》等。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语文性的，在别的领域里可能是已经词汇化了的，不一定是语文性的。语文性的圈圈可大可小。

（三十二）前人提到的一是两个平列的附加语公用一个被附加语，古已有之，但不太自由。如“演职员”不太好，“大小学”不能说。“挑应战、劳畜力、长短处”生硬。二是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省略太多，初次看见简直无从猜测它的含义，应当少用。三是县名不宜用简称。四是“市计委、市纪委”在广播里要区分，“中指委”在广播里用效果就差些。

（三十三）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有的简称不完全是代表字的问题。如“考研”，指考研究生，已经占位了。所以指“考试研究”的就不容易进来。不是说这个“研”本身着重指研究生而不是考试。语言是人的心理印象的符号系统。词语格式不能一概类推，词语结合有个松紧度，这个松紧度有语言结构和人的心理相关的两个方面。“律考”就同“路考”的格式相同而不同于“考研”。二是过去曾有人认为，政府文件中不应出现缩略语，用了似乎就有损于文件的庄重与严肃。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半个世纪前，政府文件中就出现过一大批缩略语，现在政府文件中使用的缩略语就更多了，并没有影响到文件的庄重与严肃，反而使人感到简洁明快。三是关于数字式缩略语，现在用得很多。如“211工程”，在本行业、本地区相当流行。这种缩略语有两种形式：抽取语素的，如“三民”；与语素无关，从语义上概括的，如“四害、八字宪法”。四是对缩略语的使用应有不同的宽容度。如：“华东师大”在全国范围内通用，“华师大”在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通用。不同的范围里可以有不同



的缩略语，要有不同的宽容度，在有些特定场合可有临时简缩。可见其区别性特征也还脱离不了地域的制约。五是有的词语演化为缩略语时，不同的人提取的语素不同，即一个原形有多种缩略语。这里有的有优劣之分，有的难分高下。如：爱卫会/爱委会、清华（大陆）/清大（台湾）、房管局/房地局、文研所/文学所、邮编/邮码。如何解决？要共存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的发展趋势不完全一致。如“爱卫会”用的多了，因为它有区别性特征。六是有时孤立地看某一个缩略语，觉得不规范，总要有所责难，但放到同类成族的缩略语中，就觉得并非不规范，而是相当合理合法了。如有人认为“工行”缩略得不合理，但如果和“建行、农行、交行”放在一起并列，就觉得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了。七是我们今天认为规范的一些缩略语，其实它们的表义未必明确，区别度未必高。有的缩略语使用寿命很短，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短寿，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产物，缩略语本身却不见得有何不规范。可见，表义明确与否、寿命是长是短不能视作规范与否的标准。规范与否除了受词语本身内部诸因素的影响，恐怕更多的还要受词语外的某些因素的制约，而我们对这些因素并未完全认识和深入研究，未及本质。这也提醒我们，规范与否不能只看词语本身，一定要考虑到词语外的因素，要看使用。八是新词语的简缩与人们对新词语表达内容的认知程度有密切关系，人们对新词语表达内容的熟悉程度，常常影响简缩词的产生与被接受。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动态的，因此，对新词的简缩也应持一种动态的观点。有了动态的观念，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新词新语的简缩。例如，“考研”一词，可以由“考试研究、考察研究、考证研究、考研究生”简缩而成，但人们现在只是接受最后一种简缩，主要原因是社会上研究生入学考试比较火爆，人们对之相应比较熟知。而如果研究生入学考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有那么大的影响，而人们对各种考试的认知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们对于“考试研究”简缩，或许也可以接受。九是对于科技



方面的术语或行业专有名词，无论是原形式还是缩略形式，语言工作机构应与有关部门合作，参考境外或民间已有的相应说法，事先规定其规范的称呼及规范的缩略形式，以避免混乱，减少分歧。

（三十四）关于外语词、音译词、字母词和借词。

1. 外语词、音译词、字母词和借词等使用频繁，形式多样。音译词、字母词的出现和使用势头，将随着我国加入 WTO 还会有所发展。这是国际性的一个问题。北京 2008 年申奥成功，北京组织群众学英语，这样的情况还会发展。这是社会需要。

2. 有学者认为意译就规范了，原型、音译都是不规范的。我们认为这是个过程，有时候来不及想什么道理，而且想出来了意思也不准确，就把原文拿过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想出个音、想出个意出来了，原型还用，三个同时用了，这很复杂，从内部原因来说，把外语词语移进来是简便、快捷，可能音译、意译一下子想不好，也不如移进来准确，有的移进来的是外语词缩写，意译起来很长。有的过些日子想出音译的了，或者后来又想出意译的了，几种情况可能并用，当然会有主次，主次的情况也会变化。“麦克风”到了“扩音器”，可是现在说“麦克风”的人又多起来了。一些音译还有两个的。这跟外部情况和词语色彩有关，不是说到了意译才完成了规范。入世之后音译词会增加。3. 外文原型或简缩形式如 IT、MTV，我们叫外语词。汉语拼音的简缩形式如 RMB，我们认为是汉语词。有外文字母又有汉字的字母词如“卡拉 OK、AA 制、B 超”也是汉语词。都是字母词。

4. 现在很多人接受了“IT 产业”，很少说“信息技术产业”，但网络界说 VC 比较多，其他多数还是说“风险投资”。网络语言有一个跟国际接轨的问题。

（三十五）关于新词新语的品位。新词新语的品位是客观存在的。

1. 关于确定品位的标准。包括思想情趣、文化含量、新颖程度



等方面。

2. 确定品位要注意的几点。

一是过于粗俗的从严，但反映社会消极面的需要存在，如“包养、三陪”之类。要区分词语所反映的事物的好坏与词语本身格调的高低。就是有些粗俗词也并不都是“品位”低的，要看具体使用，使用在什么场合，指称什么事物。使用得体恰当的，不能说“品位”就低。比如“骂娘”就是。“倒爷、息爷、三陪、小蜜”等词语，从词语蕴含的色彩看，都有一种调侃、嘲讽甚至否定的情绪倾向，不属于低品位的词；而“挎蜜、嗅蜜、搓蜜”等“蜜”系列词则属于低品位。词语的品位与它具体所指的事物、行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定要把这两者分开。要充分重视一些高品位的新词新语的语用价值。表达积极事物的也可能品位低，表达消极事物的也可能品位高。有时候表达丑的事物，表达得好，犹如舞台上演丑角演得好，也美，是表达的美。对一些消极的事物，我们指称的时候满含愤怒，例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就美，品位就高。还有“红眼病”衍生的“白眼病、绿眼病”，“白条子”衍生的“绿条子、红条子”品位也不低。我们常说“硬件、软件”衍生的“活件”就不怎么样，因为生硬、别扭，文化含量低，虽然指的是积极的事物。

二是人们对一些表达消极内容的词语避而远之，这又是事实。一个原因是避讳。大众场合，又是大雅之堂，做报告老举性活动或者厕所做例子，不雅，需要避讳。

三是要有动态的观点。一个词的品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新词语，在尚未成为基本词语以前，变化的可能性更大。如“写真”，单从这个词看，其表达含蓄模糊委婉，品位不低。当然它所表现的行为与中国长期以来的民族心理不相符合，所以似乎给人以品位不高之感。但是，民族心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继续开放，人们的观念、心理会继续发生变化，也许有一天，这个词会符



合变化了的民族心理，从而显现出它的高品位。这是一个词的品位由低到高的变化。反之，一个词的品位还会由高到低。如“小姐”，本来品位很高，不仅是尊称，而且含有年轻、漂亮、时尚等积极的倾向，但现在又生发出一些不太好的含义，而且使用者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似乎带有一种暧昧的色彩，于是这个词由高品位生发出低品位，使人们现在被该词称呼时，有了一种复杂、尴尬的心理。例如“绿色食品”一类，如果一旦人们滥用，或者有很多绿色食品并不安全，绿色食品的品位马上降低。

四是品位也有个度，叫品位度。了解品位度，要从实际出发，要调查人群的感觉。但是有不少人群会有误解，需要经过我们的过滤。误解也有原因，对我们也有启发，但是误解毕竟不是正确的理解。

（三十六）关于新词新语的使用。

1. 群体知识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结构与现在的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百科词条写得通俗，用小学生看得懂的语言，结果准确性差了，品位也低了，外行看了不错，专家看了就错了。这里涉及到新词语使用的不同层次，读者的层次。现在工具书使用者的素质、水平都在上升。

2. 语言的使用具有趋同性，体现一种时尚。不然社会少了很多色彩。

3. 我们说语文性的词语，除了“美丽、高兴”这一类之外实际上是跟各个领域跨界而又不很专门的词语，就是伸到各个领域里面但又不深。现在群体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了，知识面扩大了，语文性的范围也扩大了，有许多原来认为比较专门的词语也为大众了解并且经常使用了。这跟一些术语进入语文性词语如“反馈、反思、信息”还不同，而是要把整个语文性的圈子往大里画一画。所以人们使用了一些原来的术语、行话等，这是词语使用的发展，是



群体知识结构的发展，当然是社会的发展。这里有个双向的问题。科学技术性的词语进入语词未必是高雅的表现，有的会产生矫情的效果；有的就是一种庸俗化。很生活的词语进入正式场合，比如什么“眼睛向内”“向下”“向外”“向后”，“抓住经济建设的牛鼻子”“为亏损企业找婆家”“联姻”“上台阶”等，这样的经济政治领域的文章有的不知所云。科技色彩的东西拼命往生活里推，什么“可持续”“零缺陷”“克隆”，达到的并不是主观的预期效果。

4. 还有个“说”和“听”的关系，各人说各人的，听的时候宽容一点儿，不要求别人跟你一样。编写词典有句经典：“外行人看懂，专家看了不错。”但这里有偏移，“外行人看懂”就会牺牲“专家看了不错”。社会的发展，现在更倾向于“专家看了不错”外行人看了自然也就不错。往“专家看了不错”这方面侧重一些，品位提高了，准确度也提高了。

（三十七）关于对待新词新语的态度。

1. 总的应该欢迎。对待新词新语态度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语言规范观的相互碰撞。任何一种语言要丰富和健康发展，都需要不断地从方言词、古语词、行业语、外来语言成分中汲取营养。过分地对语言中的新面孔、新成分和新用法进行指责、非议，只能使语言的使用者感到动辄得咎，进而对语言规范化失却信心。近年来新词新语的层出不穷，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快速变动和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日趋活跃的反映，对此应持欢迎的态度。特别是语言学家和语言文字工作者，应该更加积极地关注新生语汇，多做研究，因势利导地促进规范。如果以为语言文字立法就是要人为地规定一些条条，把鲜活的语言“框”死，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动态、发展的观点看，新词新语的规范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应该从词语创新和使用的内在规律出发去引导规范，多做“语言导游”，要处理好词语规范同语言的丰富、发展的关系以及语言文字的主体化和多样化的关系，不要简单化、一刀切，更不能急于



求成。

2. 从不同层次来考察和分析新词新语。要看到它的不同层次进行不同的分析,找出不同的规律,这将对词语规范的实施会出现一些相当有效的措施和对策。理一理这些年来出现的新词,编出一个词表出来是非常必要的。有了词表,进行分析找出规律,不仅有可靠的依据,而且可以避免一些失误。不仅要搜集整理新词语,编词表、词典,更重要的要认真细致地分析这些新词语的流向,做动态的研究。从时间来看,可以分析一下哪些已潜藏了,哪些已被取代,哪些还在生存发展之中,从而找出其中的规律来。从空间来看,可以分析其交际领域的变化,义项的繁衍,进而结合使用者、使用地、使用环境,可扩大到语体来进行甄别和剖析,将是十分有用的。

3. 几个主要的误区。

一是追认观。完整的表述是:一个新的语言现象出现之后,等到用的时间长了,用的人多了,我们来追认它是规范的,这就是我们的规范工作。这样的观点是很早就有的,而且是语言学大家说的,例如说:一个新的语言现象,它还没有广泛使用开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它是规范的。这次追认观却是针对新词语而来的。最有影响的是1995年底全国第一届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上第一场大会。还有认为“布拉吉”像一阵风,现在不说了。其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里补进去了。以用的人多少为依据,都属于追认观。这几年我们多次分析了追认观的缺陷。

二是把词语同它指代的事物等同起来。

三是认为创造新词语是语言大家的专利,瞧不起大众这方面的创造。

四是有人把语言看成一个简单的封闭的静态系统,认为汉语词汇是已经有了某个词语,就没有必要再有一个表现相同意思的词语了。如有了“结账”,可以不必用“买单”。实际上,“结账”与



“买单”称述的不同，往往体现出色彩和风格的差异。

五是有人担心大量外来词语的使用会损害汉语的健康发展，认为这是一种崇洋思潮、殖民地意识。其实大可不必。如 E-mail，最初的译名有“伊妹儿”“电子函件”“电子邮件”等十几种，现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推荐使用“电子邮件”，有人简称“电邮”。这说明对待外来词语的规范，应当采取一种冷静的态度。

六是有人认为新词太不稳定，不能编入词典。这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在我国万千种类的汉语图书中，竟然找不出一本可供人们使用的新词语词典可以得到验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在有关专家的倡导下，我国不但出版三四十本各种类型的汉语新词语词典，而且一般的中型语文词典编写或修订时也收录了大量的新词语，这就在收词观念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4. 出现偏差的总的原因和意义。对新词新语的出现和使用，人人都有自己的语感和认识，都可以表示观点和态度。这是语言和每个社会成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特点决定的。对新词语的认识和态度跟人的年龄、阶层、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语言修养、欣赏品位等等都有很多关系。和具体是哪些新词语更是有关系，应当把那些受到批评的新词语、新说法的例子拿来做具体的分类和分析，把它们和受到肯定的那些新词语新说法做比较。语言工作者对新词新语总体要采取多记录、多观察、多分析研究，少指责的积极态度。在词典中适时收录新词，体现语言面貌，提供使用者查询，也记录词语出现的源头。

三、关于《新华新词语词典》以及有关的讨论

2003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本身和引起的反响很有意义。2003 年 3 月 1 日以“汉语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进一步面向世界”为题的语言哲学对话，收录在《语言的轮休和充电——第四轮语言哲学对话》（见 162～194 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里。参加对话的有赵俐、我、周洪波、俞允海、徐红燕、於春、刘艳春、商春光、潘国英、苏向红、司红霞、孙述学、贾磊、康健、张彤、刘一玲、余桂林、李志初、陈茜、喻梅。有关的见解跟着前面连着排序如下:

(三十八)《新华新词语词典》的特点在“前言”里说得很清楚:

1. 语词和百科兼收。
2. 主要收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或进入社会生活的新词新义新用法。
3. 除语文词语外,尤其关注信息、财经、环保、军事、法律、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新词语。
4. 词目附了英文翻译,一些词语的释文后设有知识窗,并配插图。
5. 正文后附有常见字母词等。
6. 计划每隔一年滚动修订。总的来说,从内容到形式给人新鲜感,很有用,而且不花哨。这本词典体现了包括编者在内的新词语研究的成果。引起的反响很强烈。可以说是世纪之交中国关于语言问题大讨论的又一个回合。这一个回合的特点,一是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有关负责人公开表态,二是反响总的是积极的,各界的人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水平提高了许多。

(三十九)《新华新词语词典》也是顺应了世界性的语言生活的需求。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全球化趋势的推进,新词语的大量涌现已成为世界性现象。国外一向以严格收词和慎于修订而著称的权威词典,在新词语的强烈冲击下,无论功能和形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种趋势是收词范围在扩展。如俄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最新出版《20 世纪末俄语语言变化详解词典》,着力描写动态中的词汇系统,收词标准大大放宽。另一趋势是出版频率在增加。如《牛津英语词典》1989 年出版以来,短短十余年间已出版了几个新版本。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最近也推出第四版增补本，增加了 100 页的新词补编。欧洲其他一些著名词典如《小拉鲁斯词典》，则开始每年出新版本。我国《现代汉语词典》2002 年也推出了增补本，增收一千二百余条新词新义。（《文汇报》2002 年 11 月 12 日，原作者：欧文）

（四十）《新华新词语词典》出版，引发了新一轮讨论新词新语的热潮。这一轮热潮形成的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相关新词语滚滚而来。

二是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新事物、新思想得以来去自如。

三是对于语言的整体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语言观更加趋于先进。

人民网 2002 年 8 月 30 日有一条消息“‘菜鸟’等网络语言将加入《新词词典》”，其中一句话很有意思：“对于网络语言，专家们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屑一顾’到‘研讨研究’的过程。”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对语言的认识和对新词新语的接受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年轻人中间，新词新语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父辈师长们想和孩子沟通恐怕也得了解一二，这也体现了语言学习的终身化和非一次性。

（四十一）新词语的产生是社会变化、发展、进步的产物。每当历史上发生重大变改时，就会产生新词语。新词语的活跃程度，是社会活力的指标，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如果一个社会长期没有新词语，说明这个社会是死气沉沉的。比如，港澳，广州新词语产生比较多，因为那里的经济发达，文化活跃，思想开放。语言的三大要素中，词汇是最能反映社会变化的。语法和语音难于担当此任。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产生了大量新词语，张骞通西域，带来了一批词语，西学东渐也产生了新词语，改革开放等都是如此。词



语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写照和证据。如果没有词语的记载，社会的历史就难于全面反映。由于新词语是历史的见证，因此对新词语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有语言学的意义和超越语言学的意义。

（四十二）《新华新词语词典》的几个结合做得很有特色。一是规范和描写比较好地结合。不仅比较好地完成了语词描写的任务，而且在收词、注音、释义、词典语言和编写样式等方面严格地进行了规范。为了方便读者，该词典还增加了中英对照、知识窗、插图、附录等，二是开放式编纂和滚动式修订结合。编纂方式上除了组织专门班子收集新词语资料外，还在报纸上开设专栏，向读者征集，再加上与专家互动，由专家对收集来的词语研究遴选、调整打磨，保证所收词语尽可能全面、准确。每隔一年修订一次的滚动方式能够保持词典面貌常新。三是所收词语在领域和地域方面的结合。除了语文词语外，词典还关注了信息、财经、环保、医药、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新词语，并且专门附录了港澳台流行词语和京沪穗流行词语，比较科学地记录描写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新词新语的发展轨迹、沿革变化。

（四十三）期盼着这样的新词语词典能每隔一年如期推出新版，不仅仅把它作为工具书来为现时的人答疑解惑，还要把它当作一部当代的汉语词汇编年史来完成。通过这样一系列“观察站”式的词典，我们能相对更真实的记录语言的流动，相对更完整的反映语言的潜显过程。

（四十四）社会上关于新词语争论集中在两点。一是价值取向问题，认为收入负面词语就是传播消极落后思想，一是语言规范问题，认为收入太多处于动态中的词汇，就会影响语言的纯洁性。这两种观点是建立在如下的语言观之上的：一是将语言等同于文化，认为语言观等于文化观等于世界观。在这种观点之下，就会产生这样的偏见：一个思想单纯的人，会通过负面词语看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丑恶现象，从而使世界观和认识论朝不良方向发展。有什么样



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这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延续，这种相对主义的观念早就遭到各国学者批驳。认为消灭或隐藏语言中的负面词语就纯洁了社会，净化了思想，这种观念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听不见看不见并不等于没有，不存在。所谓的负面词语与正面词语一样，是事物的两面，都承担着表述世界的功能。一是把语言看成是稳定的纯洁不变的东西。这和语言的本质属性相悖。语言只有在不断的运用当中才能得到发展丰富。语言的基本词汇部分是可以相对稳定不变的，但语言的外层——一般词汇则需要不断吸收社会文明成果才能保持创造性和活力。语言纯洁观实质上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中，使用着经过规范和经过论证的词语。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可怕的将来，贫乏的语言将会束缚我们的思维，使我们的世界不仅变得名不符实，而且面目可憎。

（四十五）《新华新词语词典》收入了许多领域的新词语，收入了所谓负面的争议很大的“包二奶”“泡妞”等词，正体现了面向未来、客观、严谨、科学的精神和态度。从历史角度来说，后人需要知道我们今天社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正面”信息，同时也需要了解现在社会还存在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客观、公正的记录能给未来社会的人们提供镜鉴，有利于寻找解决之道。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出现问题以后，回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不能讳疾忌医，社会上出现了“包二奶”“泡妞”等不良现象，不提不说不闻不问并不解决问题反而会有负面效果，关键还在于正确认识、看待、引导。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说，从事语言工作的人需要记录研究所谓正面词语的沿革发展，也需要记录所谓负面词语的来龙去脉。语言工作者还有义务帮助人们了解语言符号本身和语言符号所代表的具体事物的区别。新词新语的整理研究要进一步面向未来，必须正确、科学地看待这些词语。所以，对待这类词，编者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收入，怎样既能够履行职责完成工作，又能获得



尽可能好的效果。总之，开放、宽松又严谨、科学的氛围更有利于工作开展，过分指责会给做工作的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麻烦，最终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和完成。

（四十六）词典恐怕都要承担一定的道德评价的，《新华新词语词典》事实上是承担了道德评价的。要研究的是什么叫道德评价，怎样承担。例如不收“包二奶”的词典在道德评价方面是不是就进步一些，这样一来，编这一类词典的人会不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学生词典要不要收“黑客”，还有用什么方式评价的问题。词典，不是说收的每一个词本身在词汇系统里都是经典的，而是在一定的时空里收这样的词是应该的，有关的说明是典范的。收这样的词，体现了一种语言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四十七）提出新词语的预测，这是语言观上的进步，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但同时又很难取得预期想要达到的效果。语言预测不同于天气预测。天气现象是自然规律，人类无法改变，预测的目的在于防范，在于避免。语言的预测目的又在于什么呢？导向？事实表明，这种导向性现在还是很弱的。现在反而是语言学家跟着语言事实跑，出现了某一个新词语，去研究，去讨论，去否定，武断地去批评某一个词不该出现。所以我们常说语言规范，是不是该在导向性上多用点力，“防患于未然”，而不仅是“亡羊补牢”。应该尊重语言事实，还有值得考虑的关于校园流行词语的问题。校园流行语的使用范围和人数是很广的，目前的新词语词典都没有收录这方面的词。如“软着陆”，形容某同学补课成绩稳定了或安然度过了某一难关；“单细胞”，形容一个人的头脑不好用。今后怎样处理这类词是值得研究的。

（四十八）历史需要真实，要实话实说。语言学家作为语言学史官，需要有春秋笔法，正面，反面都要直书。语言学家要为历史负责，要为后人负责。而且，收录负面意思的词汇，并不提倡你去这样做。有些家长有些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社会中都存在了，你



难道还怕字典中收录进去？

（四十九）字母词的收录。字母词的较多出现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与国际接轨的结果，是英文程度提高的结果。在封闭时代有这种词吗？我们盼了多少年，改革开放，才迎来了今天的局面。随着与国际接触越来越多，这种字母词也会更多。这种词在表达上也确实有其独特之处。如，AA制，CPU，A片，DIY，V26，3D动画，移动PC，T68，cdma（手机）等。

（五十）科技词的收录也是必要的。而且对普通人来说的专业词，对专业人士来说是普通语词。随着科技知识的普及，专业词也会进入寻常百姓家。二十多年前，头孢拉丁药刚出来时，十分专业化，现在这种药连老太太也知道。而又有新的药出来了。现在新的科技领域大多了，如果不收科技词，就难于满足各类人的需要，解决人们的困难。

（五十一）新词不是现在才出现的，现在也不是高潮，为什么新词语的讨论变得热闹起来。是又一代人成长起来了，又一代人在关注这个问题了。还有很多老人、资深的语言学家，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十年前就提出来的，他们怎么还这样提？因为十年前新词语词典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和讨论，不排除新的运作方式、资金大量投入等因素。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标准，有这个时代的欣赏水平。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两个方面

（一）进一步研究当代汉语词汇

词典也需要多样化。这是使用者需要的多样化，是为使用者服务更加到位。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词典，如果各有千秋，也需要多样化，这样还有利于词典编撰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我们词典的多样化，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反映了人们生活需求和认识的丰富多彩，反映了词典为使用者服务的丰富多彩，反映了词典编撰学术的发展。这正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喜人的



成果。

词典的品种少的时候，人们可能把许多不同的任务都放在不多的词典的身上。事实上，不同的词典承担的任务是不尽相同的，一两种词典很难或者不可能承担那么多的任务。于是带来了两种情况，一是有的词典努力往承担多任务方面靠，二是不努力往承担多任务方面靠的词典经常受到一些使用者的不尽合理的批评。词典多样化有利于承担任务的合理分流，有利于词典进一步完成好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

有的词典的读者和编者往往认为词典的典是词的典，典是“一定的”，所以词典不需要也不能多样化，收的词也不能不合经典。认为词典不仅不能多样化，而且基本上是不变的，一定程度地把词典当成了经。其实，词典不是说收的每一个词本身在词汇系统里都是表示积极意义的或者经典的，而是指在一定的时空里收这样的词是应该的，关于这个词有关的说明是典范的。收这样的词，体现了一种语言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词典出版的滥化当然不是多样化。词典的多样化，带来了编写者的多样化，编写部门的多样化，编写渠道的多样化。这应该带来的是编写者参照、学习渠道的增加，有利于词典质量的提高。不同学术见解的讨论和争论是好事，具有不同风格甚至是流派那就更好了。当前关于词典要探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重在建设。

制定和实施语言方面的某些标准，一定要很慎重。实施这些标准也要很慎重，这是为了进一步吸取意见完善标准包括修改标准，也是让使用者有一个习惯的过程。我们经常说要根据语言的规律办事，不能违背语言的规律，就要遵循语言的几个基本规律。一个规律是语言是个巨系统，一个人学习语言要有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很多人要比较大地改变原来使用语言的状况更要有个相当长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立竿见影。根据这个规律办事，顺乎这个自



然，再因广大群众有了改变语言使用状况的认识、要求、行动的势来利导，我们才可能做一些促进工作。因此，不是我们想要改变群体语言使用状况立马就能改变的，即使是做法对头、条件具备，改变群体语言使用状况的事也要适度来做。不这么做就是违背规律，就是不科学，就一定做不好。实施标准基本上是刚性的，其中也有一些是柔性的，尤其是试用的或者指导性的也就是引导性、提倡性的部分，不宜采用刚性的做法。行政力量对实施语言使用的某些方面的标准的支持要适时适度，不要成了干涉。在语言使用方面发挥政府行为的作用，也需要因势利导。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汉语跟1919年到1978年这个历史时期的相比在许多方面尤其是词汇方面有了比较大的不同，我们不少语言学者认为我们汉语从1978年以来进入了当代汉语时代。词汇方面，出现的新词语以经济方面为主而且多方面，口语里单音节词增加，后缀和准后缀增加，还有一些副词的单用，语文性词语的范围扩大。语音方面也有一些倾向。我们的语言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对语言对汉语的认识有了发展，我们认为当代汉语里使用的不同时空来源的部分都属于当代大汉语的大系统。我们对语言规范的认识有了发展，认为及时发现和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比匡谬正俗更重要。上面还是很粗梳的认识。

我们的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可以说我们的汉语新陈代谢进入了当代汉语时代。我们生活在当代汉语里。一批同人觉得需要编一部帮助人们了解当代汉语词汇的词典。我们设想，当代汉语词汇里包含几个主要部分，这几个主要部分都需要和可以分编出字典、词典，在分编的基础上再编出中型的当代汉语词典。这一系列字典、词典构成当代汉语系列辞书。当然，需要有足够编当代汉语系列辞书用的基于当代汉语语言生活事实的词汇方面的语料库。



（二）进一步研究“少发性新词语”

我们现在编撰的许多语文性的新词语词典收录的词语还是经过比较严格筛选的，可能收录了不到十分之一，不很容易反映我们新词语的面貌，这还跟词典市场的需求有关，多少跟需求者以及编撰者互相影响的语言观有关。我们一时难以编撰出版收录面宽得多的词典，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少发性词语”的整理和研究。

虎头《她们的歌德》（《当代》2005年第2期“往事”栏），约24000字。凭我的印象，其中有“狗仔文人、精神教母、媒婆三昧、第二眼美女、展翅圈围、二八少年、势如黑白、迷你公侯国、前任爱人、名人瘾君子”十一个这样的词语：

有些文章望文生义，公然说歌德与格莉琴“初尝禁果”，其实不过暴露了自己“看见白胳膊，想到全裸体”的传统狗仔文人的嘴脸。（222页）

在歌德的所有女人中，夏露笛堪称歌德的精神教母……（同上）

这齐默曼虽是男人，却深得媒婆三昧。（同上）

让歌德如此狂热的夏露笛，长得却极一般，是个典型的“第二眼美女”。（223页）

当然他也厌倦了鄙俗的德意志，但是他也厌倦了老母鸡样时刻展翅圈围着他的夏露笛。（225页）

他们就像两个因恋爱而赌气的二八少年。（227页）

这个儿子的母亲，跟身为宫廷命妇的夏露笛势如黑白：她是个出身贫寒底层的灰姑娘……（同上）

其实，魏玛像德国当年所有的迷你公侯国一样，是个对偷情十分宽容的城市。（同上）

出于歌德的坚持，就连歌德的前任爱人、高傲的夏露笛也不得不试着接纳伍碧丝……（228页）

这裴笛纳是个名人瘾君子，她跟德国历史上很多名人



都有交往……（228～229 页）

《北京晚报》2005 年 8 月 14 日第 1 到第 4 版上，凭我的印象，也有“节能军令状、禁改限、隐框玻璃幕墙、时长、积分礼物、积分送礼、自由行、非常 1+1、矮空调、散乱小、罚没物资专营店、狗友、走失狗”十三个这样的词语：

政府机构签“节能军令状”等活动是“全民节约、共同行动”主题宣传活动的一部分。（1 版）

备受市民关注的北京市烟花爆竹“禁改限”立法听证会今天下午 2 时召开……（同上）

……在方案初始阶段即严格控制玻璃幕墙特别是隐框玻璃幕墙的使用。（2 版）

……180 分钟的国内长途通话时长价值就是 54 元。（同上）

全球通派发积分礼物（同上）

从本周开始，北京移动又启动了“积分送礼”活动，换分的门槛为 600 分。（同上）

在游客的印象中，自由行的价格都比极昂贵。（同上）

据悉，“非常 1+1”自由行两人成行，四日游报价为 2880 元，含往返机票，含早餐住宿两晚，机场接送及半天市区游。（同上）

东城出资为“矮空调”拔高（3 版）（文章说指离地面不足 2.5 米以上的空调室外机。）

中药企业散乱小（同上）

海关罚没物资专营店不合法（同上）

昨天下午，翟女士在小区遛狗时又看到了这条贵妇犬，它正被她的一位狗友牵着遛弯，翟女士一打听，它果正是条走失狗，这位狗友正带着它找家呢。（4 版）



9

网络语言冲击波

○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它的出现还引起了我们对四个媒体的有关问题的总的反思，也引起了我们对语言传播学说的有关问题的总的反思。

○调查研究学生上网或者也上网聊天对他语文水平的影响。要做实实在在调查研究分析。其中哪些学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网络语言用得不够好，原因在哪里？我们将来怎么解决？有一些学生也上网，也聊天，但是他的作文和别的方面还挺好，是不是上网聊天也起了作用，原因到底在哪儿？找出原因来了，我们好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提高。我们调查研究也体现了一种科学认真的学风，要找到到底是谁，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

○媒体语言是人交际用语借助媒体的延伸。使用媒体达到某些延伸的目的，同时也带来某些局限性。媒体语言是为了交际需要——媒体的不同标记也是为了交际需要。网络的特点是互动。而且打破了精英挑选精英的格式，而且可以少对少，更有个性化。多种媒体的融合，促使媒体语言的融合。这些都是人交际的需要，这种



需要不是人一开始就认识到的，由于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经济能力提高，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了。语言是载体，媒体是载体的载体。媒体语言带有媒体技术的要求。媒体的多样化，使人克服各种交际限制的各个方面。媒体的多样化，也促使语言方式的多样化。

一、回答有关的批评和质疑

2001年10月，我主编的《网络语言概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广电总局课题“网络语言研究”的成果，是我们“网络语言研究”的主打成果。在这之前，6月，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这是“网络语言研究”的副产品。在《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出版之前的将近一年里，几百家媒体刊登讨论网络语言的文章，其中很多是围绕将要出版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其中不少是批评和质疑。

好些语言学家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发表文章对有关批评和质疑作了一些回答。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答了其中的一些批评和质疑。2001年4月30日上午，我在北京广播学院、BBC国际台“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上发言，比较全面扼要地回答了批评和质疑。我在《网络语言概说》的“前言”里梳理了近一年来三次“网络语言冲击波”的历史，记录了宝贵的有关史料，也收录了我在4月30日回答批评和质疑的十点认识。这个前言，我还用“网络语言冲击波”为题收录在《在语言学的道路上——于根元自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里。

这十点认识如下：

（一）交际值——交际到位的程度是衡量语言是否规范的唯一标准。

（二）因为交际类型不同，对不同语体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的要求。

（三）语言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比较活跃的外层组成，它们共



同为交际服务，比较活跃的外层是比较稳定的内核的唯一来源，这两个部分基本上是互补的关系，从比较活跃的外层到比较稳定的内核基本上不是优胜劣汰的过程。

（四）求稳和求新是语言既能用来交际又交际得好的要求，语言能力是既求稳又求新或者说既趋同又趋新把握好度的不断磨合的能力，这种交际和能力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动力。

（五）如果一个语言不能发展了，那是最大的不规范，我们为我国的汉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感到无比的高兴。

（六）网络的实质是扩大交际，网络语言的实质也是如此，它的实质不是黑话。

（七）在语言创造面前人人平等。

（八）1997年又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中已经纠正了1951年提出的纯洁语言的口号。语言是为不同层次的人服务的，人不纯就谈不上语言的纯；人掌握语言是有个学习过程的，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进步的但又是一个还不到位的也就是不纯的过程；语言还要发展，发展了，人们又要学习；语言不规范现象也是会不断新生的；语言的不纯洁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组成部分。

（九）游戏功能是语言的重要的功能。

（十）对于社会上的不好的语言，既要治理又要告诉学生那些是不好的；对于社会上的不同的语言品种，要告诉学生先学哪一些，同时适当告诉学生社会上有不同的品种；对于学生还不宜知道的社会上的语言，想办法叫学生不要接触；对于社会上新的好的语言现象，要适时适度地吸收到学校的教学中来。

还提出了下面有关的认识：

（十一）文化是动态的，有传世的基本精神，还有时代性，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和发扬，发扬才是最好的继承。

（十二）我们认为我们当前网络语言的情况总的是好的，主要问题是还不够文明，在求新方面度有些过。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介入



和引导，要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和语文程度。

（十三）近几个月来，不少语言学家敏感地提出我们面临着一场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或者说是大论战。我们认为网络语言的冲击波是这场大讨论或者大论战的催化剂，因为当前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已经涉及了语言功能、语言规范、语言教学、新词新语、广告语言、外语词的使用、词典编纂等问题。网络语言的冲击波，或者说，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争论，是近十几年来新词新语冲击波的发展，或者说，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是近十几年来新词新语、语言规范问题、语言教学等问题讨论、争论的汇合。

（十四）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它的出现还引起了我们对四个媒体的有关问题的总的反思，也引起了我们对语言传播学说的有关问题的总的反思。

（十五）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或者大论战，我们要接受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上个世纪 30 年代大众语运动的两个教训，一是态度要好，二是要重在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

二、一次语言哲学对话的主要见解

2001 年 11 月 29 日，我们以“网络语言冲击波”为题进行了一次语言哲学对话，收录在于根元、夏中华、赵俐等《语言能力及其分化——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里（180～196 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参加的有我、付程、赵俐、柴璠、周洪波、李红岩。其中的主要见解如下：

（一）《中国网络语言词典》中收入个别或少量的“格调不高”的词语，诸如“TMD”（他妈的）之类，应该怎样看？我们的看法是：第一，词典编者的目的，决不是编“黑话”“脏话”词典；收录这类词语，并不等同于肯定、提倡和宣扬。第二，这类词语数量极少。据统计，该词典收录词语一千三百多条，其中聊天室和 BBS 上的词语仅占一百多条；而这一百多条中所谓“格调不高”之类所



占无几，根本不成比例。第三，这类词语还不等同于一般意义的“黑话”和“脏话”，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修辞”意义和“色彩”意义，“不用汉字，为了避讳，也有谐趣意，暗合美国一种导弹的缩写。”这类词语对于认识和研究网络语言的特点也是有益的。第四，从长远看，这类词语以及其他有些词语，随着社会网民文明程度的提高，随着网络传播的日趋成熟和发展会逐渐趋于淘汰、消亡，那么，这部词典就同时具有了珍贵的史料价值，因为它忠实和真实地记录了今天网络语言的现状。

（二）网络语言在运用上追求灵活、创新，不满足使用司空见惯的老生常谈，以遣词造句的新颖性体现生活的色彩怎么能说是黑话呢？的确，网络语言中存在粗俗、不文明、晦涩难懂甚至不知所云的话语，这正是需要规范的意义所在，同时是网络语言发展的空间，难道因为支流的曲折而全盘否定充满生机的主流吗？

（三）可以说，编写《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本身就是在做语言规范工作。“规范工作要匡缪正俗，但是主要任务是及时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为语言使用者提供积极有效的服务，就是在做规范的工作。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的、建设的语言规范观，一种与时俱进的语言观。《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编者希望网络语言尽快发展，希望网民们能够通过这部词典尽快克服网络语言上的障碍，甚至“希望这部词典尽快过时”，这也足见词典编著者的见识、胸怀和气度。

（四）特别是没上网的人和初上网的人很容易提出“网络语言你懂吗”这样的疑问，于是有人认为网络语言妨碍了交际。如果换另外的角度想想，人不是生而知之，闻道有先后，如果因为我们的“后知”而指责已经在“先知者”中流通的语言难懂，是不是有些霸道无理。对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我们还未曾了解的事物，可以怀着诚惶诚恐的求知欲不懈追求，而对与我们一同成长、发展的新生事物反倒不闻不问甚至嗤之以鼻，我们在吸纳前人辛苦积累



的文化精华的同时不能也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吗？

（五）由网络语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学术讨论，甚至是一些激烈的争论，这是一件大好事。如今，我们有了活生生的语言实践引起了关注与讨论。这是一个明辨真理、发展我们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的好时机。网络语言，也属于语言活跃的外层。外层部分，随着社会生活、语言交际实践的变化而变化，速度相对较快。当然，新的外层现象出现时，人们较为陌生，但这可能将会成为稳定内核的来源。这也是非常好的语言与社会共变的研究材料。

（六）有人士批评网络语言有些词语怪异，比如“斑竹”“JJ”“MM”，实际上这些词语的产生正是电子计算机汉字处理技术的不完善和网络使用机制造就的。当你键入“ban zhu”时，初显的词语可能就是“斑竹”，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网上，使用“斑竹”而并不影响网友的会意，既省钱又达到交际的目的，未尝不可。同样“JJ”“MM”不是很经济，很简洁，很俏皮吗？一味地对网络语言本身评头论足，而不去考察其产生的条件、背景、社会心理等原因，是不是失之局限和狭隘呢？

（七）《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出版以后，听到几种意见。一种意思是说它定位不清，不是工具书，是文献。编者说明过这本词典主要是给初上网的人用的。一种说法是术语多了。编者认为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面的扩大，语文性的范围要相应扩大。还有一种是已经编了多年语文词典的朋友说的，他看了之后认为网络语言没有什么神秘。这也是编者工作的一个目的。

（八）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人类传播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网络传播时代。尽管网络传播以其广泛性、及时性、交互性和飞速发展已向我们展示了她在信息传播上的巨大优势，但就其对人类社会所能产生的潜在深远影响来说，也许还远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网络和网络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又深远的。传播离不开语言。纵观人类语言与文化传播



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语言与文化的每一次大的发展，都与传播媒介的变革和发展紧密关联。文字的产生，为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甲骨和竹简的使用，使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具有了可能性；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为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开创了广阔的新天地；近代报纸的出现，使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又产生了巨大的飞跃；无线电通讯、广播电视电子传媒的出现，使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电脑网络的诞生，才使人类真正跨入了“地球村”时代，使人类的信息、语言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及时、有效的传播与沟通，真正成为可能。网络的发展也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语言应运而生。网络语言，是人们在网络上传递信息的新的媒体语言形式，或称网络用语，她是社会上某个特定群体——网民的用语。作为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语言现象，它属于语言中新词新语的组成部分。网络语言为社会语言学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研究对象，同时，伴随着网络传播而产生的大量的新词新语，也为语言学新词新语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这些都会大大地丰富语言和语言的研究。网络语言具有生动风趣、简洁省事、人情味浓、个性化特点强的特点，它作为社会上一种特殊群体的用语，能够满足网民交际的需要；同时，网络语言也表现出了作为语言中活跃部分的特性，具体体现了语言的多样化。当然，网络语言中也有品位不高的现象，一些格调不高，甚至相当粗俗的词语在网上也时有出现；另外，也时有错字、别字以及用汉语和英语词汇改编的“造字”现象；还有的网民乱用名字，交谈中相互攻击、传播不健康心理和思想的倾向。

（九）网络语言反映着人们的心态和社会的状态。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世界，但网络世界又是最真实的世界。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由于社会角色的制约，说出来的话未必能完全展现人们的内心世界，于是网络世界成了人们真实表明心迹的精神栖息地，有些“过火”的但却决不虚伪的语言出现在网络中，这是人们个体心



态的真实反映。同时，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开放的，无数开放的个体构成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整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状态和社会的“性格”。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语言的冲击波实际上是社会人的心态的“表演”和人的社会的集中反映。

（十）目前我们网络聊天室的用语不够文明。这跟网下用语不够文明有关。治本要治网下的。我们不少人对一些网民网下用语不够文明的解决不甚关心，这倒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十一）有人对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持怀疑的态度，认为“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现象，有着极其不成熟、不稳定的一面……”对其进行研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就是交际，网络语言作为正在使用的一种语体每天都在接受着交际的挑战和考验，在运用语言的实践中不断出现新现象、新问题，对网络上的交际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对新现象和新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实质上就是对已有语言观的反思和调整，这难道不具有学术价值吗？语言是活的，始终处于不同层次的不成熟—成熟—不成熟，不稳定—稳定—不稳定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如此看来，我们岂不是等不到语言成熟稳定后再去研究它的那一天了？

（十二）如今，上网的人以大专以上的大学生居多，要相信我们的教育水平，正确引导我们的大学生。有人说，网上的不规范语言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关于这点，该做的引导工作当然要做，但同时也要锻炼青少年的辨识能力，锻造他们的自我排污能力。因为，身处网络时代自由的交际环境中，面对这一代青少年，靠强行遏制恐怕不能奏效。

（十三）正像世界是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一样，反映这个世界的语言也应该是色彩纷呈，神态各异的。我们对弈、打桥牌、玩麻将时有术语、群体语言，那么在网络上就不能有独特的网络语言吗？既然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就不能正确冷静地对待他吗？既不一棒子打死，也不大唱赞歌。当我们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



语境、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制约下选择不同色彩的语言表达意愿时，不是很丰富、很自由吗？

（十四）对待网络语言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以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容纳网络语言，以积极的行动去引导、规范网络语言，以发展的理念去建设、繁荣网络语言。网络语言传播，给了我们一片神奇的新天地，我们更要善待它！

（十五）越是低级的东西，没有多大副作用，也没有多大正作用。越是高级的东西，越像双刃剑，副作用大，正作用也大，如原子科学。又不能不发展，不发展更不安全。网络也是这样。关键是趋利避害。对青少年也是有双重影响的，也是要趋利避害。青少年关在温室里培养不好，让他受害也不好。要让他有一些免疫力。怎样有免疫力，有多少免疫力合适，都需要试验。打防疫针有的也有反应，学游泳也有出事的。但是，打防疫针、学游泳总体又是有成绩的。还有，对我们青少年的免疫能力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其他年龄段的人免疫能力就一定更强，都需要调查研究。恐怕除了年龄还有别的有关因素。

（十六）目前网络语言的某些特点是由于经济原因和技术原因而形成，但假设有一天我们上网不需要花很多钱，技术上的困难也解决了，网络语言是不是就形成另外的语体特征？语言的发展演变是个渐变的过程，其承继性不可能令网络语言一下子面目全非，其特点中相对稳定的部分是不会巨变的，就像电报语体，今天不还是保持着惜墨如金的特点？

（十七）有人打“大侠”，先显的是“大虾”，他就用“大虾”了。起初是不得已的瓜菜代，瓜菜代也是新发现的一个途径。世界上许多新发明是歪打正着碰上的，所以我们要处处留心，而不是因为它不是源自于经院而轻视它。

（十八）有的年轻的学生，十六七岁，十七八岁，语言观里就有许多问题。例如，认为某个新用法有交际价值的，但是使得原来



的秩序乱了。用了“假若如此，天下大乱”的论证方法，说什么这样可以说了那么那样那样也可以说了怎么得了。好几位大学老师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些认识是从他们老师那儿来的。我们当老师的要注意我们对学生的影响了。其实温室在哪里呢？

（十九）长期以来，在人们心中只是“匡谬正俗”，甚至与“规定”、“打棒子”完全等同。因此，出现一个新现象，就容易愤愤不平，唯恐违反规定，赶紧盖上“不规范”的印章。其实，既然语言是在交际中不断运动着的，既然我们语言工作者的任务是为了促进语言交际的发展，那么，面对新的语言现象，我们何不欢喜地接纳、宽容地对待、细致地分析呢。规范当然需要。什么是规范？交际到位了，就是规范。除了规范与不规范，还有中间状态，不要急于下非此即彼的定论。要给它们留出发展期，给我们留出观察期。做规范工作要有弹性。对待语言的外层和内核应有所区别。

（二十）把广播电视办成报纸杂志的音像版是件很遗憾的事，同样广播电视节目的网络版如果只是把节目发到网络上就万事大吉也实在可惜。网络上的话语自由度相对比广播电视大得多，广播电视的网络版是不是可以利用广播电视雄厚的信息资源和媒体优势做出自己的特色来？通过对网络版的思索、研究和策划是不是可以反观对广播电视节目和语言的研究存在哪些薄弱点或者误区，把思路拓展开来？

三、需要着力研究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对网络语言或者网络词语整理的质疑总的来说几乎成了车轱辘话题，没有什么新意，连史料的价值都不高。答疑基本上也就成了做普及工作，学术上也没有多少发展。其实，以前涉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做学术上的探讨。近几年学术上有些发展以及需要着力研究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不同领域的语言尤其词语跨领域使用的调查研究。这个



问题前面说过，可是近年来有了研究的迫切性。网络词语就在网络里使用，范围不大，影响不大，似乎还可以。可是据说一些学生的作文甚至高考的作文也用上了网络语言，这就影响大了，这就成了个问题。

似乎应该调查扩大到网络外面来的是哪些词语，扩大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扩大出来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扩大出来用得妥当不妥当。别的领域里有没有类似的情况。2005年8月12日下午我、张普、周洪波、于虹在教育部的网上在线讨论“网络语言的是是非非”。周洪波说：“张教授刚才提到他关注平面媒体里面的一些语言现象，实际上网络词语从BBS、聊天室里面能够进入到平面媒体去，实际上已经扩展了它的使用范围。”张普接着说：“同时也是升华，网络现在毕竟是有序不够，因为是新型的东西，有序还不够，但是传统媒体的有序已经很够了，所以能从网络到平面媒体，既是扩大，也是升华。”周洪波又说：“那么，这恰恰是我们做编撰辞书研究人员非常关注的，一旦网络词语进入到平面媒体，那就是我们辞书编撰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比如我们当时出这个新词语词典的时候，把相关的网络词语作为一个附录放在后面，那么根据这几年网络语言的发展，它进入平面媒体的增加。那么，我们今年在修订这本词典的时候，像大虾、菜鸟、灌水等词语大量进入平面媒体，我们准备收到词典里面。”（见网上在线谈话）

（二）与此有关的是调查研究学生上网或者也上网聊天对他语文水平的影响。周洪波在前面的网上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它不大了解，然后断言说它不好，这样有很多以偏盖全。我今天来之前，我特意问北大附中的老师，他们都是在一线搞教学的，我问他们到底现在网络语言对中学生的写作有多大的坏处，他们告诉我，就是在他们一线教学中，一般的学生在非考试的作文当中会夹带一些网络词语，因为要诙谐，要幽默。老师觉得只要用得得体，这是不影响整个文体的协调，这是可以的。但是，老师告诉他们讲，最



好考试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网络语言。现在事实上学生做得很好，在他们教学界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像我们现在有些报道说的那样严重。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网络语言，作为我们对网络语言有偏见或者是有质疑的人，是不是先别质疑，先融入进去，先去了解网络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于虹说：“媒体有一段时间炒作得非常厉害。但是，我们也做过仔细的分析和对比。一段时间媒体举的报道的例子如出一辙，比如在北京地区报纸里说清华附中初二年级的王某某同学，他作文里出现了放假了，我在外地读大学的那个GG（哥哥），从外地回来了，带来了他的恐龙GF（girl friend），这个人不断对我妈妈大肆的PMP（拍马屁），就是这么段文章，他妈妈和老师看了这个作文看不懂。但是在长江以南，武汉地区的报纸用了一样的素材，说家住武汉的张女士拿着自己初二女儿的作文反映这个问题。在西南成都还是用这个素材，只不过更名换姓，到南京还是这个，所以可见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素材的真实性很可疑。就是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初中生，把网络字母这种简缩和谐音形式这么集中反映在一段文章里面，这个很可疑。另外，大江南北反映网络语言如何不好的时候，用一样的题材。”我说：“网络语言丰富了我们语言生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它是新兴的，大家了解的时间比较短，另外有很多学生对这个可能是比较有兴趣，他在使用当中也可能有些地方用得不够恰当，不够好，社会各界关心这个事，这是很好的。那么，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了解这个原因，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提高网络语言和使用的水平。一个事情，我想要做实实在在调查研究分析。就是我们哪些上网的学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网络语言用得不够好，原因在哪里？我们将来怎么解决？比如有一些学生也上网，也聊天，但是他的作文和别的方面还挺好，那么，这上网聊天是不是也起了作用，那么原因到底在哪儿？找出原因来了，我们好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提高。另外，我们调查研究里面也体现了一种科学认真的学风，要找到到底



是谁，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现在看到这方面做得好像欠缺一些。”我还听说，新加坡的一位语言学家集中一些网络词语连成了一篇短文，犹如相声里把歌名、电影名连成一篇文章，结果被不少人当作一篇真实的使用网络词语的文章炒来炒去。这样的学风不够好。我们需要认真做一番调查研究。

（三）手机短信息语言的研究。贾磊主编了《你的手机来信了——大学生原创短信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前面有一篇大约一万五千字的学术性前言《手机短信息语言的特点、类型和发展》。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网络词语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惠天罡正在主编新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大约有80万字，估计2005年年底能完成，其中网络词语的收集整理和学术性的前言一定会有新的内容。

（五）关于网络语言的性质。汪磊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拟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网络语言是“工具变体”的新说，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六）网络语体。网络语言不仅仅是词汇，还有语音、语法、修辞，还有语体、篇章结构。特别是网络文学的语体需要进一步研究。要关注大网络语言的研究。

（七）关于媒体语言的定位。媒体语言是人交际用语借助媒体的延伸。使用媒体达到某些延伸的目的，同时也带来某些局限性。人的语言交际要解决时空的限制，有了报纸和广播。报纸可以保存和运送，还可以扩大传播。但是缺少了身临其境，说的话改掉了许多，有了不少表演的成分，个性少了，经过编辑，加上了报纸媒体和编辑的语言成分。广播则是由播音员代读。这些媒体经过筛选，只有一部分人有话语权。还有媒体技术的限制，突破时空也有限。读报要有一定识字水平，报纸出版、运送、购买、借阅也有一定麻烦。听广播也有许多麻烦。一天里很长时间收不到广播。有的播音员还或许为了媒体技术的需要，读“的、了”用了非生活的音。报



纸是简洁，广播是适听化，但是两种媒体的语体常常混淆或者交融，有助于出现中介性的语体。电视有了广播有声音之外的图像，都是为了显示语境，便于人们理解。电视主持人也来自生活里常常需要主持。主持人兼了生活里的会议主席、评判员、串讲、幕间小丑、幼儿园阿姨、啦啦队员、解说员。媒体语言是为了交际需要——媒体的不同标记也是为了交际需要。媒体语言也主要为了坦诚和真实。主持人语言需要突出个性化。网络的特点是互动。而且打破了精英挑选精英的格式，而且可以少对少，更有个性化。多种媒体的融合，促使媒体语言的融合。有的广播同时有网络可见图像可有文本。这些都是人交际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人一开始就认识到的，由于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经济能力提高，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了。

语言是载体，媒体是载体的载体。媒体语言带有媒体技术的要求。

媒体的多样化，使人克服各种交际限制的各个方面。媒体的多样化，也促使语言方式的多样化。

传播的特点会影响语言的特点，但是传播的特点不等同于语言的特点。

大众媒体语言需要规范，是人们语言交际本身要求规范，大众媒体在这方面需要和容易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好管理。大众媒体语言对人们语言交际具有引导作用这也是大众媒体语言的性质之一。大众媒体语言的不规范带来的不方便也比较多，听不明白的人不好补问。语言生动、富有创造性也应该是媒体语言的特点，但是社会认识和一个时期媒体的定位是媒体语言不够生动，而且套话也比较多。媒体管理人员的语言观和语言水平也影响了媒体语言。

还有电话，广告，手机，布告，导游的喇叭，列车、轮船、工厂的广播等非大众媒体，都含有大众媒体的因素，又不等同于大众媒体。人们的语言交际还需要随时随地、点人、私密、便捷等等，



这些都会促使媒体和媒体语言发展。

现在有的电视主持节目的名人介入游艺圈和娱乐圈，几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这些也给媒体语言带来多种多样的影响：有的非娱乐类节目也带有比较多的表演成分。通俗化和庸俗化的分寸也不容易掌握好。人员之间有一定的圈子，语言比较可能会有模式化，这跟工作语言也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些媒体人的不怎么好的传闻传到民间，所以一些媒体人员在媒体上的说话也打折扣。提高媒体语言水平还不仅仅是语言本体的问题。



10

语言规范观

○在语言和语言学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努力开发语言资源，不搞和不信几个凡是。中国的语言资源很丰富，开发得不够。不要过早地说哪些哪些是汉语里没有的不许用的。特别是我们汉语形成白话和建立语法学的年头还很短，我们对现代汉语许多方面的事实还不够清楚。

○不是就事论事解决一个一个问题，而是主动地深入解决背后的几个大的观念问题，表面的前沿具体问题是根本问题的表现，我们只是把这些具体问题作为例证和解决比较根本性问题的切入点。

○我们鼓励探索，我们希望在探索中吸取教训，但是不因为批评探索中的失误而批评探索本身。探索本身比探索中的失误要可贵得多。只有探索才可能成功，才可能引导学术和社会发展。探索是创新，是鲜活，是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生活。

一、关于语言规范观的主要新见解

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



的 209~225 页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在学术上提出的十八个重要的新见解。

(一) 对解放以来采的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和研究以及当前规范化的形势给予较高的评价

我们的工作和研究是很有成绩的, 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语言生活规范的情况比五六七十年代也好得多。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汉语规范研究和规范工作的经验教训来看, 有几条是带有规律性的: 第一, 要结合社会的需要, 努力满足社会的需要。最根本的也是最严厉的检验是社会语言规范的实际情况。第二, 必须有一批有学问、懂理论、有活动能力、视野开阔而又脚踏实地的干部队伍。学者和工作者要进一步结合甚至合一。第三, 现代汉语规范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不能单打一。宣传和培训, 研究和行政工作, 学术引导和法规制约, 这个时期和另外一个时期, 这个地区、领域和另外一些地区、领域, 长期计划和目前的工作, 都要通盘协调。第四, 必须坚持科学、稳妥、适用的原则。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 根据社会的需要, 根据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因势利导, 做促进工作。要顺人心得人心, 选准突破口, 掌握分寸, 不冒进也不守旧。结合具体情况, 因地、因时、因人制宜。

当前现代汉语规范研究和规范工作存在这样一些主要的问题。第一, 对领袖人物语言的崇拜。80 年代之前主要崇拜他们的书面语, 简单化地作为判定规范的标准。80 年代之后又有一些人实际上崇拜他们的语音、语调。第二, 对规范的许多原则认识模糊。例如把初显的因为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判为不规范的。第三, 判定不规范过早, 总体过严, 造成过多“误诊”。第四, 大量的规范工作局限于“匡谬正俗”。没有把发现、保护、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作为更重要的任务。第五, “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大体还停留在口头上。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提这个口号, 一方面又说语言创新一般是大学问家、大作家的事。造成一方面一些人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方



言土语或者粗话，一方面不少人脱离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生活的实际，有某些贵族化的倾向。第六，对“刚性”“柔性”原则缺乏分析。有人一味喊要宽容，有的人又说要严。

（二）交际值是衡量规范的原则

语言规范的目的是便于人们使用语言来交际、思维、认知，是使语言更健康地发展。规范的大原则应该跟规范的目的相一致。跟目的背离的规范不是真正的规范，是不够正确的规范。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群进行交际，交际目的达到了，比较得体，很难用别的来替换它，或者替换了不一定比它好，这就应该是合乎规范了。如果说是这种交际不符合某些所谓的标准或者规定，那么应该修改某些标准或者规定。这些标准或规定的制定者、维护者应该调整自己的认识。没有维护某些标准或者规定来妨碍交际和语言健康发展的道理。有人提出还有表达或者抒发的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这也可以放在广义的交际里，人要跟别人或者别的什么交换信息和能量，这里的交际的广义的含义是交换。

（三）规范就是服务

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建设者服务，这是整个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立足点、目的和目标。党的十四大前后，有关方面提出了“管理就是服务”。这是针对不正确的管理观念而提出来的。错误的管理观念导致拍拍脑袋出主意、瞎指挥，阻碍、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管理就是服务”，是个很大的进步。受这个提法启发，我们提出了“规范就是服务”。

“规范就是服务”体现在认识上，是认识到为人们的交际、思维、认知服务是规范工作的立足点、目的和目标。这也是语言观的一部分。为了有效的服务，我们要经常调整自己的语言观。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要合乎某种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思维和认知。体现在人际关系上，是规范者真正深入人民大众，深入人民大众的语言生活，先做人民大众的学生，



然后一边继续做学生一边做先生。体现在工作作风上，是虚心、耐心、谨慎。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批判一些规范的甚至是很好的。“规范就是服务”，服务要及时，要有效。

我们的很多语言观和规范的见解、措施，都要用“规范就是服务”来衡量。

有没有使语言更好地为人民大众的交际、思维、认知服务好，有没有使人民大众的语言生活更加健康、丰富、活跃，是检验规范工作有没有做好的最根本的标准。这要求规范者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要了解语言发展变化的外部、内部的原因和规律。还要了解规范和不规范的外部内部的原因和规律。

（四）要为不同层次的人们服务，要为人们长期的、短期的、简单的、复杂的多种需要服务，要尽可能的为最大多数的人服务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基本估计，不会有很多人故意跟国家跟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过不去，故意或者执意不规范。规范工作者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之后，规范工作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和调整我们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实践也就是服务的实践。为一些不甚理解者的服务是深入的有本事的服务。服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服务，也是为建设者具体建设的工作和学习的的服务，规范工作要努力给建设者的具体的工作和学习带来效益。

（五）规范需要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相结合

两者都是为了服务。科学研究也同样要接受服务的检验，不是简单化的检验，也不是不受检验。这两方面的人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紧密配合。行政管理的，要服务得好，不能瞎指挥。科学研究的，要付之于服务，要到服务中去受检验。规范不要行政手段的观点是片面的。采取什么样的行政手段也是科学研究。我们的行政手段也要进一步法制化。消极的行政管理手段也要便于极大多数人“乐于接受”。



（六）发现和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

这是因为：

1. 这样的服务是积极服务，这样的规范是积极规范。

2. 这样的服务更及时。

3. 语言时刻在显现新的好的，这是语言生命力所在、调节功能所在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受语言是共时的、静态的语言观的影响，对新的好的不予重视，甚至轻视，规范工作基本上是“匡谬正俗”，工作片面，失误较多。

4. 介绍、推荐新的好的，需要站在群众语言生活的前沿，需要熟悉过去的情况，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要说出子午卯酉，这需要很高的水平。这就给规范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提出了树立规范工作者良好形象的重要途径。

5. 更重要的是，介绍、推荐新的好的，带有一定的预测的成分，比较多的要受到此后的事实的检验，这对规范工作者是个严峻的检验。我们做好了，才能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进一步显示出语言学是一门科学，一门富有生命力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很有用的科学，从而也进一步推动了语言科学的发展。

（七）语言有大量的中介状态

80年代初期，很多语言学者摒弃了大凡“非此即彼”的思想。后来陈建民在许多文章里说到语言的中介物。这个中介物不只是一个或者几个点，两端也不是两个点。后来我们提出规范度：交际即使比较规范了，还有个规范度。它指的不仅仅是意思表达到了。意思是“质”，那么还有“文”，应该是文质彬彬。要从语义、语音、结构、语用等方面进行分析。规范要放到人们活的交际活动里去看。交际效果好也就是交际度高，规范度当然高。对于处于集中学习语言阶段的人，要有分阶段的规范度的科学的教学和要求。在某个阶段里合乎要求的，虽然还不规范，还要鼓励和表扬。规范有层次性，不规范也有层次性。其实谁都是规范与不规范的混合体。刚



会说话不久的幼儿的话有不少是规范的。语言大师也会有不规范的，如果包括语音，那么就普遍了。问题是语言规范的层次不同，要求的层次不同。

（八）区分过渡状态和语病

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语言，因为学习语言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学习就有个过程，过程里向规范靠拢的、合乎规律的规范度不够的情况，就不能认为是病态，要把大量的这样的情况从“语病诊所”里解放出来。更不要轻易把一些比较新的很好的语言使用误诊为语病。当然，语病也是有规律的。

（九）不同风格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要求

如果说最低层次的语言规范，各种风格差不多都是应当遵守的。但是中、高层次的规范，不同风格就不能一刀切。所以，谈规范是不能脱离风格的。结合风格谈规范，是8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和规范研究结合的新成果。

（十）刚柔相济

语言大体有关系密切又会相互转化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比较稳定的，如语音系统、基本词、基本语法等。这部分比较好搞标准。制定标准要严谨，一旦施行，一定要严。而其他如修辞、新词新语、广告语言等变化相当快，可以做指导性、调节性工作。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刚柔相济。

（十一）多角度地分析规范

王希杰在“第四次语法学修辞学学术研讨会”发言里提出，把句子分为语音句、语义句、语法句和语用句，举例从不同角度以及综合角度分析了句子的规范情况。

（十二）色彩是个动态的系统

语言表达意思，除了表达基本的理性意义之外，还要表达色彩和别的。因此，表达一个意思不一定只有一个词语。我们常说的有褒贬、中性色彩，谐谑色彩，书面、口语色彩，文言色彩，方言色



彩，科技色彩，时代色彩，随便的色彩等。其实，很多色彩不是单一的，渗透在许多色彩里的还有新颖色彩。因为有了新颖色彩，色彩系统才成为动态的。新的语言现象不断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寻求新的色彩，寻求新的风格。

（十三）惯性原则

语言变化有个惯性原则，社会、人对语言的影响到语言发生变化往往有个时间差。所以我们有的工作要适度超前。

（十四）层次性

语言的要素、成分在交际中潜一显一潜的轨迹，形成了语言结构相对静态和相对动态结合的层次。不同层次的人学习、使用语言的轨迹，形成了语言学习、使用的相对静态和相对动态的层次。这两个变量密切相关，互相交叉，形成了更复杂的相对动与静结合的语言的层次性。根据这个事实，语言规范就不能一刀切，要有层次性。

语言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变化比较快的外层这密切相关的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都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交际，文化层次高的人较多地用到外层部分。这种认识，就是考虑到了语言的动、静结合的层次性。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把句子分为语音句、语义句、语法句、语用句，也是考虑到了语言的相对动和静结合的层次性。

语言的层次，有的部分是很清楚的。连接部分、过渡部分、中介部分就不很清楚。我们不必事事都分成了了分明的两部分，要承认中介的模糊的部分，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层次，它本身还分层次。规范也是如此，规范与不规范的两头比较分明、比较稳定，中介层向两头作有规律的运动。

（十五）潜与显

有的学者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常常说的某些语言现象的两头是一种假设，任何语言现象都处于一种过渡状态。某种语言现象在实



际语言生活里出现之前它是潜藏着的，具有一定条件了，经过孕育，出现了。潜和显，犹如冰山的水下部分和水上部分、树的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一台戏的一个时点有的演员在前台许多演员和别的有关人员后台，组成语言的整体。王希杰在提出和论述这个重要的观点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某些词语的某些义项或色彩的淡化，让位于另外一些，更是常见的潜和显。语言的潜和显是时刻在发生的。潜、显就是语言调节的方式。

（十六）预测观

很长时间比较有影响的规范的原则是追认观。认为一种语言现象用的时间长了、用的人多了，我们来追认它，这就是规范；还没有被很多人用开的，不能认为是规范的。追认观忽视了以下几点。

1. 语言是活的，是发展的。任何新的好的语言现象出现的时候，不可能是一群人约好了同一时刻开始使用。追认观的原则妨碍了新的好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初显的语言现象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让人好懂，但是初显不等于不规范。

2. 语言有相对稳定的部分，用的时间比较长，用的人比较多。语言还有相对活跃的部分，例如新词新语、临时修辞用法、广告用语。这密切相关的两部分组成了语言。任何相对稳定的部分都是从相对活跃的部分来的。没有相对活跃的部分不是完整的语言，也切断了相对稳定部分的来源。新颖是语言色彩系统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起初新颖的，后来逐渐稳定了，不新颖了，又要有别的新颖的色彩出现。

3. “大甩卖、呼啦圈、一刀切、乡、当铺、小姐”等都有过时间或长或短隐藏的历史。

4. 许多不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寿命很长，用的人不少。有的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劈头盖脑地使用，已经内化为语言的一种模式了，改起来费时费力。有的是学习过程中很多人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用法。有的是许多人原来的方言，拿普通话翘舌音平舌音分不清的说



汉语的人来说，人数或许不比分得清的人少多少。打开一般的改病句的书看看，“通过学习使我提高了认识”一类，大多是多发病、常见病。

5. “打假、脱贫、扫盲、肃贪、反腐败、扫黄、特困户、脑体倒挂、野蛮装卸、车匪路霸、危房、法盲、宰人、劫机、流失生、大锅饭、胡子工程、文山会海”这一类用语，我们并不希望用的时间长，用的人多。我们希望它们跟“布票、粮票”一样赶快隐藏起来，它们中间有的或许就是寿命很短的短命词语。而这些词语也是规范的。如果认为不规范而不许使用，肯定要影响一个时期的交际。

6. 追认观会使我们的规范工作滞后于人民群众实际的语言生活。难怪有人批评“信用卡”一类不少新词语在我们的词典里查不到，“当铺”一类词典里注的还是旧社会剥削人云云。

跟追认观有关的是阶段观。认为当初用的时间短，用的人少，我批评你不规范是对的，现在用的时间长了，用的人多了，我说你是规范的，还是对的。因为规范是分阶段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能用我今天说你规范来翻你当初不规范的案。跟上面有关的有一种习非成是说。认为原来你说错了，我纠正你，是对的，现在许多人都说错了，约定俗成么，算你对了。

我们主张尽可能地站在实际语言生活的前沿，根据社会的变化等因素引起人们交际、思维、认知的变化，从而将引起语言按照内部规律变化等先兆，把语言规范的许多工作做在前面。许多人最不能同意的是对将会出现的具体语言现象的预测。我们认为，语言在时空里始终处于一个运动的中介环节，或者说在过渡状态，或者说在潜、显的状态。具体语言现象的潜、显是有规律的，有先兆的。语言已经这样运动了多少多少万年了，我们还只有一些大而化之的认识。其实所有新词语的第一个使用者在说、写之前已经“胸有成词”，他预见到该显了。如果汉语已经有 20 万个词语显现了的话，



那么这预见的正确性已经至少得到了 20 万次的证实。我们许多语言学者大概认为这几十万次的造词、造语法、造修辞方法等事实都属于“任意性”的范畴，很少去对这大量成功的预见、创造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其实，一些人试着破除认为这是迷信的迷信，作了一些探索，还是颇有收获的。

（十七）语言传意者“功力、思维、情趣”三要素

粗略地说，语言功力管准确，思维情况管生动，情趣管品位。文如其人，至少包括其人的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动态变化的，关系也不是很简单的。

（十八）从规范评议失误中学习

综观现代汉语规范失误诸例，可以发现一些带普遍性的原因。

1. 语言现象纷繁复杂，我们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引起争议的方面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语言理论和规范理论的准备和吸取也不够。特别是语言发展变化比较快的时候，正确判断本来就不容易，我们有的人又判断过早，结论过严。

2. 我们有的人没有怎么真正认识到语言学习不能是一次性的，很少了解群众语言生活的变化，有一种贵族和学究派头，唯现有的一些语法书和词典为标准，对新的语言现象有一种潜在的排斥心理。有的知识陈旧，拿过时的说法来批这个批那个。

3. 评析时脱离使用的语境。有的自己假设一个跟别人不同的语境，来批评别人用得不对。用科学语体的逻辑语言来要求别的语体，是误诊的常见的原因。

4. 对一些典型的语言现象认识不够。这方面最容易误诊的是简称。对简称的性质、地位、作用、品位，都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5. 类推过头。

上面说的静态，后来我们叫稳态。上面第十六点“预测观”，我在《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 年第 1 期）里改成了“前瞻跟踪观”。



从现时的针对性来看，上面第六点“发现和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尤其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及时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

《人民日报》1951年社论和那一天开始连载的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但是也有历史性的不足，一个不足是形成了语言规范主要是“匡谬正俗”的片面化倾向。由《语法修辞讲话》发展成的语文评改类，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语文杂志开辟了语文评改一类的栏目，例如“语文病院”“语病诊所”。

《语法修辞讲话》的作者当时对这个倾向就有所认识。开明书店1952年出了第1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了第2版。作者在《再版前言》里说：“这个讲话当初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前边有一段引言，后来出单行本的时候扩充成一篇序。现在把原来的引言稍加修改，还印在这里。”（2页）引言里说到：

因为这个讲话侧重在应用方面，所引的例子，错误的或有问题的要比正确的多得多，竟可以说是不成比例。这是因为表达一个意思，正确的格式屈指可数，而错误可以“百出”。比如说，一般的句子都有主语，主语都和谓语配合，这是几句话就能说完，几个例子就能证明的，可是在这上面出毛病的很多，就不能不多举些例子。但是这样一来，很容易使初学的人畏首畏尾，提起笔来不敢写下去。（再版4页）

作者在《再版前言》里说得更清楚：

《语法修辞讲话》1951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二年出版单行本。在当时，在初学写作者中间普及语法修辞常识，减少遣词造句方面的毛病，这本书起过一定的作用。同时，它的缺点也逐渐被认识出来，因此，1954年



以后就没有再印了。

这本书的缺点有“过”与“不及”两方面。“过”是说这里边有些论断过于拘泥，对读者施加不必要的限制。“不及”又有两点：一，只讲用词和造句，篇章段落完全没有触及；二，只从消极方面讲，如何如何不好，没有从积极方面讲，如何如何才好。这样见小不见大，见反不见正，很容易把读者引向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路上去，然而大家知道，这样写文章是不可能写好的。

这本书停止重印之后，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不止一次向我们建议修改再版。我们终于没有动手修改，是因为经过认真考虑，认识到这不是小修小改可了，需要大修大改，最好是另起炉灶，重写一本，而我们两个当时都没有条件做这项工作。我们说，等等看吧，也许不久就有更好的来代替。一等就是二十多年。语法修辞、作文指导之类的书出了好些，也都各有优点，各有用处，但是可以完全代替《语法修辞讲话》的好像还没有。于是出版社又来商量，说是很多读者要求重印。我们想，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书讲写文章的道理，从正面讲，从大处讲，那么，作为跟这些书相配合，把《语法修辞讲话》稍稍修改，重新出版，也许不至于再产生当初曾经有过的副作用吧。这样，就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议。（1~2页）

作者在初版的引言里就说过，为句子是不是有病定一个评判的标准是很困难的。大概是1993年底，吕叔湘先生接受李行健采访的时候，又透露出一些他当初的为难：“我觉得这事不太好办。如果要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文章，那又讲什么呢？报刊上登载的文章中什么算语病？也没有个明确的范围，很难说死，但乔木同志又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东西。”（李行健《〈语法修辞讲话〉写作的前前后后——访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语文世界》1994年第2期）



一位大语言学家对自己著作的功过都会有中肯的评价，而且总是尊重社会的效益，并且善于超越自我。我们评定这些著作的历史影响，特别要尊重作者的意见。胡乔木 1955 年起关于语言规范观也有很大改变。

1984 年我在中国语文编辑部，我们刊登语文评论一类的稿子，想多发一些谈好的，没有做到。1984 年编辑出版《词语评改五百例》（语文出版社），一共一百多篇。后记里说：“大多数是评改语病的”，“少数几篇是谈正面用例，分析了某些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分析好的有顾必的《合流式短语》、慎言的《重复得好》、都是吕叔湘先生的。吕叔湘先生也重视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不太重视正面用例，可能跟社会许多方面的认识有关。例如 1981 年 6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家都来讲究语言的文明健康》，片面地强调：“我们所说的规范化，指的是纠正那些不正确的、混乱的读音和字形，改正那些文理不通、逻辑混乱和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1989 年我在《语文建设》第 6 期发表《留心各种语言现象》，进一步分析了“留心各种新鲜用法”的困难：

《词语评改五百例》“后记”说：“少数几篇是谈正面用例，分析了某些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当时，我们很希望多得到一些谈正面用例的稿子，但是未能如愿。留心正面用例——各种新鲜的用法，似乎更要费神：一要知道过去大体的用法，才能知道这些可能是新的用法；二要知道这些新用法是规范的，是好的，而不是生造的；三是新用法往往是刚冒出来的，用得少，人们研究得少，要分析出个道道来也就困难一些。不过，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新用法先记下来，至于研究，有的可以暂时不论，有的可以先少评几句。

在这前后，我陆续发表了有关的札记《说“一面应答”》《人称



的他化、类化和个化》《修地球》《问答链》《三团糟》《长得跟教育似的》《仿句》，都主要是分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后来我集中了101篇，出版了一个集子《留心各种语言现象》（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在这方面还有些发展的是我、龚千炎、季恒铨、刘一玲编的《广告、标语、招贴……用语评析400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我们约稿的时候说：“我们最欢迎分析新的语言现象，在语言学上有些说道的，还有是评述用得好的……”关于新的或者好的比较多了，一共一百四十几篇里占了大约有近三十篇，头一篇就是朱泳燊的《一则巧妙的广告》。此外还有徐菊秀的《“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孔令达的《一则令人放心的广告》，王铁琨的《醒目、简明的史克广告》，蔡健的《广告口号情感性的表达法》，徐国友的《这则电视广告预告好》，彭嘉强的《商品换名的广告艺术》，周洪波的《OK, CAMBRA !》，蔡健的《排列巧妙 迭出新意》，丁崇明的《角度新颖 平中见奇》，凌云的《语词直解 妙趣横生》，蔡健的《广告词评选中的广告词》，马彪的《一则独具匠心的广告》，周洪波的《电报？还是广告？》，蔡健的《“绝顶”广告口号》，凌云的《这样的标语多来点》，洪舒的《一条宣传口号的“演变”》，董德的《“敬告”用得好！》，于根元的《请尝一尝黄桥烧饼》，苏向红的《夏日的“冰天雪地”》，沈跃新的《晶晶亮，透心凉》，洪舒的《有这样一间橱窗》，郭龙生的《我愿买一台康巴丝石英钟》，龙万火的《“为您留下昨日的风采”的启迪》，徐国珍的《从“娃哈哈”谈起》，荣晶的《美的风景美的语言》，桑海宁的《抛开都市生活的烦嚣……》，周洪波的《“请把票准备好，验票进站……”》。

有关的理论进一步探讨方面，我还在1999年2月23日《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消极规范”和“积极规范”》。文章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现代汉语规范工作有一种主要是“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的缺点”的



“匡谬正俗”。前些年，我们提出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我们把前一种规范叫做“消极规范”，把后一种规范叫做“积极规范”，我们主张两种工作相结合。

郭沫若在 1955 年 10 月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说：“……要根据语言发展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就要研究语言的历史变化和趋向，要研究语言的系统性。有了分歧，主要的是看哪一种交际起来更好。不好和马马虎虎的，它的产生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但不能因此都认为是好的。因此要“匡谬正俗”。在全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水平不怎么高的时候，尤其是社会混乱造成语言文字使用混乱之后，“匡谬正俗”尤其重要。这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消极规范主要看到了语言使用负面的部分，其实语言使用中还有许多新的好的部分。消极规范有时候因为规范者的根据有问题有误判的情况。……近 10 年来出现了不少新的用法，近来很多语言学者肯定了这类用法……，这是很好也是很重要的现象。这说明了我们的语言生活更活跃了，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语言里还有许多宝贵的资源可以开发，我们重视了人的重要本能——创造。这说明我们的语言学者更具有辩证的观点了，对规范的认识更全面了。……

今天看来，上面引的郭沫若的话需要作些补充，就是“使我们的社会语言生活健康丰富”。这是我们语言规范工作的目的和检验标准。我们说“规范就是服务”，就是为我们的社会语言生活健康丰富服务。这需要我们的语言学者进一步向人民群众学习，帮助人民群众匡谬正俗，发现



和介绍人民群众中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水平，同人民群众一起提高我们全民族的语言文字水平，使我们的社会语言生活健康丰富。（又见于根元《语言应用论集》105～107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2003年9月26日我又同渤海大学中文系学生讨论“及时发现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其中进一步讨论到它的意义：

（1）作为规范工作来说，它是积极规范，更及时。带来的是我们对语言规范标准和语言构成的认识。

（2）作为规范工作来说是强调服务观，强调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带来的是语言表述能力“功力、思维、情趣”三要素的分化。

（3）作为规范工作来说是认识视角的改变。带来的是基本估价的公正和重在建设。还是审美观和世界观的改变。有利于语言学者的谦虚和提高。

（4）作为规范工作来说有利于语言生活的丰富、活跃。带来的是语言学者进一步重视语感和论感的相互促进。语言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是问题，也是资源和财富。两个方面都要看到。关键是人和水要和谐。人和水不和谐了，水就要出问题了，要从人的方面检查。以为人定胜天，继续乱来，问题更大。语言也是如此。

那次讨论里还谈到：

（1）比较新的好的语言事实里，比较多地蕴含着关于语言的新的道理。

（2）不发展是最大的不规范。汉语史经常讨论某种语言现象的起源，可见得各种现象不是打开头就都有的。“我是学生”的“是字句”，“作为学生的我”的“欧化句”都不是起初就有的。我们还要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几个凡是，进一步开发语言资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非常重要。历史上语言和语言学大发展的时期都是思想活跃的时期。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是个重要时期。早期白话是那个时候萌芽的，小说也是。那个时候思想多种多样，还有



外来影响，外来词也特别多。很多文化人不抱残守缺。五四时期也是如此。如果语言和语言学不怎么发展，说明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不够。在语言和语言学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努力开发语言资源，不搞和不信几个凡是。中国的语言资源很丰富，开发得很不够。不要过早地说哪些哪些是汉语里没有的不许用的。特别是我们汉语形成白话和建立语法学的年头还很短，我们对现代汉语许多方面的事实还不够清楚。

(3) 创新往往在语言活跃的部分。新时期文学作品语言里的创新也比较多。

1996年到199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个“文学新语”栏目，我应约发表了《叙述者跳出来说话》（1996年6月17日）、《快节奏》（1996年7月15日）、《相声入小说》（1996年11月23日）、《意识流》（1997年4月19日）。还在别的栏目发表了《浪漫的和声》（1997年2月25日）。我后来整理成《新时期文学作品语言的发展》，收录在杨建波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里。

新时期文学作品语言的新发展主要是快节奏、意识流、叙述者跳出来说话和多种样式语言的融入。

（一）快节奏

新时期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了，小说要用相应的语言手段反映这种快节奏。

常见的是采用话剧的方法表现人物的对话，在读者不会误解的情况下不用“张三说，李四听了回答说”之类。例如：

在父亲的背上，看着父亲破天荒，第一次如此大方地用十元钱买鱼，王爱北京的心就鼓槌一样通通通地敲打父亲的脊梁。

我们今天要吃鱼呀爸？

嗯。



爸你会做鱼呀？可是以前你怎么一次也不做呀？

嗯。

好大的一条鱼啊，鱼是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呀爸？

嗯

爸其实我早就会写信了。

嗯。

我可以把信写得更长更多。

嗯。（白连春《一幅关于北京的素描》，《当代》2003年第2期119页）

还有用多种排比甚至大排比表示快节奏，如王蒙《深的湖》（《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写一群大学生骑车出游：

和解，嘻嘻哈哈。改唱《乌苏里船歌》和“那正月里开的是海棠花……”

新华书店建筑工地，脚手架、混凝搅拌机和塔式起重机。……

一路的说笑歌唱，眼前掠过的景物，随之产生的感想都随自行车的前进富有节奏感。

谌容中篇《走投无路》里的一段略有变化的排比，把“他”的视线快速转移和“他”看到的能动的景物几种速度的同时变动结合在一起了，而且还有各种变动的声响：

猛地睁开眼来，他站在大街上。

高楼，矮房，铁门，栏杆。大卡车，自行车，平板车，三轮，摩托。皇冠，奔驰，超豪华，大上海。男人，女人，老头，小孩。穿西服的，着牛仔裤的，戴大沿帽的。交警手持指挥棒。红灯，绿灯，黄灯。人行道，电线杆，大喇叭。（《1986中篇小说选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滔滔不绝的排比还使他们小说的语言具有一种奔腾不息的气势。

（二）意识流

我们想事情，有时候并不是按照某种逻辑顺序想下来的。有时候浮想联翩，忽东忽西，忽近忽远，忽清楚忽模糊，忽断忽连。尤其是独自想心思的时候、似睡非睡的时候、神志不很清醒的时候，下意识流来流去，时空跨度大，具有跳跃性。表现这种意识的流动，相应地要以这种有内在联系的流动为顺序来叙述，表现人物，表现气氛，有时候是用这种手法来交代情节。语言也随着时而比较连贯时而大跳跃。例如王蒙《蝴蝶》（《夜的眼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85）里写张思远的梦的一段：

放羊娃和地主崽子的打架。穿棉袍的乡村教师的垂青。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队伍的到来。枪林弹雨，第一枚手榴弹没有拉弦就扔了出去。红旗下举手宣誓。他不怕牺牲，他渴望献身，他深信迈过这一步便是幸福的红枣降落到每一个家庭的餐盘里。

（三）叙述者跳出来说话

小说叙述者的身份是隐含着的，不能跳出来直接同人物和读者说话，这许多年来似乎是个天条。新时期的小说在突破许多程式的时候，也突破了这一条。陈冲《会计今年四十七》里有一段是叙述者跳出来向读者、小说外的导演说话了，实际上是多了一种描写的方法，而且比较活泼诙谐：

现在我要把舞台转到财务科了。考虑到这篇小说有可能被改编拍成电视剧，我得提前向导演进一点忠告：您千万不要在屏幕上一出现财务科的场景时，就让拟音配上一片劈里啪啦的算盘声。那您就外行了！（《小说界》1984年第5期9页）

还如下面这类的写法我们在话本里似乎是见到过的：



然而，这篇小说要讲的故事，却是从那天下午才开始的。（白连春《一幅关于北京的素描》，《当代》2003年第2期113页）

这个天条的突破，试验还是比较成功的。带来的则是突破更多程式的信心和试验。叙述者身份的时隐时现，在写作、阅读、研究的时候，除了传统说的叙述语言、人物语言之外，我们多了一个注意的方面——叙述者跳出来跟人物、读者说的话：叙述者语言。我在散文《性本善》《你好》里也跟看的或者听的人说话。

（四）多种样式语言的融入

文艺作品样式的相互吸取在新时期更为突出。例如相声里吸取弹唱舞蹈等，有的相声跟小品比较接近。有人感叹地说相声不成其为相声了。我们认为，吸取是趋势，问题是如何吸取，吸取之后它还是相声。其实，别的文艺样式也吸取了相声的样式，例如表现风趣幽默内容的短篇小说、小小说。邢可的小小说《游戏》（《北京文学》1995年第11期）是说想帮助人而不易为人理解和接受的，第二段是这样写的：

A问B：“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B问：“打啥赌？”
A说：“很简单，你在一天之内，能为三个人做三件好事而不被拒绝，晚上我请你吃一顿。”

B眼睛一亮问：“真的？”A很坚定地答应：“真的。”
B说：“那好，我现在就开始。”A说“你先别慌，我还有要求。”B问：“还有啥要求？”A说：“一，你所做的三件好事，有两件必须是对40岁以下的人，男女不限。”B忙说：“中，没问题。”A又说：“二，你如果输了，晚上这一顿你得讨腰包。”B说：“中。”

A说：“现在可以开始了。”B说：“你就等着请客吧。”A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把“眼睛一亮、很坚定地”和最后一句去掉，就是对口相声的



一段了。逗哏 A 主动，话多，捧哏 B 被动，话少，都上口，还比较风趣，含有包袱。因为有了“眼睛一亮”等，它还是小说样式。或许本来生活里说故事有的就用这种样式，相声是从说故事吸取过去的，而说故事是我国小说的源头，现在的相声入小说已经是一次回归了。叙述者身份的时隐时现，或许也是小说对说故事的某种程度的回归。

还有广告语言里有许多新的好的语言现象。

与此有关的是我们在语言教学和其他许多方面要重视语言创新。与着力研究语言创新和语言创新能力。赵俐的《语言宣言——我们关于语言的认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里有很多研究。她 2005 年 6 月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语言创新和语言创新能力研究》有更多的研究，她不久会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

这里顺便谈一下“突破自己”。

人的眼睛长在前面，看前面方便。要看后面，就要转动脖子，不如看前面方便。大概人主要是看前面，久而久之，在生理构造上积淀了下来。人要继承，继承是为了创新，温故是为了知新。创新才是继承好了的标志。不创新谈什么继承？《光明日报》2001 年 3 月 21 日“电脑网络周刊”头版头条的是“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专家学者研讨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我受到启发说：“语言不发展是最大的不规范。”

继承都不应该是照搬。时空点不同了，情况不同了，继承都是借鉴，都有突破。突破里最难的是突破自己，因为有个既得利益，有个自己的心血，有自己付出的青春。

这里有两个问题。为什么突破别人就容易一些？那是没有设身处地，没有把别人当自己，缺少历史感和责任感。为什么突破自己就比较难？缺少历史的发展观，自己也是不善于经常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自己不怎么进步，还不许别人进步，把别人的进步怀疑成对自己如何如何，多疑。



更不好是计划经济的饭吃多了，好话听多了，朕即国家。有时候也不允许突破别人，那是因为那个人跟自己有某种联系，或者怕殃及自身。

中介观念很重要。一切都在过程中，都有旧有新，有对有错，自己在运动的过程中。有了这个观念，就会正确认识别人和自己。正确认识自己，是正确认识别人和认识所有的结果及焦点。

三、关于站在应用语言学的前沿

问题是需要解决还没有比较好解决的题目。需要解决问题是学术发展的动力。进一步解决问题包括进一步梳理问题是进一步发展学术。

前沿问题是问题里居于前沿地位的，是需要迫切解决的、许多人关注和热烈讨论而又争论不休的、难度大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在引导语言生活发展和学术发展方面的作用也大。前沿问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观念问题，进一步解决，有利于其他许多问题的解决。

问题一般是越来越深入的，可以进一步解决，但是不能完全解决，往往还因为出现新的情况而出现新的问题。新问题或者说也是原来问题的深入。问题层出不穷，问题越来越深入，前沿问题也是动态变化的。

所以，我们这门课尤其不能稳定。讨论的问题有的可能是老问题，例如规范问题，但是内容跟以前不完全相同。讨论的材料也常常有些变化。

我们这门课讨论了“学科建设的评价、学科建设的任务、队伍建设、应用语言学理论的提出、交际理论、应用语言学的其他基本理论、语言观的大讨论、关于‘纯洁语言’、关于新词新语的讨论、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关于语言规范的讨论、关于语言交际能力、关于方法和方法论、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上了这门课，具体领域



的问题内容上不能管好多年。我们着重解决的是观念问题，这方面大概可以管一段时间。还有，方法上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顺乎自然，辩证法和学术上民主讨论，这是长期会起作用的。

关于比较具体的大讨论，今后还会不断出现和深入，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许多是今后问题的前身，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后的问题。

但是，不能吃老本。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今天学的这些东西越来越不够用，或者有的会不管用，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关注和讨论前沿问题。

现在应用语言学发展很快，往往是一年不留心就会跟不上趟，甚至跟人家缺少共同语言，甚至丢掉了发言权。我们在不少会议上会听到有些发言太陈旧，许多人甚至不愿意跟他们讨论，因为层次的差距太大，他们有的还不怎么谦虚，胆子又很大，我们只是建议他们去读几篇十几年前就发表的概说性的文章。关于前沿问题的认识，不进则退，而且退得很厉害。建议大家密切关注。

我讲这门课也是动态发展的，尤其是我的发言是动态发展的。针对性是动态发展的，而且还针对新博士生这些前沿人群的问题；内容也是动态发展的。我的很多新内容是在这样的课上冒出来的，例如“名”加“着”、语言预测新途径、进一步解放语言也是进一步解放人自身、语言人文性的进一步认识、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的进一步认识、书面语跟口语的联系与区别、关于媒体语言的一些思考、语言交融能力是重要的能力。你们以后有时间、有兴趣，不妨还来听听这门课。

现在这门课可以说是速成。有人说是恶补。不是恶补，是速成。

这门课基本上是完整的、成套的、系统的。有一个好处，是大家大体上对主要的前沿问题都接触到了。在大面上有个认识，这个起点还是相当高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的认识是一通百通和百通一通的结合，我们常常是需要百通一通的，从一粒沙子认识世界不是



很容易的，还要认识了许多别的事物才能认识沙子，再进一步才认识了一些从一粒沙子可以看世界的道理和方法。现在是把关联的问题摆出来，又认识一下渗透在各种问题里的实质性的内容及其不同的表现。

速成也有不利的地方。

一是可能丢得快。

二是比较粗。有些问题现在争论不很激烈，不见得不重要，例如语言规划问题里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课上把这些问题都讨论到。如果这门课从现在的每周两课时增加到8课时，就会讨论到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讨论到，但是有关的问题在有关的领域里是很前沿的问题。还有，将会热烈讨论的问题，我们也难以讨论。例如发展中国的语言传播学说的的问题。还有暨南大学2004年12月25日同国家语委语信司举行的应用语言学高级论坛讨论新形势下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汉语要努力成为强势语言，怎么办？我认为要谦虚，要向人家学习，注意语言交融，要友好，切忌霸道。霸道这种意识在我们许多人脑子里不是没有的。理论上要注意“抵制强势语言侵略”的提法，我们汉语不是也要努力成为强势语言了吗？还有，要进一步正确对待我们自己的方言和民族语言，普通话要注意加强吸取方言的营养。还有一个语言规范的问题，关于“华语、汉语、中文、中国语”的提法和标准，标准可能不会多，具体要求要宽容。今后会带来语言主体化和多样化复杂的局面，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做好。在观念上尽量做好准备。还有一个教法问题，到外国去教华人华文，跟教外国人汉语不同，跟在国内教中国人的母语汉语也不同，有方法问题，有理论和观念问题。还有，含金量和总的水平体现在教材、教法、教师、工具书、读物方面，更体现在我们自己的语言生活的健康活跃和语言学术的高度上。我们课上已经讨论的问题，也几乎还是主干，有同学介绍了不少论著，也粗。有的虽然介绍了，恐怕自己也没有好好读。



三是看的往往是第二手的资料，自己几乎没有参加实际的前沿问题大讨论，缺少实际体会，缺少自己的新见解，因此容易人云亦云，容易说新套话，容易在调整的过程中留有混乱。基础不很牢靠，容易丢得快。所以，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一定要进一步提高。

语言的发展要找处在语言前沿的人来显示。处在语言前沿的人有灵敏的语感，语言使用比较新鲜、活跃。语言学思想的发展要找处在语言学思想前沿的人来显示，处在语言学前沿的人有比较灵敏的论感，这些人容易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

语言学的基本方法是选优。优了才容易选优，越是会选优越是更优。要从很多似乎是不相容的对立面里吸取必须的营养。《周易精义》里谈到坎是水，离是火。八卦里坎是上下两道虚线中间一道实线，是阴包阳，其中有真阳；离是上下两道实线中间一道虚线，是阳包阴，其中有真阴。道家说要取坎补离，要水火交融，心肾和合。

人体是这样，水和火缺一不可。世界也是这样，我们要这样认识和对待世界。解读宁肯的网络长篇小说《蒙面之城》（《当代》2001年第1、2期），特别要注意下面这一段：

雪终于下来了。哪里是雪，简直像冰雹。不过要真是冰雹马格就完了。是雪粒子，黄豆大小，马格伸手就接了一捧。他飞跑，往有阳光的地方跑，穿透雪雾仍能看到远处依稀的阳光，人逐阳光而行，天性使然。总不能坐以待毙，让雪埋了。巨大的恐惧使马格现出野兽的神情。令他惊心的是阳光竟然越跑越暗，以致他突然把阳光跑没了！直到这时他才突然醒悟，他跑的方向原来也是云的方向。他幡然回跑——究竟什么使他具有如此的直觉本领，多少年后他都无法搞清——他对了，不久他就发现亮度有了变化，虽然眼前仍然朦胧如大海之底。光线越来越亮，就要见到天日。马格干脆停下了脚步，气喘吁吁，伫立于急雪



之中。他不用再跑了，因为他已亲眼看到如注的阳光正向
他射来，蓦地一道骄阳斜刺里切入雪雾，仿佛腰斩了大
雪。马格一半在雪中，一半在阳光中。（第 1 期 131～132
页）

类似的但是有些前进的描写是马格在 S 城海边的夜泳：

动荡。漂泊。无尽头地向黑暗跋涉，就像他的一生。
他没有任何恐惧。他挑战黑暗，忘记了时间。他几乎是在
向月亮游去。一阵巨浪打来，他突然失去了月亮，喝了好
几口海水，这是预感的灭顶之灾吗？也就在这一刻，他开
始发力。当他再次看到月亮，他的心释然了。他还是要回
去的，他想。（第 2 期 121 页）

马格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几乎有了新的冲动，某种
奇妙深邃的音乐动机击中了他：相爱，穿越黑暗，进入月
光……（第 2 期 154 页）

这大概是作者给我们解读马格、这部小说以及这部小说的语
言的主要的钥匙。马格追求真诚的“相爱”，他身边本来就有黑暗，
他要了解黑暗，记得黑暗，“穿越黑暗”，“进入月光”。他“穿越黑
暗”时的恐惧感也逐渐消失。小说的语言因此也丰富和作有策略的
探寻。这样的写法还有：

（马格）……他看到了布达拉宫……白色宫墙上的黑
色排窗深邃如强光中的黑键。……除了宫殿寺院展示出絢
红色，整个城市是白色的，高音般的白。黑色雕窗是神秘
的低音部分。（第 1 期 128 页）

还有，马格看了寺庙的前面还要看看后面，“他喜欢看一些事
物的背部。寺院背部庞大而凌乱，像一支散乱的军队。”（第 1 期
129 页）小说的主人公马格从 B 城到阴阳界到西藏到 S 城，在 S 城
又住在地下室。

作者还借恨马格的成岩和喜欢马格的朋友杜枫从几乎相反的两



个方面评价了马格：

（成岩）一个星期来他的心颇不平静，马格出现在红方酒店让他意外，许多天他在考虑一个问题：他怎么总也摆脱不掉这个人呢？这个人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让他这么狼狈？他到底有什么？他为什么一见到这个人心就开始发抖，或者发霉？如果说他仅仅是诗人时内心是虚弱的，那么他现在有钱了，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为什么依然感到虚弱？（第2期151页）

马格演唱了两首新写的歌《预感》和《暗室中的太阳》，杜枫叹惜马格惊人的才华，感叹他那种神秘的穿透黑夜的人性的光芒，并不复杂，几乎没有技巧，非常单纯，但又是神奇的。这是个灵魂的歌手，充满记忆、黑暗和阳光，他注定会横空出世。没有什么能难得住他，天才从来不会就范现实的任何秩序，任何价值取向对他都无效。（第2期153页）

马格胜过成岩的就是：“相爱，穿越黑暗，进入月光……”杜枫是S城音乐界的大腕，他上面的评价，或许也是作者这部小说语言的美学追求：“并不复杂，几乎没有技巧，非常单纯，但又是神奇的。”

世界给了我们丰富的方面，这都是必要的，我们要这样认识和对待世界，学术上更是这样，所以学术上不要求大一统，不要追求只有某一个方面而没有另外一个方面。学术上要想发展自己的见解，要靠自己的建设，而绝对不是压对方。不同意见发展了，另外一种意见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学术上大一统和压对方对学术发展是有害的。“天才从来不会就范现实的任何秩序，任何价值取向对他都无效。”（第2期153页）那是杜枫的认识，杜枫到不了马格的层次，他不能正确认识马格，他说的“现实的任何秩序，任何价值取向”是不妥的。天才当然遵循某种秩序和价值取向。

关于比较具体的方法。



一是留心新的语言现象和新的语言学思想。新的反映全息更充分。

二是跟高明的人交谈。读书也是如此。交谈更重要。前沿的内容在他们的头脑里。这是把他人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

三是高效率。人家不会把真谛托付或者传授给吊儿郎当的人。武术界有句话叫低功夫是徒弟找师父，高功夫是师父找徒弟。师父有高功夫，是希望传下去的，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宁可失传不可滥传。一定选好了人传。所以录取博士那么难。所找的人要有悟性，一说就明白了，不要三番五次叮嘱，更不能三番五次叮嘱还不明白还不听。不能糊弄老师。能被糊弄的老师一定是糊涂的老师，一定是还不如你的老师，你来辛辛苦苦向他求学干什么？如果是高明的老师，你糊弄不了，你干吗糊弄？

悟性还有一条，从基本的学起、做起。不要以为当硕士的时候还不错，学博士就自然好。学博士是另外一个层次，有的以前不错的东西在新的层次上可能是很错的，这是一个普遍原理。在某一个层次上这么说，有它的道理和需要，到了新的层次要告诉你原先那个说法有不妥的地方，那个时候跟你说现在的话你不懂，因为你不在现在这个层次。事物和认识的发展里不是还有个否定之否定吗。我们的说法和认识一定不是一贯正确的。不是我比你们的硕士生导师高明，你们的硕士生导师今天也会这样告诉你们的。还有。你们读硕士的时候，即使有人准备了读博士的，那时候也很难保证你们一定会读博士，培养计划还是培养硕士的计划。现在读博士了，不是在硕士的楼顶上再加高几层楼。当初培养硕士的地基也不够用了，还要动地基。有的是跨学科的，不少同学当初没有怎么接触应用语言学，现在还有补打地基的任务。我们学新的东西要放下架子，从基本的学起。我跟学生说过，人家要你从最基本的学起、做起，例如编辑要你从收发、初审学起、做起，那很可能是要重用你了。到你当了领导，你要最基本的也做得好。你要当一个大的课题



或者一个学科的带头人，方方面面你都要擅长。另外，衡量一个好的领导，还有一个方面是要善于当被领导。善于当被领导的人才可能当好领导。当了领导的人要同时当好被领导，这是指的谦虚、学习、吸取营养。从基本的学起、做起，就是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做大学问就得这样。这是按规律办事。换句话说，你自己条件不够，使劲求师，跟老师套近乎，得到的一定是低层次的学问。你自己条件够了，有悟性，高效率，不急于求成，就可能得到高层次的学问。有人会问：你给我们上大课，不是说的一样的话吗？同样的话，听明白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课下呢。大课上能说多少高层次的学问？

高效率本身就是一个层次。不能高效率，一定得不到高层次的学问。一是别人不会告诉你，二是别人无意之中说了你也听不懂。

前沿不是上上课就学到的。前沿是当前正在热烈争论的问题，我们要投身争论。不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是要积极投入。我们应该是当事人，是参加者，是建设者。我们投身前沿问题的争论才可能处在学术的前沿。

学术都是在讨论、争论中发展的。解决问题是发展学术的动力，问题一定众说纷纭，前沿问题一定争论很热烈。我们不要自顾自搞一个研究的时间表。我们不关注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社会也没有必要关注我们的学术和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学术和我们尽到责任，这就是因和果的关系。学术是为社会做了贡献而为社会所认可的，这是多劳多得，是合理的。一个人也是这样。当然，我们不完全是打遭遇战，不完全是来什么前沿问题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各人还有分工，问题有大小，个人能力也有大小。

还有，不是就事论事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而是主动地深入解决背后的几个大的观念问题，表面的前沿具体问题是根本问题的表现，我们只是把这些具体问题作为例证和解决比较根本性问题的切入点。



队伍要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建设。要尽可能到前沿去发表意见。还有，理论要作为修养，要体现在实践当中。

我们往往希望做学问快一些、成绩大一些，希望有捷径。捷径就是自己没有走过、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也是没有被证明一定成功的路。一定是没有什么同伴的、不好走的路，更准确地说不是路。走在这样的地方会冷清、没有把握。没有这样的情况 and 感觉，就不是捷径。这就是探索。前沿问题是没有解决的麻烦的问题，你怎么说都不会很快解决问题而且都会得罪人。想要做学问快一些、成绩大一些，一个捷径就是研究前沿问题。要有本领，要有勇气，要有献身事业的精神。

其实，我们也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上的探索者多的是，我们也不寂寞。大的方面，前人探索得很多了。

很奇怪，我们有的人年纪轻轻，既要探索又要保险，什么好事都要，这样不公平。老天也不答应。我们有人会问，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怎么说？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说，很在乎别人说好说不好，当然主要是在乎别人说不好。我们往往希望做之前就上了保险，很多人就给你掌声和鲜花，甚至奖状都给你准备好了。这还叫探索吗？这样的好事还轮到你来做什么？前沿问题谁都没有解决，谁事先给你评判？这是连什么叫科学研究、什么叫前沿问题、什么叫探索都还不清楚。

所以我们说，带博士生，主要不是解决知识问题、方法问题，主要是解决学风问题。不是说有的有学风问题有的没有学风问题，而是程度不同的都有，其中就有对待前沿问题的态度和实际行动。

我们鼓励探索，我们希望在探索中吸取教训，但是不因为批评探索中的失误而批评探索本身。探索本身比探索中的失误要可贵得多。只有探索才可能成功，才可能引导学术和社会发展。

探索是创新，是鲜活，是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生活。



附录一

关于读书

——2004年9月2日在2003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语言学重要著作研究”第一课上的讲课和11月4日最后一堂课上的总结发言

我们这学期要一起读几本语言学的重要著作，研究几本语言学的重要著作。我们先讨论一下关于读书的一些问题。

读书的一个目的是“运用他人的智慧”。苏州教育学院教授黄岳洲在他的第二本文集《语言文学与教学新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里的《教师进修经验谈》里说：“真正的强者不但会运用自己的智慧，更要会运用他人的智慧，从而发挥更大的光和热，这就是交益友。”（601页）这里实际上说到了强者的一个重要条件。不向别人学习则强不起来，不向别人学习还以为自己强，那是霸。“更要会运用他人的智慧”这个经验，黄岳州也是从古人、师友那里学来的。他说，叶圣陶先生跟他说过：“以能者为师友特别重要”（同上）。叶圣陶先生自己就跟吕叔湘、朱自清、陈望道、夏丏尊诸先生友好合作，撰写了许多传世之作。大学者都不是孤立的，他都有许多学术上的老师和朋友。



黄岳洲，1928年生，语言学家、古典文学和语文教学专家。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的《语言文学与教学新论》里，就包括“音韵、文字、训诂之部”“词汇、方言、词典之部”“语法之部”“修辞之部”“话语、信息之部”“综合语言之部”“古典文学理论和古典文学鉴赏之部”“语体和语文教学之部”“语文教学之部”。黄岳洲没有读过小学，初中只读过一年，高中只读了一个月，大专也只旁听了一年。他的成就主要来自广泛地向师友学习。

他少年时期，苏北正是战火连天，他断断续续读了一点书。1945年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1951年前后，被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那时候，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校的教授相互兼课，别的单位的著名学者也常常到北京师范大学兼课。黄岳洲凭着勇气和毅力，课外还拜访了许多专家，以求治学之道。那时候，著名专家也比较容易拜访到。他先后拜访了郭沫若、黎锦熙、陆宗达、罗常培、艾青、田间等56位。黄岳洲满载而归，回江南准备把他访问的56位专家论治学的经验加上古代学者的治学经验汇集成册出版。不料来了一场风雨，这份宝贵的资料也被人强行拿走。80年代中期，他再次收集专家治学经验，也是56位。有苏步青、王力、冯友兰、俞平伯、姚雪垠、施蛰存、臧克家、罗竹风、霍松林、秦牧、徐中玉、袁静、曹余章、张中行、金克木、张寿康、碧野、敢峰、竹林、吕叔湘、段力佩、草婴、赵家璧等。他同穆央、陈振编成《怎样读书最有效》，语文出版社1990年出版，很受欢迎。黄岳洲再次收集专家的治学经验，是继续向师友学习。他说：“以我个人来说，几十年来，如果没有党的母亲般的关怀，没有几百上千的良师益友的或批评，或鼓励，或指导，或反对，或介绍资料，或引进信息，或惠赠妙法，或提供机会，治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同上）他在上面一篇文章和同一本集子里的《介绍拙编〈怎样读书最有效〉》说了有关的情况。

《怎样读书最有效》一书里也介绍了别人关于读书价值的论述。



主要是曾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的耿峰的《话说博览群书》里概括的六点：“第一，开阔视野；第二，了解各种信息；第三，学到各种知识；第四，增进智慧；第五，了解各种思想观点；第六，丰富文化、精神生活。”（113页）碧野在《思想的翅膀，感情的花蕾》里更是激情地说：“爱读书，是一种美德。”（110页）

接下来就有相关联的两个问题，就是读什么书和怎么读。

其中《吕叔湘闲话读书人》里说了三种书。一类是“有关自己专业的书”。“这类书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是一定得读的。它们是一个专业人员的立身之本。”第二类是“与专业有关的其他门类的书”。第三类是“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必读之书”。（都见121页）

读的方法无非是精读和泛读。大体说来，基本的，理论性强的，很有见解的，要精读；其他的杂书、闲书可以泛读。有的需要精读的书，起初可以先泛读。还有，高兴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可以精读。

研究一个问题，要了解现状，一个是事实和问题的现状，一个是研究和解决现状。了解第二个现状，要读许多有关的书。基本的书和论文要精读。我们检查别人这方面的研究，也要了解这个现状。

我刚到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时候经常担任一审。拿到一篇稿子，判定能不能用，主要看它有没有新见。我要查有关的著述。主要靠论文索引，由近及远。王力在《谈谈怎样读书》里说：“要厚古薄今。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人的书，如果有好的，现代人已经研究，并加以总结和发挥了。我们念今人的书，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面了。”（同上5~6页）至今还没有大学者说过的，还没有人说清楚的，可能是这篇稿子的新见。我们不是由远及近的。有的是看新的概论性的书，如果概论里都说了，就不是那篇稿子的新见。书海茫茫，了解问题研究到哪一步了，不是没有办法的。连这个都不知



道，还搞什么研究？

我这样读了很多书和论文。我们这样的审稿意见其实都是读书札记。比一般的读书札记水平高，那是要用的，要很负责的。一篇一篇都要作为二审参考的。二审有不同意见还要到三甲手里的。稿子如果录用，有的还要到主编手里的，起初主编是丁声树，“文革”结束之后是吕叔湘。审稿单都要存档，这是重要的凭据。

陈建民给徐红燕主编的《语言学家的故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里写了一篇《吕叔湘教我读书》说：

1962 年之前，我已在《中国语文》发表了三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了，可吕叔湘先生看到我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决定 1963 年让我停下一年工作，系统而深入地读 20 部语言学专著和 100 篇论文，要求我每次读完都要写出详细的内容提要和自己的评述意见，说出文章好在哪里。还要我在读书中把随时引发出来的思考写出札记，在看看看报中发现有用的观点和材料养成立刻记卡片的习惯，而且要我定期把所积累的卡片拿出来捣鼓捣鼓，以发现写作的素材和灵感。（163 页）

那时侯我读到了陈建民的几十篇札记。八开的大稿纸，一页 600 字，一篇有三四页。陈建民 1935 年 3 月生，1962 年 27 岁，比我们很多博士生还年轻。一年里读 20 本专著、100 篇论文，还认真做出笔记，笔记估计有 30 万字。他不会全脱产读书写笔记，所里和研究室的许多活动都要参加的。

精读要做札记。很多大学问家说要做卡片，做批注，做札记。做札记是把生语料加工成熟语料，是梳理问题。梳理问题也是发展学术。不做札记，书基本上还是作者的。做了札记，许多部分可以说被自己吸收了。王力在上面那篇文章里说：“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说你没有好好看，你好好看，总会有些意见的。”“如果你作了笔记，又作了眉批，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



(7 页)

要了解一个领域里的情况，起先一定要这么读书。好比烧水，起先要用大火。烧到水开了，到了临界点了，日子就好过了，就不用大火了，用维持量就行了。再看有关的书，主要挑着看一些新见就可以了。但是还是得经常看。

不能跳过第一个阶段。没有经过第一个阶段，就拿起第二个阶段的做派，三下五除二做出判断，肯定出大错。

陈建民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

如何才能把书读进去呢？吕先生特别强调，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读到一半之后就应停下来，然后把本子合上想一想，要是我来写，接下去我该怎样写呢？想好了再把本子打开继续读下去。读完后再进行比较，想想谁的思路清楚，谁的推理合乎逻辑，谁使用的材料更说明问题。这样，对书或文章的内容就会加深理解，增强鉴赏能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163 页)

我们读书也要这样读。要想一想：他们有了贡献，凭的什么条件。他们有不足，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让我们来修改，怎么修改。

有两部书我读得很细。一部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那是在河南明港干校，林彪已经死了，运动也搞不下去了，但是还不让我们回北京。正好有时间读书。这部书我读了半个月。一本是王存臻、严春友的《宇宙全息统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994年春天，我读了半个月。这实在是一本好书，是一座富矿。我写了书评《语言的潜、显及其他》（《修辞文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发展了潜显理论，还进一步发展“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提出语言喷泉现象。

王力在上面那篇文章里还说：

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



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陷在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面，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行，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3页）

我读书很杂。语言学之外的书大概占了一大半。我也读过很多非经典的书，我觉得也没有被误导，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不信，我们的学校抓思想教育抓了几十年，现在孩子的觉悟还不如我们那时候。

我读的书的来源，小学的时候有个朋友摆书摊，我拿他书摊上的各种书来读。初中的时候同班同学任长宝在读一本很厚的外国翻译过来的《彭斯舅舅》，我说读过了借给我读。他说是在上海江苏路长宁区第二图书馆借的，他带我们去免费办了借书证，我从那里读了许多书，有许多新出的现代作家的选集。还有是借别人的书来看。初中的时候，新出了《三国演义》，别人在看，我说就借我两天。两天，别人同意了。我借来看，看得快极了。高中的时候，我父亲的朋友张先生看我和我姐姐要高考了，没有好一些的地方做功课，说可以到他们家去做。每天晚饭以后，我们到他家二层楼的前楼去做功课。他们家有个孩子叫大毛在读初中，大毛跟我们一起做功课，不懂的地方好问我们。张先生家有许多藏书，是他弟弟解放前读大学时候的藏书，鲁迅、郭沫若、卞之琳许多人的书，许多是一套一套的丛书，还有许多杂志。张先生让我随便看。书的主人不是上海名牌大学的，也不是搞文科的，藏书那么多，可见得那时候的大学生读书也不简单。我大学时候可读的书多了。南京大学好几个图书馆让我们借书，一次可以借好多本。我几天就去换一次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一次就说好多著作，现读哪来得及。不少著作我早读过了，上课前是读第二三遍了。有人说“没有书的人



读书”，很有道理。不过，后来我也有了许多藏书，我也是读了的，因为以前有了习惯。

读书还不仅仅是一般情况下的要杂。有人说某某大学问家就抱着一本书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况。还有的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许多人读了几遍《论语》甚至能背也不见得能治天下，有的人连自己还治不好。有的人一辈子几乎就抱着一个题目，本科论文是它，评教授还是它。有人说某某如果专攻历史不要文学什么的都搞成就会大得多。我看也不见得。我们有时候是一通百通，有时候是百通一通，两者都有个层次，通都不是一次性的。我们需要一通百通和百通一通相结合。过于强调一通百通、抱着一本书一个题目，可能是太迷信机械全息论了。

读书要读有读头的。艰涩的吓唬人的我一般不读。我们审到这样的稿子一般不用，因为学风、文风不好。

我为夏中华主编《语言学教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写的序里说：

还有，不少人一谈起理论，就同拒人千里之外、冷冰冰、莫测高深、枯燥无味挂起勾来。其实，理论具有实践的性质，还是一种修养，是通人性的。有大学生跟我说，他看到一些理论，太高深了，看不懂，他感到自卑。我说，一般的情况下，连这个专业的好的大学生字面上都看不懂，叫人看了不长精神却要自卑，那么，你别信它的，它至少不高明。我想，这样或许会长许多大学生的志气，会使故作高深的所谓理论缩小市场而改弦更张。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做的《反对党八股》列举了党八股的主要表现，指出了它们的危害：“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



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这是给党八股一次集中的曝光和批判，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写书一般有三个层次。低层次是内容浅表达也浅，中等层次是内容深表达也深。高层次是内容深表达浅。不要把高层次的表达浅同低层次的表达浅混淆起来，也不要将中层次的表达深同高层次的内容深混淆起来。从中层次到高层次是提高而不只是放下架子。等而下之的是内容浅而表达故作高深。

跟这个认识相关的是华南师大教授沈开木叫他的研究生读书要入木三分。中国书法好的入木三分，写得入木三分，我们读也要入木三分。沈开木说，首先要读懂字面上的意思，比较深的是读懂字面背后的针对性，更深的是领会作者写作的大的意图。我们写作也要入木三分。

读书入木三分，要领会作者的暗示，要掌握读解的钥匙。书里不同于一般的地方，例如情绪大变化的地方，故意含蓄的地方，似乎有点离奇的写法，说了两三遍的话，都要特别注意。

还有一个读书慢的问题。如果做别的事都慢，就要通盘改正。如果仅仅是读书慢，又不想改行，还想读书，就要针对这一点来改正。要找找原因。如果没有认识问题，那就练习得快一些。

我的体会，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要特别集中精力。我们快的人，也是花了劳动的，高度紧张的劳动，高度紧张到别人以为你很轻松似的。以为轻松也可以高效率，其实没有那回事。这还不是一时一事的事，要养成习惯。你可以试一试，你读一个小时是不



是很快，如果是这样，说明你是可以快的。你说再接下来就吃不消了，就累了，不想读了。其实我们也很累，不同的是还坚持读下去，而你不肯坚持读下去。办法还是有的，秦牧《谈谈读书方法》说：“尽可能发挥脑子各部分的功能，研习一种学科，疲劳了，就去从事另一方面的事情……”（42页）所以，我们往往是同时做几件事情。秦牧还说：“简朴的生活，有利于学习和工作。长于彼者拙于此，过分讲究生活，必然会剥夺学习和工作的时间。”（43页）我们读书困难的同学，有的是不是应酬多了一些？有的应酬恐怕还不是推脱不掉的，而是自找的。我们有时候可能对场面上的热闹过于感兴趣。

有的读书慢是安排不当造成的。例如。读书管读书，可以随手写批注，但是不用随读随抄写。精神好的时候读书，精神特别好的时候读理论性强的书。精神一般的时候抄资料和整理批注，有时候发现后来资料更好，前面的也可以不要了。有时候发现几个资料有关联，就要写上它们的关联。这是随读随抄做不到的。还有，抄资料不随手记出处，以后再找出处，白费了很多时间。还有抄的资料错字太多，没有及时核对，不能用，到要用的时候再找原文核对，也白费了很多时间。我们常常以为抄的资料将来不一定用的着，不及时核对。有的可能用不着，但是为什么不想着说不定哪个资料将来就用得着呢？这里是不是有点不严谨和急功近利的问题。

读书切忌被书束缚住了。顾颉刚在《怎样读书》里说：“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同上，16页）古人说过“开卷有益”，也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和“不唯书”。有人说识字是启蒙，也有人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有人说读经如何如何好，也有说人生艰难困苦起一经。“腹有诗书颜自华”，也不见得。我们江苏老家说小孩子读书是放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还有叫书呆子的，我们老家一带把傻子叫呆子。书呆子是因为读书而傻的。所以读书



有两个前途。黄岳洲前面的书稿没有了，但是他一再说郭沫若谈为学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黄岳州在《教师进修经验谈》里说：“我曾拜谒郭沫若先生，探求治学之道，郭先生说：‘为学之道，识见第一。’”（《语言文学与教学新论》596页），在《介绍拙编〈怎样读书最有效〉》里说：“郭沫若先生说：‘治学问的根本途径’就是观点。《史记》精于《汉书》，《史通》高乎《文史通义》。”（同上593页）。

读书，实际上是同写书的人交谈。切忌掉书袋。我们不少论文是语录汇编。有篇论文说某某斯基说的“说话要看对象”，好像不引某某斯基就不行了，人家就不信了，一引某某斯基说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引证病。中国古代叫掉书袋。我们要解决问题。某某斯基本人说过了不是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吗？你引一下就能很好解决问题了？也有很多人认识到“说话要看对象”，也不是因为听了某某斯基的话才认识到的。引某某人说过，只能是修辞手法和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前人研究到哪个阶段了，不能作为发展学说的重要论据。

札记不一定是关于一本书的，往往是就一本书联系别的书，有的就一个问题谈到好多书。

札记很有用。有的札记可以出集子。有的札记是亮点，犹如珠子、宝石，有机会了可以放在合适的地方用。例如我写了札记《为学、为道、为人》，后来用在《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的“后记”里，《论经典》用在论文《关于媒体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媒体语言大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里。

读书是很重要的，又是很初步的。时间、乔艳琳主编，崔永元、关秀玲、赵一工策划的《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里有一段崔永元说的：

后来不久，就见到著名作家麦天枢，我向他叙述自己



的苦恼，说自己过去有个很好的习惯，看看书、读读报，现在时间越来越少，尤其是静下来读书的时间。麦天枢说：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愣了，我觉得这句话没必要解释。麦天枢说：十个人有十个解释得不对。这两句话是并列的，就是说，一个人读一万卷书和行一万里路，收获是一样的。不是说先得读一万卷书，再行一万里路，那任何人都达不到这个境界了。他说我再给你加上一条：和一万个人说话。你现在就靠第三条，这和读万卷书的效果是一样的。这让我豁然开朗，我觉得现在我一直在充电，而且不比谁充得少。（110页）

野外调查很重要，要跟读书结合，但是比读书重要，或者说这也是一种读书。野外作业，还要身体好，思维要积极，手要勤，及时记录，包括记自己的思考。

更要跟在思想和学术前沿的人交谈。这比读书重要得多。写书评也是跟他们交谈，要评到点子上，识人跟识文结合起来。书评是很重要的一种论文。

还有，写过书的人来读书，心态和意见跟没有写过书的人来读，会很不同。所以，现在我们做学问的，如果还没有或者没有怎么写过书的，读起书来总有一些欠缺，还要尽快弥补。我要我的学生写书，一个目的是可以更好地读书。当然，书是分层次的，层次相近可以共振，层次很近可以谐振。我们写过一些书的人，还要进一步提高写书的层次。书评，可以评好，评不好，其实更可以讨论一些问题。不是说书评一定要说好话，也不是说书评一定要批评，而是要有好说好有不好说不好，而且说到点子上。我们要知书、知人。

我也写过一些书评，例如下面一些：

读头一年的《语文建设》（《语文导报》1987年第2期）



吕叔湘先生近年来的著述（《语文导报》1987年第6期）

总还要讲点儿朴学

——读刘洁修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博览群书》1990年第4期）

胡同名儿里有大学问

——读张清常《胡同及其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4期）

汉语现代风格学的建筑群

——读四本有关的新著（《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又见程祥徽等主编《语言风格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朗读导引》“序”（王为东编，语文出版社，1992）

领先科学——语言学的本质（《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2期）

读《汉语新词新义词典》（《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2期）

《中国语文简报》和《中国语文通讯》（《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论王希杰的语言学研究（《池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探讨语文教学理论的重要成果（《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4期）

品与时（刘田生《玉树后庭花》“序”，大连出版社，1994）

读《语法疑难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语言的潜、显及其他（《修辞文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语言文字应用》五年回顾（《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4期）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读高莉琴的《非线性音系学与维吾尔语音节的底层结构》（《语言与翻译》1997年第2期）

当代汉语简缩语词典“序言”（刘一玲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理论的魅力



——读《蔡富有语言学论文集》（《语言应用论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夏中华《语言与语言应用问题研究·序》（《语言应用论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播音主持工作者是播音主持重要的研究者

——第十届全国优秀播音与主持论文讲评（《播音主持艺术》（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的重要参考

——读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汉语学习》2000年第3期）

夏中华主编《语言学教程·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夏中华主编《现代汉语·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实践者关于中国播音学的新建设（《播音主持艺术》（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深入研究，提高水平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播音与主持论文讲评（《播音主持艺术》（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读黄岳洲先生的两本文集（（华中师大）《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同“非网络文学”比肩的标志

——评《蒙面之城》的语言（《中国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

关于文学语言的若干理论认识

——读高万云的《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汉语句群研究的精品

——读吴为章、田小琳的《汉语句群》（《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语言哲学对话”的精选、重组和发展



——序赵俐的《语言宣言》（赵俐《语言宣言——我们关于语言的认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语言交际》的书品

——序刘艳春的《语言交际》（刘艳春《语言交际》，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说语言交际

——序施春宏《语言在交际中规范》（《语言在交际中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我爱大海，我爱小河

——序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语言是小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还有，读书“不求甚解”不一定就是缺点。需要甚解就甚解，不必甚解就不要甚解，甚解也是相对的。

还有一个兴趣问题。有人说事先要有兴趣，事先能有多少兴趣呢？很多兴趣是做起来才有的。不读书对读书就老没有兴趣，读起来看，读起来了可能会有兴趣。一个人不是每天都精力充沛的，我们常常是做起来，渐渐地会进入佳境，兴奋起来了。其实，到我们这个程度了，兴趣不是特别重要的。应无所住而起兴，我对语言学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我对语言学并不执着。或者说我对许多都有兴趣。

还有说读书慢可以笨鸟先飞，那你飞呀，先飞呀，先飞就不一定笨。我们常常急功近利，凡事要先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才做，读书也是，这还叫探索吗？这还叫做学问吗？有些事情做起来并不复杂，可是思考做不做或者怎样做就花费了许多时间，思考的时候其实事情早该做完了。

我们说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不重视语料不可能有新的语感，读书少能有许多语感和论感？还有，提高论感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所以要有一些浪漫主义。例如，有人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提



出拟声词和感叹词不是任意的但是在语言里不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想一想拟声词和感叹词在语言里的地位是不是不很重要的。我们要重视拟声词和感叹词。拟声词拟的往往是动物和自然界的聲音。有的拟人的声音，但是从拟声来说跟拟动物和自然界的聲音没有什么不同。感叹词在语言的上线，“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回过头来我们进一步考察和认识拟声词和感叹词。还有说语言是线性的，跟时间的线性有关。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要照顾到前面说的和后面将要说的？是不是还要看看听话人的反应？即使念稿子，也不能看一个字念一个字。听人说话，脑子里有很多预想在不断运动，根据对方的话来调整，也不是走的一条线。我们进一步似乎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时间真的是线性的吗？如果思考下去，会对别的学科的有关的思考感兴趣了。

还有，我们读书有时候惊叹人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认识。这时候，需要读一读人家认识的来源。这是提高的一招。有的人把他认识的来源都告诉我们了，这是很有气度的。人家千辛万苦得来的真知灼见和来源，写成书或者文章告诉我们，我们轻易就得到了，哪有不好好读的道理？我们有了一些好的见解，也要把来源告诉人家。所以，说明读书的准确出处是很重要的，也是一种气度。



附录二

参考文献

1. 蔡富有、郭龙生主编《语言文字常用辞典》（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
2. 陈建民、陈章太《从汉语的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中国语文》1988年第2期）
3. 陈望道《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4. 陈原《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5. 陈原《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
6. 陈章太《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
7. 陈章太《胡乔木同志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特殊贡献——怀念乔木同志》（《语文建设》1997年第7期）
8. 陈章太《关于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的几个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1期）
9. 陈章太《近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几个热点》（《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1期）



10. 陈章太《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发展中的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2期)
11. 陈章太、于根元《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3期)
12. 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13. 程祥徽主编《澳门语言论集》(澳门社会科学学会, 1992)
14. 储泽祥《汉语规范化中的观察、研究和语值探求——单音形容词的AABB差义叠结现象》(《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1期)
15. 戴庆厦主编《社会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3)
16. 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北方论丛》编辑部, 1994)
17. 戴昭铭《叠架形式和语言规范》(《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
18. 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述评》(《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2期)
19. 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新词新语规范的基本原则》(《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1期)
20. 郭丽君主编《语言预测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21.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22. 韩少功、王尧《文学: 文体开放的远望与近视》(《当代》2004年第2期)
23. 季恒铨《读1991汉语新词语》(《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1期)
24. 李耳《老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25.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开明书店, 1952.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26. 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陈原〈语言与生活〉读后》(《读书》1980年第4期)



27. 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中国语言学会编《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28. 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
29. 李行健主编《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语文出版社，1993)
30. 李行健主编《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1994)
31. 李行健《〈语法修辞讲话〉写作的前前后后——访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语文世界》1994年第2期)
32. 李宇明《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
33. 李宇明《语言学习与教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34. 李宇明、周建民《“领域语言研究”开栏引言》，《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5. 梁衡《散文美的三个层次》(《只求新去处》，作家出版社，1994)
36. 刘艳春《广告语言的哲理化倾向》(《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7. 卢卓群主编《学生常用成语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38. 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39.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40. 牛印文等编著《广播电视语言应用》(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
41. (英国)皮特·科德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究所译《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42. 钱冠连《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 2002)
43.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44. 邱质朴《试论语言资源的开发》(《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
45. 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语文出版社, 2001)
46.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语文出版社, 1987)
47.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简明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1)
48.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写《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3)
49. 施春宏《语言在交际中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50. 史有为《异文化的史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51. 时间、乔艳琳主编, 崔永元、关秀玲、赵一工策划《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3月)
52.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1)
5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82)
54. 卫志强《当代跨学科语言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55. 《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人民日报》2001年6月6日)
56. 王存臻、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57. 王希杰《这就是汉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58.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59. 王心琳《学习与发展》(《播音主持艺术》(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60. 吴为章《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
61. W. I. B. 贝弗里奇著、陈捷译《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 1981)
62.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编《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1956)
63. 萧国政《世纪之交的语言文字应用之走势——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座谈会纪要》(《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4期)
64. 邢福义《语言学科发展三互补》(《汉语学报》2005年第3期)
65. 徐红燕主编《语言学家的故事》(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66. 徐思益等《语言的接触和影响》(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7)
67. 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
68. 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69. 许嘉璐《开拓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 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服务》(《语文建设》1998年第2期)
70. 许嘉璐《容纳 分析 引导 规范》(《文汇报》1999年12月30日)
71. 许嘉璐《未成集——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语文出版社, 2000)



附录二 参考文献

72. 姚喜双、郭龙生主编《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73. 姚喜双、郭龙生主编《媒体语言大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74.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75. 于根元、龚千炎、季恒铨、刘一玲编《广告、标语、招贴……用语评析 400 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76. 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 1996)
77. 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9)
78. 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 1999)
79. 于根元主编《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
80. 于根元主编《网络语言概说》(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81. 于根元《用好自动升级的程序》(《语文教学通讯》2001 年第 5 期)
82. 于根元、夏中华、赵俐等《语言能力及其分化——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
83. 于根元《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
84. 于根元《留心各种语言想象》(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85. 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3)
86. 于根元《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87. 于根元等《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88. 于根元《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汉语学报》2005 年第



2 期)

89. 俞士汶主编《计算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3)

90. 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批判“四人帮”扼杀〈现代汉语词典〉的罪行》(《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91.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语言文字应用论文集》(语文出版社, 1995)

92.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语言文字应用论文集Ⅱ》(语文出版社, 2004)

93. 袁贵仁《以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 开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新局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2001年第3期)

94. (美国) 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 张健民、唐建清译《塞莱斯廷预言》(昆仑出版社, 1996)

95. 张炜《能不忆蜀葵》(《当代》2001年第6期)

96. 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3)

97. 赵俐等《语言以人为本——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98. 赵俐《语言宣言——我们关于语言的认识》(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99. 赵俐等《语言的轮休和充电——第四轮语言哲学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100.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

101.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5)

10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103. 中国语文编辑部《词语评改五百例》(语文出版社, 1984)



附录二 参考文献

104. 周洪波《从隐性到显性——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辞书研究》1994年第4期）
105. 周洪波《新词语的预测》（《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
106. 庄莹《不规范的原因和规范的途径》（《学语文》1995年第4期）
107. 邹韶华《试论语法规范的依据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4期）
108. 邹韶华《论语言规范的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2期）



附录三

著述目录

敦煌变文“是”字用法分析（《中国语文》1965年第4期）

批判“语言有阶级性”谬论的锐利武器（《光明日报》1977年6月3日）

谈谈语言学研究跟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陈章太署名在前）

关于第二次汉字简化工作的一些意见（《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

合乎规范，通俗易懂

——从电影《李双双》语言谈起（《语文学习》1978年第5期）

评“统一祖国语言”这个口号（《中国语文通讯》1978年第2期）

消除引证病（《解放军报通讯》1978年第12期，与蔡富有合作）

江桥摇（《语文学习》1979年第5期）

谈谈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河南师大函授部《函授通讯》1979年第4期）

关于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几点认识（《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与曹澄方、林天庆、李仲英、王敏学、应培基合作）



重叠四字格杂议（《语文研究》1980年第1辑）

漫谈骂人话（《语文战线》1980年第3期）

语病札记（浙江师院《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3期）

○推广普通话简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

曹操与斯霞（浙江师院《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6期）

上海话的“勒勒”和普通话的“在、着”（《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

新闻报道要力求简洁（《新闻学习》1981年第3期）

艺术化的语文评论（《语文战线》1981年第3期）

语词札记（《新闻学习》1981年第4期）

说话的先后及其他（《新闻学习》1981年第6期）

○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与韩敬体、张朝炳合编，已发表的有《江桥谣》《曹操和斯霞》，新发表的有《方言和水土》《“南蛮鸩舌”》《置之庄岳之间》《周恩来同志鼓励侄女学习蒙古语文》《玄奘请学士润饰译文》）

滥用方言的轻重（《汉语拼音小报》1981年10月16日）

“心神”“忙乎”种种（《汉语拼音小报》1981年11月16日）

标题拉杂谈（《奉新教育》1981年第7期）

小说如何注释方言（《汉语拼音小报》1981年12月16日）

《驿路梨花》的两处用语（《语文战线》1981年第11期）

继续坚持和完成文字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语文研究》1982年第1期，陈章太署名在前）

有感于“五味瓶”（《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

说“全都……只有……”（《汉语学习》1982年第2期）

打草稿一议（《中学生语文报》1982年5月1日）

不要再贬低知识分子语言（《语言美》1983年1月25日）

答话和礼貌（《语文学习》1983年第2期）

文学作品的方言使用（《语文研究》1983年第3期）



喻体琐议（《修辞学习》1983年第4期）

毛病出在缺少语言学知识（《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

关于动词后附“着”的使用（《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口头禅（《大学语文》1984年第1期）

两面词语的某些一面性用法（《学语文》1984年第2期）

“是不是”之类的某些用法（《语文月刊》1984年第3期）

数量札记（《语文月刊》1984年第4期）

文言词语的使用（《语文月刊》1984年第5期）

重叠六题（《语文月刊》1984年第6期）

从“麒麟”和 giri 说开去（《字词天地》1984年第3期）

时点和时段不能随便相比（《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准确与含糊（《语文月刊》1984年第9期）

反问句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语文》1984年第6期）

也是顾此失彼（《词语评改五百例》，语文出版社，1984，已发表的有《毛病出在缺少语言学知识》《时点和时段不能随便相比》《有感于“五味瓶”》，岷新发表的有《引体跟本体的意思不一致》《试试看》《话要像人物说的》）

在京郊的土岗上

——在探索中前进之一（《汉语学习》1985年第1期）

从香山到延吉

——在探索中前进之二（《汉语学习》1985年第1期）

社会发展迫切要求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1985年第1期）

又一条路

——在探索中前进之三（《汉语学习》1985年第2期）

姓名学点滴（《字词天地》1985年第2期）

杨朔散文对话中的生动、简洁和机智（《大众修辞》1985年第2期）



语言表达中的更改（《学语文》1985年第3期）

○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陈章太署名在前）

请逻辑学帮忙

——在探索中前进之四（《汉语学习》1985年第3期）

从人机对话看人跟人对话

——在探索中前进之五（《汉语学习》1985年第3期）

从结构形式入手

——在探索中前进之六（《汉语学习》1985年第4期）

形式和意义相互验证

——在探索中前进之七（《汉语学习》1985年第4期）

男女标点有别（（港）《普通话》1985年第1期）

称谓男性化（（港）《普通话》1985年第1期）

咳嗽还有妙用（（港）《普通话》1995年第1期）

关于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再认识（《文字改革》1995年第5期，同曹澄方、林天庆、王敏学、李仲英、应培基合作）

从语言运用中寻找语法规律

——在探索中前进之八（《汉语学习》1985年第5期）

我们的语言学信息交流会（《语文导报》1985年第11期）

注重口语的调查研究

——在探索中前进之九（《汉语学习》1985年第6期）

把语法现象表现为数字

——在探索中前进之十（《汉语学习》1995年第6期）

另外几个侧面

——在探索中前进之十一（《汉语学习》1986年第1期）

寄希望于未来

——在探索中前进之十二（《汉语学习》1986年第1期）

文字改革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汉语拼音小报》1986年3月5



日)

王蒙小说设计的套话 (《语文研究》1996 年第 2 期)

无声的语言 (《学语文》1986 年第 3 期, 同刘一玲合作)

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更不应该滥用方言 (《中国语文天地》1986 年第 2 期)

淡绿的底色 (《修辞学习》1986 年第 3 期, 同刘一玲合作)

王蒙小说词语的仿造 (《语文月刊》1986 年第 5 期, 同刘一玲合作)

新时期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语文建设》1986 年第 3 期)

“乡音不改”另解 (《港》《普通话》丛刊 1986 年第 4 期)

王蒙和语言 (《语文建设》1986 年第 4 期, 同刘一玲合作)

王蒙小说语言札记 (《语文月刊》1986 年第 11 期, 同刘一玲合作)
他运用了十八般兵器

——论王蒙小说潇洒的语言 (《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 1986 年第 4 期, 同刘一玲合作)

子午卯酉, 一冬二东 (《港》《普通话》1986 年第 5 期)

致年轻的同行们 (《华中师大学报》1986 年第 6 期)

○语言学在您身边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6, 同王希杰合作, 已发表的有《漫谈骂人话》《艺术化的语文评论》《标题拉杂谈》《答话和礼貌》《喻体琐议》《口头禅》《姓名学点滴》《语言表达中的更改》, 新发表的有《文学作品中的计算》《有趣的体态语》)

读头一年的《语文建设》(《语文导报》1987 年第 2 期)

关于普通话方针政策的一些认识(要点)(《港》《普通话》1987 年第 3 期)

语用所基本情况介绍 (新加坡《华文》1987 年第 1 期)

动宾式短语动词的类化作用 (《句型 and 动词》, 语文出版社, 1987)

吕叔湘先生近年来的著述 (《语文导报》1987 年第 6 期)



说“一面应答”（《学语文》1987年第6期）

“这并不是夸张”（《语文月刊》1987年第11期）

“小报告”（《语文月刊》1987年第12期）

人称的他化、类化和个化（《语文学习》1987年第12期）

在探索中前进（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附录，语文出版社，1987，已发表的有之一至之十二，加十三“补记”，其中附《致年轻的同行们》）

“用嘴讲”（《语文学习》1988年第1期）

说“怎么样”（《语文月刊》1988年第1期）

人本位（（港）《普通话》1988年第1期）

“哪儿”和“干什么”（《语文学习》1988年第2期）

关于学生学习普通话倒流的问题（《语文建设》1988年第2期）

关于“地方普通话”（《语言美》1988年2月10日）

误注四例（《语文月刊》1988年第3期）

“李中央、王一般”（《语言美》1988年3月0日）

“一口气”（《语文月刊》1988年第4期）

喊出个惊叹号（《语文学习》1988年第4期）

修地球（（港）《普通话》1988年第2期）

“小雨小干，大雨大干”之类（《语言美》1988年4月10日）

铁转转（《语文学习》1988年第5期）

虚设（《语文月刊》1988年第5期）

他有待于写出更加成熟的作品（《修辞学习》1988年第3期）

问答链（《学语文》1988年第3期）

用A的话来说（《汉语学习》1988年第3期）

自行配乐说话（《语言美》1988年6月25日）

避同（《语文月刊》1988年第6期）

单用“居然”（《语文学习》1988年第7期）

“下的下干校”（《语文学习》1988年第7期）



三团糟（《语言美》1988年7月10日）

“波尔蒂尼不在！”（（港）《普通话》1988年第3期）

美容霜也要美容（《汉语学习》1988年第4期）

改词（《语文月刊》1988年第7期）

闷声大发财（《语文学习》1988年第8期）

不像话（《语文月刊》1988年第8期）

补对（《语言美》1988年9月10日）

“长得跟教育似的”（《语文月刊》1988年第9期）

请核对一下数（《中国语文天地》1988年第5期）

姓名化（《学语文》1988年第6期）

语法没有那么玄（《中国语文天地》1988年第6期）

不停地+V（《语法研究与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他的脑（《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第1期）

请尝尝黄桥烧饼（《汉语学习》1989年第2期）

不同层次的并列成分不能都用顿号（《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第2期）

纸头·石头·红布溜儿（（港）《普通话》1989年第1期）

他先一步踏入果园

——读张炜的《满地落叶》（《语言学通讯》1989年第

1、2期合刊）

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语文月刊》1989年第12期）

新词语旧用二例（《语文月刊》1989年第12期）

留心各种语言现象（《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

胖管（《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

黄河—摇篮—襁褓（《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

打岔（《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

男舞女（（港）《普通话》1989年第2期）



○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大连出版社，1989，同刘一玲合作，之前发表的关于王蒙小说语言研究的文章全都收入）

结巴磕子赶大车（（港）《普通话》1990年第1期）

黑葡萄般的眼睛（（港）《普通话》1990年第1期）

爸爸先生（《语文建设》1990年第1期）

一老二实（《语文建设》1990年第1期）

卖方便瓜（《语文月刊》1990年第1期）

活大该（《语文月刊》1990年第3期）

闭门羹（《语文建设》1990年第2期）

锄地工作（《语文建设》1990年第2期）

总还要讲点儿朴学

——读刘洁修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博览群书》

1990年第4期）

“敬告”用得好（《汉语学习》1990年第2期）

两毛钱意见（《语文月刊》1990年第5期）

天南海北新西兰（《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的的的（《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五冬六夏（《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叙述者同小说人物对话（《语文建设》1990年第3期）

礼品的别名（《语文建设》1990年第3期）

有趣的手（《语文建设》1990年第3期）

○新时期的推广普通话工作（语文出版社，1990，之前发表的关于普通话研究的文章的内容全部收入）

普通话与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街巷胡同名儿里有大学问

——读张清常《胡同及其他》（《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年第4期）



为“社会用语规范栏”说些话（《汉语学习》1990年第5期）

副十名（《语文建设》1991年第1期）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语文月刊》1991年第5期）

仿句（《语文月刊》1991年第6期）

文武反正法（《语文月刊》1991年第7期）

顺口溜（《语文月刊》1991年第8期）

发挥厦门优势，提高推普水平（《厦门民俗方言》1991年第2期）

什么是体态语？（《语言学百题》（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我对澳门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认识（《澳门语言论集》，澳门社会学学会出版，1992）

制订语言计划的若干原则（《澳门语言论集》，澳门社会学学会出版，1992）

○广告、标语、招贴……用语评析400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同龚千炎、季恒铨、刘一玲合编，已发表的有《美容霜也要美容》《“敬告”用得对》《请尝尝黄桥烧饼》，新发表的有《社会用语规范调查》《行情看少》《长幅四条》《触动了你哪一个神经？》《“否则放气”》《抛开都市生活的烦嚣》《“不夹不捧”还要活多久？》）

反衬关系正反例（《词语评改千例》，语文出版社，1992，已发表的有《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更不应该滥用方言》《请核对一下数》《他的脑》《不同层次的并列成分不能都用顿号》，新发表的有《用手抱》）

从方言吸取营养

——普通话新词语出现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汉语现代风格学的建筑群

——读四本有关的新著（《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



2 期, 又见程祥徽等主编《语言风格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朗读导引》“序”(王为东编, 语文出版社, 1992)

○1991 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主编)

领先科学——语言学的本质(《语言文字应用》1993 年第 2 期)

读《汉语新词新义词典》(《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 2 期)

○1992 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主编)

整理汉语新词语的若干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3 年第 3 期,

又见《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前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中国语文简报》和《中国语文通讯》(《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
纪念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本事与派头(《书法艺术报》1994 年 1 月 16 日)

语言文字应用的广阔天地(《语言文字应用》1994 年第 1 期)

论王希杰的语言学研究(《池州师专学报》1994 年第 1 期。又

见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1993 年部分广告用语分析报告(《语言文字应用》1994 年第 3 期)

文学作品中的新词语(《修辞学习》1994 年第 5 期)

探讨语文教学理论的重要成果(《语言文字应用》1994 年第 4 期)

○语言的故事(东方出版社, 1994, 同韩敬体、张朝炳合编,
为《语言漫话》增订本, 已发表的有《曹操和斯霞》《黑葡萄般的
眼睛》《方言和水土》《“南蛮鸩舌”》《置之庄岳之间》《顺口溜》
《“波尔蒂尼不在!”》《结巴磕子赶大车》《人本位》《周恩来同志鼓
励侄女学习蒙古语文》《玄奘请学士润饰译文》)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主编)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主编)

广告语言课题研究纲要(《语言文字应用》1995 年第 1 期)

品与时(刘田生《玉树后庭花》“序”, 大连出版社, 1994)

芦青河畔的姑娘们(语文月刊《1995 年第 4 期》)

读《语法疑难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



语言学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学语文》1995年第4期）

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语言学（《锦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

新词新语和语言规范（《语文建设》1995年第9期）

○中国语文大词典（华夏出版社，1995，主编）

○广告语言规范（语文出版社，1995）

语言应用研究的队伍建设（《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1期）

说“友”（《语文建设》1996年第3期）

反问句的某些形式标志（《语法研究与探索（七）》，商务印书馆，1996）

语言的潜、显及其他（《修辞文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0年代大众语讨论再认识（《绍兴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失态的季节》里的佛道儒用语（《汉语修辞与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

语言文明研究回顾（《语文建设》1996年第6期）

语言传意和传意者（《语言与传意》，香港海峰出版社，1996）

解放以来的语文知识大普及（《襄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快节奏（《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7月15日）

广告语言课题研究报告补（《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3期）

五四白话文运动再认识（语文现代化丛书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我怎样研究作家作品语言（《锦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相声入小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11月23日）

《语言文字应用》五年回顾（《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4期）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已发表的单篇和内容有《语言文字应用的广阔天地》《探讨语文教学理论的重要成果》《广告语言课题研究报告》《广告语言课题研究报告补》《语言学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语言学》《语言应用研究的队伍建设》《30年代大众语讨论再认识》《语言文



明研究回顾》《解放以来的语文知识大普及》《五四白话文运动再认识》《〈语言文字应用〉五年回顾》)

浪漫的和声(《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7 年 2 月 25 日)

语言的人文性(《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 年第 1 期,署于根元等)

给《中国可以说“不”》后半本做校改(《中国语文》1997 年第 1 期)

意识流(《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7 年 4 月 19 日)

新格言(《南方农村报》1997 年 5 月 5 日)

狭义的人(《南方农村报》1997 年 6 月 9 日)

《体态语》“序”(周国光等编著,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美和漂亮(《南方农村报》1997 年 6 月 23 日)

“走社会”(《南方农村报》1997 年 7 月 28 日)

译音褒贬(《南方农村报》1997 年 5 月 15 日)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读高莉琴的《非线性音系学与维吾尔语音节的底层结构》(《语言与翻译》1997 年第 2 期)

动态:语言的本质(上)(《语文建设》1997 年第 8 期,署于根元等)

动态:语言的本质(下)(《语文建设》1997 年第 9 期,署于根元等)

词语的时空分布(《世界汉语教学》1997 年第 4 期)

语法学界六君子(《中国教育报》1998 年 1 月 20 日)

“后悔药”之类(《南方农村报》1998 年 1 月 27 日)

加强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建设(《语言文字应用》1998 年第 1 期)

鸡一嘴鸭一嘴(《南方农村报》1998 年 3 月 3 日)

李宇明记录女儿学话(《中国教育报》1998 年 3 月 3 日)

○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语文出版社等,1998,主编,写 14 篇)

当代汉语简缩语词典“序言”(刘一玲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用手指尖“鼓掌”(《南方农村报》1998年4月21日)

三寸不烂的舌头(《南方农村报》1998年5月26日)

西湖记得范继淹的歌声(《中国教育报》1998年5月26日)

金有景“腌鸭蛋”(《中国教育报》1998年6月9日)

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语文建设》1998年第6期,同施春宏合作)

邢福义反思(《中国教育报》1998年8月18日)

“三个发挥”是个有机的整体(《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3期)

应用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

以能者为友(《中国教育报》1998年9月1日)

关于普通话能力(《语文建设》1998年第9期)

○广告语言教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主编,写第九章)

20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压缩后又见《科学时报》1999年3月10日)

○实用语文规范知识小词典(语文出版社,1999,主编,写正文约五分之一)

“消极规范”和“积极规范”(《中国教育报》1999年2月23日)

○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署于根元等)

○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主编)

中国播音学的奠基和发展(《播音主持艺术》第1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语言应用论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新发表的有《编写教材〈应用语言学〉的几点设想》《中国播音学的奠基和发展》《理论的魅力——〈蔡富有语言学论文集〉序》《夏中华〈语言与语言应用问题研究〉序》《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教学》《体态语和修



辞》)

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教学 (《汉语学报》2000 年第 1 期)

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的重要参考

——读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汉语学习》2000

年第 3 期)

研究应用语言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于根元主编《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发展趋势和播音主持艺术

——1999 年 12 月 1 日在第 20 期全国广播影视系统专

业干部(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培训班上的讲课 (《播音主持艺术》第 2 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陈醇访谈录

——著名播音员主持人系列访谈 (《播音主持艺术》

第 2 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关山访谈录

——著名播音员主持人系列访谈 (《播音主持艺术》

第 2 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夏中华主编《语言学教程·序》(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夏中华主编《现代汉语·序》(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播音主持工作者是播音主持重要的研究者

——第十届全国优秀播音与主持论文讲评 (《播音主持艺术》第 2 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我从对外汉语教学学到了许多 (张德鑫主编《回眸与思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实践者关于中国播音学的新建设 (《播音主持艺术》第 3 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深入研究, 改进方法, 提高水平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播音与主持论文讲评 (《播音



主持艺术》第4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中国网络语言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主编）

○网络语言概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主编）

读黄岳洲先生的两本文集（华中师大《语文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用好自动升级的程序（山西临汾《语文教学通讯》2001年第5期）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

同“非网络文学”比肩的标志

——评《蒙面之城》的语言（《中国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

○语言能力及其分化

——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同夏中华、赵俐等著）

关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方法的若干认识（《语言文字学论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应用语言学研究（林焘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卷》
大条，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关于文学语言的若干理论认识

——读高万云的《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毕节师范
高等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新时期文学作品语言的发展（杨建波主编《大学语文》，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2）

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1期。同
时署名的有王铁琨、孙述学）

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3期，
陈章太署名在前）



我怎样研究大众媒体语言（《媒体与语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新收《汉语句群研究的精品——读吴为章、田小琳的〈汉语句群〉》《应用语言学科的几个前沿问题》《广告语言研究》《语言规划和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整理网络词语的若干思考》《网络语言冲击波》《播音主持语言研究六题——2001年2月28日~4月4日在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00级语言学研修班上讨论的发言》《学术论文写作的几个问题——2000年11月23日在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00级语言学研修班上的讲课》）

○实用语法修辞（修订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同苏培实、徐枢、饶长溶合作）

○留心各种语言现象（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札记类基本收入）

○语言是大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主编）

“语言哲学对话”的精选、重组和发展

——徐赵俐的《语言宣言》（《语言宣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10月）

○唤醒语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长江学术》2004，总第6期）

○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关于媒体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媒体语言大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在语言学的道路上——于根元自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我的学生出书了（《学者的声音》，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关于当代播音主持教学的几点建议（《播音主持艺术》第5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主编）

说语言交际

——序施春宏《语言在交际中规范》（《语言在交际中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语言交际》的书品

——序刘艳春的《语言交际》（《语言交际》，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我爱大海，我爱小河

——序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语言是小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

○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主编）

关于“语言全息发展论”（《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

○播音主持语言研究十篇（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后 记

这本书是滚动了四年多完成的。

2001 年秋天起，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每年给新入学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博士生上“应用语言学前沿”这门课。上了四轮了。我给大家基本材料，分好题目，大家轮流主讲，我再有针对性地补充说明。大家的发言不少发表了。我也不断整理讲稿。这本书里，一是有基本材料。原来的基本材料都散见于各处，容易丢失。这次，我把基本材料放在书里了。二是有我的讲稿。前四次我是怎么讲的呢？一是有针对性，主要针对学生主讲里表现出来的认识和说法。第二是说明背景，主要是跟基本材料有关的事、人和说法。第三是补充最近的情况，介绍新的见解，新的问题。基本材料本来就是供大家讨论用的，不是游离的。这本书里的材料跟我的讲稿还是结合的。这本书带有一些现场讲的味道，可能也好读一些。还要说明的是，“代前言”是 2005 年 6 月 22 日的讲稿；第一讲的“开头的話”，是 2001 年 9 月我给博士生上第一堂课的讲稿；第十讲的“关于站在应用语言学的前沿”，是我 2004 年 12 月 29 日在 2004 博士生“应用语言学前沿”课最后一课的讲稿。

这本书的附录里有一个是《关于读书》。我给 2001、2002、2003 级的部分博士生在二年级的时候上了《语言学重要著作研究》课。近来博士生的课集中在第一年，我估计以后我也不上这门课了，我把 2004 年 9 月 2 日在 2003 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



“语言学重要著作研究”第一课上的讲课和 11 月 4 日最后一堂课上的总结发言附在这里，供有关的学生参考。

我曾经把 2001 年 2 月 28 日～4 月 4 日在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2000 级语言学研修班上讨论的发言整理成《播音主持语言研究六题》，收在我的论文集《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里。其中说到：“讨论应该有不同意见，我们只不过希望意见有一定的根据。学术讨论可以有不正确的意见，这是正常的，必然的。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轻松的状态。”“我们先摆问题。问题是指存在而需要解决的，包括可能的潜在的问题。梳理问题就是进步。问题是分层次的，交叉的。有时候一个问题通了，许多问题跟着通了；有时候别的许多问题通了，这个问题才通了。所以有时候是一通百通，有时候是百通一通。有时候是一下子通了，多半是渐渐通的。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提高了，这也是提高了学术。对老大难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学术上提高得就比较多了。”“做学问无非是从实践中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跟别人交流，会有碰撞，要尽量选取别人的好的哪怕是很少的好的意见。学习的方法，大的说，就是择优，把别人的好的都吸取过来。”（以上 268 页）“我们关于实际的、前沿问题的讨论，还有队伍准备的重大意义。”（269 页）“我们要学会碰撞。一、可以发现自己哪些地方比较脆弱、松散，经不起碰撞。二、还可以发现哪些地方比较牢固，经得起碰撞，但是可能要加固。三、碰撞实际上是一种交流，要进行选取，要取长补短。四、碰撞才能出声音，‘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当’，才能出彩，才能放电。五、碰撞才能出现新的东西，物质运动要加速，猛烈碰撞的一刹那可能出现新的东西，记下来很有价值。碰撞不一定意味着打倒。体育竞技不一定是拳击，可以是跳高。拳击是一个打败一个。跳高是横杆倒了跳的人失败了，横杆没有倒跳的人成功了，是‘共存’，是‘双赢’。”（270 页）“碰撞就是运动，是一切，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形式。”（271 页）“交际讲究合作



的原则。要让人放松，要采取朋友的态度，用真诚的语言，才有亲和力。要能够听懂别人的话，善于听话，善解人意，也不是一味说好话，而是褒贬有分寸。还需要机智，会巧妙应对。”（278 页）“对提问的人要有礼貌。对于对方不够礼貌的话你能有礼貌地回答，才是你的气度。面对刁难，面对困境，这是考验，这是现出人格魅力的关键。要想到面对的是大众。对方也是大众的一员。面对难题，正是你出彩的时候。处理不好，也是暴露你人格缺陷的时候。真诚，首先就是要特别尊重别人。人格，就是人的品格。魅力，就是吸引力，团结周围的人包括不同意见的人的力量。只有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帮人帮到点子上，也真能帮助人，才有吸引力、凝聚力。遇到难说的问题，不避开，还非得说，说到受众的心里去。”“分寸感，就是到位、准确，是人格魅力的重要表现。实事求是是一种品格，是一种魅力。”（以上 280 页）

前沿，也是重大问题的集中点。

提出很多重要问题，也是学科和学者开放、开拓和生命力的标志，也是学科和学者的任务。

有的问题可能是说宇宙里还有黑洞。黑洞不要修补，不能修补，要我们重新认识宇宙。问题大了，我们要重新认识了，甚至觉得没法办了，就有价值，有意思。我们总要面对现实吧，总要实事求是吧，总比臆想的、不符合事实的所谓“整齐”还是要好。

我们不要没有问题硬找问题，碰到问题也不要掩盖、粉饰、回避。问题是学科的生长点，是认识的生长点。

人总是要思考的。思考，发现了问题。问题，又推动了思考。

其实，生活在臆想的、不符合事实的所谓“整齐”里是很憋气的。

少鸿说：“其实，写作又何尝不是一种透气的方式？”（《让心灵透口气》，《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4 年第 3 期 173 页）我有同感。探索，“又何尝不是一种透气的方式”？探索，如同呼吸一样



重要！

这本书完成之后，可能有两篇相关的论文。一篇大概是《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例释》，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本书里梳理的主要问题的精选和拓展。可能 2006 年初发表在《长江学术》上。还有一篇是《说“联想”》，是从又一个角度讨论“语言全息发展论”的，也是一个语感和论感相互促进的实例。可能 2006 年初发表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

这本书是一本专著。书稿将在我们 2005 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课上使用，2006 年 1 月出版。可以用作有关博士生的教材。也可以用作有关硕士生的教材，不过讲解的时候要做一些调整。

探索不一定局限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探索不一定要写专著。少说话或许是更好的透气。

我完成这一本专著，有一种大轻松，大解脱。关于应用语言学，我以后大概不会再写什么专著了。关于语言学，我以后大概也不会再写什么专著了。谢幕、急流勇退、金盆洗手、下台、逃遁，无论理解成什么，说成什么，我这方面的任务完成了。大轻松，大解脱，真好。

好了，我要去看《超级女声》了。

于根元

2005 年 8 月 26 日北京方庄